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DE MARI NOSTRO POST DELETAM ROMAM

（上册）

[日] 盐野七生◎著

田建国 田建华◎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册）

作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国,田建华

ISBN:978750864498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卷首语

海盗

在日语中，只有一个词语可以表示结伙横行海上、袭击其他船只和沿岸居民、进行抢劫和绑架的海上盗贼，那就是“海盗”。

但在日本之外，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海盗。以英语为例，有pirate和corsair。

英语pirate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pirates，进入罗马时代后演变为拉丁语的pirata。在拉丁语的长子——意大利语中，pirata一词至今未改其貌。在意大利语和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中，海盗一词的词源都是古代拉丁语。这表明这种海盗古已有之。

然而，corsair一词则不同。英语中的corsair源于拉丁语的cursarius，但这个拉丁语词既非源于古希腊语，也非源于古罗马人所操的拉丁语，而是进入中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这个中世纪拉丁语词派生出了后世西欧诸国表示此义的词语：

意大利语corsaro

法语corsaire

英语corsair

德语Korsar

由于意大利人与中世纪地中海主人公之一的海盗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关系，这两个表示海盗的词在意大利语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Pirata是不为官方公开认可的海盗，而corsaro则被官方公开认可。

前者是以获取自身利益为目的从事海盗行为的人。

后者则指虽然从事同样的海盗行为，但其背后，无论官方是公开认可还是默认，这些人都受到国家和宗教的控制。所谓corsaro被认为是会带来公益的海盗。近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著名的例子。

在“罗马治下的和平”时代的罗马帝国，只有pirata一种海盗，他们是单纯的罪犯，可予以惩罚。也许在只承认法治国家的罗马人看来，即使是为了国家利益，绑架无辜之人，抢夺他们财产的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拉丁语用cursarius一词表示这种意义上的海盗。这一词语不是古罗马人的拉丁语，而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拉丁语。语言上的这个情况似乎证明了上述史实。

在日语中只有海盗一词，意思上没有pirata和corsaro的区别。我想个中原因，大概是日本人绝对不是可以与罗马人比肩的法治民族，日本也没有苦于corsaro式海盗的历史。对日本人而言，只有pirata一种海盗。也许因为这一点，在外国语译成日语的辞书中，pirata和corsaro这两个词都被译为“海贼”(注)。

日语辞书编纂者的心情也并非不能理解，无法明确区分这两种海盗的情况太多了。先是作为corsaro参加海战，归途中摇身一变成为pirata，袭击回程时经过的沿海村镇，返航时整船装满了掠夺而来的财物和俘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这也是人类世界秩序崩溃时代的特点之一。把单纯的犯罪和有大义名分的犯罪区别考虑，而人们对此并不质疑，这本身就意味着法的权威的堕落。

在本书中，不论是pirata还是corsaro，我都只能用“海盗”一词来表示，使用日语写作也只能如此。

最后补充一句。海盗船的桅杆上高挂着黑底白色骷髅旗，这样的海盗，可能是加勒比海的海盗。即使是所谓加勒比海盗，也不过是小说和电影里的臆测和虚构。

---

1. 海盗，日文汉字写作“海贼”。——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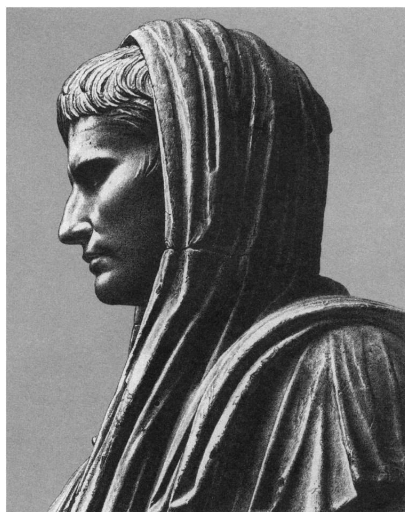
序

罗马市的火车终点站附近，有一座被称为“玛西摩宫”（Palazzo Massimo）的美术馆。在罗马市，国立的、市立的美术馆比比皆是，通常都以被辟为美术馆之前的建筑物名称来称呼。例如，主要展示希腊美术的阿特姆彼斯宫（Palazzo Altemps），陈列着较多文艺复兴时代展品的巴贝里尼宫（Palazzo Barberini），而朱利亚庄园（Villa Giulia）则多有伊特鲁里亚的美术藏品。玛西摩宫内充满了古代罗马人的嗜好之物。

走进玛西摩宫大门，登上级数不多的台阶，透过玻璃朝院里望去，便能看见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立像。主导宗教祭祀是罗马皇帝的重要任务，奥古斯都的这尊塑像是以洁白托加袍的一端裹着头的形象，表现出浓郁的罗马情调。最近，这座全身立像背后的墙上，出现了下面一段文字：

> 每个人想向神祈求的一切，神想赐予人类的一切，奥古斯都都准备了，并保证这样的神赐经久不绝。
>
> 那就是坚信劳动必得报偿，就是对神助人们努力的信心，就是对财产不会被任何人剥夺的安心，就是每个人对人身安全的放心。

这段文字摘自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所写的《历史》一书。在活到77岁的长寿皇帝奥古斯都眼中，他属于儿辈或孙辈。他虽然留下了名为“历史”的一本书，但却连元老院议员都不是，也不是以教育或写作为业的知识分子阶级中的一员。他的大半生都在奥古斯都之后的第二代皇帝提贝里乌斯·尼禄手下为将，最终似乎官至大队长。用现代的话说，他大约是罗马帝国的中层管理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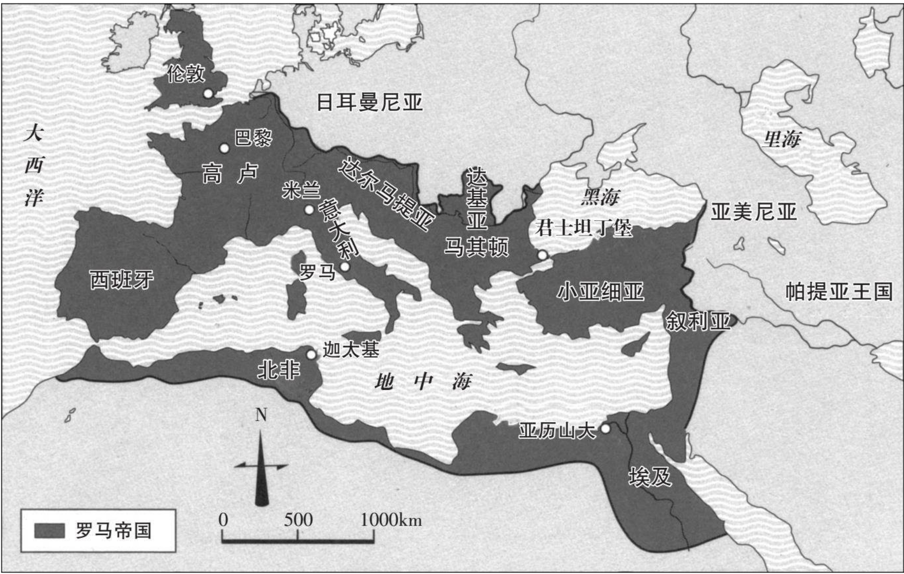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既不属于统治阶级，也不属于对统治阶级多有批评的知识分子阶级。但他跟随提贝里乌斯·尼禄走遍了帝国各地，这些经历使他精于人情世故。他一辈子对政治的看法至为单纯，只有善政与恶政之别，而与政体是共和或是帝制这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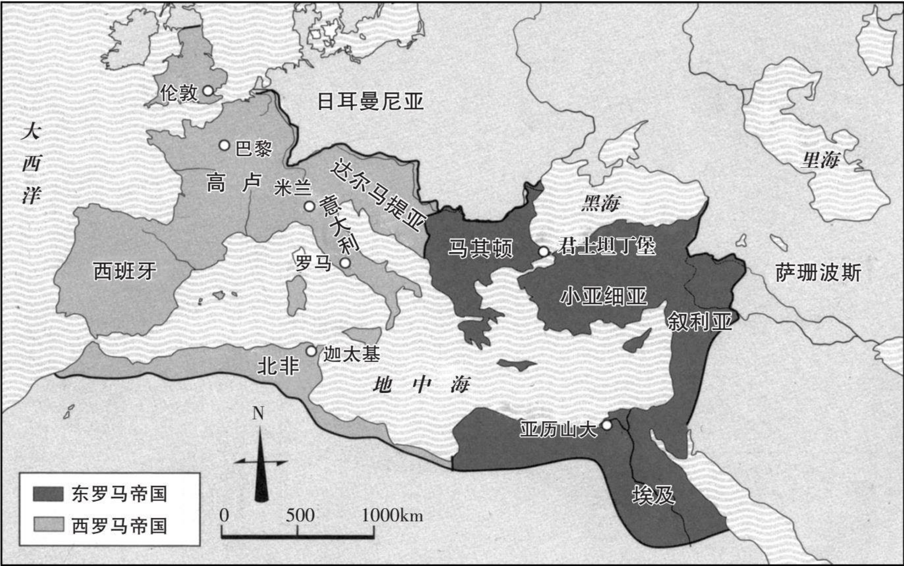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死后，帕特尔库鲁斯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是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初期一生完满的人给予皇帝奥古斯都的评价。没有别的什么评语能够如此直率、如此简洁地评价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治下的和平”了。或许因为他是活在现实中的一介武夫，才能做出如此评价。

可是，荣枯盛衰既为历史之道，罗马帝国也概莫能外。作为罗马人建立的国际秩序，“罗马治下的和平”也已经成为过去。不过，人类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停止祈祷。如果不能指望统治者实现人类的根本愿望，剩下的就只有依靠神了。这个神不是可以与其他神祇同在的多神教的诸神，而是断然拒绝与其他神祇同在的一神教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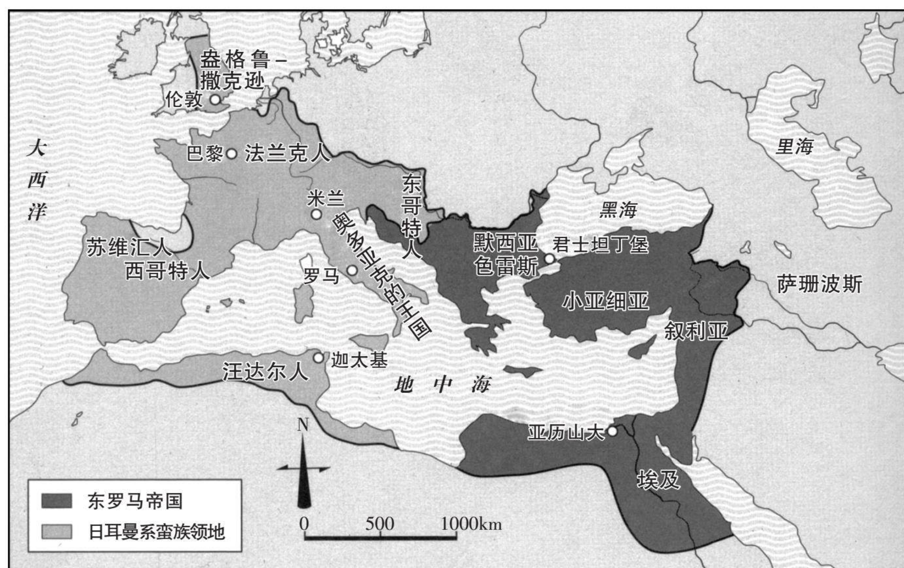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一神教在地中海的两岸隔海相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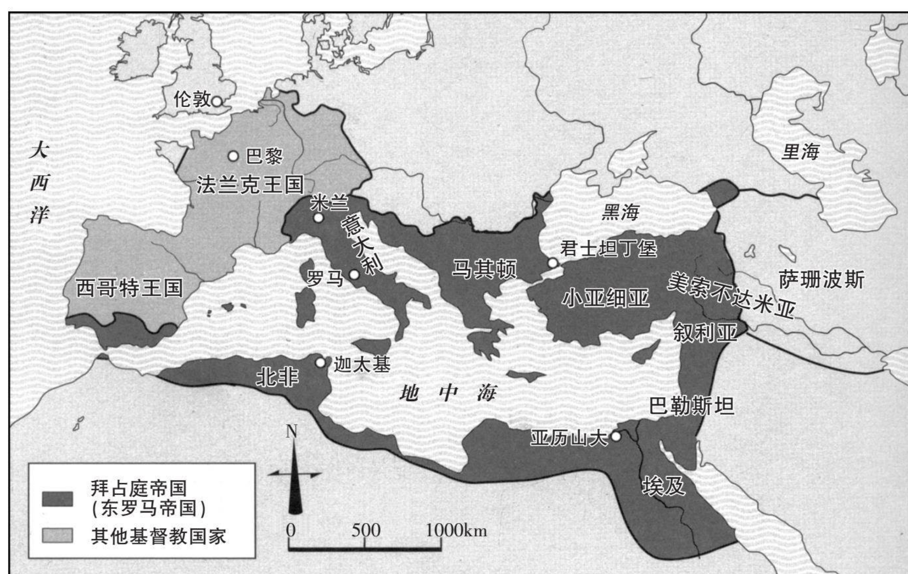
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1、2世纪）



狄奥多西皇帝死后东西分治时代的罗马帝国（4世纪末）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东罗马帝国（5世纪末）



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不久的拜占庭帝国（6世纪后半叶）

第一章
内海向界海的演变

伊斯兰抬头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在统治长达37年之后于公元565年去世。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帝”，不是因为他让人编撰了古罗马时代制订的众多法律之集大成——《民法大全》，而是因为他成功地从476年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新统治者北方蛮族手中夺回了意大利半岛和北非。因为这一点，历史上称他为“再征服者”。

然而，蛮族盘踞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这些曾经的罗马领土的状况并未改变，说他再次征服有过誉之嫌。不过，意大利半岛是罗马帝国的本土，北非又是罗马的粮仓，可以说，他收复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留下的主要地方。



6世纪到7世纪的意大利半岛（采自A. Giardina、G. Sabbatucci，V. Vidotto，Manuale di Storia Vol. 1, II Medioevo）

但是，这位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后仅3年，伦巴底人便南下意大利。东罗马帝国在长达20年与哥特人进行的意大利半岛争夺战中已经耗尽了气力，还要在东线应付没完没了的针对波斯的战争，再要驱逐新来的北方蛮族伦巴底人已经力不从心。伦巴底人也无力完全称霸意大利半岛。结果，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希腊人统治的地盘与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伦巴底人统治的地盘便逐渐在意大利半岛犬牙交错，共生共存了。这种状态在被统

治一方看来，只意味着不安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难以生存的时代。

570年，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不过5年，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他于613年开始传教，632年逝世，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使半个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化了。先知穆罕默德似乎还有武者之才。

先知死后便是其继承者哈里发（khalifah，伊斯兰教领袖）统率的时代。“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其成功相当惊人。两年后，他便完全称霸阿拉伯半岛，遂将目标北移，先是巴勒斯坦，进而叙利亚。他于635年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城市大马士革，并迁都至此。翌年又战胜前来迎战的拜占庭帝国正规军。在700年里一直是罗马帝国东部要冲的叙利亚被伊斯兰化。此后他马不停蹄，东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西向小亚细亚纵深进攻，南向埃及，连续闪电进击，所向披靡。

伊斯兰势力于公元642年攻陷亚历山大，使埃及伊斯兰化。仅仅两年之后，又征服了的黎波里，将现在的利比亚地方伊斯兰化。其后伊斯兰势力没有停下称霸北非的步伐，公元698年后征服了迦太基。这时，北非全境已处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了。公元670年，伊斯兰势力在现今突尼斯境内突尼斯以南150公里的地方开始建设北非最早的阿拉伯人城市，取名凯鲁万（Kairouan）。他们无疑打算把这里作为扩大伊斯兰势力的前沿阵地。

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公元710年，在攻陷迦太基，完全称霸北非之后，伊斯兰势力就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转而开始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征程。但是，在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企图把伊斯兰化的巨浪推向整个高卢时，法兰克国王前来迎战，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普瓦捷之战”，遏止了这一浪潮。在后世看来，这一“遏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欧洲免于伊斯兰化。在当时急剧扩张的伊斯兰势力面前束手无策的人们大概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尽管是暂时的，也总算是让他们停顿了一下。

好似在巨幅白纸上泼墨一般的伊斯兰化浪潮，在中东更加彻底。先是罗马帝国，接着是拜占庭帝国的宿敌波斯。萨珊王朝虽已衰落，但也实在是“其亡也忽焉”。就连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被注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包夹、中东强国经常作为根据地的地方，这个一直是东方文明母体的地方，也被伊斯兰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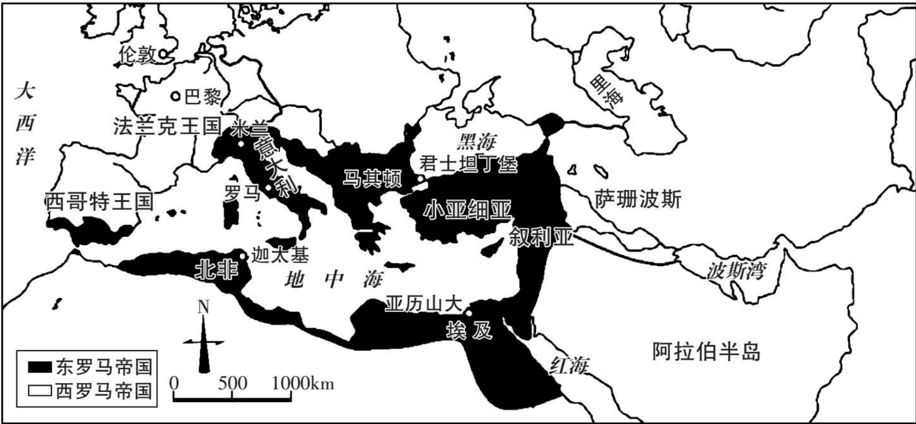
不知是阿拉伯人没有心情把波斯的首都当作自己的首都呢，还是他们认为应当新建伊斯兰的首都，公元762年，他们舍弃了以往所有帝国都在此建都的泰西封，在距此仅有40公里的地方建设新首都，取名巴格达。首都随即从靠近地中海的大马士革迁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西岸新建的巴格达。其间还两次进攻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兰势力

不但灭掉了长久统治东方的波斯帝国，并已强大到可以扼制正式名称还叫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咽喉的程度。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的百年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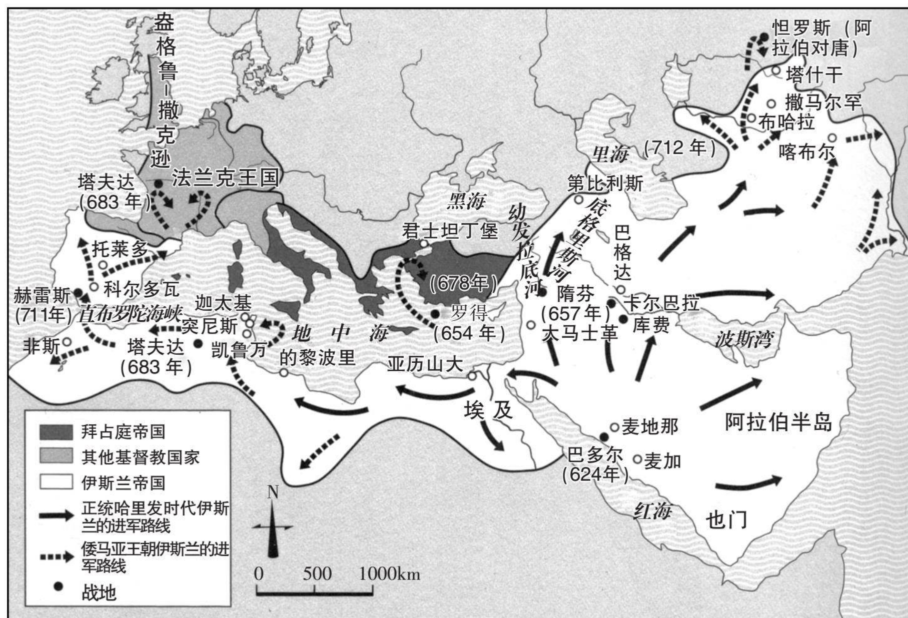
伊斯兰势力迅速扩大的原因，根据某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尽在一事之中：

“这是新兴宗教常有的突破力量与阿拉伯民族的征服欲合为一体的结果。”

换成口号式的说法就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



公元565年查士丁尼皇帝去世当年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



7、8世纪的伊斯兰化浪潮（采自A. Giardina，G. Sabbatucci，V. Vidotto著Manuale di Storia Vol. 1, II Medioevo）

这是基督教方面的看法，伊斯兰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处在1300年后的现代，真正的伊斯兰教义仍然感动着每个人，这才是原因。时至今日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在说：真正的伊斯兰教厌恶暴力。这一说法似乎也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双方可以相互接近的起点。

然而，在直到最近的漫长岁月中，现实却不是这样。

“当抵抗……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指犹太人、基督教徒），你们要与他们战斗。”（《古兰经》第九章“忏悔”第29～30节）

“遇到不信道者的时候，你们应当斩杀他们，你们既战胜他们，就应当俘虏他们。”（《古兰经》第四十七章“穆罕默德”第4节）

基督教世界将“圣战”正当化是接近中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但在罗马帝国后期盛行的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方面的“强制”。无关人性是好是坏，在正视人性现实的思想复活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并未直接指向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

“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

意思是宗教不论说教多么正确，如果不具有强迫他人的力量，就不会成功。

在宗教夺取现有世俗国家的权力方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类似，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承认的宗教费时300年。与此相比，伊斯兰教得天独厚。

基督教当初的对手是强大而尚能充分发挥功能的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而伊斯兰教面对的是步入衰落期的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

波斯帝国因东北蛮族的侵略和与拜占庭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而疲惫不堪，拜占庭帝国也与此类似，加之东方基督教独特的教理论战，教会内部也处于分裂状态，相互憎恶不已。

论战起于耶稣基督是神还是具备神性之人。因为论战，拜占庭帝国的两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主教甚至公然敌对。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国家，主教相争对一般民众而言，既然领袖之间是敌对关系，民众相互之间也成为仇敌。

听闻亚历山大被伊斯兰势力占领的消息，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居然走上街头欢呼庆祝。

除了帝国内部分裂，拜占庭帝国还存在贪污和重税，这是它的特质之一。恶政如此深重，不满自然在人们中间蔓延。伊斯兰教的渗透也就无须像基督教那样需要300年的时间。绝望的人会去寻找值得依靠的对象。

深远的教义也许会净化内心，赐予死后的安心，但却不能给活在现世的人以足够的力量采取行动。而具体现实的好处，往往会使人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徒苦于苛捐杂税，他们一定会想，做一个伊斯兰教徒会把自己的烦恼一扫而光，这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只要成为伊斯兰教徒，就可以不用再向拜占庭帝国缴税了。

撒拉森人

无论在利比亚、突尼斯，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地中海阳光灿烂、风平浪静，展现在眼前的这片景象自古未变，直到21世纪的现代。事实上，地中海已成为谋求生路的“路径”，难民不惜铤而走险把命运交给橡皮艇和破船，渡海前往欧洲各国。眼下热门的是前去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距今1300年前的8世纪，撒拉森人镇压了北非之后，并没有把展现在眼前的地中海视为挡住去路的“壁障”，而是看作自己面前的一条“大路”，这也是

相当自然的事情。

所谓撒拉森人，来源于古希腊语“Sarakenoi”，罗马人称其为“Saraceni”，自古为人所知。这个称呼并非泛指所有阿拉伯人，似乎单指住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他们只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古代撒拉森人袭击乘坐沙漠之舟——骆驼往来的商队，抢劫货物，或是以保护为名收取过路费，也有人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中充当雇佣兵参战。根据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后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说法，公元378年，在著名的哈德良堡之战中，罗马军队在与北方蛮族的战斗中惨遭大败，连皇帝都战死在沙场之上。战场上，罗马方面英勇善战的就数撒拉森士兵。当时，撒拉森人是站在基督教徒一边战斗的。

打那以后，撒拉森人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消失了，直到200年后才因先知穆罕默德而再次现身历史。此后，伊斯兰化的大潮所到之处，无处不有撒拉森人尖兵。地中海对岸基督教世界的居民，尤其把镇压北非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称为“撒拉森人”，他们也许回忆起了古时的称呼。这样一来，经过中世纪1000年的漫长岁月，这个称呼固定下来，它不仅指阿拉伯人，也用于称呼居住在北非的全体伊斯兰教徒，包括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成为伊斯兰教徒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

如果想出海获取生活食粮，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做商人，要么当海盗。在食物保存只有干燥或盐渍这两种方法的时代，从事渔业并不是个好出路。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不知道古罗马盛行的牡蛎养殖和大规模鱼池养鱼的方法。这不是因为技术被人遗忘。农业是典型的需要实实在在沉下心来投入其中的产业，和平和安全保障是最重要的条件。在中世纪，这些条件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不出海即能生存，就不会有人去风浪中玩儿命。古代的北非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粮仓，是葱郁富饶的农耕地带，今天已无从想象。可是这久已成为过去。北非失去了和平与安全，帝国灭亡后，占居民大半的民族已不同于帝国时代。他们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这些流浪民族和沙漠民族历史悠久。还有摩尔人。尽管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罗马帝国子民，但绝称不上是农耕民族。这些民族在传统和历史上都不是天天下地劳作，以期收获的农耕民族。

地中海时常风平浪静，阳光充足。这些人成了地中海南岸广袤地区的“主人”，能迅速获利的海盗业对他们自然更有魅力。而且，他们新奉的宗教已把加害异教徒的行为视为正当行为。

对伊斯兰教徒来说，国家、民族、人种都不是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信不信

仰伊斯兰教。以前的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今后要转变为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想法，世界只有“伊斯兰之家”和“战争之家”这两个家。“伊斯兰之家”成员的职责是去“战争之家”战斗并取得胜利，从而扩大“伊斯兰之家”。

基督教并非不重视，而是最重视推广耶稣的教义。这一点是基督教与其母体犹太教的重大差异。不过，推广教义的“传教”是主教、祭司等教会专业人士的职责，而不是每位信徒的职责。与此相反，在伊斯兰教中，这也是一般教徒的职责。于是，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即使是对异教徒的敌对行为也会与“圣战”（jihad）联系起来。既然相信《古兰经》是唯一圣书，这样不也是自然而然的吗？不过，“海盗”的意思却由此发生了变化。

海盗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徒的海盗第一次袭击基督教世界是在公元652年。伊斯兰船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出发，袭击了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叙拉古，大肆破坏、掠夺，绑架了800名男子和妇女，在亚历山大的奴隶市场上出售。这就是此后戕害地中海千年的撒拉森海盗之始。

不过，我想这不过是一次偶发事件。地中海再大也是内海，风向易变，老练的水手也经常会有行船失控，卷进涡流的危险。专程从地中海东边的亚历山大远道来到西边的叙拉古，只是为了海盗的勾当，这种理由不能让人信服。况且，回程时船上满载掠夺来的财物和人口，却不停靠北非的任何地方，直接回到亚历山大。夏天，地中海大多是西风劲吹的日子，尽管人、货可以一起上船，伊斯兰船的船舱里可以塞满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但这时期沿途的北非却不是可以放心停靠之地。要知道，虽然伊斯兰打下了的黎波里，已经控制了利比亚，但突尼斯还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北非要港迦太基是在公元698年才投降伊斯兰的。

虽然突尼斯在整个中世纪中与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海盗的重要基地，但突尼斯在7世纪末才彻底完成伊斯兰化。我认为，这就是7世纪中叶袭击叙拉古事件以后长达50年间，伊斯兰海盗没有再来袭击基督教领土的原因。沿贸易路线有相应的基地是海上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海盗也需要在一定距离内有方便停靠的基地，其原因我会在后面详述。不论怎样被宗教上的热情所驱使，往返于埃及与西西里之间而中途不停靠港口，其距离都嫌太远。



意大利南部、叙利亚及北非

不过，这个偶发事件显示，沙漠之民的阿拉伯人，只要能玩转东方的海洋民族希腊人，就可以往来于地中海之间。

公元700年，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两个岛接连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两个小岛，现代都属于意大利领土，但当时却和西西里一样，属于拜占庭帝国。两年前迦太基投降时逃亡的人们移居于此。这些基督教徒全被杀

害，其空间由刚刚伊斯兰化的北非移民所填充。现在这两个小岛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当时却无甚产业，征服这里大概只是出于确保海上交通线停靠港的目的。

这个时期北非的“首都”尽管在突尼斯境内，但却不是沿海的迦太基和突尼斯，而是阿拉伯人出于和在中东建设巴格达同样的考虑新建的凯鲁万。

这座城市由从东方前来赴任的地方长官（Amir）注治理。这座城市建在突尼斯以南150公里，距最近的海岸线也有50公里的内陆地区，这显示出当时的阿拉伯人并不充分了解地中海。从凯鲁万出海，最先碰到的是兰佩杜萨岛，紧靠其北面的是潘泰莱里亚岛。从突尼斯、迦太基等沿海城市出海，挡在面前的不是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这就是阿拉伯人要率先攻占这两座小岛的原因。

撒拉森海盗自此开始了针对基督教世界的袭击。无论是从凯鲁万出发，还是从突尼斯出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都是其首要的目标。在伊斯兰势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班牙之前，尽管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的伊斯兰化尚未完成，这个目标很早前就已决定。伊斯兰势力在仅仅百年的短时间内便迅速扩大，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速攻”。我甚至在考虑，伊斯兰势力即使推迟确立对攻占之地的统治权，也会优先考虑不断进攻的。

公元704年，伊斯兰战士大举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的6年之前，凯鲁万的地方长官穆萨宣布进行“圣战”。当年夏天，地方长官亲率1 000名伊斯兰士兵在西西里岛南岸登陆，杀戮掠夺之后乘船凯旋，回到凯鲁万。据说如果把掠来的物品卖掉，将收入全部分配给参加行动的人，人均会得到100枚第纳尔金币。他们懂得了一件事，基督教世界不仅是能予以杀戮的异教徒聚居之地，还是可以迅速致富之地。

此后，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开始称呼居住在基督教势力范围内的人们为“鲁米”（Rumi），意即“罗马人”。当时的罗马人全是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教徒看来，“鲁米”即基督教徒，即不信真主之徒。

公元705年，也许是前一年的成功令海盗们心情大好，他们再次从凯鲁万出发，突然袭击了叙拉古。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叙拉古一直都是重要城市。西西里成为拜占庭帝国领土之后，叙拉古也一直是其首府，其原因之一就是它防守坚固。只动用1 000人的兵力袭击叙拉古表明，此战并无征服的意图，目的只在骚扰。

事实上，海盗并不攻击防卫坚固的城市，破坏的只是城墙之外广阔的郊区。可见中世纪的海盗也很善于骚扰敌后。烧抢之后再掳走居民，自然使得人人恐惧。周边地区连续受害以后，农耕生产率下降，物产向城市的流

通不畅，大城市的脖子就这样一点点地却是扎扎实实地被扼住了。

不过，705年这次袭击叙拉古以后，撒拉森人发动的对西西里岛的进攻像风暴戛然而止一般，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阿拉伯编年史的作者坚信，这一时代伊斯兰势力在安拉的庇护下，不断发动着进攻。他们以生动的笔法逐一记录了这些进攻，流传后世，唯独这15年里一次进攻的记录也没有。我想这是北非伊斯兰势力于710年开始了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西班牙的行动，他们将力量集中于此的缘故。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凯鲁万的大清真寺

肩负扩大“伊斯兰之家”使命、使北非全境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人，与被他们征服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北非原住民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在8世纪时的伊斯兰教中，并没有把感觉上可以称之为“原生”的阿拉伯半岛出身的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变宗教信仰的其他地方的居民同等看待，而是分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以向一般教徒说教《古兰经》为使命的伊玛目（imam，导师）一定是“原伊斯兰教徒”。实际上《古兰经》的语言直到今天都是阿拉伯语。

还有一件事将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区分开来。

“原伊斯兰教徒”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战士”，负有参加战斗扩大“伊斯兰之家”的职责，也拥有把战斗胜利所获得的土地、财产和人员归为己有的权利。说白了，他们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

而“新伊斯兰教徒”没有资格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战斗，也不能参与战利品的分配。伊斯兰战士大约是想让这些“新伊斯兰教徒”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然而，被伊斯兰化的北非居民是罗马帝国时代就不擅长这些工作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他们再也不想默不作声地旁观眼前海盗业的收益了。正好，这段时期大部分伊斯兰战士都集中于征服西班牙的征战之中。

在严酷环境中生存的民族不会繁殖兴旺，往往人口较少。我想，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原生阿拉伯人的悲哀就在于人口稀少。“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的做法也许和战士阶层人数减少的风险不无关系。

最后妥协的似乎是原伊斯兰教徒，也许他们注意到从事海盗业适合于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的共生共荣。

不论是做什么事业，只有在全体参加者认为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才会成功，才会长久。利害一致方能成功，成功方能长久持续。对北非的伊斯兰世界而言，海盗行为这种“幸运之例”，既可以给原伊斯兰教徒带来完成圣战的满足感，又能给在宗教地位上不及他们的新伊斯兰教徒带来迅速到手的财富。

到了公元725年，海盗行为再度开始。这时，即使是打着圣战旗号出海的海盗，也都不再从阿拉伯人充满推广伊斯兰教义之心建设的凯鲁万出发了。由原伊斯兰教徒的地方长官亲自率领的海盗行为也逐渐少见。此后的出发港都是面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多数都是自古以来以海港城市而闻名的港口。较之于离海岸线50公里的内陆地区的凯鲁万，一出家门就是大海的港口城市对出海更为有利。人们从这点可以想象，此后海盗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已经从原伊斯兰教徒转为新伊斯兰教徒了。虽然不清楚始于何时，海盗出海的利益分配也按下面的方法确定下来。

收益的五分之一上缴地方长官，剩余的五分之四由船主、船长和船员分配。

绑架

然而，新方法起初几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公元725年的海盗行动彻底失败，居然没能登上西西里岛。船队倾覆于狂风巨浪之中，船只相互剧烈碰撞，仅极少数人得以逃生，其他人几乎全部葬身海底。也许凭着信仰、主张冲过风浪前进的原伊斯兰教徒与长期居住在北非了解地中海、主张撤回

的新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意见对立。据说漂浮到西西里海岸的尸体中，有几具是把《古兰经》紧抱在胸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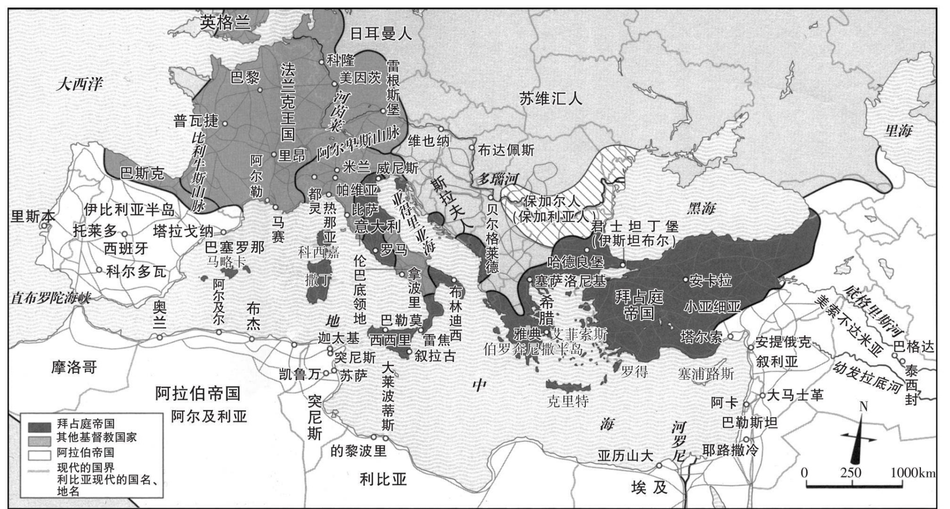
翌年的海盗行动，同样未能踏上西西里土地。但在第三年，公元727年海盗出海，使西西里南岸一带遭殃，海盗们满载着掠夺品和绑架的人口凯旋。进入港口的海盗船桅杆高耸，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帜迎风飘扬。

被海盗绑架带到北非来的西西里居民并不是迎战海盗而失败的人，因而不是俘虏。但在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海盗看来，他们是失败者，是胜利者可以任意处置的战利品，而且是些伊斯兰教认为的信仰“错误教义”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尽管承认犹太教、基督教是先行宗教，但却断定由于它们脱离了真的道路，作为宗教已经堕落。

如果这就是伊斯兰的基督教观，被绑架的人就只有做奴隶一条路了。如果被绑架来的基督徒是男子，他会有下面几种命运：

第一，做以海盗船为主的伊斯兰船的划桨手。

在靠帆和桨航行的加莱船[注]上，划桨手承担着发动机的作用。在无风或风小以及风力过大而无法用帆的时候，或是进出港口的时候，就要发挥划桨手的作用了。划桨手如果是奴隶，划桨时要被锁链铐住。



8世纪前半叶的地中海世界

第二，加入正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圣战的伊斯兰军队。

参战士兵要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既是圣战，伊斯兰军队中只有伊斯兰教徒才被允许参战。

第三，在奴隶市场出卖，在买主手下当一辈子奴隶。

第四，送进不知为何而被称为“浴场”(balneum) 的强制收容所，等待愿意使唤他们的伊斯兰教徒前来挑选。当然，他们的报酬极低，是廉价劳动力。不过，他们也经常会被提拔为“浴场”管理人，但仅能获得极少的食物。从早到晚在“浴场”干重活，就是这些人的生活。

如果被绑架的是女人，则几乎都会被在奴隶市场上卖掉。虽然结果仍是当奴隶，日子与被绑架的男子并无两样，但女子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的比例却极高，因为伊斯兰教禁止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

公元727年的巨大成功，催生了其后的多次海盗行动。以现代的地域而言，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西面的海港，用铁锁链成队锁住的基督教徒奴隶的身影越来越多。

同时，西西里人感到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海盗袭击，人人惊恐万状。从这时开始，他们的脑海里刻上了这样一种图式：

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 ＝ 撒拉森人 ＝ 海盗

但是，应以保卫他们的安全为己任的拜占庭帝国却拒不出战。

说拜占庭帝国无力迎战也许更为准确。8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帝国，不仅被伊斯兰势力夺去了叙利亚、埃及、北非等帝国最富庶的地方，还在小亚细亚方面受到侵略，连三重城墙护卫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时常受到威胁。在帝国西部，已经很难压制住新的北方蛮族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入侵。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拜占庭有义务保障其安全，但是帝国却无力向这些地方派出正规部队。

不能保障本国国民安全就失去了统治的资格。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问题，还会让绝望的人们倒向敌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要比处于拜占庭帝国腹地的希腊更为富庶。

变本加厉的入侵

蛮族从欧洲北部南下了。在意大利半岛，北部势必成为罗马帝国军队迎战蛮族的战场。过去，曾经有过向战胜后滞留的蛮族提供三分之一耕地，从

而维持蛮族与罗马人共生的时代，但北方蛮族素好意大利北部的土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事实上不在这种体系之内。此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属下的将军贝利撒留打了一场哥特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尽皆荒废。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并未成为战场，因而免遭荒废。

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富庶，是与北部和中部相比较而言的，并不能与罗马帝国强盛时期相提并论。不过，在中世纪的最初时期，这里还留有古罗马式农庄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体系的残余。在拜占庭的皇帝看来，可以指望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获取相当的税收。君士坦丁堡派来的总督经常会在西西里首府叙拉古的官邸里慨叹边境工作，但这位总督的主要工作却是征税。

几乎可以肯定，西西里岛已成为撒拉森海盗的目标，这种险境已由总督报告给了皇帝。但是帝国没有余力派遣大规模的军队。帝国对险境报告的回应只是命令驻防叙拉古的防卫兵前去迎击。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728年，撒拉森海盗700人又从突尼斯港出发，要到岛屿南端抢掠，西西里派兵迎击。可是，这样做非但没有让敌人遭受损失，反而西西里兵被轻易打败，仓皇逃回叙拉古，空自让撒拉森海盗燃起了打跑拜占庭正规军的自信。

不过，伊斯兰方面也不是事事顺利。也许撒拉森人原本就不长于思考如何扎扎实实地积累战果。

也许是打败拜占庭军让撒拉森人心情太好，翌年他们四处搜罗，征集了180条船，组成庞大船队。这次他们已不满足于袭击小镇小村，而把目标指向了沿海围着城墙的富庶城镇。他们从突尼斯港出发了。

拥有180艘船，这可是大型船队的规模。撒拉森海盗常用的船是加莱船中最小的一种，称为“福斯塔”（fusta），是一种小型的军用快船。这种船有一根桅杆，使用与船身长度差不多的三角帆，划桨手有16至20人。这种船一般只能载水手、划桨手和战士40人。180艘这样的船所能装载的战士不会超过2 000人。这一人数尚不到一年前打败拜占庭兵力的3倍，以此兵力去攻打防守坚固的城市，与其说是大胆，不如说是鲁莽。

攻打有城墙的城市，必须做持久战的打算。守方即使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因其可以灵活用兵而有可能长期防守，攻方却需投入远超守方的兵力。

还有军粮问题。防守方已经储存了平常需要的粮食，而攻方只能靠外部补给。进攻城市需要投入远超防守方的兵力，是因为需要一边持续攻击一边派兵去后方运粮，有时是抢粮，这些人数也要计算在内。如果人数上没有余地，那就必须像全盛期的罗马军队所做的那样，确保与后方基地之间的

补给路线，保持它的作用。公元729年的攻城战，这样的条件一个也没有。以后撒拉森人也大多缺乏这种综合战略，甚至让人觉得莫非这就是他们的民族特性。

海上排列着180艘战船，刚开始时对居民产生了恐吓的效果。随着撒拉森军队实际情况的不断明朗，防守方也增强了自信心，开始以彻底抗战的决心来直面进攻。战斗陷入僵局。战事起于夏天，但在你来我往的持续中，冬天临近。尽管西西里地处南国，但冬天西北风仍然寒冷凛冽。原本就不擅长持久战的撒拉森人决定就此撤退，等待来春。

可是，冬天的地中海对他们并不温柔。他们在归途中遭遇猛烈的暴风雨。180艘船中竟有163艘连同船上人员一同沉没。原本要前往突尼斯所在的西南方，却漂流到了南方，仅有17艘船漂流到利比亚的黎波里。司令官阿尔·穆斯塔尼尔乘坐在这17艘中的一艘船上，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是撒拉森海盗行动的第一次大败。惨状很快由的黎波里的地方长官通报给了突尼斯的地方长官。突尼斯地方长官接到通报立即命令“即刻送还”。

阿尔·穆斯塔尼尔被带回突尼斯，以怯懦无能致大量安拉的战士死亡为由被宣布有罪。起初他被鞭打到流血，仍不能得到宽恕。接着被绑在驴背上在城里游街，再被投进监狱。他每天被拉到监狱院中棒打。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士兵打开牢房门锁，再要拉他到院子里去时，发现这位前司令官已经断气了。

然而，一次惨败不会让撒拉森人打消念头。3年之后的公元732年，安拉的战士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兰克，与前来迎战的法兰克王国军队作战，大败于普瓦捷近郊。伊斯兰势力在短短20年时间内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却不得不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南麓。不过，打消了沿内陆征服欧洲的念头，却意味着更想从海上征服欧洲。

西西里居民成为目标，厄运连连的时代已经到来。阿拉伯人的编年史家也写道：“灾难连绵，无法逐一记录。”撒拉森人似乎也不再好高骛远，不再进攻筑有城墙的城市。他们改变了战法，用十来艘“福斯塔”船组成小型船队，出海抢劫，抢到即回，如此循环往复。



“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的安拉的战士

这样的战法很适合撒拉森海盗。因为是抢了就走，只要装足去程够用的淡水和粮食即可。如同现代比赛用的赛艇，只需装上最低限度的必需品，船只自然轻巧。船又是小型船，水和风的阻力都很小。船速很快，又是少量船只行动，不大会引起居民的注意。海盗船旋风一般地从海上袭来，抢夺绑架，又如旋风一样地消失在大海深处。这已成为南方岛屿西西里夏天的平常之事。

撒拉森海盗的目标不仅是西西里这个地中海最大的岛屿。随着海盗出海次数的增加，自然会有撒拉森海盗出没于与西西里近在咫尺的意大利半岛南部一带。撒拉森人还意识到可以利用西地中海中央的撒丁和科西嘉这两座岛屿。从地中海一侧进攻法兰克南部，如果失败，伊斯兰船归途可漂流到此落脚。

这两座岛屿在古代不似西西里繁荣富庶，可说是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积蓄较少，即便进入中世纪，也还不敌西西里。但岛屿多有面海的沙滩和断崖下的洞窟，能够补给新鲜水和食物，作为海盗在掠夺后回到母港之前稍事休憩的地点最为适合。这两个岛上尽管没有可以卖得更多第纳尔金币的物

品，但却有居民。伊斯兰势力在这个时期进行绑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劳动力，这两个岛在这方面也有利用价值。实际上，当年了解这个情报后，从突尼斯出海袭击了西西里的海盗船队并未像平常一样掉头返航，而是继续北上，登上了撒丁岛。不光是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撒丁、科西嘉也都进入了撒拉森海盗的视野。意大利半岛西侧的大海是第勒尼安海。现在，这片海域也不再安全了。

随着出没海域的扩展，海盗需要相应的更多的坚固船只。行动范围拓展了，遭遇暴风雨等的风险也就更多。公元734年，亦即普瓦捷战败的第二年，地方长官命令在突尼斯建造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最早的造船厂。既是受地方长官之命建设，这船厂就不是私营，而是公营。在8世纪前半叶，所有基督教世界都没有这种造船厂。虽有造船修船的工厂，但当年也都规模偏小，只相当于现代在任何街道都能看到的汽车摩托车修理厂之类的水平。在罗马帝国尚能发挥其基本职能之时，海港中必有附属造船厂。但这些造船厂现已倒塌，成为废墟，只余杂草繁茂。港口也被河流带来的泥沙淤塞。造船厂自然化为废墟。

然而，北非朝向地中海的那一面又开始回荡起造船的当当锤声。

“中世纪”是后世学者所起的名称，所指时代大致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492年热那亚出生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代被视为“中间期”，可实际上也是历时千年的漫长岁月。通常，这1000年以公元1000年为界，分为“中世纪前期”和“中世纪后期”。按照这种方法，“中世纪前期”在地中海世界掌握主导权的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伊斯兰教徒。

我不想议论文化文明方面孰优孰劣，但说到最大限度凭自身力量上升的意愿，在“中世纪前期”，伊斯兰方面绝对表现卓越。不过这种意愿投向了海盗业，这对海盗的目标——基督教世界的居民而言是一种不幸。

地中海世界就这样进入了8世纪后半叶。小股海盗开着快速的小型加莱船，不断袭击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沿海一带，这仍然是夏季的常态。这时，海盗已把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作为落脚点。这样，连意大利中部也不得不与海盗发生关系。

“坎帕尼亚”的中心是拿波里，“拉齐奥”的中心是罗马。伊斯兰势力不但开始深入意大利中部，甚至把手伸向了基督教世界的中枢、“神的代言人”罗马教皇的脚下。这时，海盗的根据地东起突尼斯东部的利比亚，西至阿尔及利亚，遍及地中海沿岸的所有良港。

拜占庭帝国面对伊斯兰势力的攻势，从不想真正迎击挑战。有时装模作样地派来一星半点儿的战船，却没有一次能给撒拉森海盗以沉重打击。绝望的西西里总督用金钱收买突尼斯的地方长官，试图买到和平。但不独突尼斯，无论何处的地方长官都是只收钱不办事。就算从大马士革前来上任的地方长官有意遵守约定，实际上也挡不住海盗的反对。这时的地方长官似乎仍继续由阿拉伯人担任。被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并不情愿在这个伊斯兰教本家出身的人的统治下从事海盗业。海盗业对原伊斯兰教徒来说是圣战，但对新伊斯兰教徒来说已经成为打着圣战的大义旗号的产业，是一种生意。

间或有两三年不见海盗船的踪影，这对基督教徒来说像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这时往往是地中海对岸外来的阿拉伯人与当地的摩尔人、柏柏尔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基督教徒把他们都称为“撒拉森人”，但撒拉森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然而，这种“休战”不会持续很久。海盗业虽然被冠以“圣战”之名，实质上却已是一种生意。暂时休业之后，海盗就会来袭，进行更为彻底的掠夺、放火和绑架，以期夺回休业期间减少的收入。

从这时开始，海盗对绑架来的人按照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进行分类。除了在奴隶市场出售或当作奴隶残酷使用直至其死亡以外，又搞出了一个新名堂——收取赎金。

收取赎金这个新名堂的对象，不只是个人，整个城市也会成为收取对象。海盗们已经不需长期艰苦地攻打铜墙铁壁似的海港城市了，只需荡平城市周边，瞅着城市哀鸣求救的当儿，以撤退为条件勒索赔偿金就成。小城镇赔款尚可理解，叙拉古防守坚固，据说在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这样的城市也曾支付赎金，以求海盗撤退，这可真是到了世界末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基督教素有末日思想。

8世纪就是公元700年到800年之间的100年，这是地中海世界东南西三面都被伊斯兰势力覆盖的一个世纪。退缩于北方的基督教世界不断遭受海盗袭击，渔船亦不能远航。所谓海盗，也并不只是在海上施暴。

在海盗看来，这可以充分理解。如果袭击航行在海上的商船，一次袭击可能收获很大。但商船却是运动中的靶子。地中海浩渺广阔，在没有雷达的时代，要捕捉到航行中的商船并非易事。而如果上岸袭击，就只需瞄准静止的靶子。北非产的马形体矮小，一艘福斯塔就能装十来匹。

撒拉森海盗就是这样，在大海上靠轻快的小型加莱船，在陆地上靠体形矮小但吃粗耐劳的北非良马，使用最合适的突袭战法，进行着海盗行动。

那么，谁来负责防止这些灾害？他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既然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和撒丁都正式隶属于拜占庭帝国，安全保障的责任就在拜占庭帝国皇帝。在查士丁尼大帝以后的意大利半岛，拜占庭领土和南下入侵并盘踞下来的伦巴底人统治的地方犬牙交错，而北方蛮族伦巴底人也改宗成为基督教徒。于是罗马教皇是信仰上的领袖，而皇帝是世俗领袖。这样，即使在伦巴底人统治的地方，防卫责任最终还是落在拜占庭皇帝的身上。

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被后来的新兴力量伊斯兰势力不断蚕食，如今已被逼到首都君士坦丁堡西翼的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之间。它正在竭尽全力保卫所剩无几的土地，再无余力向意大利伸出援手。因此，无人能掌握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已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拜占庭甚至把保卫希腊西面的亚得里亚海航行安全的责任，也托付给了尚在成长中还谈不上可以独当一面的威尼斯共和国。

伦巴底人也没有力量承担意大利半岛的安全保障。伦巴底人也从来没有统一过。贝内文托大公和萨莱诺大公徒有漂亮的称号，实际上只是几个部族的头领，统治着各自的地盘而已。他们之间也时常生出争端，大动干戈。

未曾被伦巴底人侵略，留在拜占庭帝国的只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可是，正像我们曾在有关西西里的章节里所述，拜占庭已不能保障这里的安全，却还要收税。这样，沿海居民一直处在撒拉森海盗的威协之下，哪里都没有希望。他们所能拥有的自卫手段，只是选择在能够瞭望到广阔海域的地方建塔，尽早发现海盗船的来袭，给居民们多一些逃跑的时间，哪怕只是一点点。

这样的瞭望塔，意大利语称之为“撒拉森塔”（torre saraceno）。现在意大利半岛还留有为数众多的这种塔，分明是16世纪大炮普及以后的造型，但这些塔却不是16世纪建造的，而是对以前的塔进行加固后形成的。

塔内还残留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原物。建在海岸边上的瞭望塔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由于海岸线的侵蚀，已经浸在海水中，遭到遗弃。在罗马的南方，亚壁大道边的福尔米亚塔就是其中的一座。据说这座塔建在西塞罗的别墅之上。古罗马有情趣的人喜好在近海的地方建别墅。这些昔日的豪邸已经坍塌，却为中世纪的百姓提供了建造瞭望塔的石材，毕竟新开石材并运到海边也是需要花费人工和费用的。

可是，不论建多少撒拉森塔，也不能完全躲避海盗之灾。撒拉森海盗来袭时不会在桅杆上高悬黑底白色骷髅旗，也不会打起绿底白色月牙旗表明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常常挂出别的基督教国家的旗帜，或挂着被袭地同

盟国的旗帜靠近。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瞭望者为了早一秒辨明靠近船只的真相而在塔上拼命凝神定睛，这种心情委实令人同情。对生活在中世纪前期，即公元1000年以前西地中海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不愿意被绑架去当一辈子伊斯兰教徒的奴隶，就只能依靠这点儿自卫手段了。

后世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中世纪并不黑暗。不过，至少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生存其中的“中世纪”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神圣罗马帝国

公元800年是学习西方历史的学生必须记住的年头之一。

1200年过去了，在现代的布鲁塞尔，与欧盟（EU）相关的大厦中有一幢被冠以“查理曼”（Charlemagne）之名。

公元800年11月中旬，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他们首先横跨意大利北部进入拉文纳。当时，在逼退了伦巴底人之后，意大利北部处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之下，因而查理曼率领大军顺利地横跨意大利北部。

查理曼和平地进入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根据地拉文纳。他把托付给儿子丕平的部队驻扎在拉文纳，自己则只率手下沿亚得里亚海“轻装”南下。从安科纳进入内陆直奔罗马。真可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一带有多条古道通向罗马，宛如河流流向湖泊。在离罗马尚有一天行程的门塔纳，教皇利奥三世前来迎接。



查理曼的加冕典礼

查理曼和利奥牵手走进罗马城门的准确日期现已不详。不过12月25日基督圣诞那天，他们出现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天，罗马教皇亲手授予法兰克王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冠。这是中世纪史上的大事件，被后世历史学家视为“欧洲的诞生”。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理由归结起来就是，实现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大团结，再创历史辉煌。

说是再创历史辉煌，但既然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那就不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而是一个世纪半之前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完成的短暂的“罗马帝

国”。那厢的拜占庭帝国也同样打着基督教旗号，但却正式号称“罗马帝国”。因而这厢加上“神圣”一词，不就是想表明与拜占庭帝国的区别和从此以后的分离吗？因为催生“神圣罗马帝国”的真实意图源于拜占庭帝国从来不关心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欧洲之防卫。

在王侯和地方豪绅相互之间整天为领土你争我夺的时代，罗马教皇多少感到自己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负有责任。

这不是由于罗马教皇们有出色的政治感觉，而是因为尽管也被称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并不住在西方。但罗马教皇并非像拜占庭帝国皇帝那样是宗教和政治的双重领袖。首先，罗马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罗马教皇曾向拜占庭帝国皇帝送去过几多请求保障西方安全的信函，却每次都大失所望。就像我们前面所述的那样，拜占庭帝国也无余力做到这些了。但罗马教皇是神职人员，而非政治家。他只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判断，而不会考虑对方的立场。他把拜占庭皇帝优柔寡断的应对解读为拜占庭皇帝不想为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西方履行防卫职责。

情绪发展到如此地步，一丁点儿过失都极易酿成大事。圣像破坏问题就是一例。在关于是否认可圣像崇拜的争论中，拜占庭皇帝断然持“否定”的态度。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大量圣像被焚毁破坏。

愤怒的罗马教皇开除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教籍。开除教籍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罗马教皇拥有的最强大武器，其原因在于基督教徒并无义务追随被开除教籍的人。皇帝也好，王公也罢，只因有大批部下追随才能维持帝位和权力，一旦随从离去，他们也只是个普通人。

因而，对俗世的君主王侯而言，开除教籍是一个可怕的武器，然而这对拜占庭帝国的臣下却并无明显效果。

这里的原因第一个是，东罗马帝国一直轻视灭亡后被蛮族割据的过去的西罗马帝国，将他们看低一等，自信自己不会重蹈其覆辙。

第二个原因是，君士坦丁堡也有主教，罗马教皇只不过是罗马的主教，感情上不能允许他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第三个原因是最近发生的破坏圣像问题。

于是，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知道拜占庭皇帝靠不住，罗马教皇需要另寻伙伴。教皇不具有军事力量，伙伴的资格首先是要拥有军事力量。起初他把目光投向了在意大利半岛与

拜占庭势力分庭抗礼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起源于欧洲最北端的斯堪的纳维亚地方，其南下耗费了漫长的岁月。但到8世纪中叶，他们竟也把首都安在了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南下当初，伦巴底人并未与被征服的罗马人融合，只是作为统治者君临当地。到了8世纪前半叶，登上王位的利乌特普兰德不仅改信了基督教，还完善法律制度、组织统治制度，成为罗马教廷眼中“可与之对话的对象”。利乌特普兰德修筑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当时已经成为意大利北部首屈一指的地方，或许是西欧第一的繁华都市。建国不久的威尼斯共和国商人带着从君士坦丁堡贩来的东方奢侈品到帕维亚出售，而不去其他城市。

可是，这位被尊称为“立法者”的利乌特普兰德在公元744年去世了。之后伦巴底人又回到了以前的分散状态。罗马教皇本想让意大利半岛确立强大势力，以对抗风头正健的伊斯兰，到这时这个想法也夭折了。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想出对付伊斯兰势力的对策。教皇的目光这次投向了法兰克王国，它正在欧洲中部逐渐形成广阔而统一的国家。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理由中，字面上既未提到拜占庭帝国，也未言及伊斯兰。不过我想，如果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良好，或者不是伊斯兰势力形成了如此威胁，神圣罗马帝国便不会产生。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是否加上“神圣”二字，实际上都是东方有一个名为“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而西方又要创立另一个“罗马帝国”，要有一位与“罗马帝国皇帝”并立的皇帝。这件事也表明了罗马要在西方主导下与君士坦丁堡分离的意志。

如果再放任不管，欧洲迟早要被伊斯兰吞噬。当时欧洲的基督教徒普遍抱有这种危机意识。从那个时代人们的处境来看，其根据再充分不过。

实际上，从公元700年到800年的一个世纪之间，伊斯兰势力发展惊人。

公元762年新建巴格达，“《古兰经》之民”的首都就已从地中海附近的大马士革移到了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望的巴格达，尽可作为伊斯兰帝国之都。

源自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之民活力四射却野性十足，而波斯人虽被阿拉伯征服，却在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经历反复的历练，这是阿拉伯力量与波斯文明的幸福结合。在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文化和文明的水平之高令人惊异，大大优越于同时代的欧洲。

这一切在基督教看来，伊斯兰世界现已不仅拥有军事力量而且兼备文化文明的力量，自然越发被视为巨大的威胁。伊斯兰士兵发出豪言壮语，“要把圣彼得大教堂变成伊斯兰的马厩”，这已不能只作为士兵的逞强之言而

充耳不闻。通过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来依靠查理曼，也是这一危机意识的自然结果。

法兰克人当初不过是罗马帝国末期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北方蛮族之一，进入前后长达400年的中世纪前期以后，已成长为堪当欧洲守护者的势力。

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人并不具有特别优越的资质。日耳曼系蛮族勇猛而残忍。卫生观念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指标，以此指标评判，法兰克人则是不卫生和马虎的民族。

不过，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族具有这样的特质，即使发生了杀死族长的权力之争，他们也经常会言归于好；几乎不会滥杀被自己征服的人民，更多的是去融合他们。法兰西人是法兰克人的后代，他们是日耳曼系蛮族征服者与被他们征服的罗马系高卢人的融合。

这两个特质对法兰克族的强盛起了作用。首先，减少了因镇压被征服者起义而需投入的兵力，可以将军力对外；第二，有可能招募到扩军所需的足够士兵。

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父亲率领法兰克大军，在普瓦捷的原野大败伊斯兰军队。大军中血统纯正的法兰克士兵的比例低于其他蛮族国家。

到了查理曼这一代，在法兰克人的特质之外又加上了查理曼个人的军事才能。结果，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已经向北达及多佛海峡，向南达及比利牛斯山脉，向东越过莱茵河，达及易北河。趁着拜占庭帝国不介入的做法，法兰克王国又把手伸向了意大利，把伦巴底人赶到了意大利南部，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意大利北部。这样，在9世纪前夕的欧洲，法兰克已经成为无人比肩的领国之主。

在蛮族中，法兰克人最早改信基督教，又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辽阔的领土以及基督教化先行者的资格。查理曼登上王位后一直转战各地，自身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是神圣罗马帝国创立者最合适的人选。教皇利奥三世一定也想不出比他更佳的人选了。

不过，这个方案也不是无懈可击。



公元800年前后查理曼统治的地域

首先，经过30年连续不断的戎马生涯之后，即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查理曼已是即将60岁的年龄。

其次，神圣罗马帝国只有在才能卓越的查理曼率领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存续下去。这种情况也令人不安。

查理曼似乎也深刻觉悟到自己已是基督教在欧洲防卫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也许是模仿古罗马皇帝图拉真，他在多瑙河上架起了桥梁。他的想法是正

确的，只有击退以渡过多瑙河南下为目标的敌人，才能确保多瑙河以南广阔土地的安全。

然而，这桥不过是把小船和浮筒绑在一起，在上面铺上木板的浮桥。多瑙河是条大河。只要上游稍稍下点儿大雨马上就会冲走这样的浮桥。即使上部是木造的，但至少立在水中的桥墩和用来支撑桥板的桥梁应该用坚固的石头建造，这样才能承受桥体的自重和过桥的人、车重量。图拉真桥是700年前用这种方法建造的著名桥梁。这座桥与查理曼浮桥的差别，是古代帝国与中世纪帝国的差别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个例子不能不令人深思。

查理曼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还创建了舰队，这大概是他接受了教皇利奥的请求，教皇对撒拉森海盗的危害了若指掌。舰队有“阿基坦舰队”（Classis Aquitanica）和“意大利舰队”(Classis Italica)两支。从名称推测，前者一定是为保卫法兰克南部不受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而建，而后者一定为的是保卫意大利半岛西侧和西西里的。法兰克人以前并不是海洋民族，这是一项值得褒扬的政策。

我们不知道这两支舰队的确切规模，但当时海战的胜负是靠接近并爬上敌船后的白刃战决定的。而法兰克将士对陆战非常自信，一定会充分利用陆战经验取胜。船似乎是由意大利水手操纵的。

舰队的海上巡逻似乎很快见效。舰队创建后12年，812年9月7日教皇利奥给查理曼皇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留存了下来。

“由于上帝的恩宠和圣母马利亚的慈悲，由于阁下的慎重和果敢，我们居住的地方所有边境都得到了守护，免除了危害，令人不胜喜悦。我深切地感到，我们二人都不应忘记为使现存防卫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努力。”

两年后的814年，查理曼逝世。又过了两年之后，教皇利奥三世也去世了。这两个人是中世纪欧洲史的主角。人们只知道他们去世的年份，却没有他们出生年份的记录。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懂得了没有正确的记录就不会有商业繁荣的道理以后，存在于古罗马的“重视正确记录的精神”才得以复活。这时出现的国情调查（census）正是这种精神复活的表现。

不过，古代有一个“复活”的东西，那就是肥皂。据说查理曼来到罗马，了解到使用肥皂洗涮的好处，回到法兰克后做了推广。此前也使用肥皂，但仅限于古罗马遗风尚存的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直到今天，马赛传承古风，仍是肥皂和洗涤剂的著名产地。或许马赛制皂业中兴的鼻祖还是查理曼

呢。

人死了，肥皂可以留存下来，可是统帅人物死后，依靠个人才华发挥功能的组织便一同死去。这是这种组织的宿命。查理曼死后，留下的“欧洲”不仅被儿孙瓜分，他们之间还因此争端不绝。很快，神圣罗马帝国便名存实亡了。保卫地中海沿岸不受伊斯兰海盗祸害的两支舰队也消失了，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解散的时间。

光靠祈求实现不了和平。和平，是要有人明确申明谁敢捣乱决不轻饶，并且说到做到方能实现。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和平的确立，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意志。

由于这二位深谙此道的人物的去世，欧洲再度陷入战乱，地中海也回到了权力真空的状态。伊斯兰势力在销声匿迹10年后，不会不好好利用这个绝好机会。

成为目标的修道院

海盗很快就像神圣罗马帝国创立之前一样横行起来。陆地上也不安全。撒拉森海盗驾着“福斯塔”在沙滩上登陆，骑着个儿小却快速的阿拉伯马四处袭击，抢掠、破坏、放火、绑架，然后撤走。海盗非常了解袭击何处可以高效且收益巨大，就像事前做好了调查。修道院首当其冲。

我原本以为，修士把一生奉献给上帝，整日祈祷、劳动；修道院以贫为德，是静谧度日的宗教设施。但是，中世纪的修道院却不是这样。隐者自然另当别论，他们一个人躲进连路都没有的深山洞穴中，靠附近人们施舍，过着孤独的祈祷生活。贯穿整个中世纪，在善恶两方面都发挥了莫大影响力的修道院，只服从罗马教皇的命令，当地主教、封建领主无法插手，因而是事实上独立的宗教组织。

首先，修道院常常建在城市的城墙之外，而不在远离乡村的僻壤。修道院因信众的捐赠和遗产赠予而拥有广阔耕地。出售耕地上的收获物使之与俗世有着充分的交流。

其次，在中世纪前期，有不少神职人员娶妻。修士是独身者，没有结婚生子引起的财产分散，也不拿薪水。

最后，向上帝祈求却未成事，是因为不够虔诚，上帝不会被问责，因而不必要考虑愤怒的信徒前来袭击破坏这类风险。

相反，如果向上帝祈求后如愿成功，信徒就会感恩戴德，贡奉“恩宠收

条”（grazia ricevuta）。虽然这种奉献有时只是一幅绘画、一打鸡蛋，但如果受到恩宠的人地位很高或是很有钱，对“恩宠”的回报就会是金银制作的弥撒用贵重圣具、沃田或是带有葡萄园的山庄。因为修道院是宗教组织，还可以免税。

修道院靠运营、使用这些资产所得的收益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兴办慈善和教育等各种事业。以后，这些都成为基督教会的垄断事业，即使所需经费加上修士的生活费，也还是收入大于支出，这种状况从未改变。中世纪的人由于生存环境严酷，信仰颇为坚强。这使得所谓宗教组织财源滚滚，古今东西概莫能外。撒拉森海盗可期望得到最大效益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修道院。

同样的理由也使教堂经常成为海盗的目标，虽然教堂建在城镇，海盗有诸多不便。人们得知海盗来袭后最先逃往教堂，教堂便成为海盗可以一次绑架众多居民的地方。

排在修道院和教堂之后，海盗的目标就是领主的城堡和富人的宅邸。这些地方多有守护人员，抢掠绑架不便。海盗首先会瞄准防守薄弱的地方。他们没有粮草，人数亦少，必须尽快完事。

信息量越多，据此所下判断的准确度也越高——这种认识完全错误。

即使所获信息很少，但在具备能迅速而正确地解读其意义的人手中，信息就有价值。

在罗马帝国，皇帝布告用拉丁语写成，在公布时一定会译成当地居民能够读懂的语言，例如在帝国的东部要译成希腊语。重要的政策还经常会刻在大理石上，放置在人们聚集的广场上，甚至会刻在人们每天握在手里的货币上，以此传递着信息。

然而在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基于政治意志的国家灭亡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无人去做。这样，以中世纪史为专业的后世历史研究家们便苦于史料的极度匮乏。这对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状态意味着人们对统治者的行为毫不知晓。对付海盗的舰队需要维护费用，便征收特别税；为建造撒拉森塔便向人们收费。只有这时，人们才注意到统治者在做什么。

信息靠这种方式传递实在是一种不幸。但如果这样还能显出效果，人们或能忍受。神圣罗马帝国曾经表明这样的统治意志，即它的防卫不会像以往那样依赖拜占庭帝国，而要靠西方自己。但因创立者查理曼之死，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只延续了不到10年时间。神圣罗马帝国创立后，意大利半岛居民成为皇帝的臣下。他们甚至还未来得及感受自己付出的费用和劳力是

否被有效使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卫意志就已消失殆尽了。

但是，地中海对岸却有人正确解读了这10年多来西欧动向的个中意义。中世纪前期，伊斯兰势力特别以其积极的态度超越了基督教势力。行动积极证明大脑活跃。得到少许信息，也能立即理解其重要性。神圣罗马帝国的创立意味着西方基督教世界与拜占庭帝国的分离，意味着基督教世界东西方并肩战斗的可能性越发渺茫。

换句话说，如果进攻拜占庭帝国，西方各国也不会立即出手救援，而进攻西方某国，拜占庭帝国也不会派出军队。而且，曾被视为强劲对手的神圣罗马帝国10年之后便已名存实亡。以普及《古兰经》教义为使命的原伊斯兰教徒，以及尚无这样强烈意识的新伊斯兰教徒，都认为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对伊比利亚半岛进行的伊斯兰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尽管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尚未被波及。从北非到西西里，顺风时只需一天时间。这时的北非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自然开始对征服西西里产生了强烈兴趣。

不同于大部分土地被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人统治的意大利半岛，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至今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如果攻打西西里，能来抵抗的至多也就是微弱的拜占庭军队。法兰克王国、伦巴底各公国以及与拜占庭皇帝不和的罗马教皇，都不会轻易出手救援。

海盗航行的目的是掠夺财物、绑架人员，而征服航行的目的是要把全岛收入手中。这两种航行是不一样的。况且，把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摩尔人合在一起，撒拉森人也没有足以组成大军的人口。绑架基督教徒也正是为了让他们充当劳动力。但只要不改信伊斯兰教，基督教徒奴隶就只能当划桨手，而不能用作士兵。由于这些原因，撒拉森人看到机会来临却无法利用。不过，西西里的基督教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

尽管地处最西端，西西里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圈内，由常驻在首府叙拉古的总督（esarca）与负责防卫的武官联合统治。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前来赴任的“总督”名义上是文官，通常是帝国的贵族。负责防卫的武官则大多由西西里岛当地出身的人担任。这反映出拜占庭帝国防卫力量的衰弱。公元827年到西西里赴任的人也是拜占庭帝国贵族，名叫帕拉塔。迎接这位文官的武官名叫欧赫米奥，长期担任驻扎在西西里的拜占庭军队总指挥官。

在为庆祝“总督”上任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帕拉塔对欧赫米奥的妻子奥莫尼莎一见钟情，不光是恋着这女人，还把她夺来为妻。

奥莫尼莎原来是修女，欧赫米奥让她还俗，娶为自己的妻子。被人横刀夺爱，欧赫米奥的愤怒当然可以理解。然而，古老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个事件没有仅止于一个被人夺爱的丈夫的愤怒，这愤怒蔓延到西西里的男人，引发了驱逐拜占庭的风潮。

这似乎是历史被偶然事件所左右的一个案例，但这与很多类似案例一样，不过是水已积满因而最后一滴溢出而已。即使没有帕拉塔的轻率举动，在西西里人的内心，无疑已对拜占庭帝国充满了不满情绪，怨恨拜占庭只知横征暴敛，却不真心保卫西西里免受撒拉森海盗的残害，否则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团结一致奋起驱逐拜占庭帝国。

然而，借用西西里历史记录者的话说，到了这一步，欧赫米奥却“玩起火来”。

他向身在凯鲁万的地方长官要求结成统一战线，把拜占庭赶出西西里。

根据长年从事西西里防卫的经验，欧赫米奥知道突然袭击、抢完就走的短平快战斗是撒拉森人的拿手好戏。西西里地域辽阔，只要为数众多、分散在岛内各处围着城墙的城市不被攻破，就无法征服西西里全岛。撒拉森人既没有这种毅力也没有这种实力，迟早会泄气撤退。欧赫米奥认为，撒拉森人撤走之后，遭到撒拉森人攻击的拜占庭军队一定会更弱，仅靠西西里人的力量也足以把他们赶走。他甚至还认为，自己会成为摆脱拜占庭统治后的西西里君主。

然而，事情却并未按欧赫米奥预想的方向发展。他要求人们与伊斯兰教徒共同战斗，这唤起了虽对拜占庭统治不满，却是基督教徒的西西里人的反感，把许多赞同他，有心奋起反对拜占庭的西西里人推向了拜占庭一边。结果，追随欧赫米奥的兵力大大少于预想人数。

伊斯兰的“圣战”

在大海对面的北非，征服西西里的准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到欧赫米奥共同战斗请求的凯鲁万地方长官是从巴格达派来的，大概是位把扩大“伊斯兰之家”当作自己使命的原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新伊斯兰教徒不同，像他这样的原生伊斯兰教徒都是对“圣战”坚信不疑的人。

地方长官向北非全境发出布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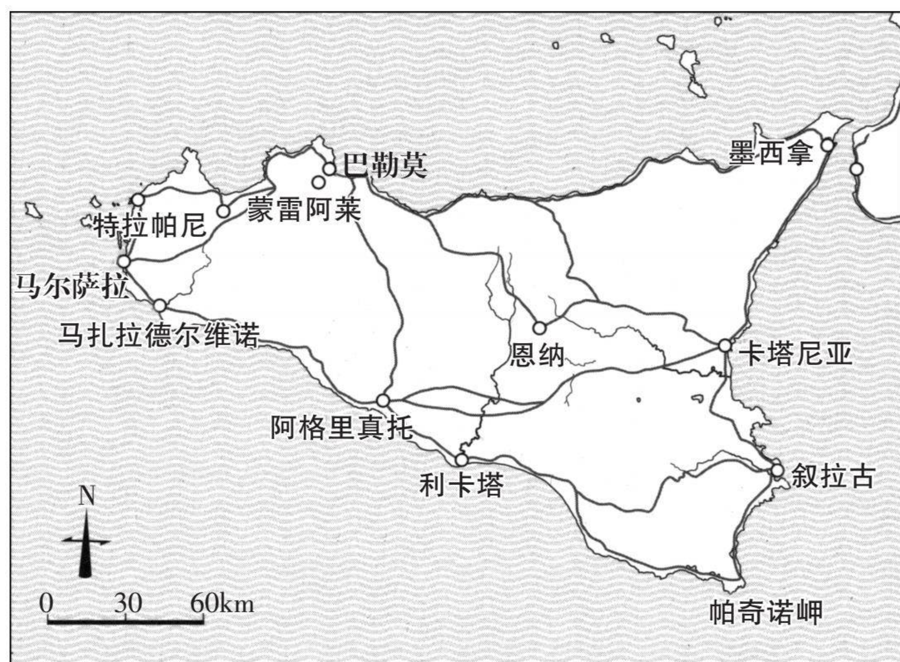
“安拉之外没有神，穆罕默德之外没有先知。现在时候到了！全体伊斯兰教徒鼓足气力，杀向无信仰之徒的老巢！”

也许是布告的作用，地方长官召集到了1万名志愿者、700匹马和数量不详的船只。如果这一切都是从北非招募而来，在当时就意味着在招募海盗和海盗船。

被委以这支伊斯兰远征军总指挥之职的不是专程从巴格达来的军事老手，而是专司司法的原伊斯兰教徒阿布·阿拉·阿萨德。全部人马集结于突尼斯东岸的苏萨港。总指挥官阿萨德站在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帜前，面向全军再次宣读了地方长官的布告，宣布出征。

公元827年6月14日。初夏时分，这一带海域最适合于快艇帆船的航行，即使在现代这里也以此闻名。使用当时的加莱船，到达位于西西里西端的马扎拉也只需两天的航程。马扎拉从罗马时代起就一直是前往北非的港口，欧赫米奥带着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前来迎接。

让1万名士兵和700匹马上岸，让众多船只停泊并随时可以使用，需要花费相当的时日。撒拉森人并不习惯做这些事。做完这一切，出发去到平原，花去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给了总督帕拉塔时间，使他可以调集分散在各地的拜占庭军队，赶赴马扎拉。



西西里

公元827年7月15日，拜占庭军队与伊斯兰军队在马扎拉附近的平原展开决战。伊斯兰方面担任总指挥的法官阿萨德在宣告战斗开始前，对一旁自以为在共同指挥的欧赫米奥不容分辩地说道："这里不再需要你和你的士兵了。离开战场。就此消失也好，留下观战也罢，这是你们的自由。如果想要观战，我劝你们用那边的草把头盔盖上，免得被误为拜占庭兵而杀掉。"

欧赫米奥只得听从这个劝告，别无他法。战斗在欧赫米奥及其部下的眼前进行。对西西里居民来说，这场战斗交战双方的士兵都是他国人，不论哪方胜利，西西里的命运都掌握在他国人手中。

当天的战斗，以伊斯兰方面的胜利而告终。战场尸横遍野，没有留下伤兵和俘虏。担任总指挥的阿萨德不是军事专家。他一遍又一遍地用阿拉伯语诵读着《古兰经》。对他这样彻底相信《古兰经》的人来说，基督教徒这样的异教徒连人都不是，而只是狗。这些异教徒们甚至忘记了自己是"狗"，把剑挥向伊斯兰。只有杀掉他们，才是恰当的处置。

但还是有一部分士兵成功逃脱。幸运的是打了胜仗的伊斯兰兵并不追击，他们更热衷于把战死者全身剥光。总督帕拉塔从西西里逃出，在卡拉布里亚投靠了拜占庭人，却反被他们杀害。

伊斯兰势力战胜拜占庭军队后，依旧以高喊圣战的阿萨德为先锋，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进程。征服依旧是杀戮抵抗者，抢掠所有值钱的东西，绑架不抵抗的人送到北非，如此反复。当时的胜利消息似乎也传到了北非，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争先恐后蜂拥来到西西里的圣战战士总数曾经达到4万人。

司法者阿萨德当然没有能力按照军事战略组织如此数量的人。涌到西西里的撒拉森人各自为战，向东面和西面打去，在西西里遍地进攻。

阿萨德和他的军队一气打到了叙拉古。我认为这是他不谙军事的例证。谁都知道，攻下了叙拉古就等于攻下了西西里全境。然而，叙拉古防守坚固，连罗马军队也曾陷入长期攻城战的泥淖。过早地把目标放在了不可能轻易攻下的叙拉古，这正是狂热信仰而无视军事战略的证明。实际上，进攻叙拉古的战斗陷入了极度困难之中。

为孤立叙拉古而下令在其周围打焦土战，这也只是外行的做法。焦土战本应是受到进攻的一方为对付进攻方而采取的军粮攻势。这次，因为进攻方采用了焦土战术，虽然到了收获的秋季，伊斯兰军队却比守在城里的叙拉古人更加缺粮。

据说缺粮的伊斯兰士兵把专门从北非带来的马匹吃掉充饥。叙拉古岿然不动。迟滞的战事和严重的缺粮使安拉的战士们不堪忍受，他们请求指挥官阿萨德权且撤回北非。他们说：“伊斯兰战士的生命比罗马人的所有财富更宝贵。”

阿萨德听到这些不动声色，冷冷地回答道：“让逃离战场的伊斯兰战士回到圣战不是我的职责。”

这就是说：你如果要这么干，安拉是不会不问的。士兵们也只有沉默。

叙拉古顶住了进攻，而赶来救援的拜占庭军队却再次一败涂地。

叙拉古攻防战打了10个月。缺粮导致体力衰退，伊斯兰军队的士兵中，病倒的人比被敌人的剑和矢击中的还多。指挥进攻的阿萨德也病倒了。

伊斯兰军队失去了司令官，一切都匮乏，士兵数量也减少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而在广袤的西西里，却没有攻下一个好在屋檐下睡个安稳觉的城镇。这样的现状使得参加征服之行的伊斯兰士兵士气低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看好攻占叙拉古的事。

通常，人们会考虑如何趁此机会打击已经衰弱的敌人。然而，欧赫米奥却主动要求打头阵，去内陆为撒拉森人寻找能在屋檐下睡安稳觉的城镇，他已经无法回到拜占庭一边了。

伊斯兰教徒如大群蝗虫从北非渡过地中海袭击西西里岛，这一情报早就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中。情报来源非止一处。

第一个来源是意大利商人。这个时期北非伊斯兰教徒与意大利几个城市之间已有明显的贸易，也有意大利商人到北非港口城市去。商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动向格外敏感，不会不注意到因为“圣战”而喧腾的人和船。

第二个来源是居住意大利南部的人们，他们与西西里只隔着狭窄的墨西拿海峡。这与其说是情报，不如说是悲鸣。没有比这更原始的情报传递手段了，而“恐怖”却是最有效的传递手段。

第三个是安拉的战士自己带来的情报。

北非伊斯兰教徒始于公元827年的西西里征服，并不是根据事先慎重考虑好的战略进行的，因而不是通过有组织的军队实施的。征服西西里之行是因为有人提倡“圣战”，而有人响应，是由这样聚集起来的一伙可称为乌合之众的人进行的。不少应该去西西里的船都不知所踪。

其中有若干只船随风漂流，居然漂到了罗马教皇领地的意大利中部海岸。圣战的战士昨天还是海盗，漂到哪里都行，到了无信仰之狗所居之地，便重操起他们早已习惯的掠夺绑架的旧业。当然，他们完事后就会回到船上扬帆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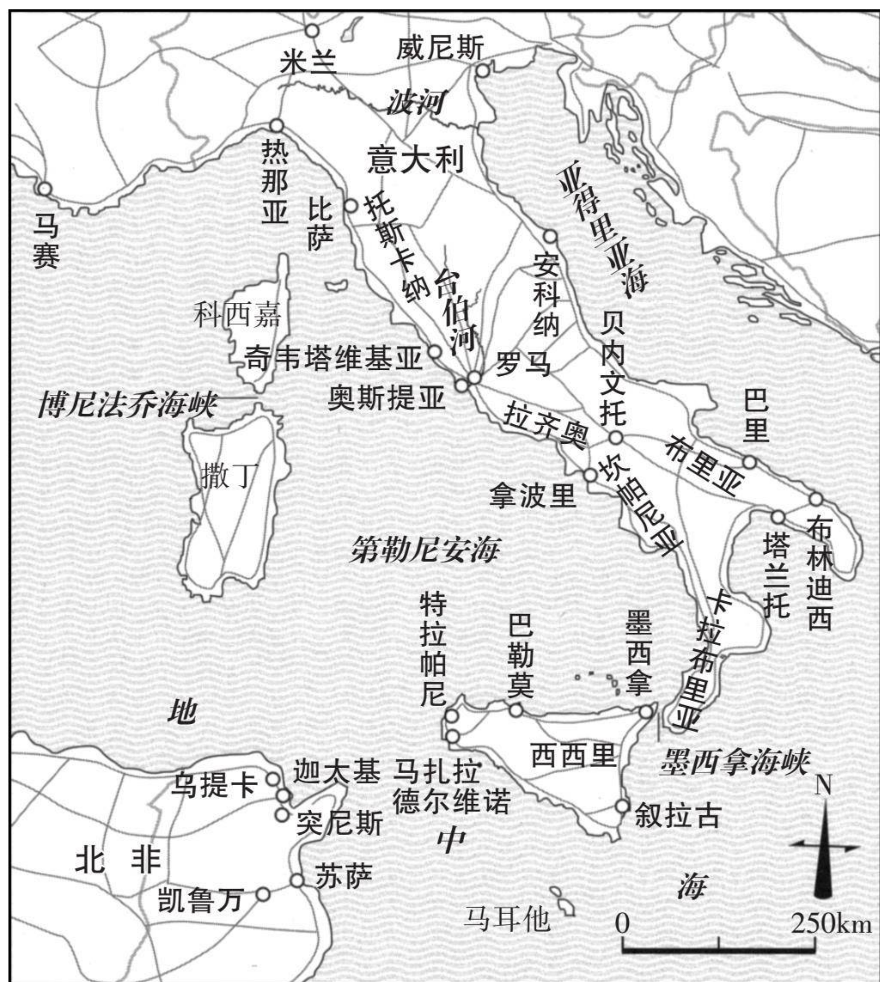
这个时期在位的教皇是格列高利四世，他出身于罗马有实力的豪族萨维利家族，年富力强。

他首先正式向负责意大利防卫的神圣罗马帝国请求派遣援军。但是当时的法兰克王国整天国内纷争不断，根本顾不上西西里，对教皇的请求充耳不闻。

支援西西里需要船只，于是他转而向正成长为海洋国家的比萨和威尼斯请求合作。

但这样做也无甚效果。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尚不能确保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这是保障他们最重要的东方贸易通道所不可或缺的。为确保制海权，最要紧的是打退盘踞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海盗。换句话说，眼下威尼斯的利益与支援西西里并无密切关系。

承诺提供船只的比萨也并非不考虑本国的利益。确保亚得里亚海航行安全是威尼斯的最大课题，而对濒临第勒尼安海的比萨而言，意大利半岛西侧第勒尼安海的安全则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最大问题。北非北上而来的撒拉森海盗已逐渐成为这片海域的最大威胁。



意大利及其周边

现在，这些海盗正在袭击西西里。如果西西里被伊斯兰化，海盗船将会从西西里港口出发来袭，这比从北非港口出发要省一半路程。只要看看地图，我们便可理解这个时期以后比萨应对伊斯兰变得积极起来的原因了。

虽然由于比萨的支援有了船只，但船上却没有士兵。成为海洋国家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人口形成陆上战斗力，转而向海洋求生路。比萨即使能够提供船只和水手，也无法提供打仗的士兵。

教皇仍未放弃。他把眼光投向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家臣、负责第勒尼安海防

卫的博尼法乔伯爵。教皇成功说服了这位托斯卡纳的豪族。教皇立即发出征兵布告。招募到的士兵数量不详。根据当时的记载，参加征服西西里之战的伊斯兰士兵有1万人，而教皇征到的士兵数量要大大少于这一数目。

按照教皇格列高利四世本来的意图，组建这支由博尼法乔伯爵率领的基督教军队的目的，是支援遭到伊斯兰军队攻击的西西里。可是，博尼法乔却想到了一个自以为天才的点子。

梦见西庇阿

伯爵的点子是不去西西里，而去直捣敌人的根据地凯鲁万。当时的凯鲁万类似于地处遥远东方的巴格达，是一座对伊斯兰教徒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博尼法乔认为，如果进攻凯鲁万，西西里的伊斯兰军队恐怕不得不回师救援。

他也许想起了1 000多年前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那场布匿战争。博尼法乔可能是想仿效当年西庇阿果敢的战略。

汉尼拔甚至赶着大象越过阿尔卑斯山打进意大利半岛，此后连战连胜，使罗马人的梦魇持续了16年之久。一位罗马的年轻武将想，要把这个噩梦驱赶出意大利半岛，只有突袭汉尼拔的老巢迦太基。他认为，迦太基遭到突袭而惊慌失措，不可能不给最高武将发出回防的命令。这一战略非常成功，罗马在扎马会战中打败了汉尼拔，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者。

往事越千年，博尼法乔自然想仿效这一做法。

“原版”与“模仿”毕竟有差异，但博尼法乔仍然想全盘照搬地模仿西庇阿。攻打凯鲁万从突尼斯东部登陆是近道，他却在突尼斯北部乌提卡附近的海岸登陆，理由或许与西庇阿选择登陆地点的理由相同。博尼法乔从这里沿陆路杀向突尼斯。博尼法乔肩负着一个西庇阿所没有的任务，出发前教皇与他约定，解放在农村做奴隶的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徒。

他没有抽出时间去攻打突尼斯城。也许是扬言要攻打突尼斯的威胁奏了效，他成功地解放了收容在突尼斯城里的基督教徒奴隶。他用获得自由的奴隶扩充军队，挥师直指原本的目的地凯鲁万。

行军途中，博尼法乔注意从奴隶那里收集情报，这是他值得赞扬的长处。他甚至了解到，突尼斯的地方长官已用快船向西西里派出信使，向正在西西里作战的本国军队传达本土危险的情况，命令他们从速回国。

凯鲁万与突尼斯不同，防守设施并不完善，但防守气概豪壮。这里是伊斯

兰的圣都，守护这里的士兵士气高涨。

在统帅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看来，这些仓促招来的阿拉伯士兵有着坚决的战斗意志，他的指挥也坚决而毫不松懈。

萨夫农率领的伊斯兰军队与博尼法乔率领的基督教军队在凯鲁万郊外展开决战。

战斗从日出开始，日落仍未结束。激战持续了5天，自始至终激烈而残酷。最后获胜的是基督教军队。伊斯兰战士在“无信仰的狗”面前败逃了。经常身先士卒的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也差一点做了俘虏。他逃到苏萨港，向西西里发出快船，再次命令伊斯兰士兵回师救援。

突尼斯地方长官和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似乎这时还不知道去西西里的远征军的状况，也不知道统帅阿萨德已经病死。统一的指挥系统不复存在时，命令再多，如果不知谁来接受，想执行也无人率领。

西庇阿的战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有汉尼拔这样的军事天才做对手。

一心想效仿西庇阿的博尼法乔给人留下笑柄。但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方面虽然圣战的意欲高涨，却也净出乱子。正因为历史有其不乏滑稽的一面，才映射出了人类社会的立体图景。

博尼法乔的做法颇为滑稽。他并不知晓正在西西里远征的伊斯兰军队的现状。因为长期逗留在敌国令人不安，他决定回国。季节也到了秋天。

博尼法乔预测，只要本土的“埃米尔”下令，正在征战西西里的伊斯兰军队就会中断行动回国。预测碰巧与奇妙的现状吻合，却没有成为现实。他并未攻下突尼斯，连凯鲁万的市内都没能进去。不过，他解放了被锁链铐住、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生活的众多基督教徒。博尼法乔觉得这就够了。

据说他集合士兵，带上被解放的人们，回到了原来登陆的地点。如果真是这样，直线距离也有120公里之遥。走完这120公里而未遭到伊斯兰教徒的袭击，远征伊斯兰之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便成为事实。全部人员安然登船，船队没有停靠西西里，而是直奔北方的撒丁岛。他们在撒丁岛停靠，途经奇维塔韦基亚。原来的奴隶下船后，他们便向比萨凯旋而去。

博尼法乔班师后受到了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全境人们的一片赞扬。然而这一快乐仅持续了公元828年一年。撒丁岛与科西嘉岛之间的海峡直到现代仍被称为“Bocca di Bonifacio”，直译是博尼法乔之嘴。博尼法乔负责的海域是东起意大利半岛、西至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之间的第勒尼安海。

不知为何被命名为“博尼法乔之嘴”，但根据民间传说，这是吞掉撒拉森海盗的意思。实际上，撒拉森海盗不但未被吞掉，以后照样继续横行海上。这是百姓表达美好愿望的又一个例子。

伊斯兰在西西里的征服行动混乱不堪，难以为继，但他们并未因厌烦而撤退，反而一心向前，足见宗教狂热之不可救药。接续阿萨德法官高举绿底白色月牙旗涌入西西里的撒拉森人中，有一个名叫哈尔卡莫的伊斯兰教徒。

哈尔卡莫在西西里南部刚一登陆，就命人在部下眼前烧毁了来时所乘的所有船只。他对惊讶的部下说，非洲已无路可回，我们只能在这个岛上住下来。他说完便身先士卒，率领不得不跟随他的部下，开始向西西里北部行进，一路上自然是不断地做着抢掠、放火、破坏、绑架的勾当。

这位撒拉森男人似乎言出必行。今天，在连接巴勒莫和特拉帕尼的高速公路边上还有一个名为阿尔卡莫的城镇。意大利语中H不发音，哈尔卡莫变音为阿尔卡莫。正是由于有了像他这样的伊斯兰教徒，开始时错漏百出的征服西西里之行才会不懈地延续下去。这对做事容易厌倦的撒拉森人来说是件稀罕事。

打到罗马去

地中海西边伊斯兰教徒的象征性城市凯鲁万遭到攻击，而且被“无信仰的狗”打得一败涂地，无论如何要雪耻报仇。让他们得胜撤走不被追究，就不能继续把他们当“狗”看待了。这对正在进行的征服西西里行动不会不产生恶劣的影响。

自诩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对雪耻的愿望比谁都强烈。在北非，阿拉伯人既是外来民族，又是征服民族，他们与被称为新伊斯兰教徒的被征服者摩尔人和柏柏尔人的关系紧张，经常担心后者会起来反叛。

阿拉伯人在北非数量很少。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就需要不断地显示少数人所拥有的权威和权力的有效性。如果失败，权威就会受到伤害。这种失败哪怕只有一次，也必须迅速挽回。

他们认为，基督教徒狗仔们都打到了凯鲁万，只有直捣他们信仰的象征性城市才算雪耻。而象征基督教的城市只有罗马。于是，在博尼法乔撤走还不到一年的公元829年6月，满载大军的伊斯兰船队从突尼斯的港口启航。

登陆地点选在了罗马以北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这个港口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图拉真皇帝所建，进入中世纪之后仍是罗马教皇所领有的拉齐奥

地方的主要港口。奥莱利亚大道连接着奇维塔韦基亚和罗马。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一直把意大利半岛叫作“鲁米人居住的狭长土地”。他们看准了奇维塔韦基亚，把这里作为基地，去进攻位于“狭长土地”半腰上的罗马。

在古罗马时代，奇维塔韦基亚被称为“Centumcellae”，意为“万物仓库”。恰如其名，这里港口的规模堪与帝国时代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相匹敌。

当时，港口建造得合理而坚固，港内沿岸建有为数众多的仓库。由于是强大帝国的主要港口，才会有如此的设施。进入中世纪后，设施虽已闲置朽坏，但墙壁厚而坚固，不愧是罗马人所建。可以躲在这些仓库中作战，是奇维塔韦基亚得以抵抗伊斯兰军队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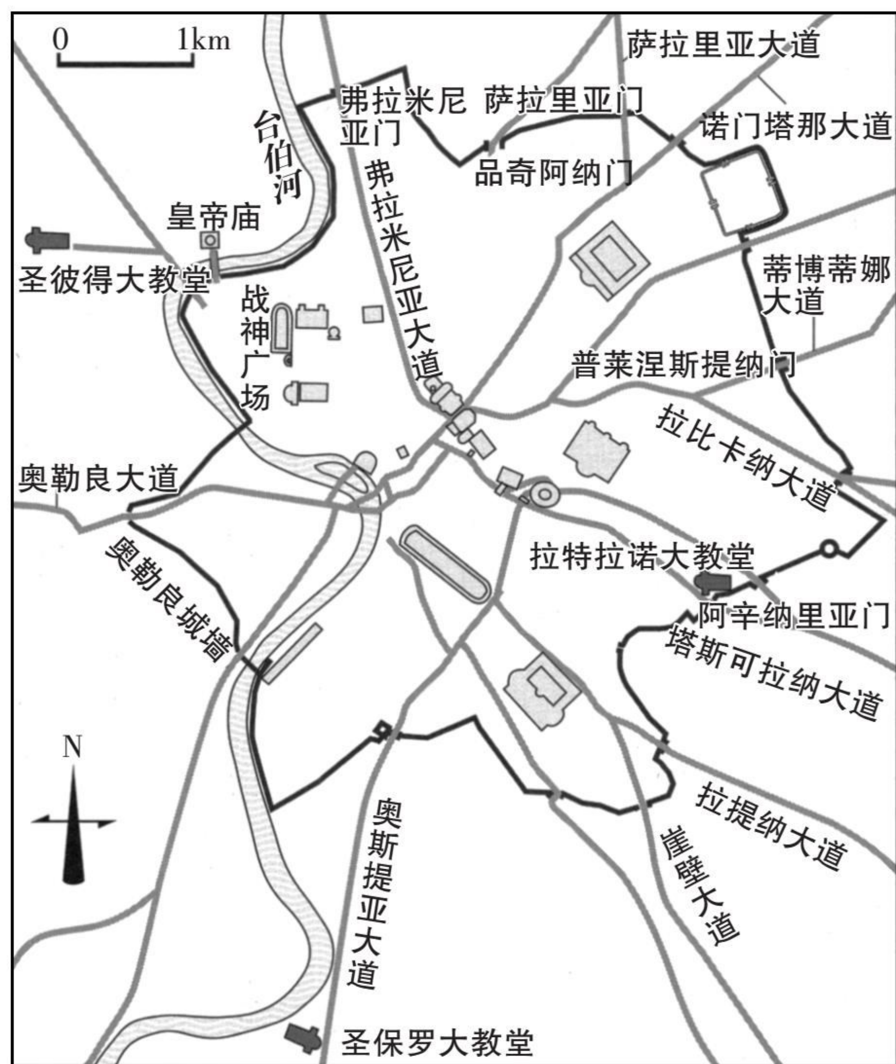
可是，长达两个月的保卫战以失败而告终。破城之后的屠城使奇维塔韦基亚成为无人之境，幸存的人们纷纷逃离，去了内陆深处。

在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时间里，基督教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赶来支援奇维塔韦基亚。罗马教皇并无军队。本该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兰克国王正忙于在意大利北部进攻同是基督教徒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南部拥有几个小公国的伦巴底人因惧怕伊斯兰军队而不敢靠近。拜占庭士兵也因防卫西西里腾不出手来。这就是9世纪“鲁米”即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所在的“狭长土地”上的状况。

也许是知道这一状况，伊斯兰军队攻陷奇维塔韦基亚后并未急于进攻罗马。他们知道近旁的奥莱利亚大道的终点就是罗马，却决定在托斯卡纳悠然过冬。当然没有缺粮之虞。不消说，意大利中部一带所有城镇村庄全都被撒拉森战马的铁蹄践踏蹂躏。当时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记录：铁蹄踏过之处宛如大片蝗虫袭来飞去。

第二年，公元830年春，伊斯兰军队留下少数守兵后向罗马进发。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沿奥莱利亚大道南下，一路沿海岸从海上到奥斯提亚港，下船后通过沿台伯河的道路去罗马。把船队调至奥斯提亚，是为了尽快把掠夺的物品和绑架的人们装船运往北非。

基督教方面的援军没有出现在奇维塔韦基亚。罗马号称基督教世界的首都，甚至没有援军前来救援。



罗马市区略图

进攻的伊斯兰方面似乎也没有多少兵力。可能是为了把抢来的东西和绑架的人们随时运去北非，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士兵离开了队伍。统率大军是要有很多条件的，但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却看不到有关情况。大概撒拉森人因兵力减少便分成小部队进行袭击，这也是海盗们更为习惯的方式。小镇小村抗不住撒拉森人袭击，但罗马城是帝国后期建设的，有超过20公里长的高大厚实的城墙拱卫。而攻击罗马的撒拉森人与海盗的所为并无二致。

当年的罗马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然而，位于城外的教堂却没有一个逃过劫难。

奥斯提亚大道旁的圣保罗教堂名为“Fuori di Mura”（城墙之外）。这样的教堂自不待言，就连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建设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也遭到了伊斯兰士兵的洗劫。圣彼得大教堂是遵从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体之上建造教堂”的教诲而建，建在圣彼得殉教的梵蒂冈。这座教堂在基督教世界享有至上的尊崇地位。伊斯兰士兵实现了他们说过的话——“把圣彼得大教堂变为马厩”。

罗马教皇居于建在城墙内侧的圣拉特拉诺大教堂。罗马人虽然没有打出城去的兵力，但尚有不让撒拉森人越过城墙的力量。教皇格列高利四世身先士卒，激励大家，全体市民行动起来，成功地守住了罗马城。

伊斯兰军队未能攻进城内，扫荡周边地区以后撤退了。他们从奥斯提亚港乘船返回北非，留下的人再次沿奥列里亚大道北上，在奇维塔韦基亚驻扎下来。他们没有改变把这座港口城市作为进攻罗马的桥头堡的想法。敌人夸口要抓住“无信仰狗的头目”，他们将在离格列高利四世教皇居住的拉特拉诺宫只有50公里的地方扎下根来。

此时，北非又传来了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的消息。

在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一带，正在集结300艘的船队和2万人以上的军队。这300艘船，可能多为“福斯塔”这种小型加莱船。即使如此，事实上这也是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撒拉森人所组织的规模最大的船队。

船队的目的非常明确，在西西里岛西岸登陆，企图一举攻陷巴勒莫。这次远征军的指挥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柏柏尔人阿斯巴哥，与其说他是安拉的战士，不如说是一个地道的海盗。

巴勒莫陷落

现代的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个区——西西里岛的首府，在此有区长官的官邸，是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但在古代，在中世纪前期，这里还只能算是主要城市之一。叙拉古自古以来一直是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雅典为得到叙拉古曾不惜冒远征的风险。柏拉图对统治组织抱有强烈的兴趣，为了看到最佳例证也访问过叙拉古。希腊人也曾祭出阿基米德研制的新兵器与罗马人苦战。罗马人认为，不攻下叙拉古就得不到西西里。这一想法与希腊人一致。

后来，在罗马逐步将地中海变为“自家之海”（mare nostrum）的过程中，位于与北非相对位置上的特拉帕尼、马扎拉和阿格里真托等都成为对罗马很重要的港口。在整个古代的历史中，巴勒莫的重要性都仅次于这些城市。进入中世纪以后，拥有西西里的拜占庭帝国让派去统治西西里的总督常驻叙拉古已成定例。

确定巴勒莫为目标，似乎也是顺应着这个传统，莫非公元830年的北非伊斯兰教徒中有优秀的战略家？因为叙拉古面海向东，阿格里真托面海向南，马扎拉面海向西南，特拉帕尼向西，而巴勒莫却面海向北。这就是说，巴勒莫面向着地中海这个广大的基督教世界。如果希望扩大“伊斯兰之家”，巴勒莫作为前沿基地最为合适。在攻下巴勒莫之后，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岛就成为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西西里得天独厚，军粮可以自给。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战略并非开始就是如此，这样的想法可能更接近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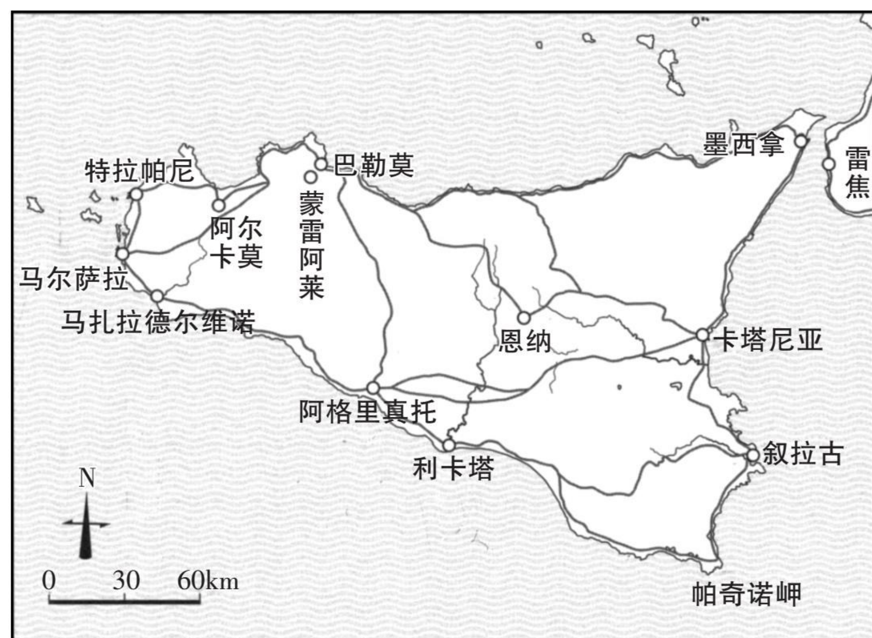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宗教狂热分子伊斯兰教徒阿萨德统率的征服西西里行动，自大肆张扬地开始以后，3年过去仍未攻下叙拉古。在西西里东西线中段的地方，有一座著名的城堡都市恩纳。这里位于要害之地，防卫相当严密。伊斯兰军队数次进攻均未奏效。顺便一提，为伊斯兰势力创造了征服西西里机会的欧赫米奥，被派来与守城的拜占庭军队谈判。他随即被捕，被指向伊斯兰出卖西西里而被处死。他借伊斯兰之力推翻拜占庭的统治后，自己当了统治者，但这美梦没能持续3年。

撒拉森人的海盗行动长年不断，他们或许认为征服西西里易如反掌。然而征服行动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把罗马选作目标的同胞已经带着掠夺而来的人和物满载而归，受到欢迎。他们知道后也许开始着急起来。出于以往的海盗经验，他们选择了防卫肯定比叙拉古薄弱的巴勒莫作为目标。

不论当初的动机如何，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择，这一选择甚至考虑到了恒久的益处。从此以后，巴勒莫比叙拉古更经常地成为西西里的第一大城市就是明证。在战略上值得赞赏的是，这次不是小股队伍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举投入大规模兵力的军事行动。

从马扎拉登陆西西里，已经成为北非伊斯兰势力这3年来的常路。公元830年这年，伊斯兰人也从马扎拉登陆，但船只多达300艘，无法全部进港。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另一路直奔北面不远的马尔萨拉港。这样登陆后队伍也分成了两支。阿拉伯人较多的部队去了巴勒莫，阿斯巴哥率领的柏柏尔人部队去了阿格里真托。他们准备进攻恩纳，然后一个回马枪杀向叙拉古。

可是，这支队伍来到阿格里真托时遭到了瘟疫的袭击。瘟疫总是在体力衰弱的时候或卫生状况最差的时候来袭。我们不知道柏柏尔人是否比阿拉伯人更不讲卫生，但去巴勒莫的那支队伍平安无事地行军时，第二队的人却因疫病眼见着一个个倒下。阿斯巴哥自己也倒下，死掉了。剩下的士兵都觉得征服西西里行动难以为继，乘上从西西里人那里抢来的船只逃回了北非。2万人的半数开了小差。



西西里

前去巴勒莫的那支队伍却意气风发。打头阵的士兵打着绿底白色月牙的“先知穆罕默德之旗”，队伍中有较多的阿拉伯人，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主流。

巴勒莫当时只不过是西西里的主要城市之一，加上那年听到撒拉森人逼近的消息后从周边地区前来避难的人，巴勒莫共有7万人口。只看这一点看就可以知道，中世纪前期的西西里比意大利半岛富庶。巴勒莫人根据以往直接、间接的经验知道，落入撒拉森人之手，其后的命运不是死亡便是沦为奴隶。他们拼死守城，坚持了一年之久。这让进攻的伊斯兰人也深感震惊。城里的所有人都笼罩在恐怖和绝望之中。

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赶来救援。这一点我已经写腻了。

拜占庭军队在防守坚固的恩纳和叙拉古坚守不出。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及基督教世界的各路王侯为守护自己的领地已经拼尽了全部精力，稍有余力的人脑子里也只想着如何侵略他人地盘。

罗马教皇在拿不出行动这一点上也与他们同罪。不过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说服不了拥有军事力量的人就什么也做不了。但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说明教皇动用了开除教籍的武器，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西西里是拜占庭帝国的正式领土。但是，拜占庭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实在不好。他们之间围绕圣像问题存在教理争论。虽有拜占庭皇帝，但教皇却又特意造出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虽同为基督教徒，这些事件仍然恶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说不定在罗马教皇的内心深处，还有冷眼观战，看拜占庭如何守卫西西里的心思。这时的巴勒莫食物匮乏，许多基督教徒饿死病死。

公元831年9月，巴勒莫攻防战已打了近一年。市内一切匮乏，应该说什么都没剩下更为准确。

在防卫战打到将近半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派来统治巴勒莫的总督、主教就已乘着准备好的船只出逃意大利了。没有找到船只，只得沿陆路西去的修士在逃跑途中被撒拉森人抓住，被逼做出选择：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去死。他们全体选择了死亡。

城市在这种状态之下陷落，并不是那种迎击发起总攻之敌之后雄壮的陷落。就像一点点地衰弱迎来死亡的人一样，城市终结于一片阴森恐怖的寂静之中。据说在长达一年的守卫战中死亡6万多人。

城市陷落后，市内还剩3 000多人，但多数都已衰弱到了极点，胜利者觉得送去做奴隶也无价值。还能走动的男女和儿童被装上了船，其余的人全部就地处死。

巴勒莫化为无人之境。后来，北非来的伊斯兰教徒在此定居下来。如果无人居住，拿下巴勒莫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重新引入居民，使城市再生。

很快就有地方长官被派到巴勒莫，地位低于突尼斯的地方长官，但官名一样。北非的伊斯兰势力将征服西西里全岛看得与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同等重要，让巴勒莫成为西西里中心的意图昭然若揭。

而基督教方面，似乎很少有人能正确认识到巴勒莫陷落意味着什么。更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即使在能够采取对策并有相应实力的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认识到个中的意味。

拜占庭帝国皇帝比其他任何人都能主张领有权，但其行动是在陷落4年以后的公元831年。虽然当时拜占庭帝国东有伊斯兰势力的进逼，北有斯拉夫民族的逼迫，但无论如何行动都嫌太晚。

在此期间，伊斯兰势力照例毫不留情地杀戮企图抵抗的人；抢掠贵重物品，甚至粮食、家畜；年轻人，甚至孩子也要抓来送到北非去当奴隶；最后放火烧屋，使之变成废墟。他们用这种做法征服了西西里西部，又将势力扩大到东部。

人们感到拜占庭帝国终于“行动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只能说是粗陋不堪。

皇帝任命女婿亚历克西斯为常驻西西里总督，命他组建救援西西里的大军。这事做得不错，拜占庭帝国正式表现出出征的架势。可是，此后的表现却证明，这只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国家及其最高领导人的做派。

亚历克西斯来到仍处在拜占庭帝国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西部，热心组建大军，成功地招募到了相当数量的士兵和船只。可是拜占庭皇帝知道后内心起了疑窦，想亚历克西斯莫非是想率领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把自己拉下皇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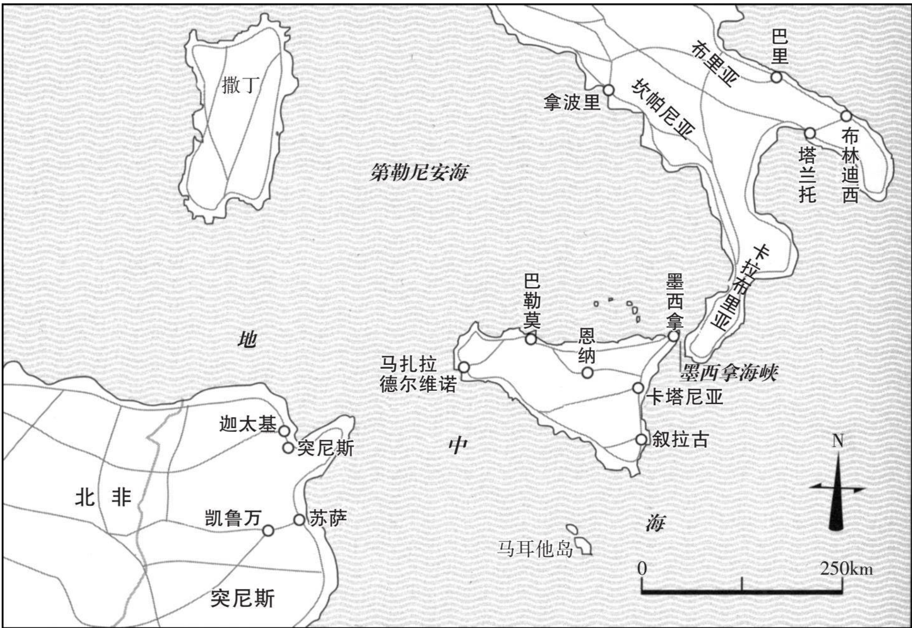
皇帝的疑虑给了专制君主国家必然存在的宫廷阴谋家绝好的借口。亚历克西斯被突然召回，直接投入了监狱。在牢里，这位拜占庭的贵公子似有所思，说他万念俱灰也许更加正确。他宣布舍弃公职、地位和妻子，要去修道院，于是被释放出来。回到现实世界后，他便在社会上彻底消失了。

拜占庭海军本应以海港城市叙拉古为基地，以保障地中海西部海域的安全为己任，但皇帝这个司令官的表现尚且如此，海军也就一事无成了。这时，拜占庭战船对撒拉森战船已是每遇必逃。

北非突尼斯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在现代欧洲被称作“西西里海峡”（Canale di Sicilia），因为西西里岛是意大利领土，但古罗马人却称同一片海域为“阿非利加海”（Africum Mare）。

在那个时代，西西里和北非同属一个文明圈，由一个皇帝统治。以隔海相望的随便哪一个国家的名字命名都不会意有所指。可是，到了中世纪，隔海相望的国家分属于不同文明圈。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辽阔海域自然会以拥有制海权一方的名称命名。

我甚至认为，在中世纪前期的这个时代，如果要给这片海域起名，用古代的称呼“阿非利加海”也许更为合适，因为这片海域的制海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的手中。



西西里及其周边

换成古代罗马人的观点，所谓制海权就是拥有把海洋称为“自家之海”的资格。一旦居住在北非的撒拉森人认为眼前这片地中海是“自家之海”，接着的想法就是要把横亘在地中海对岸的陆地也称为“自家的土地”，甚至还可用扩大“伊斯兰之家”的大义名分去行掠夺之实。

拿下巴勒莫大有好处，紧接着征服了从巴勒莫到墨西拿的海港城市群，使得这个好处更加完美。

意大利南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烈地受到西西里伊斯兰化的影响。受到影响的地方包括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膝盖以下的所有地方。这样的情形是很自然的。撒拉森海盗此前的做法是从北非来袭，猛击一下之后又回到北非。现在却可以中途先在不沉的航空母舰上落脚，然后再次出击。从此以后，以卡拉布里亚、普利亚和拿波里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地区完全暴露在撒拉森海盗的“猛击”之下。

同样打着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旗号，但地中海东部与西部情况并不一样。

在东部，伊斯兰势力从小亚细亚东部逐渐侵入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征服所有包围东地中海的陆地后已经过了两个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已经完全成为“伊斯兰之家”。或许可以认为，伊斯兰势力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恐怕已有相当的组织程度。此外，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是伊比利亚半岛，其土地之辽阔恐怕不能称之为半岛。这里处在以科尔多瓦为根据地的“埃米尔”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业已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伊斯兰势力的指挥体系。

在沿着扩张路线突飞猛进的9世纪伊斯兰世界中，北非在统治组织化方面最为落后。这片地区就后世的国别而言是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将这些国家统称为“阿非利加”是因袭古罗马的习惯。历史完全不同的埃及往往被区别开来。中世纪伊斯兰化之后，仍然继承了这个习惯。

在以巴格达为首都的伊斯兰世界中，北非的定位是“伊斯兰之家”的内部成员，但其地位却莫名地有所偏离，待遇方面类似于相当程度上被授予自治权的“埃米尔”所统治的领地。“埃米尔”一语的日语究竟是译为中央派遣的地方长官好呢，还是译为有着强烈的实力者意味的“酋长”好呢，人们莫衷一是。顺便一说，这个词儿有时译为“酋长”，是参考了现代将“United Arab Emirates”译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例。

总之在中世纪前期，北非的统治形态明显尚未确立，连伊斯兰史专家一般也在这一方面不甚明了。

但是指挥体系不明确的状况却会令其敌手困惑。如果指挥体系明确，必有一定的战略战术预测其动向，事先“读懂”并非难事。军队越庞大就越容易在其准备、整编阶段察知其动向，也就越容易确定迎战体制。

可是，中世纪前期的北非情况完全相反。“地方长官”埃米尔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不明确。时常有埃米尔亲率大军前来进攻的情形。撒拉森人大多情况下是以小规模海盗船队前来袭击。令基督教徒悲叹的“大群蝗虫”也并非一次性集群来袭，好似分为小群分别在不同日子袭击不同的目标，形成波状攻击，反复不已，令人防不胜防，放马后炮都来不及。

北非的伊斯兰社会

从撒拉森海盗的传统、习惯和性格来考虑，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合理、完美的。

他们操纵着容易控制的小型加莱船，船上没有多余之物，船快如飞，小规模行动使他们神出鬼没。他们打着基督教国家和城市的旗帜骗人眼球，登陆后丝毫不浪费时间，只做海盗该做的事情，然后和来时一样迅速消失在大海深处。

在他们的祖国，这样做完全不是犯罪。不，甚至还是英雄行为。

第一，掠夺来的物品和绑架来的基督教徒在市场上出售，所得金额的五分之一会自动上缴给“酋长”。

第二，撒拉森海盗在基督教徒居住地区采用的是恐怖战法。如果这样能引起人们恐慌，使人们绝望，就比出兵征服容易得多。撒拉森人的海盗行为也是伊斯兰化的前哨战。

第三，必须提到一个事实，即对于居住在北非一带的人们来说，海盗业已经成为一项产业，也给未直接从事海盗业的人们带来了就业机会。

要把掠夺来的物品和绑架来的基督教徒换成“收益”，就需要有人来判断这些商品的价值，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些人还有另外一项工作，管理、运营收容掳获来的基督教徒的“浴场”。

“浴场”一词自古就有两个意思：洗澡的地方以及收容战争俘虏的场所。

在古代和中世纪，有不少词语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浴场”也是其中之一。在中世纪的欧洲，洗澡不再受到重视，甚至认为洗澡带来的愉悦会使人堕落，因而有害。罗马时代被称为“庶民宫殿”的豪华而设施齐全的公共浴场也都化作废墟，人们已忘却了公众浴场这个词。而在同时代的北非，这个词语的意思转变成为“收容掳获来的异教徒的地方”。

因而，在中世纪听到“浴场”一词后首先联想到的是强制收容所。不过这与20世纪纳粹的强制收容所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

8世纪到18世纪北非的“浴场”接受外面的雇佣委托，被收容的人可以到收容所外面劳动。这意味着“浴场”是奴隶的收容场所。劳动报酬不直接付给奴隶，而是付给管理运营“浴场”的伊斯兰教徒，充作“浴场”全体人员的伙食费等费用。当然，管理者最热心的事是极度降低伙食的质量，更多地中饱私囊。

海盗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以造船匠为主的工匠是高效推进海盗业不可或缺的。随着船只使用次数的增加，损耗也不断加大。经常需要新造船只，修理修复的工作更不待言。不过，北非伊斯兰教徒中适合这种工作的人手不足，而从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绑架来的人可以派上

用场。

但从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是给直接从事海盗业的人创造了机会。把他们称为“pirata”也好，“corsair”也罢，他们实质上都是海盗。

海盗也和士兵一样是最危险的职业。他们可能会遭遇敌方船只，在交战中战死，也可能在袭击城镇的过程中战死。海盗船遭遇暴风雨沉没的概率也不低。海盗这一职业成功后到手的报酬很高，但风险也很高。

正因为如此，从征收收益五分之一的“酋长”到船主到船长，都在积极发掘有能力的人才。

在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中，体格健壮的年轻男人几乎都充当划桨手。其中有些人会在面临危险时处置得当，或在别的方面表现出众。海盗就会招揽这些人。

不过，这些人继续信奉基督教是不合适的，要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海盗们便设下圈套，诱使某个年轻人去杀伊斯兰教徒。异教徒哪怕是不得已杀死伊斯兰教徒，等待他的只有死刑。可如果是伊斯兰教徒，即使杀死其他伊斯兰教徒，只要有人证明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就会被认可为正当防卫。这就是海盗招揽有能力的基督教徒的手段。这与现代国家的谍报机关所擅长的招募间谍的手法如出一辙。

无论如何，海盗业想要产业化，决定成败的是“人”，这与其他工作是一样的。后来甚至还有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意大利南部青年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例子。在此700年前的9世纪时，就已有原基督教徒当上撒拉森海盗船的船长了。历史上的所谓强盛期，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时代。在8、9、10三个世纪，这种运气确实偏向于北非的伊斯兰方面。

人们对其他产业的兴趣和对海盗业投入的减少并不能阻止海盗业作为一种产业取得成功。在迦太基统治的时代，或是在被罗马帝国收编的时代，北非还是丰饶的农耕地带，甚至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粮仓，自古就以出口农产品闻名。

到了中世纪，这一切全改变了。海盗袭击之处，小麦等农作物也会遭抢。农作物刚收获就被抢走，这使我们感到同情，但同时也感到愕然：连小麦这样的大量低价的便宜货都值得抢吗？

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越来越依靠海盗业为生了。长远来看，这就是导致地中海南岸居民逐渐减少的重要原因。

这是中世纪前期的9世纪，是一个海盗竭尽全力，因而极富攻击性、强而

有力的时代。他们现在已经可以使用西西里这个中转基地了。罗马以南的沿海地区已经没有一块基督徒的安身之地了。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

以拿波里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对这种状况的反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敏感。这里是意大利半岛著名的丰饶之乡，耕地辽阔，古罗马人称之为“幸运的坎帕尼亚”（Campania felix）。

这里位于拜占庭帝国和伦巴底各公国统治圈的边缘，直到9世纪一直是权力的真空地带。拥有如此丰饶的腹地，不受压制的人们一定会有想法。这想法就是建立独立的共同体。这样想这样做的都是罗马时代延续下来的海港城市，自北向南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政治组织也都是以执政官（consul）为最高长官的共和政体。

这些海港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意大利北部的感情不如对北非更为亲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睁眼就能看到地中海的缘故吧。这些城市的港口全都是面向南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同，船就是脚。海盗的“脚”也是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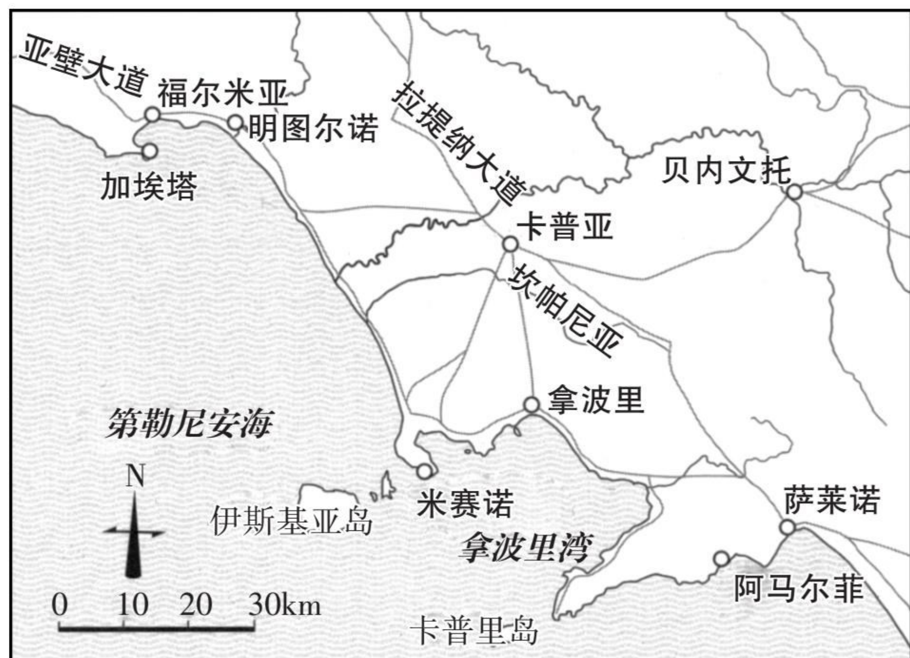
可以想象，即使在北非伊斯兰化以后，已经习惯于这种观念的坎帕尼亚并不忌讳与异教徒进行贸易，坎帕尼亚在中世纪依然还是农产品的出口地。

近在眼前的西西里也正在扎实地进行着伊斯兰化的转变。与其被从西西里中心巴勒莫出港而来的海盗抢劫绑架，不如与住在巴勒莫的伊斯兰教徒进行贸易。这种想法很难受到责备。当然，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则有可能受到谴责。伊斯兰教是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与敌人结好就是背叛。不过，谴责他们的人也并没有出动船队，前来保卫坎帕尼亚海港城市的安全。

岂但如此，虽然同为基督教徒，拥有内陆地区的伦巴底各公国并不满足，还把手伸向了这些海港城市。贝内文托是伦巴底的公国之一，大公亲自率领军队向三个海港城市中土地最为富饶的拿波里发起了进攻。

公元835年，巴勒莫落入伊斯兰之手仅过了4年，拿波里就在海上有撒拉森、陆上有伦巴底的腹背受敌的状态下，与巴勒莫的“酋长”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

罗马教皇谴责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缔结这个条约是“与恶魔结盟”。的确，即使不考虑宗教上的差异，这也是一座“危险之桥”。



坎帕尼亚及其周边

伦巴底人看到巴勒莫“酋长”派来的船队，就不再攻击而撤退了。眼前的危机消除了。然而，同盟关系常被强大的一方所左右。只要对方认识不到破坏同盟关系的后果，持久的外交也不会得到保障。

即使是短暂的，拿波里一带的人总算又能睡个安稳觉了。然而，撒拉森人的海盗业已经产业化，为了生活不得不继续做下去。于是，撒拉森海盗改变了一下袭击目标，转向了位于长筒靴踵部的普利亚。以前这一地方较少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现在这里也进入了海盗的视野。

把目光转向这里的伊斯兰势力已不满足于只做海盗，他们的意图是像占有西西里那样完全占有这块地方。他们已把攻击目标锁定在了自古以来就以良港而闻名，背后又是广阔麦田的塔兰托和布林迪西。

拜占庭的皇帝是意大利南部的正式统治者。但拜占庭军队撤退以后，伦巴底人的一支贝内文托公国便包抄而来。拜占庭并未尽到防卫和保障安全这一统治者的义务，却一个劲儿地主张统治权，间或派些军队过来，好像要证实一下这种权力。

从北非和西西里来的伊斯兰势力在与拿波里结盟之后的5年中，与贝内文托公国交手三次，三战三胜。撒拉森海盗越发认为基督教徒胆小懦弱。伦巴底人源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南下而来在意大利落脚，改信基督教以来已有300年。即使不以伊斯兰教徒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已成为优秀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一定认为，这些伦巴底人不是对手，普利亚很容易征服。伦巴底士兵没有拦住撒拉森人，威尼斯共和国却成功堵住了他们。

威尼斯人如何会在这时出现呢？其原因据传是威尼斯正式接受了拜占庭帝国的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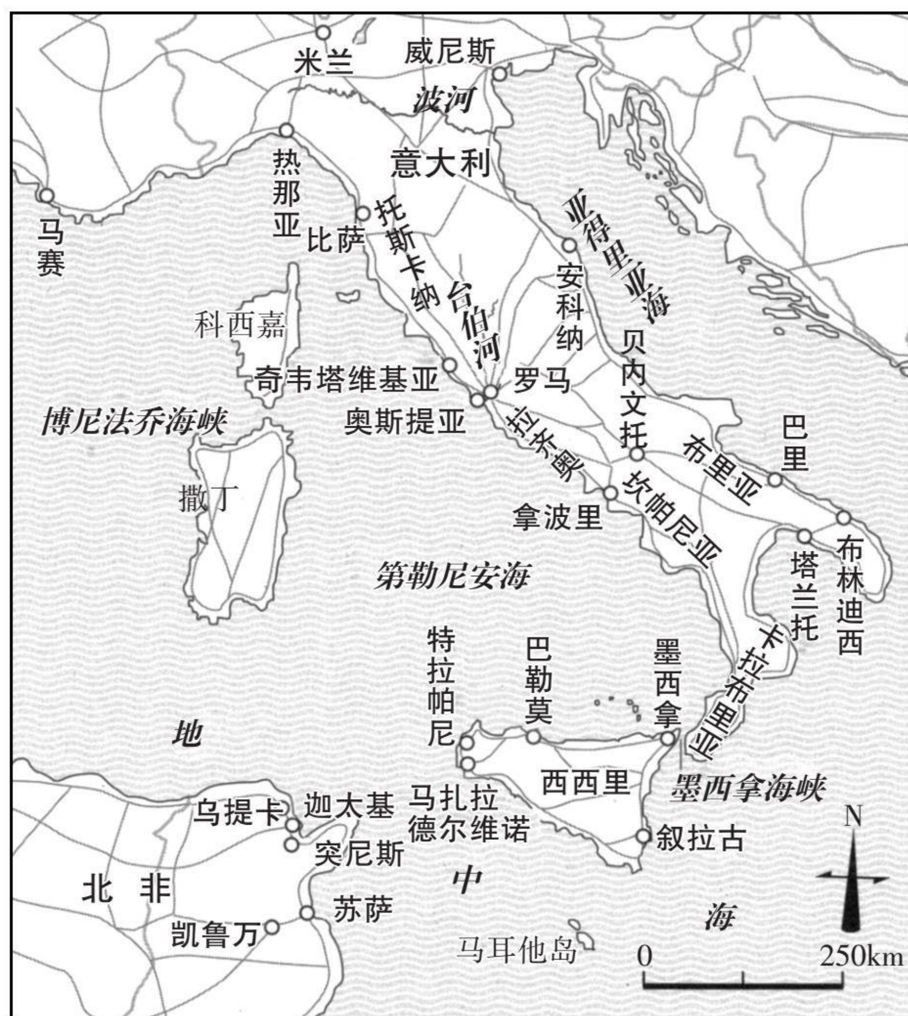
5世纪中叶，为了躲避大举入侵的蛮族，人们在一片汪洋的潟湖海滩上建设了居民共同体。如果将那时作为建国起点的话，到9世纪中叶，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有了400年的历史。但这个共和国有着长达1400年的历史，以人的成长作比喻，度过最初的400年可以说是刚刚踏进青春期。

拜占庭帝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威尼斯的正式统治者。但由于威尼斯位于拜占庭帝国的西端，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所有方面都处在专制君主统治的负面影响之外，没有受到压制，这是非常幸运的。威尼斯商人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去，会比其他欧洲商人享受到更有利的条件。威尼斯有能力给拜占庭帝国带去它所需要的东西。

最初，拜占庭帝国向威尼斯共和国要求，打退当时横行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海盗。海盗的巢穴散布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如果斯拉夫民族在这里定居下来，土地毗邻的君士坦丁堡就会受到威胁。

威尼斯当然会接受这个请求。他们从建国之初就以通商立国。亚得里亚海是通商要道，确保海上的安全航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9世纪前半叶，他们才刚刚开始着手这样做，离确立的目标路还很遥远。

解读以后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大国之一威尼斯共和国的钥匙是“国家利益最优先”。无论在政治、军事和宗教各方面，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为信仰、名誉冲昏头脑的时候，只有威尼斯的统治者置身局外。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甚为令人生厌的现实主义者的集团。



意大利及其周边

公元840年时，纵令没有拜占庭帝国的请求，威尼斯大概也会出动海军。个中原因看看地图就会知道。塔兰托和布林迪西所在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部位一旦伊斯兰化，就堵住了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威尼斯也就无法与东方进行贸易，为刚刚确立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所付出的辛苦也将付诸东流。如果不能从亚得里亚海深处走出，威尼斯共和国就是死路一条。

9世纪威尼斯海军在规模上还称不上是海军。总督彼得亲自率领，海军倾巢而出，能集结到塔兰托外港的也只有60艘加莱船。他们不但规模小，战

术和士兵也不熟练，在与撒拉森海盗的战斗中大败亏输。

威尼斯士兵几乎全部战死，仅有的幸存者也都当了俘虏，被送往北非的“浴场”。只有总督乘坐的船和其他极少数船只成功逃脱，但也一次次地遭到追击。据说他们一直沿亚得里亚海北上逃到海湾，都忘不掉背后受敌的恐怖。

撒拉森人这时很冷静，未去攻击威尼斯本土。但他们在沿亚得里亚海返航途中，袭击了沿途经过的所有港口。尽管离波河河口稍有距离，他们还是沿河逆流而上，沿途扫荡，就连罗马时代的港口城市安科纳也未能幸免。每次袭击后，撒拉森船都会加载抢来的东西和人。凯旋回到塔兰托港时，所有船只都超载得几乎沉没。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撒拉森的海盗船队于翌年841年再度从塔兰托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北上。去年遭到沉重打击的威尼斯出动船队迎击，但再次败北。威尼斯船队只得又一次逃进潟湖。

威尼斯海军在中世纪后期被称为地中海女王，基督教舰队也只有在威尼斯参战时才能获胜，但在中世纪前期却是如此惨象。

如果伊斯兰方面当时乘胜追击，亚得里亚海大概也已成为伊斯兰之海了。斯拉夫人同样也是海盗，这两家无论谁胜，亚得里亚海一定会成为海盗之海，而不再是商人之海。

然而，撒拉森人救了威尼斯。撒拉森人的行事方式一贯不够谨慎耐心。他们在努力称霸西西里的同时，还把手伸向了意大利半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战果惊人，却忘记了这战果，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

威尼斯人的性格却完全相反。他们具有正视失败，从头开始的坚韧意志和忍耐力。威尼斯两度败给撒拉森海盗。这一定给斯拉夫海盗增添了勇气，让他们卷土重来。他们此前被威尼斯人赶进了地势复杂的江河入海口深处，潜伏下来。威尼斯人不得不从头开始整治亚得里亚海上的海盗。

再攻罗马

但是，威尼斯海军败北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亚得里亚海。两年后墨西拿陷落，西西里北部完全落入伊斯兰势力之手，进攻教皇这个“胆小的基督教狗”的最高人物居住的地方已无任何障碍。

距罗马仅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港也已被伊斯兰占领。进攻罗马的船队也

可以从巴勒莫和墨西拿这两个良港扬帆起航。当时在意大利南部有陆上战斗力的是伦巴底人，其中贝内文托公国已被屡次击败，必定不会出头，其他公国正忙于内讧，不会成为问题。伊斯兰方面判断，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救援罗马。威尼斯也还龟缩在亚得里亚海的深处。

凯鲁万的“埃米尔”看准现在正是进行圣战的好机会，命令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等地的地方长官做好准备。

圣战是忠实实行《古兰经》教义的事项之一。圣战允许以下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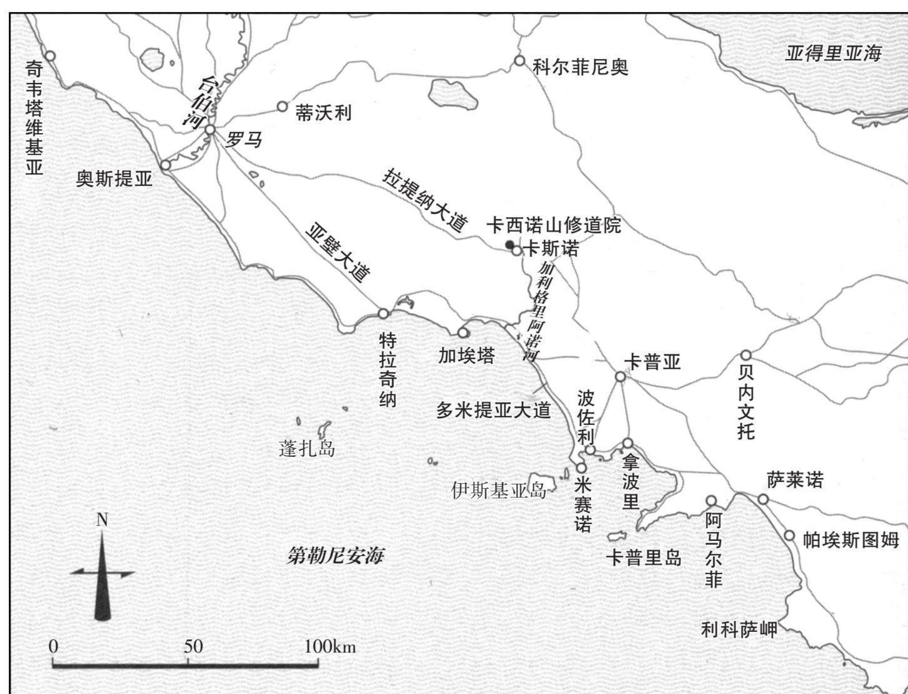
剥夺基督教徒这些信错神的教义的人们和犹太教徒的财物是正当行为，抓获信仰错误的人当奴隶也是正当行为。于是，不仅伊斯兰教徒，听从圣战召唤行动起来、对额外好处更感兴趣的撒拉森海盗也卷了进来。

他们在以往的海盗行动中了解到，基督教徒奉献的财宝集中在大修道院和城里的主要教堂中。

15年前的公元830年，撒拉森海盗打到罗马，却因城墙阻隔未能进入市内，只扫荡了圣彼得和圣保罗等位于城墙外的教堂。虽然这两座教堂在罗马的教堂中数一数二，但城墙内还有教皇居住的拉特拉诺等罗马七大教堂中的三座。教堂之外，罗马还集中着贵族和豪门望族的宅邸。在伊斯兰教徒眼中，罗马既是“错误信仰之徒的头目居住的城市”，还是一座有众多猎物的城市。

从北非各地出发的伊斯兰船只首先在西西里的巴勒莫集结。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规模多大，总司令官是谁。历史上只有时在夏季大船队集结的记载。船队在巴勒莫分两路出海。一路可能打算在墨西拿靠港，然后进入伊奥尼亚海，在塔兰托登陆后沿着古老的亚壁大道，直指罗马。

主力所在的另一路离开巴勒莫之后一路北上，进入第勒尼安海，然后一分为三。其中一队在利科萨登陆。帕埃斯图姆在现代以古代神庙遗迹而闻名。利科萨是帕埃斯图姆南方的一个海岬，控制了这里，阿马尔菲、拿波里和加埃塔等地连商船也将无法出海。



意大利中部

同时，另一队在蓬扎岛登陆，占领了这座小岛。在罗马帝国时代，蓬扎岛是流放，或是说隔离发生丑闻和制造麻烦的皇族成员的地方。该岛并非孤悬海外，一旦控制了这里，船只从意大利南部驶向罗马的必经海域便可尽收眼底。蓬扎处于拿波里的势力之下。蓬扎与拿波里签有同盟条约，但该岛被占领，拿波里却一声不吭。

第三队好像去了已被占领的奇维塔韦基亚港。

仅仅这些也已是相当规模的大战略了。撒拉森海盗的行动是走哪算哪。只有这一年，凯鲁万的“酋长”让人觉得准备充分，行为符合圣战宣言，是依据经过相当推敲的战略在行动。

拿波里的执政官比谁都早地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执政官赛乔向海港城市加埃塔和阿马尔菲发出了呼吁。这三座海港城市的代表都非常害怕，如果罗马陷落，整个意大利南部就会被伊斯兰化。他们迅速组成船队，然后率领船队来到利科萨，团团围住停泊在附近的伊斯兰船队，进行威胁，让其选择是回到巴勒莫去，还是以自己的血来祭奠这片海域。

撒拉森海盗善于登陆抢掠，却不喜海上作战。他们决定撤退，离开了利科萨。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可得到巨大收获的圣战。他们也不会自缚于与拿波里的约定，拿波里人也是基督教徒。

伊斯兰势力离开利科萨后并没有去巴勒莫所在的南面，而是不理睬拿波里，径直北上，在拿波里湾西端的米赛诺登陆了。

米赛诺是罗马帝国时代最重要的军港所在地。这里可以停泊众多的船只，陆上交通也很便利，拐上多米提亚大道和亚壁大道，可以直通罗马。

伊斯兰船队在米赛诺卸下士兵和马匹之后，空船往北驶向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他们连拿波里也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加埃塔了。陆地北上的士兵和海上北上的船只都不理睬加埃塔。伊斯兰士兵沿着古老的罗马大道前行，他们高呼口号，直奔罗马而去。

“砸烂无信仰者的神圣之都！在它的瓦砾上赞美安拉的荣光，建造清真寺！”

北非侵略者为求军粮一边行军一边抢劫。8月的强烈阳光似乎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痛苦。

公元846年在位的罗马教皇是3年前登基的塞尔吉乌斯二世。在中世纪前期，很多教皇的生年不详。这位教皇情况同样如此，不知他有多大年纪。他在第二年去世，可能不是老死就是病亡。伊斯兰大军逼近，他并不能身先士卒，奋起指挥，是罗马的市民奋起保卫自己的城市。罗马首次记录下了伊斯兰军队的规模。

船只有73艘，其中50艘为大型船，其余23艘为“小船”（sottile），这些小船可能是为军事目的而造。

阿拉伯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进攻的军队总数大约为3万人。据说其中1.5万人是步兵，所以3万人这个数字中也许包括划桨手。伊斯兰船上的划桨手经常是基督教徒奴隶。他们经常被铁锁链相互连成一串，锁在划桨台上，一边挨着鞭打一边划桨。这些人只是“马达”，不是兵力。纯粹意义上的士兵人数，不论如何高估，2万已是极限了。要攻打由周长超过20公里的城墙防守的大城市，这点儿兵力太少了。这些兵力也许就是当时北非伊斯兰世界能够动员起来的最大限度了。

能够动员的军队人数必然反映出人口的状况。罗马帝国末期因为人口锐减，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数量也减到了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以下，罗马帝国以这样的状态进入了中世纪。地中海南边的伊斯兰世界和北边的基督教

世界大概都面临着可动员的人数减少的类似情况。在某种方面，这也可以说是穷人之间的对决。

绵延不断的环绕罗马城的坚固城墙是罗马帝国的遗产。以前遭受过撒拉森海盗祸害的人们得知伊斯兰军队要来进攻后，纷纷逃来罗马避难。他们与罗马人的共同点是“绝望”。然而“老鼠急了也咬猫”(注)。绝望的老鼠齐心协力，奋起抗猫。附近的伦巴底士兵和驻扎在罗马的法兰克士兵也都参加了罗马的防卫。近郊拥有领地的豪族也带领手下的男子赶来罗马。时常为弹丸之地你争我夺的人们，也因为罗马的危机而将平日的恩怨置之脑后。也许“绝望”与“信仰”超越了消极性和利己心。没有谁来做总指挥，但防卫的一方团结紧密，士气高昂。

罗马周围高大厚实的城墙因由奥勒良皇帝建造而被称为“奥勒良城墙”（Mura Aureliana）。伊斯兰军队来到这座城墙前，城墙上箭矢如雨而下,箭雨中一个个士兵又被投石机抛来的大石块击中。

伊斯兰士兵的服装优先考虑的是要能自由活动，对箭矢和石块几乎没有防护作用。他们也并不擅长这种旷日持久的攻城战。要攻下这座“无信仰狗的神圣之都”，非得等到防守一方粮尽而降的时候。伊斯兰方面只有2万名士兵，也不可能将有20公里以上城墙环绕的罗马城围得水泄不通。

攻不进城去，就彻底扫荡城外的广阔地方。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首当其冲。根据教廷的记录，从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始者查理曼，历代皇帝贡献的金银圣器都被劫掠一空。这个记录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在15年以前，这两个教堂就曾被劫掠过。

不过，这些“集500年间贵重物品贡献之大全的一大博物馆”中的一部分还会遭到劫掠。

有过15年前被劫掠的经验教训，人们应会将这些贵重物品转移到城内的教堂中。但在基督教徒中，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想法非常浓厚。像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这样最重要的教堂，也不可能全部搬空。伊斯兰士兵这次还会有相当丰盛的收获。据说这些士兵向绘有基督圣像的镶嵌画放乱箭，在自己的阵地上通宵狂欢乱舞，寻欢作乐。

这些情况传到城内基督教徒的耳中，他们群情激愤。第二天夜里，人们趁着夜幕，悄悄渡过台伯河，攻入了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人们手执火把，袭击了伊斯兰士兵。偷袭取得成功，至少将伊斯兰士兵赶出了圣彼得大教堂。

成功夺回圣彼得大教堂，给城里的人们增添了信心，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

意大利中部。罗马奋起了，整个意大利中部都在奋起反击伊斯兰。自古仅自北方而来的大道就有奥莱利亚、加西亚、萨拉里亚、诺门塔那和蒂泊蒂娜五条大道汇集于罗马。中世纪前期，这些道路虽有破损但仍可使用。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大道来到罗马。公元846年，人们通过这些大道聚集而来，拯救罗马。

不知是为了信仰，还是出于勇气，抑或是由于面对危机的绝望，也可能是这些兼而有之，大批民众不断聚集而来。伊斯兰士兵震惊了。

以前他们认为基督教徒是“胆小没有反抗勇气的狗”。狗现在要冲过来，而且是成群结队的。伊斯兰士兵开始退缩。他们溃不成军，只想着带回抢来的东西，于是乱成一片，四散而逃。

有些人向停在奥斯提亚港待命的船逃去，有些人涌上亚壁大道，一个劲儿地南逃。多数赶来救援罗马的人都是沿大道从北方而来，伊斯兰士兵便全部向南逃去，向基督教徒不会过来的方向逃去。然而，冬天将至，他们即使南逃，也不再安全。

加埃塔、拿波里，还有阿马尔菲，这些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已经与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缔结了同盟条约，但这次也明确地站在了基督教一边。这样，逃往意大利南部的伊斯兰士兵在罗马与拿波里之间受到了夹击。

绝望的伊斯兰士兵用信鸽向巴勒莫的地方长官求援，信鸽是他们之间使用良好的通信工具。地方长官收到了信，但船只出港要看天气。虽然地中海总是风平浪静，在冬季也会不时波涛汹涌。到了次年的公元847年，靠抢掠度过一冬的伊斯兰士兵盼望已久的船总算从西西里、从北非开来。不过在此期间，基督教徒已经组建了防卫军，指挥系统也已确立，总指挥是法兰克国王、曾经的意大利国王鲁多维科。伊斯兰方面也重整旗鼓，留在奥斯提亚和米赛诺的船只也南下与从西西里和北非来的船队会合。

在此后的半年里，伊斯兰方面企图进攻卡西诺山大修道院，与团结一致的基督教方面展开了地面战，双方都要争夺这座意大利南部最为著名的修道院。春天的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在卡西诺山下布阵的伊斯兰军队被水冲走。基督教方面认为这正是上帝的恩宠，他们沸腾起来，感谢上帝。载着幸存士兵的伊斯兰船队与载着基督教方面士兵的阿马尔菲和拿波里船队之间展开了决战。

根据基督教徒的说法，这时上帝又出手相助。在海上决战打响前，胜负就已决定。强风突如其来，袭击了加埃塔港外海战场。基督教方面的船只尚未出港，躲过一劫，强风直接袭击了已经来到港口外海的伊斯兰船队。据说加埃塔附近海岸满是溺毙的撒拉森人的尸体。被铁锁链连成串的划桨的

基督教徒奴隶和船只一起消失在海底。也许上帝的恩宠是有优先顺序的。就这样，公元846年开始已打了7年的、以征服基督教首都罗马为目标的伊斯兰圣战彻底失败了。

但是，伊斯兰方面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是一场凯鲁万的埃米尔发动的圣战，凯鲁万相当于西方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实际上，这也是一场起着首都作用的突尼斯的埃米尔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征服罗马为目标，并得到了举国支持。就这样败下阵来，对这两人而言都有面子的问题。北非的新伊斯兰教徒都是被军事征服后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原住民，一旦败退，这两个人必然会在他们中间失去威望和权力。圣战的成功与否还是国内稳定的关键。

不等这年结束，说教继续圣战的导师就从凯鲁万分赴北非全境。他们在各地清真寺的经坛上热情说教。

“征服错信上帝教义的无信仰之徒的首都罗马，是安拉和穆罕默德的共同愿望。参加圣战是我们忠于伊斯兰教义的义务。天堂在等待着参加这场神圣战斗的人们。去吧，伊斯兰的战士们！打到罗马去！”



法兰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

第二年，公元848年的整整一年中，北非全境建造新船的锤声就没有间断过。士兵们不再去想过去的失败，开始集结。凯鲁万的埃米尔也高调宣布要在翌年重开圣战。

在意大利半岛，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面对面的第勒尼安海一侧，没有一个人认为伊斯兰就会这样退走。这里的人对撒拉森海盗的恐惧，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所谓世袭感情。

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半岛居民认为，如果罗马屈服，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将屈服于伊斯兰。历史上并不缺乏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

西西里，除了恩纳和叙拉古之外，全岛已被伊斯兰势力征服。

意大利南部数一数二的良港塔兰托和巴里也已落入伊斯兰之手。

在意大利中部，要把伊斯兰势力从教廷领土内第一港的奇维塔韦基亚驱逐

出去，却无法着手实行。

在其他地方，人们惧怕海盗的小船队，风一般来袭，抢人越货后又风一般消失在地平线之外，连渔民也只能在海岸附近捕鱼。

直到今天，在意大利半岛第勒尼安海一侧，随处可见被称为“撒拉森人洞窟”（grotta saracena）、“撒拉森人入海口”（cala saraceni）的地方。这些都是他们发动袭击之前的藏身之地。不光在第勒尼安海的基督山、吉廖、皮亚诺撒以及厄尔巴岛这样的小岛，就连撒丁、科西嘉这样类似陆地的大岛沿岸也遍布着这种海盗的藏身之地。这意味着，不仅罗马以南的地方，就连罗马以北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也都进入了撒拉森海盗的视野。

好似要证明这种情形一样，公元849年刚刚入春，撒拉森船队在鲁尼登陆，其目的与其说是打圣战，不如说是做海盗。

鲁尼位于托斯卡那北端，自古以来就是港口城市，港口背后有耕地，以富饶闻名。撒拉森海盗捣毁了鲁尼。他们并未在劫掠、绑架后立即撤走，好似要向基督教徒显摆伊斯兰发怒的后果。从此以后，鲁尼成为一片废墟，化为无人之境。撒拉森人撤退之后，回来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下。

撒拉森人毁灭了鲁尼之后并未停止北上，他们接连扫荡了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沿海地方。他们的暴行甚至波及法兰克南部，之后才终于南退。即使在普罗旺斯，人们也不敢放心地靠近大海了。

基督教的“圣战”

这个时代，只有罗马教皇能够设法拯救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于水火。前任教皇去世后，利奥四世一年前被选为教皇，他以积极进取而著称。

利奥教皇没有坐等北非的再度挑战。当选为教皇后，他立即进行了罗马城墙的加固工程，还制定了用粗铁链封锁台伯河的战术，并完成了准备工作，如果敌船沿台伯河逆流而上进攻罗马，随时可以付诸实施。

利奥四世认为目前面临的状况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问题，所以他并未向拜占庭的皇帝发出呼吁。虽然他向神圣罗马帝国请求组织军队，抵抗伊斯兰，但却同样未抱多大希望。与其依靠这种地位崇高的世俗者，不如依靠对撒拉森的威胁有切肤之痛的意大利人。他将拿波里、加埃塔和阿马尔菲的代表召到教廷所在的拉特拉诺。

问题在于，是等撒拉森人登陆后予以迎击，还是在海上严阵以待，在撒拉

森人登陆前展开决战。我们不知道教皇是与什么人商量的，说不定教皇采纳的是应召而来的阿马尔菲代表的意见，他是三个海港城市中最了解北非情况的人。教皇选择了在海上决一雌雄。

9世纪的阿马尔菲仅次于同时期的威尼斯，几乎是西欧唯一深深介入东方贸易的国家。他们和威尼斯一样，与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也有贸易关系，常常引起敌视伊斯兰的教皇不快。

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对伊斯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撒拉森人不但不惯于攻城战，而且也不善于海战。

也许同样根据这三位代表的意见，决战的战场定在奥斯提亚港前方的海面上。可能教皇认为，如果这场海战失败，台伯河两岸设置的铁锁链将不起作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背水一战。这时传来了消息，在大海彼岸，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大船队已经离开突尼斯港。

代表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的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提供的船只和水手已经全部开进奥斯提亚港。志愿参加海战的士兵也已开始从整个意大利集结到达奥斯提亚。接到报告的教皇利奥也走出位于城墙之内的安全的拉特拉诺宫，前去奥斯提亚。教皇来到这个图拉真皇帝建设的巨大港口，向停泊在此的船上的船员和士兵高声说道：

> 万能的上帝啊！昔日在您的救助下使徒彼得曾行走海上。您还三度拯救了遭遇风暴即将沉没的使徒保罗。这次，请听听我们的祈祷吧！基督教的信徒们，现在正要为正当神圣的大义献出生命。如果他们在即将开始的海战中获胜，那也是为上帝的荣光而做出奉献。愿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永昌！

教廷的记载中记录道，人们凝听着，神圣之火在心中燃烧。

地中海彼岸人们的心间燃烧着“神圣之火”，地中海此岸也同样燃烧着“神圣之火”。

伊斯兰称“圣战”为“jihād”，同一个词语基督教则称为“Guerra Santa”。所谓圣战是一神教才会有的概念，一神教最大的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的存在。

教皇利奥没有回罗马，在奥斯提亚住了下来。他打算亲赴上帝之子即将开始的海战。无须久等，派去侦察的快船回来报告，伊斯兰船队已经逼近。

台伯河入海口两边，海岸线一望无际。伊斯兰船队桅杆高耸，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在风中猎猎飘扬，渐行渐近。

岸上观战的人都觉得，伊斯兰船队与出港迎战的基督教船队短兵相接，一场血战就要开始。可是突然之间，风向大变。

猛烈的西南风从正在开过来的伊斯兰船队背后袭来。对阵的基督教船队很快注意到这阵风，舵手使出全身力气转舵。可伊斯兰船队可能缺少能够辨别风向的老练水手，未及反应就被强风吹走，友船相撞，一片混乱。有些船撞击后被狂风卷起，猛撞海岸。只能这样认为，神这次没有眷顾穆罕默德，而偏向了耶稣基督。

伊斯兰船只破损严重，不能再用，但划桨手却得以挣脱锁链成为自由之身，还俘虏了大批伊斯兰教徒。

数千人的俘虏被锁链成串锁住押回罗马。在去罗马的大道上以及进入罗马之后，沿街人山人海。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撒拉森海盗被锁链锁成串的情景，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一睹为快。

利奥教皇让这些俘虏建造环绕梵蒂冈的城墙。为使圣彼得大教堂不再被伊斯兰教徒践踏，教皇决定在以大教堂为中心的梵蒂冈周围建造坚固的城墙。利奥假手伊斯兰教徒建造了这座被称为“利奥内墙”（Mura Leonina）的城墙，它现在依然矗立在梵蒂冈周围，守卫着基督教世界位列第一的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及其附属建筑。



奥斯提亚海战

这场战斗在历史上以“奥斯提亚海战”而闻名，罗马教皇认为这是基督教值得纪念的胜利。文艺复兴时代，教皇委托拉斐尔以此战为题材挥毫作画。人们今天还能在梵蒂冈的“拉斐尔画室”观赏到这幅画。站在基督教一方来看，教皇的想法顺理成章，毕竟这是第一次战胜伊斯兰对手的战斗。然而，并非取得了一次胜利，形势就会好转，事态依然不容乐观。

打着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的明火执仗的圣战，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北非伊斯兰势力改变了战术，又转回采用海盗波浪式攻击的方法。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明智的策略转换，其理由有四。

第一，只是回到了长年惯行的方法而已。

第二，海盗已经成为产业，不论是采用直接的方法还是间接的方法，从事这个产业的人只能坚持下去。

第三，海盗必须上缴收获的五分之一，对统治北非各地的“酋长”而言，这笔收入不可或缺。

第四，海盗以基督教徒居住之地为目标，自然是削弱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因而也可以视为圣战。

总之，当时伊斯兰教徒去做海盗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海战伴有失败的风险，但海盗总是袭击没有准备的人，风险既小，收入也稳定。

在基督教方面，“神圣之火”就像对胜利的欢呼一样早已湮灭。伦巴底人诸公国为地盘争夺不休，四分五裂。贝内文托公国占领萨莱诺以后，又对近边的阿马尔菲表现出了露骨的领土野心。

阿马尔菲这样的贸易国，少有耕地，人们只能出海谋生。让他们完全自由，在通商贸易方面取得成绩，这对周边国家也是有利的。贝内文托既然已把萨莱诺这样拥有耕地、能够生产出口物产的城市弄到手里，就应该把出口委任给能胜任此事的阿马尔菲人。企图在阿马尔菲行使像内陆一样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方法是不明智的。

但伦巴底人是从北方南下而来的民族。只知道陆地的人，也许无法理解大海的作用。不过他们定居意大利已有300年的历史。我们只能认为，他们并非是因为陆地民族而不了解大海，而是仍未具备领悟大海效用的能力。实际上，伦巴底人的统治在意大利北部十分有效。以米兰为中心的区至今仍叫伦巴第（Lombardia），这个名称即起源于伦巴底（Langobardi）。

“海洋共和国”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有4个海洋国家具备在地中海世界与海盗渡海作战的海上战斗力。现代意大利海军军旗图案，就是缆绳围着的这四个国家的旗帜（参见本书卷末彩页）。

军旗上这四个国家的顺序，从上至下是威尼斯、热那亚、阿马尔菲、比萨。这些国家的商人靠与海外的贸易积累实力，构筑起财力基础。国家政体也是商人主导的少数人领导的共和政体，所以它们又被称为“海洋共和国”。

但是，如果按照作为海洋力量崛起的先后顺序，应该是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才对。我曾思考过这种顺序的变化，但在地图上观察各国位置的一瞬间，我明白了。

阿马尔菲位于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比萨位于意大利中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热那亚位于意大利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威尼斯不仅位于意大利中部，还处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位置。

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中，距离北非伊斯兰世界较近的国家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形成海上势力。换言之，防卫撒拉森海盗的必要性使它们成为海洋国家。威尼斯最后成为海洋国家，也是因为它虽曾两度在海上败给撒拉森海盗，却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撒拉森海盗打到家中抢掠破坏、人民从未被绑架过的国家。

但如果按照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这四个国家排序将会不同。在文字是从左往右阅读的国度里，左上方通常是最重要的位置。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把这个位置给予了威尼斯。这不仅是因为在这四个海洋共和国中只有威尼斯一直维持着独立，还因为它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已成为海军国家，被称为“地中海的女王”。

按这样的说法，人们似乎会说，下排左边的阿马尔菲要比位于其后的比萨在历史上更为重要。其实不然。这是因为阿马尔菲是“海洋共和国”的先驱，应当受到相应的尊敬。

阿马尔菲崛起的契机是伦巴底人的“瞎管闲事”。这事饶有趣味。虽然大海的弄潮儿并非不满意做拿波里的盟弟，但他们也许对受旱鸭子统治感到厌恶。公元860年，准确地说是在那年前后，阿马尔菲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起步了。当时意大利南部的形势扑朔迷离，激烈动荡，渺小的“海洋共和国”很容易被一口吞掉。

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和卡拉布里亚，撒拉森势力已经侵入内陆腹地，伦巴底人本应奋起反抗，但其内部处于劣势的一方却向撒拉森人求援。而罗马教皇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让伦巴底人的统治者不要忘记自己是基督教徒。而伦巴底人却只有在与撒拉森人的共同作战不利时才会“想起”这一点。

北非伊斯兰势力战术的改变涉及了正在征服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取得了良好的战果。海盗改变了战术，不再是袭击、掠夺，然后离去，而是侵入意大利南部的内陆腹地，建立据点，再从那里出去抢掠。

他们不再辛苦地袭击修道院，而以烧杀抢恐吓威胁，勒索容易运输又不需兑换的金币。

所有的修道院都是勒索的目标。意大利南部最负盛名的修道院是圣本笃创立的卡西诺山修道院。就连这座位于山顶、被认为最易守难攻的修道院也交出了3 000枚金币后才免于被付之一炬，这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然而，交钱之后，下次又会被盯上。中世纪前期甚至可说是修道院的时代，各地都有大型修道院。撒拉森海盗的袭击日趋严重，修道院也逐渐建

得像城堡一样。本该是用于祈祷的建筑，外观却越来越像军事设施。

还有一种社会现象，始于很久以前，一直延续到这个时代以后。

人们离开近海地方，为寻求安居之地，纷纷移居到悬崖之上或深山之中。这个现象在意大利南部尤为突出。在现代，人们驱车行进在高速公路上，也能看到很多村镇紧贴在高耸的悬崖之上。如果不了解历史，人们大概会问为什么要特意住在那么不方便的地方。但生活在中世纪前期的人们要豁出命去求生。以前只有信仰狂热、追求孤独隐遁生活的人才会隐居在深山里，而现在普通人也移居了进来。

山里大约不缺新鲜水。但再怎么努力开垦，深山里的耕地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有耕作近海平原时那样高的生产效率。此外，移居选择的地点是连撒拉森人都不来的偏僻之处，与外界以及附近的其他人交流也相当不易。由此而来的孤立，不仅在精神上，也使实际生活受到影响。

听到在小共同体内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就会联想到这种生活理想而和平。实际上这是一种浪费很大的生活方式。别的居民共同体可以大量生产、购买的东西这里都得“自给”，这导致了生产力低下。

罗马帝国是广域经济圈。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中世纪，只有成为狭域经济圈一条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物产流通是昌盛还是停滞。

共同商议后做出判断，这种意义上的合议制，应该只适合于富有自信的人们集合而成的共同体。相反，对提反对意见失去自信而逃匿的人而言，由某个人下决断，其余人服从命令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安全感。

时至今日，人们一踏入建在深山里的城镇，便会产生穿越时光隧道，一下子回到了中世纪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房屋保留了昔日的原样。与简朴的房舍形成对照，修道院或领主的称为城堡更为准确的宏伟建筑，更加给人以中世纪的感觉。修道院除了宗教事务以外，还起着指导开垦和耕作的作用。一旦有事，领主可以提供防卫保障。

这二者几乎都是农田的地主，农民必须缴纳地租和保护费。罗马时代这些租费约占收益的一成，而在中世纪，至少也超过五成，原因是自耕农已经消灭，保护费是地方越小，人均负担越高。这一点只要与罗马帝国时代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那时有着很好的体系，可以利用完备的罗马大道向需要的地方派遣军队。

“撒拉森塔”

中世纪也有人决定不逃进深山而留在海边。这恐怕是权衡生活方式之后的决断。

这些人首先在能够眺望到广阔海面的海岬和悬崖上像串珠似的建起了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监视塔。

他们接着组建了迎击撒拉森人来袭的舰队。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撒拉森海盗最讨厌劳而无获。即使是商船，只要有护航船，遇袭的概率立刻锐减。

然而，即使不再遭到直接袭击，也还常有撒拉森海盗在附近登陆，沿陆地袭击的危险。虑及于此，城镇建筑牺牲了舒适性，以防御为最大目的。用一句话说，城镇建筑的设计是小巷曲折，宛如迷宫。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穿行于这座城市房屋下面狭窄昏暗的小巷之中，眼前会突然一亮，出现一小片空地。这空地并非为周围房子的采光而建。

往这里一站，谁都会想到，如果把刚才进来的小巷和对面的小巷用铁门或别的什么东西堵上，来袭的海盗就成了口袋里的老鼠。阿马尔菲的小巷不仅像迷宫一样纵横交错，有些地方还会突然变窄。这些小巷还会在某个方向上建成复线。从阿马尔菲最大的教堂出来，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有两条小巷，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你都能逃出城外。

这种城市建筑在地中海南部的伊斯兰世界称为“卡斯巴城”（Kasbah）。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城至今都很有名。我们不知道北非的阿拉伯人为什么喜好这样的城市结构。然而，地中海北方的意大利“卡斯巴城”则是为防御从地中海南方卡斯巴城来袭的海盗而形成的。

有些人想建造以防御为目的的“卡斯巴城”而无法建造。他们居住在广袤平原之上的港口城市，背后没有阿马尔菲那样的峻峭山峦。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实力来组建相当强大的舰队，城中的居民就只能逃入内地。这类人在中世纪前期占了绝大多数。

有一个办法最适合现代人想象哪个地方的人受到撒拉森海盗的祸害最甚。

这个方法要在大脑里进行电脑制图。不过这是动脑筋的事情，有想象力就行。

从法兰西南部开始，沿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往下，围着“长筒靴”的脚踵部画一个圈。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濒临第勒尼安海和伊奥尼亚海的全部地域。这一带如今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充分享受到“地中海”的游趣。这些地方的共通特点是气候温暖，阳光明媚。让

我们在大脑中将这里的所有人、房屋建筑和港口船只统统屏蔽掉，在大脑里把这里变为无人之境。在古代，这里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平原上有片片耕地，每一个角落都被精耕细作；上下水道完备的城市和村镇像珍珠首饰一般串成珠链；进出港口的船只络绎不绝。让我们在大脑中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从这片土地上统统抹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们恍然明白中世纪前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我们也一定能够从心底里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说“中世纪暗无天日”。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在最为悲惨的9世纪，保卫基督教徒应该是专门为此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义务。这时的皇帝是鲁多维科二世。他和历代的法兰克皇帝一样以法兰克为根据地，却拥有“意大利王”的称号。

经不住罗马教皇再三请求，公元860年，他终于答应去意大利，敌人当然是撒拉森人。

就在马上要为保卫臣民安全前往意大利前夕，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向意大利半岛的臣民发出了这样的布告：

> 动产较多之富人有义务动用其财产让杀人犯出狱，并为其准备武器装备，送他们上战场，越多越好。
>
> 贫者中，拥有10个以上铜币者有义务担任所住地区及其海岸一带的警戒。财产不足10个铜币者免除本义务。
>
> 多子之父，只可留下一个最适合的儿子，其他必须报名参加皇帝的军队。
>
> 仅有二子者，则其子均须报名参加皇帝的军队；有三子者，则许其中一人留在家中。
>
> 领主和土地管理者亦不得免除这些义务中任何一条，概无例外。全民均有参军义务。但允许以前帮工的用人中有一人，或为继续以前工作可再有二人留下，以保卫留下家属之安全。
>
> 如果违反本令，有企图留下更多人者，将剥夺其领主之地位，若为地主，将剥夺其拥有土地之权利。
>
> 修道院、尼僧院也以同等条件与领主和地主承担同样义务。如有怠慢此项义务者，将剥夺其神职人员之资格，并没收修道院和尼僧院所有

的土地及其他一切不动产。

只看字面，这布告表现了皇帝奋起反抗撒拉森人的坚定意志。可是，发出这项命令的皇帝长年以来一直敷衍着自身的义务和职责。这命令也许得到了遵守，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大概是大打折扣的。

皇帝来到罗马，皇后同行相伴，仪仗豪华，显示着基督教世界中的俗界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然而，此后赴意大利南部与撒拉森海盗作战，结果却是惨败。失败不止一次，翌年又吃败仗。皇帝自己也险些做了俘虏，全靠临阵皇后的机灵才免遭危难。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撒拉森海盗的俘虏，北非全境的伊斯兰教徒一定会高奏凯歌。皇帝也许会被当成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无信仰的胆小无能的基督教徒”的活标本，用锁链锁成一串拉着游街。撒拉森人最想抓到的人就是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个时期，所有的地中海沿岸地方一直受到撒拉森海盗的祸害。我不再一一记述这些事情，因为撒拉森海盗的祸害已成家常便饭，千篇一律，逐一写来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这些海滨城市经过千年之后，以老百姓为主角的祭祀活动今天依旧延续。前面打着护城圣人画像，祭祀队伍在城里迤逦而行。几乎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撒拉森海盗有关。祭祀活动都集中在夏天。因为北非的海盗多是乘着夏季的西南风或东南风来袭，夏天地中海的潮流也是自南向北流动的。

来袭的撒拉森船队未能躲过突然改变的风向，猛撞崖壁后沉没，海上现出了圣母马利亚；圣尼古拉唤醒了塔上打瞌睡的放哨人，城里的人得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护城圣人的由来因地而异，形形色色，但都与撒拉森海盗有关。

9世纪，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与恐怖是同义词。在这个世纪里，准确地说，是在公元876年，在位的罗马教皇约翰八世给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送去了这样一封信：

撒拉森人结伙袭击，每每犯下种种暴虐残忍的暴行，这使我心中不能不充满深深的苦恼和悲哀。可以说，这种惨状没有一天不使我痛苦万分。

我能做什么呢？我甚至在想，任何笔都会因不堪书写这无休无止的种种悲惨而折断，任何语言都不能准确表达那些惨状的细节。

我自己也在深深的苦恼中度日。我眼前浮动的，尽是基督的敌人让信

> 奉基督的人们痛苦、死亡的景象。上帝的孩子在各地流血，忠于上帝教义的人们的灵魂正在逝去。所有地方都已化作掠夺、杀戮和放火的舞台。人们躲过剑锋也逃不过大火。逃过大火，等待他们的也是铁锁链，他们被带走送到异教徒的地方，在那里当奴隶，做牛做马，迎来死亡。这就是可怜的基督教徒的命运。
>
> 曾经人口稠密的城市、村镇和田园已经不见人踪，如今或是成为撒拉森人的巢穴，或是成为野兽出没的地方。
>
> 而罗马城，已经成为失去家园的人们和失去父母的孤儿们的避难之所。看到这些人，我就心如刀绞。
>
> 亲爱的皇帝啊！这是降临到上帝的孩子们身上的灾难，是不能不让我痛苦的现实情形。

然而，绰号“秃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二世连封回信都没有写。他正全力以赴收拾法兰克内部的各种势力。也许无法完全不理睬教皇的屡次请求，他还是向伦巴底族公国之一斯波莱托的领主下令，要求组建抵抗撒拉森的军队。

可是，斯波莱托大公古伊德根本没有对抗撒拉森，反而率领大军进攻了卡普亚和拿波里。意大利南部各城市重新开启了与撒拉森的交涉，使他有了进攻基督教同胞的口实。

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等城市在得不到皇帝和伦巴底各派势力保护的情况下，开始行动起来，谋求与撒拉森人建立良好关系。这确是事实。

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是海港城市，接近撒拉森的理由不难理解。商船的安全航行对这里的人们，尤其是对没有耕地的阿马尔菲而言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卡普亚是内陆城市，老是受到伦巴底系的贝内文托公国的觊觎。这块名为“卡普亚伯爵领地”的独立领土，逃脱不了被贝内文托公国吞噬的恐惧。于是，战胜伦巴底人的想法逐渐扎根，他们试图投向撒拉森人。人被逼到生死边缘，人种、宗教的差异也许就成为第二层次的了。这些人都拥有健全生活，不是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神职人员。

如果卡普亚站到了撒拉森一边，罗马教皇便会陷入危险。从罗马向南去的大道，不论是亚壁还是拉提纳，都要经过卡普亚。古罗马大道虽然在中世纪也被弃置，根本得不到修缮，但因为没有建设其他的基础设施，仍然还

是最好的交通手段。一旦卡普亚伊斯兰化，就等于打开了通向罗马的道路。

教皇约翰八世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靠不住，在公元877年，即发出前述信函的第二年，沿亚壁大道南下，在明图尔诺与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的代表见面，目的是说服他们不要与伊斯兰结盟。教皇说道，要想对抗伊斯兰势力，基督教方面只有团结起来。但是，代表们默不作声，教皇的话音只不过是被当作耳旁风。教皇以开除教籍相威胁，最终也没能得到他所期待的不与伊斯兰结盟而与之对抗的答复。非但如此，拿波里的执政官赛乔辞别教皇回去后，让人逮捕了反对与伊斯兰建立良好关系的急先锋阿塔纳西奥主教，挖去他的双眼并把他扔进了牢房。

没有一个人响应教皇拼死的请求，听从他的说服。而撒拉森海盗一直继续着野蛮的暴行。教皇被迫做出选择，是把宗教放在优先的地位，对信徒的痛苦置之不理，还是为了哪怕是暂时的拯救而把耶稣基督暂放一边。

教皇选择了后者。他以一年之内不得掠夺意大利西海岸为条件，向撒拉森海盗支付了罗马教廷铸造的2.5万枚银币。

在此以前，叙拉古、拿波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都曾有过花钱买平安的事，但还从来没有过西欧基督教之首的罗马教皇与伊斯兰海盗做交易的先例。

如果回到公元877年，我们去问居住在当地的人们，首先向伊斯兰屈服的是君士坦丁堡还是罗马，我想更多人的回答会是罗马。意大利半岛在9世纪后半叶的任何时候被伊斯兰化都已不足为奇。终于，西西里发生的事件使这个判断更为确实。

叙拉古陷落

伊斯兰势力征服西西里的行动始于公元827年，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这时已结束在望。西西里主要城市只有恩纳和叙拉古尚在基督教手中。城堡恩纳矗立在山顶之上，一个市民向伊斯兰方面密告了上山的秘密通道，恩纳随即陷落。最后只剩下了叙拉古，这是一个把突出于海上的海岬整体打造成为要塞的城市。

然而，在被视为北非伊斯兰教徒首都的凯鲁万的埃米尔看来，不能控制叙拉古就等于没有征服西西里。既然宣布并开始了圣战，如果不能完全征服，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圣战也会失去威严。

即使不站在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来看，位于地中海西部的西西里也具有不

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曾经发生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即是始于对西西里的争夺。不拿下叙拉古，就不能完全称霸西西里。

进入中世纪以后，叙拉古的重要性并未改变。这个时期，西西里这个地中海最大岛屿的正式统治者还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西西里是东方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直辖领土。总督官邸也设在叙拉古，肩负防守西西里全岛任务的拜占庭军队也驻扎在这里。征服了叙拉古，地中海西部的拜占庭势力也就被一扫而光。

此外，叙拉古具有自古以来不可小觑的知名度。譬如没有见过地中海的北欧人，哪怕不知道巴勒莫，也会知道叙拉古。攻陷叙拉古，意味着在心理上给基督教世界一个重大的打击。

凯鲁万“酋长”新任命因战斗果敢而崭露头角的贾法尔·伊本·穆罕默德担任西西里“酋长”。不知是否是为了纪念征服西西里之行50周年，他还把攻克叙拉古大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交给了贾法尔。

贾法尔来到已经成为伊斯兰西西里首都的巴勒莫上任。他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浪费气力。

他向西西里并且向北非全境发出号召，征募志愿者。同时，他让人制造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对于伊斯兰武将来说这些器械非常罕见。贾法尔大概认为灵活使用攻城器械会有助于那些不善进攻有城墙的大城市的伊斯兰士兵。

巴勒莫城里立刻成了一座大兵工厂，各地汇集而来的士兵人头攒动。时间紧迫，到处都在忙着赶工。这给日后的贾法尔带来了灾难，但进攻叙拉古的准备工作却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时节已经入夏。公元877年，在开始征服西西里行动的第50个年头，士兵们高举圣战旗帜，骑着战马，带着攻城武器从巴勒莫出发，杀向最后残留的叙拉古。

叙拉古也在奋起防卫，似乎已把曾经用堆积如山的拜占庭金币做交换，让伊斯兰撤军的事忘到了脑后。

连同周边地区前来避难的人，叙拉古共有2万居民。能够打仗的士兵人数不详。从已投降伊斯兰的城市和要塞撤退而来的士兵约有1万人。在修士狄奥多西奥后来编写的《编年史》（Chronicon）的记载中，却没有关于本该常住在叙拉古官邸的“总督”的叙述。说不定他在公元877年春天伊斯兰明确攻打意图时，就离开了叙拉古，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向皇帝搬救兵去了。总之，在长时间的攻防战期间，“总督”这位防御总指挥一直没在叙拉古。

但是，并不是没有人担任防御战总指挥。总指挥是位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的贵族。修士狄奥多西奥没有记下他的名字。说起指挥官，还有一位名叫尼凯达的队长，他经常厉声激励前线士兵，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尼凯达也是希腊的塔尔索人，这时已失去家园。圣彼得与圣保罗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两大支柱，圣保罗就出生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塔尔索。对基督教徒而言重要无比的圣人出生地，也已伊斯兰化了。

叙拉古攻防战，就这样似乎成为伊斯兰与奋起抗击的已基督教化的希腊之间的战斗。记录了这场战斗的也是希腊人僧侣。这回拜占庭帝国倒像认真考虑派遣援军了。一个不断衰退的国家，特点就是作决定很慢，决定的事情实施起来也很慢。进攻海港城市叙拉古，一定要实行海上封锁。攻占这个城市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时，伊斯兰方面既没有封锁海上，也没有这个实力。如果拜占庭能够快速决断并付诸实施，就能使援军在叙拉古尚能顶住敌人猛攻的期间到达。打防御战的人只能依靠援军的救援。

中世纪后期尚不能使用大炮轰击，遑论使用飞机轰炸。在这样的时代，进攻坚固城墙环绕的城市，其难度远非我们后人所能想象。

在没有火药的时代，所谓攻城武器的效果也可以想象得到。发射球形石弹的目的是破坏城墙，发射点着的火球的目的是杀伤城内的人。然而在中世纪，决定这些武器命中率的技术水平远逊于古罗马。不独伊斯兰方面，基督教方面也是一样。所以，大城市攻防战的结果取决于下面几个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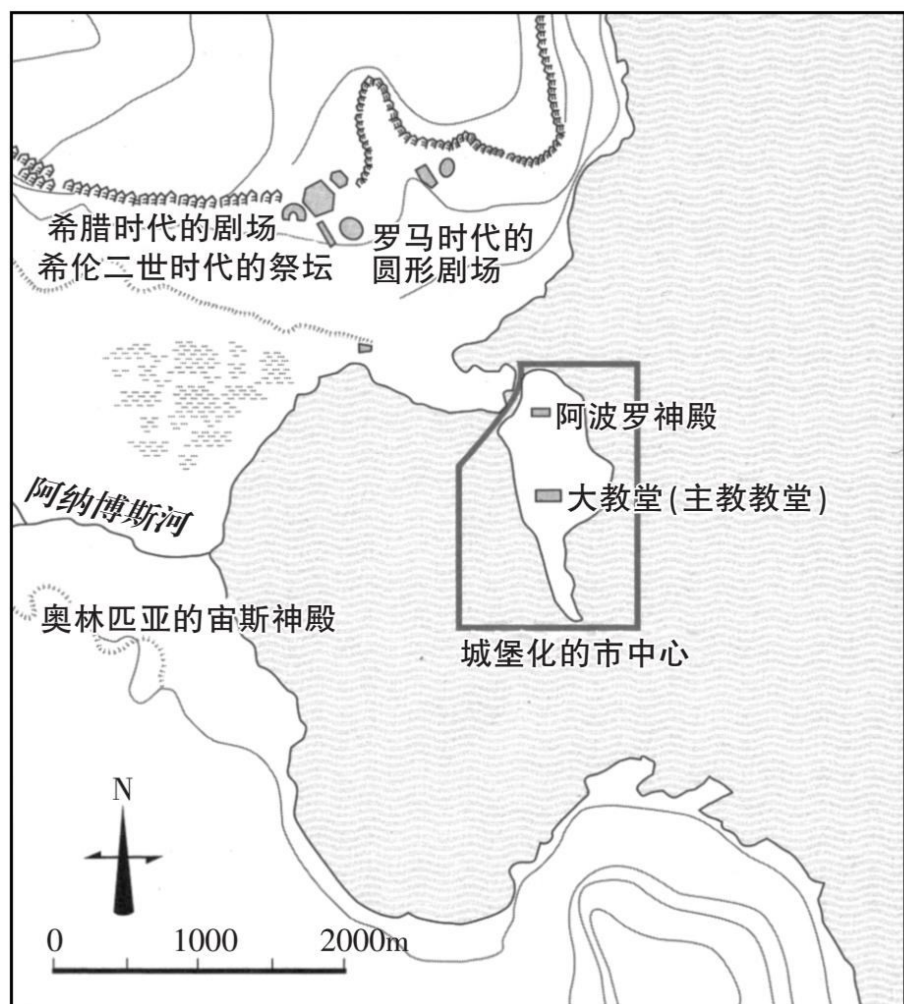
第一，防御方须在人和物两个方面拥有经得住持久战的足够力量。

第二，进攻方须持续拥有能将城市围困得如铁桶一般的力量。

第三，进攻方是否受到瘟疫、恶劣天气等灾害的影响。

第四，防御方翘首以盼的援军能否到达。

在公元877年的叙拉古攻防战中，叙拉古具备第一项条件；伊斯兰方面不具备第二项条件；这第三项条件，伊斯兰军队过去经常遭到瘟疫的袭击，有很多因此而撤退的先例。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援军能否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次动了真格的消息传到了叙拉古。



叙拉古

这次奋起守卫叙拉古的人们不是殉教者。殉教者往往会受到狂热的宗教热情煽动，而去参加抗击基督教敌人伊斯兰的绝望战斗。这次参战的是相信冷静思考也能打胜仗的普通人。

不过，当年的叙拉古有一点不足，这件事也许让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修士无法理解。这就是西西里的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人为了保卫叙拉古而前来参战。

这是因为叙拉古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暴政和剥削的象征之地。对居住在西西里其他城市和地方的人来说，叙拉古是吮吸“总督”所课重税并装船运往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叙拉古以外的地方已处于伊斯兰的统治之下，但人民并没有全部成为伊斯兰教徒。反抗伊斯兰的暴动也时有发生，但就连这些人也没有赶来参加叙拉古保卫战。

叙拉古攻防战开始于公元877年8月。总司令官贾法尔率领大军不断攻城。他们高唱着战死荣升天堂的战歌，高举着圣战大旗，决心坚决战斗到底。叙拉古也在坚持着。攻城军队用石弹和火球进攻，防御的士兵则用一种叫作“希腊之火”的武器回击。“希腊之火”是点火即燃的雾状喷火武器，可以说是中世纪的“火焰喷射器”。他们把这种武器在城墙上排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向一齐登城的伊斯兰士兵喷发火焰。

夏天转瞬过去，秋天也过去了，进入了冬季。没有援军到达叙拉古。满载拜占庭士兵的船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出了爱琴海后却不再西行，而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过冬去了。

那时，只要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冬季是不打仗的。特别是进攻大城市的士兵不得不长期宿营野外。为了使他们得到休整，事实上冬季多为休战期。伊斯兰方面的总司令贾法尔也决定回巴勒莫过冬。这时，传来了基督教徒在巴勒莫近郊发动暴乱的消息。

贾法尔是进攻叙拉古军队的总司令官，也是在巴勒莫设有官邸的地方长官。镇压暴动也是他的任务之一。然而，这次他没能回到久违的官邸睡上安稳觉。他刚到巴勒莫就遭到暗杀，最终也没有查清凶手是谁。基督教方面的记录推测，这是一个嫉妒贾法尔地位和权力的伊斯兰教徒所为。不过，进攻叙拉古的行动并未流产。伊斯兰方面决定擢升名不见经传的阿布·伊萨为进攻叙拉古的总司令官，待来年的878年春天再启战事。

伊斯兰方面虽然换帅，但战术未改，还是人海战术。因温暖而一下子变得干燥的西西里的气候，给进攻的一方带来了运气。可能是受到安拉的眷顾，这次没有发生常常使伊斯兰军队痛苦不堪的瘟疫。历史上没有这次攻防战的详细记载，现场的唯一证人狄奥多西奥是一位修士。他可能对人们的悲惨处境敏感于心，但对战斗展开的战略战术却毫不关心。我们后世之人便无从知晓当时的战况。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以下这些情况。

进攻的伊斯兰方面军粮和兵力充足，没有遭遇到坏天气和瘟疫的不幸，可谓条件优良。然而事实却是耗时9个月，他们才最终攻下叙拉古。

防守的叙拉古方面则军粮告罄，城内满是病人和伤员，甚至无处可以掩埋尸体，始终见不到援军出现于水天之际。他们在这种状态中坚持了长达9

个月的漫长时光。起初的几个月里，城墙被破坏后，当天夜里居民就会全体出动修复。但转年之后，前线的人逐渐减少，可以说战斗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但敌人一步也未能踏入叙拉古这个建造在海岬上的城堡城市。

终于，坚固的城墙也有几处被攻破，却来不及修复。居民们在坚持战斗。他们知道，如果投降不是被杀就是去做奴隶。伊斯兰方面把抛掷石弹和火球的攻击集中到了夜里。白天，满脑子想着叙拉古城里财富的撒拉森人攻击城墙坍塌的地方，晚上休息。晚上，攻城武器又开始上阵。叙拉古城内的人日夜得不到休息。

5月20日，距攻防战开始已过去了9个月。这天夜里，敌人的攻城武器不知道为何一直沉默着。南国的初夏之夜在恐怖的寂静中度过。

21日天刚破晓，伊斯兰方面动员了所有士兵，动用了所有攻城武器，发起总攻。防卫者已无力应对敌人的全线总攻。撒拉森人开始从各处入城。根据狄奥多西奥修士的记载，撒拉森人蜂拥而入，像恶魔一样狂叫着，手里挥舞着绿底白色月牙旗，赤裸着双脚，浑身污秽不堪，只有眼睛像野兽看到猎物一样闪着光芒。

不论是士兵还是市民，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他们见人就杀。叙拉古城内的地面自古都是用平整的石头铺成，路面因石头上流淌的鲜血而打滑，拖住了逃跑人的脚步。

在海岬的前端，有座高塔可把大海尽收眼底。9个月以来一直担任守卫战总指挥的拜占庭贵族和手下70个奋战的叙拉古权势人物躲进塔里，试图作最后的抵抗。但是，全城都陷落了，孤立的一座塔不可能幸免。他们最终投降，全部做了俘虏。西西里首屈一指的城市叙拉古有地位高于主教的大主教。大主教索弗洛尼奥和三位神职人员躲在叙拉古的主教教堂里。他们也被抓获。这三位神职人员中就有《编年史》的作者狄奥多西奥。

叙拉古在陷落的当天被胜利者掠夺了整整一天。叙拉古美丽富饶，历史上一直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它被称为地中海的珍珠，难怪撒拉森士兵抢红了眼。仅仅因为待在撒拉森士兵闯进去的房子里，人们不抵抗也会被杀。

第二天，全部俘虏被押到中央广场，士兵和市民被两边分开。屠杀随即光天化日之下开始。

第一个是那位拜占庭帝国的贵族。他的罪名是对伊斯兰以刀相向的首领。

根据狄奥多西奥的记载，这位希腊人贵族听到死刑判决后面不改色，沉静地毅然赴死。这使得宣布他死刑的总司令阿布·伊萨也很惊讶，撒拉森人过

去一直侮辱嘲笑“没有信仰的狗”，他们也默默地看着他被切断喉管。

接着，连续处死了70位叙拉古的权势人物。这些人也都慷慨赴死，面对死亡的态度丝毫不逊于希腊贵族。

死亡，也降临到了9个月以来共同战斗的士兵身上。他们被驱赶到广场中央，绑着手脚一个挨一个地坐下。撒拉森士兵对他们枪刺棒打，反复不断，最后把他们送到枯草丛生的山上，周围点上火活活烧死。

狄奥多西奥唯一记下名字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塔尔索的尼凯塔。尼凯塔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嘲笑冲过来的伊斯兰士兵说：老子是狗，那你们是什么东西？每当此时，撒拉森士兵都恼怒地还他一句，打下叙拉古一定要让你享受特殊待遇！伊斯兰士兵没有食言。

出生在小亚细亚的这位希腊人队长被作为留到最后的乐趣。他最后才被拖到广场中央，仰面按在地上，捆住四肢，等待着他的是东方式的酷刑——活剥人皮。

活剥人皮，做不到只剥皮，要连皮带肉地撕下来。撒拉森士兵用枪去刺暴露出来的内脏，再用枪尖把内脏挑出来满广场乱抛。揪出心脏的士兵用牙齿撕碎了再啐出来。人们不知道塔尔索的尼凯塔是何时候断气的。他的遗体和被集体烧死的士兵的遗体一道，被暴尸弃置，直到胜利者撤出叙拉古。

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仅是城市陷落时叙拉古的死者就已达到了4 000人。果真如此的话，活着逃出来的大概没有几人。这仅有的人中有几个乘坐藏在港内的船逃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向停泊在那里的拜占庭军舰队报告了叙拉古的陷落。这个舰队是派来救援叙拉古的，但却以过冬为由推迟出港。这时，传来了叙拉古陷落的消息。救援军司令官得知后，便率领舰队返回了君士坦丁堡。

叙拉古在古代作为希腊人的殖民城市而发祥，后来强盛繁荣，甚至受到雅典的敌视。柏拉图曾经访问过这里。这里还诞生了阿基米德。如今，叙拉古也落入了伊斯兰之手。当时的负责人——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应对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距离比君士坦丁堡近得多的罗马教皇也不会不知道叙拉古遭到进攻。这个时代的通信手段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是，这可是一场围绕地中海中心西西里最重要城市的攻防战，而且，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

9世纪对基督教世界而言是黑暗的时代。但即使在这个时代，意大利半岛上的港口无论大小，都与伊斯兰控制下的西西里和北非进行着通商贸易。

有关消息不可能不通过这些人传到西欧。其中阿马尔菲在意大利半岛的大客户是卡西诺山大修道院。修道院不归当地主教管辖，而是在罗马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知道的事情不会不传给罗马教皇，而且也应该会通过罗马教皇传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

总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要人全都知道这一切，但却没有一个人行动起来。无论把天然的要地打造成怎样的要塞，援军不至，早晚也会陷落。

叙拉古陷落的消息在凯鲁万卷起了欢乐的旋涡。这里在伊斯兰化之后俨然已成为北非圣都。征服西西里全岛的圣战目的已胜利达到。市内挤满了感谢安拉的人，埃米尔命令举行特别庆典。对伊斯兰教徒来说，没有什么比圣战的胜利更能证明他们所信宗教的正确了。

在叙拉古，胜利者正在把教堂改建成清真寺。伊斯兰教徒讨厌膜拜上帝和圣人画像的行为，认为这是圣像崇拜。在他们看来，要把教堂改成清真寺，首先需要破坏上帝和圣人的造像。叙拉古的主教堂是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同时，用奉献给异教的雅典娜女神的神殿改造而成的，现在又要改建成清真寺。

叙拉古在罗马时代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希腊色彩，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之后，也许是因为存在太多无法全部破坏的缘故，在叙拉古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希腊文化遗产。伊斯兰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但还有一些留存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因而那次破坏也并不彻底，只是破坏了他们所能看见的而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一神教，不承认其他的神祇。

据说所有这些一直到7月才结束。掠夺破坏、改建教堂就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些不光是胜利者所为，俘虏也为此做着劳役。

后来，胜者和败者全都去了巴勒莫。败者被用绳索和锁链绑成一串儿，从东到西横贯西西里，走了六天时间。

到了巴勒莫以后，俘虏被分为两组。大多数人的一组被作为奴隶卖掉，少数人被投入牢狱。狄奥多西奥修士是这少数人之一。牢房是地牢，在14级石阶之下，昏暗潮湿，肮脏不堪。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黑人罪犯、阿拉伯人等一股脑儿关在一起。关进来以后，狄奥多西奥才知道，大主教索弗洛尼奥也被关在这里。大主教和其他入狱者一样手脚都被铁锁链铐着。

8月12日是伊斯兰教的节日。居住在巴勒莫的撒拉森人要求“地方长官”火炙大主教，以表示对安拉的敬意，但其他伊斯兰教徒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手拿《古兰经》反对说，伊斯兰法律禁止人身作为供品。于是，大主教索弗洛尼得以继续他的牢狱生活。

这位大主教最终是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还是拒绝改教而殉教，不论是阿拉伯方面还是基督教方面，都未留下记录，也没有他死在牢里的记录。说不定他被作为一张牌留了下来。从这时开始，伊斯兰对西西里的统治方式越来越明晰。伊斯兰对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的统治渐趋独特，至少有别于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这是一种独特的共生路线。

人们最恐惧的不是文明的侵蚀，而是军事的侵蚀。文明的侵蚀，人们可以不喜欢不理解从而不接受，但军事上的侵蚀却不能就此了事。这样的事不用说，人们也能切身地感受到。在叙拉古陷落以及西西里全岛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意大利半岛和法兰克南部的人们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恐怖。

西西里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附近撒丁岛的总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顺便说一下，日本九州的总面积是4.2万平方公里，四国是1.9万平方公里。地中海第一大岛西西里岛和第二大岛撒丁岛的面积小于九州，大于四国。和九州、四国都没有“岛”的感觉一样，西西里和撒丁也不太给人以“岛”的感觉。但西西里和撒丁仅仅在这一点上与九州、四国相类似。

在现代，这两个岛都是以旅游胜地而闻名，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游客来访。两个岛气候温暖，风光秀丽。周边大海呈现的颜色不能用“蓝色”这个字眼来形容，而是一种深蓝色。游客在这两个岛上的游兴不一样。在撒丁岛，划艇和海水浴是主要的愉悦项目。而在西西里岛，除此以外还有漫步，参观各地的2000年以前的古代遗迹以及这个岛屿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留存的教堂、市政厅、宫殿和别墅。一句话，西西里“历史深厚”。而撒丁岛在这一点上相形见绌。时代飞跃。进入19世纪以后，一种以“大旅行”[注]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的旅行形式流行起来，欧洲各国富家子弟也为习得教养而纷纷赴南欧旅行。西西里是他们的必访之地，而撒丁却很少有人涉足。

顺便一提，19世纪欧洲各国逐渐流行精英和精英后备军赴地中海各地游历的做法。那时，伊斯兰海盗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伊斯兰海盗依然出没于地中海，北欧富家子弟就是绑架后勒索巨额赎金的最好对象，这种个人游历就不会流行。

让我们把时代的时针再次拨回来，接着叙述。即使在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也已经有足够厚重的历史了。希腊人在叙拉古建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这种“厚重的历史”可以提高漫长岁月中积累起来的人类技能水平，提高对这个时代而言特别重要的港口和造船厂的建设和整备水准，发展出最重要的造船和航行技能。占有了西西里就意味着拥有了所有这一切。这就是可以把西西里而不是撒丁称为航空母舰的原因。“航母”西西里完全被伊斯兰统治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冲击，其原因也在于此。

身在罗马的教皇约翰八世对这个事实的反应比其他任何人都敏锐。前一年

付了2.5万枚银币买来的“安全”已经过了约定的一年。公元879年春，撒拉森海盗重新开始扫荡教皇的领地。对意大利半岛第勒尼安海一侧南部、中部乃至北部的人们来说，和平与安全只是词典里的词语。伊斯兰夺取西西里，兹事体大。

教皇把这些基督教羔羊的困境写信告诉了应负保卫这些羔羊职责的意大利王查理三世、法兰克王以及德意志王。教皇对每位国王都加了一句诱惑的邀请：如果您能率军南下，解除撒拉森对意大利的威胁，我就将在罗马为您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我曾经想过，如果这三人都接受请求来到意大利，教皇又该怎么办呢？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三位国王都未理睬教皇近乎哀求的请求。他们光处理各自国内的纷争就已自顾不暇，腾不出手来打击伊斯兰海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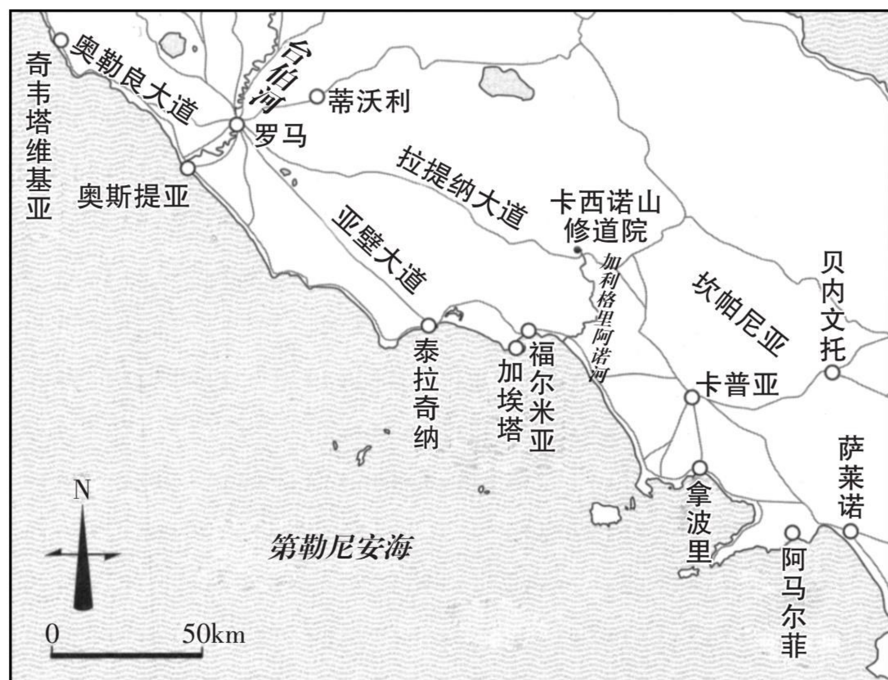
教皇对北欧各国国王感到绝望，又向在意大利南部各地拥有领地的伦巴底人各位大公发出了呼吁。但大公们此前多次败在撒拉森人手下。再具诱惑性的辞藻，对他们也不再奏效。

教皇还呼吁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萨莱诺等罗马以南的海港城市加入抗击撒拉森人的同盟。然而，这些海港城市在叙拉古陷落之前就与巴勒莫的“酋长”有通商关系，所以让他们参加同盟的先决条件是撕毁这种通商条约。

教皇命令他们毁约的说法是，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保持通商关系只对敌人有利。可是，通商对这些海港城市也有利。加埃塔、拿波里和萨莱诺都没有遵从这一命令。

唯一有反应的是阿马尔菲。在这些坎帕尼亚的海港和通商城市中，阿马尔菲已经把贸易渠道扩展到了地中海的东部，也许更能接受风险。这个时期的阿马尔菲的商人们积极而大胆，把地中海东半部分也作为了贸易对象。看到现在美丽小巧的观光地阿马尔菲，人们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也成了威尼斯商人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但是，阿马尔菲也是建立在商人的合议制基础上的以通商立国的共和国，实际上也在与北非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的贸易中获利。与撒拉森海盗开战，同样会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虽然因为与东方的贸易活跃，并不会牺牲全部利益，但的确也要牺牲相当部分。不知是察觉到了这一点，还是对现状彻底绝望，教皇承诺向阿马尔菲提供1万银币，作为抗击撒拉森海盗的军事经费。这样，阿马尔菲共和国应该撕毁与北非和西西里“酋长”的协约，把阿马尔菲的加莱船组建成军事舰队，担负起第勒尼安海的海上巡逻责任。



意大利中部

就在这个协定即将签字时，阿马尔菲方面提出了异议，说约定的银币不是1万，而是1.2万。阿马尔菲代表与教皇之间为此甚至起了争执。阿马尔菲坚持不让步。他们不知通过教廷的什么人了解到，前一年教皇向撒拉森海盗支付了2.5万银币，得到了一年不侵犯的承诺。也许阿马尔菲人认为，自己都已牺牲了与地中海西部伊斯兰世界通商的利益。最终，教皇与阿马尔菲的共同作战体制胎死腹中。

教皇越发绝望，甚至去信给根本靠不住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巴西尔派来了小规模舰队，在海上刚遭遇撒拉森海盗就吃了败仗，狼狈地逃回了君士坦丁堡。

教皇对把自己屡次号召当作耳旁风的拿波里感到恼怒，对拿波里的实力人物处以开除出教的处分。开除教籍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严重的处罚，但对这个时期的拿波里人却毫无效果。

公元882年，教皇约翰八世去世。为民众的悲惨而落泪，对统治者的自私而愤怒绝望了10年之后，他走了。教皇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杀害的。他大概是碍到了某些人的事。无人知道这某些人究竟是谁。中世纪前期罗马

教皇的处境相当危险，还经常面临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风险。

自约翰八世被害到公元914年约翰十世即位，32年间共有13位教皇死亡。教皇是终身制的，这种情况大可说是处于无领袖的状态了。同时代欧洲各国也是王位交替频繁，但只是政局不稳而已。欧洲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抵抗伊斯兰方面非但不团结，反而一直在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纷争浪费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西西里已经完全化作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意大利南部也不再有阻挡伊斯兰的基督教势力了。撒拉森海盗可以自由停靠撒丁和科西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拥有可以转变为战力的海上力量，但他们更加重视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的贸易，而不是与之打仗。

这个时期的一切事情都令人心情黯然，唯一的捷报大约就是总算把伊斯兰军队赶出了教廷领土内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可是，这唯一的捷报与撒拉森人同年夏天于加利格里阿诺设置基地的消息相比便算不上有分量了。

加利格里阿诺河注入第勒尼安海，入海口一带因河名而被称为加利格里阿诺。河口附近的河边不仅可以隐蔽船只，还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两条连接罗马和意大利南部的古代干道，一条是到达同一海湾内的福尔米亚，然后转上亚壁大道；另一条是溯河而上进入位于内陆的拉提纳大道。

这就是说，这里可以直通罗马。在罗马看来，大道那头总有敌人。这里还处于加埃塔和拿波里的连接线上，从这里可以切断这两个港口城市的联系，这样加埃塔和拿波里也都在有效威慑范围之内。如果进而来到拉提纳大道，还有卡西诺山大修道院，其富裕程度使得撒拉森人不论是掠夺还是以掠夺相威胁勒索，都可以保证收入丰厚。西塞罗时代，在这一带海边拥有别墅是地位的象征。那时的罗马人大概根本想不到，时代变了，不动产的价值也会改变。基督教方面在得知加利格里阿诺已成为撒拉森人的基地以后，第一次感到了这一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法兰克南部及意大利北部

对北非伊斯兰教徒战略眼光的准确性感到吃惊的不仅是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基督教徒。因为撒拉森海盗的危害并不止于第勒尼安海一侧，还波及了法兰克南部。有坚固城墙保卫的马赛也两度遭到掠夺，沿罗纳河稍向上游就可到达的阿尔勒也两度遭到掠夺。这个数字还只是9世纪中叶约10年间的次数。防守坚固的马赛和阿尔勒都是如此，濒临地中海的其他城镇村庄的受害便不可估量。较之意大利，法兰克濒临地中海的地方极少，但也未能逃过撒拉森海盗的侵袭。

撒拉森海盗又在法兰克南部安置了基地，位于今天的圣特罗佩附近。这里在中世纪时还沿用着弗拉克西涅图姆这个古拉丁语的地名。戛纳、尼斯、蒙特卡洛沿着蓝色海岸（C□te d□Azur）连成一线，是地中海屈指可数的享乐之地。这里在1 000多年以前还飘扬着伊斯兰的月牙旗。

“伊斯兰之家”是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的别名，撒拉森人也有义务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圣战。拿下圣特罗佩不是为了享受日光浴，而是为了进攻内陆地区。在法兰克南部普罗旺斯和意大利之间通有几条古代敷设的

道路。进入中世纪以后没有维护保养，不能指望往日的便利。但体形矮小、适应恶劣环境、脚力扎实的非洲马扩大了撒拉森海盗在陆地上的行动范围。这样，海盗的袭击扩展到了以都灵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财物被抢掠，居民被绑架，城镇被破坏，内陆城市也并无安全可言了。

法兰克南部曾经是法兰克等北欧神职人员造访教皇所在地罗马的通道。走海路有落入撒拉森海盗魔爪之虞，中世纪前期的人尽量选择走陆路。但现在陆路也变得危险起来。这拉大了罗马教皇与北欧基督教各国国王之间的距离，通信也不易往来。

“和平”，不光是保障安全，还有缩短横亘在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效用。中世纪前期，时代往前走了，但人们之间的距离却比古代拉得更大。只有撒拉森海盗是例外，他们来往于地中海西部，好似走在自己家中。

“十字军时代”以前的十字军

约翰十世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基，做了罗马教皇。他成为教皇之前一直担任拉文纳的主教。他也许可以通过意大利北部更加了解北欧国王的想法。这就是说，他心里非常明白，依靠这些人，意大利无法摆脱撒拉森海盗获得自由。

教皇约翰十世倡议建立十字军。中世纪的人们有虔诚的信仰。在这悲惨而看不到希望的黑暗时代，能依靠的只有上帝。教皇宣布要亲自率兵抵抗伊斯兰，人们纷纷志愿参战，虽然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武器也不惯于使用武器。值得赞赏的是，尽管约翰十世针对月牙旗打出了十字旗，却不单为宗教热情而挥舞，他定下了具体目标。教皇亲自统率十字军的目标是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加利格里阿诺。

在实际军队指挥者的人选上，教皇也只看重是否具备武将的能力，而不看其他方面。队长名叫贝伦加里奥，经历复杂。这个人过去非但不以伊斯兰教徒为敌，反而总与基督教徒打仗。约翰十世重视能力的做法，在攻取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夺回撒拉森船进出频繁的加利格里阿诺，不能缺少海上战斗力。具有这种力量的近邻国家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教皇也知道，这三个海港城市与西西里和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教皇却没有逼迫这三个海港城市撕毁与伊斯兰的通商协定。他没有理会这些事情，只是坚决要求他们加入夺回加利格里阿诺的十字军。

这支抵抗伊斯兰军队就这样勉强拼凑了起来。如果不想看到十字军在犹豫和谨小慎微之中销声匿迹，就只能趁热打铁。公元916年，教皇约翰十世

即位不到两年，便从罗马出发，沿亚壁大道南下。宗教领袖身先士卒，令人感到可叹可悲。责难声并未传到这位教皇耳朵里。不，教皇应该听到了，但他并未理睬。

一方高举月牙旗，一方高举十字旗，战斗持续了3个月。这3个月的前半期，双方在加利格里阿诺打仗，后半期十字军追击沿河逃往内陆的撒拉森势力。这期间教皇没有回罗马，一直留在前线。这给基督教徒增添了勇气。伊斯兰方面也打得很顽强，指挥他们的撒拉森海盗头目成功地煽起了部下的宗教狂热。

这场战役本身是局部规模的，不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例。战场上的对阵双方，一方忘记了通商赚钱，另一方忘记了做海盗的打劫营生。

基督教一方获胜。撒拉森人的身影从加利格里阿诺消失了，海盗船的踪影也从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的第勒尼安海一侧消失了。夺回了奇维塔韦基亚，又夺回了加利格里阿诺，这对居住在罗马的教皇而言是件好事，北去的奥莱利亚大道、南下的拉提纳大道和亚壁大道都不再受到敌人的威胁了。

但是，仅靠一场胜仗不可能驱逐一直给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带来威胁的撒拉森人。非常幸运的是，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原来时有发生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摩尔人的内部纷争，即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纷争连续爆发。这些纷争发生后，北非各地连续发生暴动。暴动期间海盗们便关门歇业。

这一时期的北非内部纷争持续了数年。这期间除了意大利南部以外，整个意大利半岛享受到了和平。既然这样，那是否能利用这段时间建立防卫体系，以防敌人的下次袭击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基督教世界再次分崩离析。拜占庭帝国甚至以每年支付2.2万拜占庭金币的代价，与撒拉森海盗缔结了停止袭击拜占庭商船的协定。但这个协定没有得到遵守，拜占庭白白付出了这笔钱。

教皇约翰十世就在这样的时代中又活了10年，于公元928年被杀身亡。这位教皇大概又成了什么人的绊脚石。中世纪时代，尤其是在中世纪前期，担任教皇是要豁出性命的。

---

1. 原文为Amir，译者根据情况在此译为“地方长官”。Amir通译“埃米尔”，也可根据不同情况译为国王、大公、总督、酋长、头人等。 ——译者注

2.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作战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

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译者注

3. 日本谚语，原文为“窮鼠猫を噛む”，犹言“困兽犹斗”、“狗急跳墙”。——译者注

4. 大游行（The grand tour），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这是旧时英国贵族子女绅士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目的是通过周游欧洲列国接受广泛的文化教养。——译者注

间奏曲 某种共存

“伊斯兰的宽容”

历史几乎都是多种事件和现象并行发展的，但却不是所有事件排成一行同时并进。事件的发生有先有后，其发展不但不会齐头并进，反而会先后不一，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态。这就是历史叙述复杂曲折的主要原因。如果历史学家无视这一点而只叙述他认为重要的事，历史也许变得更易理解，但却成为应试用的教科书。

叙述历史就像制作珍珠项链。如果只想用颜色一致、光泽又好的大珍珠来做，那么颗粒稍小但颜色光泽俱为绝品的珍珠就派不上用场。可这些珍珠具有价值，不能舍弃。平庸的匠人大概会用这些珍珠做成戒指之类的物件，而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则会在珍珠周围镶上极小的钻石或宝石，做成的首饰比单使用珍珠更富变化感，且不会损害珍珠的美感和价值。

下面我们要叙述的就是地中海历史上的小粒珍珠。它们不具备左右以后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力量，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双方都一直把它视为异端的缘故。

古罗马的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一句名言：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恶劣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善意。”

这是真理。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事例，简直是毋庸赘言。但反过来表述这个真理，难道不也正确吗？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美好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恶意（即使不那么恶劣也并不值得赞赏）。”

公元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伊斯兰统治的负责人、常驻巴勒莫的“酋长”并没有在西西里构筑新天地的高尚想法。他只是企图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已。

以往巴勒莫的“酋长”必须遵从被北非伊斯兰教徒奉为圣都的凯鲁万“酋长”的命令。可是，凯鲁万与东方的巴格达不同，随着宗教色彩的愈发浓烈，被任命为“酋长”前来巴勒莫上任的人也有了变化。派来的当然都是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与其说这些“酋长”是行政官，不如说一任接一任都是伊斯兰的法学家和导师（伊玛目）。其结果是身在突尼斯的“酋长”却给巴勒莫“酋长”下达命令。

这就使巴勒莫的“酋长”心生厌恶。站在他的立场上，理由并非不可理解。第一，持续了50年之久的征服西西里行动，只有开始时是依靠突尼斯所派兵力进行的，后来的军事行动都是定居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所为。

第二，这些人虽然多为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他们已经厌倦了北非经常爆发的柏柏尔人、摩尔人等新伊斯兰教徒的反叛。北非不稳定因素很复杂，不光是“原”与“新”的差异，也不仅是由此引起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还有宗派之间的抗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在这一时代已经极为炽烈。

第三，他们似乎受到了西班牙伊斯兰教徒统治方法的启发，这一点可以想象得到。不管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统治者是叫“埃米尔”，还是叫“哈里发”，他们与北非同辈的关系都相当淡薄。

第四，西西里虽是岛屿，但其面积足可匹敌突尼斯“酋长”统治的地域。如果不用地理面积而用生产力做尺度衡量，可以说西西里还在北非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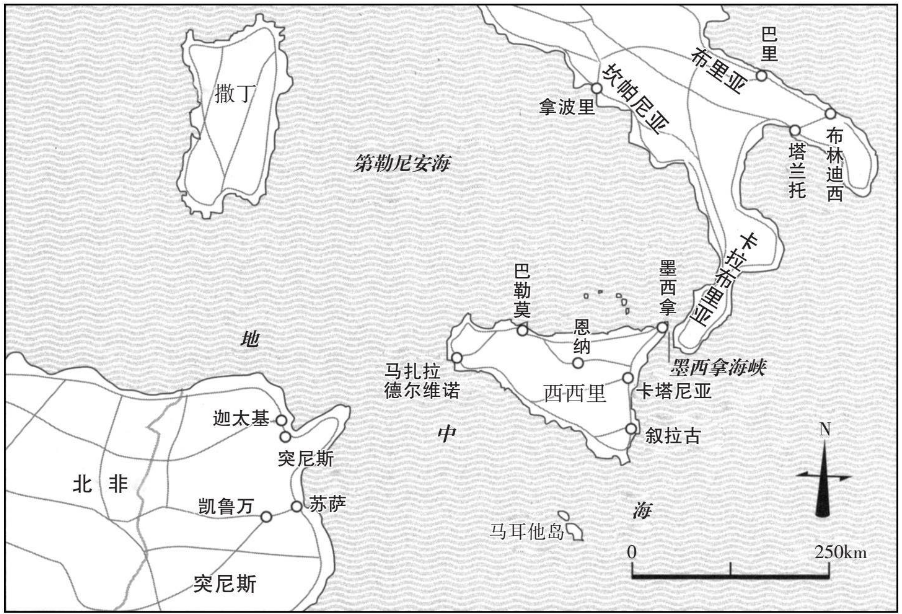
古罗马时代，虽然西西里也一直向本土出口农产品，但重要程度却远不及同时代的突尼斯。在古代，说起非洲几乎就是指突尼斯。那个时代的突尼斯，有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农业和商业，特别是有从非洲内地运来的黄金，使其具有足够的价值，从而被视为北非要地。

可是，北非在帝国末期被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征服，后来又遭受拜占庭帝国的连连恶政，到了公元7世纪归入了伊斯兰统治之下。罗马式思维已死，被誉为帝国粮仓、繁盛的农业已死。居民没有活路，遂使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化为海盗的巢穴。

而这个时期的西西里躲过了北方蛮族的袭击，没有成为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战争的舞台，所受拜占庭帝国恶政的影响也小于其他地方，走过了一个比较安泰的时代。当然，大部分居民也一直是基督教徒。与改信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等共生共存的北非不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征服西西里以后，他们所要统治的是仍然保留着古希腊和古罗马古风的基督教徒，统治方法有所改变亦属自然。

常驻巴勒莫的“酋长”不知玩弄了何种计谋，巴勒莫的“酋长”不再由凯鲁万和突尼斯的“酋长”任命，而改由巴格达的哈里发直接任命了。从突尼斯到巴勒莫只有一两天船程，而命令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传到巴勒莫的时间无法与之相比。上司所在越远，受命行动之人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巴勒莫的“酋长”似曾一度僭称“哈里发”，他对西西里的统治已经具备了更加西西里化的基本条件。

伊斯兰教徒对西西里的征服，从公元827年开始到878年叙拉古陷落结束，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当然，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并没有等待叙拉古的陷落，而是很久以前就已开始，叙拉古陷落之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条统治路线就是伊斯兰方面自画自赞的“伊斯兰的宽容”，并在西西里取得了成功。



西西里及其周边

首先，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一神教的伊斯兰教把另外一个一神教基督教徒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在西西里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殉教者。就是说，没有人拒绝改信伊斯兰教而为基督教殉教。但也不是整个西西里的基督教徒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其次，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当同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叙拉古遭到了进攻，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却几乎无人赶来参加保卫战。保卫战持续了9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如果西西里的其他地方爆发反伊斯兰起义也不足为怪。趁统治者把兵力投入到前线，后方空虚之际举行起义，是被统治者的常用方法。然而，西西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发生过起义。

叙拉古是过去拜占庭帝国恶政的象征，不愿意为救援叙拉古而卖命的心情可以理解。即使叙拉古防卫成功，整个西西里也不会立即回到拜占庭的统

治之下。西西里全岛几乎都已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当时的叙拉古也只是一座孤城。即使在9个月的保卫战期间发生了起义，大概也不过是对伊斯兰统治的反弹，而不是要回归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这一连9个月，叙拉古以外的西西里基督教徒们都是老老实实的。

最后，西西里屈服于伊斯兰统治之后，来自于此的袭击“鲁米”（直译为“罗马人”，意译为“基督教徒”）之地的海盗行动几乎绝迹。实际上，“鲁米”也已从这时起，开始区别使用“撒拉森人”和“阿拉伯人”的称呼。“撒拉森人”指居住在北非且以海盗为业的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则指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

西西里在归入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以后，甚至享受到了不优于却也不亚于古罗马的繁荣。这也是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方法之所赐。那么，这种统治方法的支柱“伊斯兰的宽容”又是怎样的实际情况呢？

在现代，正像“伊斯兰各国”的说法那样，伊斯兰教徒也分国别。非伊斯兰教徒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伊斯兰教中原本不存在国家这个概念，只有涵盖所有伊斯兰教信徒的“伊斯兰之家”的概念。

可是，没有国家概念会有一件麻烦事——无法征税。税收是国家为代行国民个人无法办到的事情所需要的费用。国家的意义不存在了，税收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而在伊斯兰国家，无法征收始于古希腊城邦、完成于罗马帝国又延续至现代的“国税”。

这种情况在实际层面上使人非常困惑。纵使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实际生存其中的仍然是一种居民共同体。

《古兰经》也承认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的私有财产。这样就有可能征“税”。这就是向伊斯兰教徒征收的唯一税种，名为“扎卡特”（zakat），其意义却不同于希腊、罗马式的税。“扎卡特”直译的意思是“富人为净化见穷人饿死而不救助所感到的悔恨之情”而解囊。因而，“扎卡特”不是被课而缴，而是一种自发捐赠的行为，这与基督教世界的慈善相同。与基督教世界对慈善事业的捐赠不通过国家相似，在伊斯兰世界也有以援助贫穷伊斯兰教徒为目的的慈善事业团体，捐赠也是通过这些团体进行的。现代基督教国家认为钱款从这些团体流向了恐怖分子，但即使向贫困伊斯兰教徒提供援助的团体与恐怖集团有牵连，在逻辑上也无法指摘。

我们先不谈这一问题，且把话题拉回到中世纪前期的伊斯兰世界。“扎卡特”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以“净化悔恨之情”为目的的自发行为，就不能像罗马帝国那样设定税率。可是，如果钱款进项不确定，就不可能制定救济贫民的福利政策，也不可能使之组织化。此外，穆罕默德还认可另一种

税收。

这是一种向战败者即被统治者课征的税收。

我们不知道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税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忠实实施。但是，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近东人、中东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人大部分都改信了伊斯兰教，没有改教的多为犹太教徒。这种税在东方专以犹太人为对象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税种在征服者伊斯兰教徒的保护之下征收，犹太人要在伊斯兰世界里坚守自己信奉的宗教并生存下去，就要拿出收益、收入的一半。按伊斯兰的说法，这是非伊斯兰教徒在“伊斯兰之家”中得以“容忍”的“代价”。也许有人认为50%的高税率实在没有人性，但在中世纪前期这个时代，却未必可以这样说。

罗马帝国也有向被统治者征收的行省税，税率是10%。但是在中世纪，自耕农要向封建领主和同样是大地主的修道院支付税金，尽管因土地所有者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超过50%。这是因为古代的税制“广而浅”，到了中世纪演变为“窄而深”，也是因为中世纪以后神职人员为首的免税对象变得越发庞大，社会上不纳税人数多于纳税的人数。

在信仰笃深的中世纪人看来，这个50%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伊斯兰教中只要纳税就认可“异教徒”的存在，基督教中却不行。在基督教世界里，连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都不认可，遑论“异教徒”。

在西西里，征服当初，大概是圣战狂热过了火，对失败者的处置过于残酷，对被征服者的这种税收也实施得极为严格。所以，在首先被伊斯兰征服的以巴勒莫为中心的西西里西部，起义时有发生，也有大批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如果改信伊斯兰教，不但可以免重税，也不会再有被当作奴隶卖到北非的危险。

我因此想象，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统治者后应该有以下的考虑：

第一，既然要淡化与北非的关系，朝独立的方向迈进，最好不要发生被统治者的起义和暴动，避免给北非以派兵的口实。

第二，如果西西里只有伊斯兰教徒，那么面向非伊斯兰的这种税就征收不到。净化对穷人悔恨之情的“扎卡特”即使收进来，也不能挪作行政和军事费用。

可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找到了非常现实的统治方法。

首先，决定不奖励被征服者西西里人改信伊斯兰教，相反鼓励他们不改宗教。

当然，要向这些人征税来作为“容忍”他们存在的代价。通过把地租税和人头税分开的方法，做到实质上减税。

地租税在阿拉伯语中称为“哈拉吉”（kharaj），税率是耕地收入的10%另加课于动产家畜头数的2.5%。对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似乎也征收这种税。

人头税只向居住在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征收。人头税，在阿拉伯语中叫“吉齐亚”（jizya）。人头税的征收对象也并非全体基督教徒。妇女、儿童、身体残疾者、乞丐、奴隶免交此税，其课税对象仅限于成年男子。

人头税不是等额征收，而是按财力分上中下三等，各等级所缴纳银币数目不同。下面记录的是以“迪拉姆”（dirham）银币为单位的一年纳税数目：

上等：48枚

中等：24枚

下等：12枚

迪拉姆银币由3克白银铸造而成，搞清它在中世纪的价值非常困难。当时的白银绝对要比21世纪的今天贵重。正因如此，撒拉森海盗才更要袭击修道院和教堂，基督教的弥撒及其他祭典所使用的圣器几乎全是白银制成。

由于这样的情形，想要知道1 000年前银币的货币价值近乎不可能。如果只是想大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假定如下。假定在2008年11月这个时间段，1克白银为0.5欧元弱，1欧元合125日元，那么：

上等：144克白银＝72欧元＝9 000日元

中等：72克白银＝36欧元＝4 500日元

下等：36克白银＝18欧元＝2 250日元

如果光是这样，我们只会说这太“便宜”了。但在那个时代，价值说不定10倍、20倍于此。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不人性的。这是基督教徒为了在伊斯兰统治下也能坚守信仰生活下去的“代价”。对伊斯兰方面来说则是“容忍补偿金”。

阿拉伯人称此为“兹因玛”（dhimma），是“保护”的意思。这个字眼的本意是“容忍”，只说“保护”是相当虚伪的说法。在罗马那样的多神教世界可以直接称为“保护费”，但在一神教世界，“保护”的意思也成了“容忍”。但如果想到同时代基督教世界不能容忍异教徒的存在，而在这里付钱即可，也许这种“伊斯兰的宽容”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要问基督教徒支付了“容忍补偿金”，其境遇是否就会与伊斯兰教徒一样，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在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基督教徒的人身安全、行动自由、信仰自由得到承认，财产也受到保护，但他们必须忍受几个方面的不自由。他们终究只是“二等公民”。

严格禁止向伊斯兰教徒说教基督教教义。

禁止新建教堂。

禁止在基督教节日上街游行，教堂不得鸣钟。

禁止携带武器行走。在家可饮葡萄酒，但禁止在人前饮用。

基督教徒必须在家门上打上某种“标记”，今天我们已无法知晓这些标记的内容。

严禁与伊斯兰教徒通婚。

在路上遇到伊斯兰教徒时必须避到路边让路。

这些禁令即使不从近现代尊重人权的理念来看也是非人道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使人感到屈辱得不堪忍受。暂且不说很早就被征服、据传已有300多座清真寺的巴勒莫，就连征服行动前半期归入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据说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在西西里东部，墨西拿、卡塔尼亚、叙拉古这些古希腊时就有的城市较为集中，这里的基督教徒几乎都未改教。可以想象，在周围尽是二等公民的社会中，这些禁令也不会带来多少不适。不是吗？路上与伊斯兰教徒邂逅的概率几近于零。非但如此，受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之后，反而多占了便宜。

伊斯兰·西西里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农业形态从大规模农庄转为了中小规模的自耕农。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农业一直是主要产业。罗马时代的西西里有着大规模的农庄。农庄的合理运营是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粮仓的主要原因。进入中世纪以后，在生产效率方面有所下降。尽管没有受到北方蛮族的侵略，

也没有受到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长期战争的危害，西西里的农业还是衰落了。

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是帝国基督教化以后广泛实施的长子继承制度。这一制度避免了耕地的分割，但却使农庄经营僵化。世袭而代代重叠，使经营者极其自然地成了守业者。想要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准，只要继续生产以前所生产的产品即可。在西西里，自古以来的主要产品就是小麦。

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新统治者以后，似乎强制推行了伊斯兰阿拉伯式的继承法，其理由不得而知。这是一种把继承权传给所有儿子而不仅是长子的继承制度。

大农庄制度因此骤然崩溃，中小自耕农变成了西西里农业的主人公。在早期纳入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农田因农庄主及其家人被杀而成为无主土地，很多阿拉伯人便把这些农田据为己有。这个继承法看来也适用于这些伊斯兰教徒。所以在西西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并无区别，一同进入中小自耕农时代。这带来了诸多好处。

第一，农庄主本人开始直接参与农庄运营，可以关注到细节。

第二，极其自然地产生出了自由竞争的环境。

第三，阿拉伯人农庄主带头从东方引种了许多新品种。

第四，这无疑也是阿拉伯人积极主动所为——西西里引入了东方的灌溉方法，中世纪东方在这方面绝对先进。

第五，农业要繁荣，必须保证下面几个条件：安全与和平得到维持、流通与市场的网络功能正常。

由于以前袭击掠夺的人们已经定居下来，并从事农业和贸易，安全与和平便以极其自然的形式得到了保障。

流通与市场网络方面也不成问题。北非全境和伊比利亚半岛已经伊斯兰化。西西里拥有这样的广阔市场，还有乘着南风或东南风几天即可到达的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不久以后，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也会加入这股基督教势力。

被伊斯兰统治后的西西里既不用担心海盗登陆，也不用担心在海上遭到撒拉森海盗船袭击。西西里的船已成为伊斯兰船。如果袭击西西里船，撒拉森人就不再是自诩圣战一翼的“官方认可的海盗”（corsair），而是纯粹的“海盗”（pirate）。在伊斯兰的法律中，对这种罪犯的处罚也相当严

厉。

在伊斯兰阿拉伯时代，巴勒莫已明显成为西西里的中心。10世纪造访巴勒莫的阿拉伯人旅行家留下了以下叙述。

> 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位于大海之滨，面积大于阿尔福斯塔特（现开罗旧城区）。城市根据功能分为几个地区。由于使用瓦和石灰，很多建筑物的颜色红白相间。城里有水路，各处的喷泉喷着水花。城内还有宽阔的运河，名为瓦底·阿巴斯河（Wadi Abbas，现奥莱托河），水车数量很多。由于水源丰沛，这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城市有很多清真寺。市场位于郊外，除星期五外连日开放。市中心还有一个巨大的商业区。这一切使得全城充满活力。城墙环绕着城市，有四个城门可以进出，出城后的道路通往西西里全岛。
>
> ——阿尔·穆卡达西（Al-Muqaddasi）

同一时期遍游西西里的地理学家也留下了以下叙述。

> 整个西西里岛因其美丽富饶被誉为地中海的珍珠，的确名副其实。西西里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悠久，举世无双，为不同的统治者所钟爱。
>
> 现在的西西里，旅行者来自各国，贸易商人云集，他们异口同声地赞赏西西里的重要性和它的美丽，羡慕与岛上居民进行贸易的收益。西西里的这些利处，比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吸引力。
>
> 西西里历史所拥有的魅力，会给亲眼见过她的人留下难忘的回忆。昔日辉煌的遗迹，不同的时代统治者留下的业绩都遗留至今。如今西西里的统治者，只要想到自己是这些古老统治者的继承人，心里一定会感到自豪。
>
> ——伊本·豪卡特（Ibn Hawqat）

这位伊斯兰教徒似乎与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的精英不同，对希腊和罗马的异教文明并不排斥。

阿拉伯人不仅在西西里的首都巴勒莫建设了贸易中心，还从厌恶拜占庭帝国的禁锢而逃到波斯的希腊人那里了解并移植了所有他们知道的哲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已不顾圣

战大义，停止了袭击掠夺基督教徒。他们决定在西西里生产，并将其作为生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全部移植过来。他们已把西西里当作了自己的家，所以非常热心地要使家里舒适。

他们最热心的是移植农作物。我在这里制作了一份一览表。看了这份表，人们大概可以理解后世欧洲人在《你可知晓那遥远的南国》[注]的歌中所讴歌的西西里其实是阿拉伯人所创造的。在一览表中，除了农作物以外，我还加进了一些语源为阿拉伯语的一些词汇。大家一定能通过这些了解到，伊斯兰阿拉伯的影响决不限于9世纪至11世纪伊斯兰统治时代的西西里，后代也受到了广泛的影响。

汉语	日语	阿拉伯语	意大利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英语	德语
柠檬	レモン	laimūn	limone	citron	limón	lemon	Zitrone
橙子	オレンジ	nāragia	arancia	orange	naranja (*or* anaranjado)	orange	Orange (*or* Apfelsine)

汉语	日语	阿拉伯语	意大利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英语	德语
砂糖	砂糖	sukkar	zucchero	sucre	azúcar	sugar	Zucker
茄子	茄子	bādingiān	melanzana	aubergine	berenjena	aubergine	Aubergine
藏红花	サフラン	Za'frān	zafferano	safran	azafrán	saffron	Safran
洋蓟	アーティチョーク	kharshūf	carciofo	artichaut	alcachofa	artichoke	Artischocke
（玻璃）蒸馏器	（ガラスの）蒸留器、ランビキ	alambig	alambicco	alambic	alambique	alembic	Destillierkolben
年鉴	歳時記	al-manah	almamacco	almanach	almanaque	almanac	Almanach
海军将军	海軍提督	amīr al（－bahr）	ammiraglio	amiral	almirante	admiral	Admiral
天蓝色	紺青色	lāzwardi	azzurro	azur（*or* bleu）	azul（*or* azul claro）	azure	Himmelblau
海关	税関	dīwān	dogana	douane	aduana	customs	Zollamt
茉莉花	ジャスミン	jāsāmīn	gelsomino	jasmin	jazmín	jasmine	Jasmin
鲁特琴	リュート	al－'ūd	liuto	luth	laúd	lute	Laute
仓库	倉庫	mahāzin	magazzino	magasin（*or* entropot）	almacén	magazine（*or* storehouse）	Magazine（*or* Lager）
笔记本	手帳、メモ帳	taqwin	taccuino	carnet（*or* calepin）	agenda（or carné）	notebook	Notizbuch
价目表	料金表	ta 'rīfa	tariffa	tarif	tarifa	tariff（*or* rate）	Tariff（*or* Gebühr）
巅峰、顶点	天頂、頂点	samt	zenit	zénith	cenit	zenith	Zenit

然而，所有这些全部加起来，其重要性也不会超过阿拉伯数字。这是基督教世界引进的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礼物。阿拉伯人在印度学会了这种类型的数字，并带到了地中海世界的西方。这种数字现在仍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为全世界所使用。

1—I

2—II

3—III

4—IV

5—V

6—VI

7—VII

8—VIII

9—IX

10—X

50—L

100—C

500—D

1000—M

这就是9世纪到11世纪的西西里，它不是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航母，而是地中海世界一大贸易中心。

出入西西里港口的不再是海盗船，而是商船。在西西里安定下来的伊斯兰教徒已不再是海盗。事实上，在西西里，甚至在巴勒莫都没有被称为“浴场”的强制收容所，而这种收容所必定存在于同时代的北非主要港口。把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这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有利的。但这种廉价劳动力也是冒着遭到迎头痛击或海难死亡的风险绑架而来，如果有别的生路这事就不划算。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找到了“别的生路”。

中世纪也有奴隶。与古代奴隶制的不同点在于，基督教徒不能把基督教徒作为奴隶，但可以把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异教徒作为奴隶；伊斯兰教徒不能把伊斯兰教徒作为奴隶，但可把基督教徒和其他异教徒作为奴隶。信奉任何宗教都不能把人作为奴隶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回溯到1 000年以前的那个时代，西西里并不存在名为“浴场”的奴隶收容所，尽管这时西西里已经属于伊斯兰世界。这件事值得特书一笔。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和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经常遭到基督教世界的责难，原因是这些国家与西西里有贸易关系，并将这种贸易关系优先于参加罗马教皇呼吁的对伊斯兰战争。但是，伊斯

兰统治下的西西里并不从事海盗业。

他们在一旁冷眼看着伊斯兰圈内的北非依然继续着海盗业，自己却没有同流合污。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勇敢地反抗袭击他们国家、绑架他们同胞、阻拦他们商船的海盗。不，可以说，出于防御海盗的需要，这些国家已经成长为具备海军力量的海洋国家了。

地中海的奇迹

阿拉伯人在西西里的统治持续了200年。公元1072年，西西里被诺曼人征服。

诺曼人征服了英吉利以后在11世纪处在活跃时期。诺曼人从法兰西西北部的诺曼底到英吉利相距很近，但到南欧西西里的距离却很远，新统治者诺曼骑士的数量很少，这是西西里的幸运之处。人少使他们变得现实。虽然被同属基督教的诺曼王朝统治，西西里却没有多大改变，纠正的只是坏的一面。

新统治者也是基督教徒，以前200年间西西里的基督教徒所忍受的“二等公民”的处境自然不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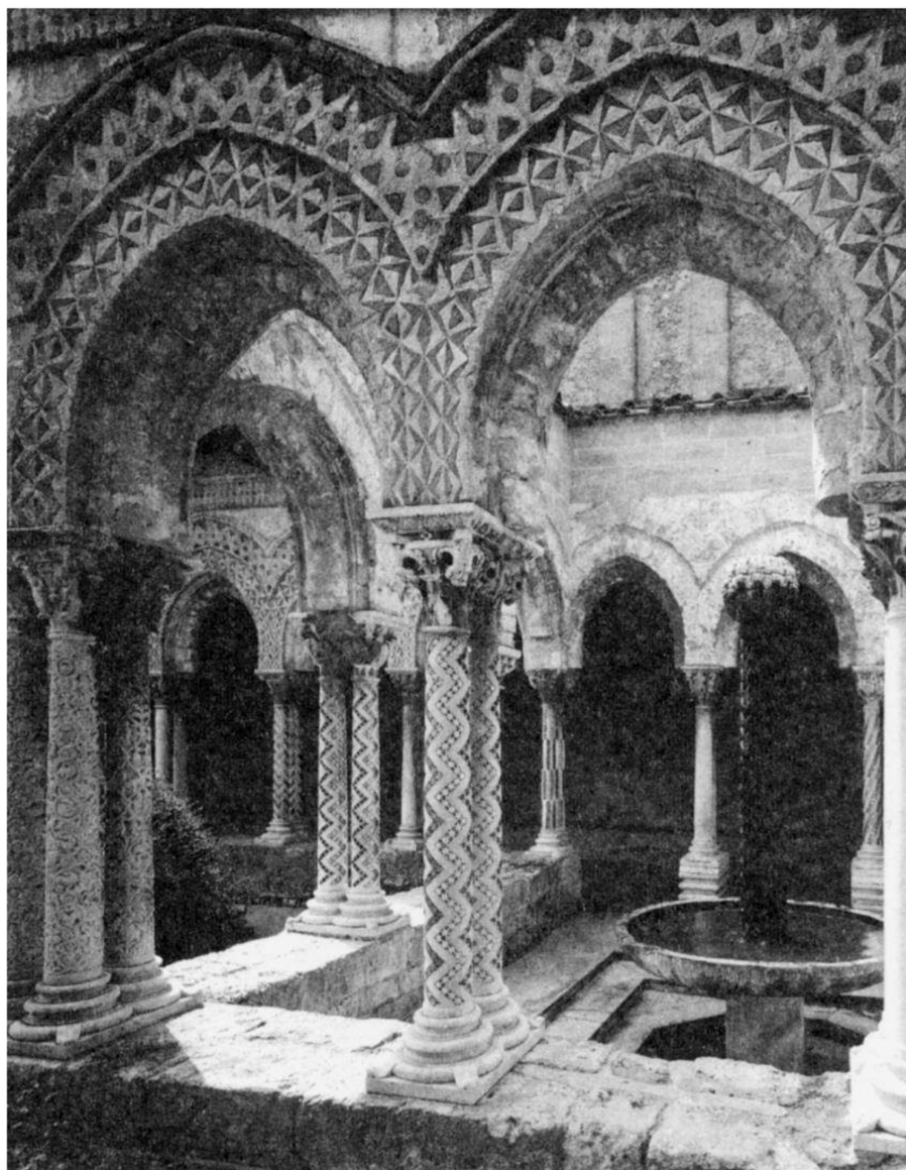
不需要再缴纳只向基督教徒征收的“吉齐亚”人头税了。

建造新教堂、在基督教的节日里上街游行、在钟楼上连续敲钟，这些都可以不必顾虑而堂堂正正地去做了。

诺曼人统治者并未让已沦为被统治者的西西里伊斯兰教徒沦为“二等公民”，只是把巴勒莫的主要清真寺恢复为教堂。清真寺本来就是用基督教教堂改建成的，这不过是与字面一致的“恢复”。其他的清真寺则都保留下来。保留清真寺意味着认可伊斯兰教徒可以不加改变而生存下去。人头税具有“容忍异教徒存在”的意味，但也未向伊斯兰教徒征收。诺曼的统治者反倒积极利用这些伊斯兰教徒。

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西里，可用“勉勉强强”形容的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共存社会，这时以更接近理想的形式实现了。

西西里东部的基督教徒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全部生存下来，叙拉古是其象征性的城市。蒙雷阿莱则是进入诺曼时代以后仍有众多阿拉伯人居住的西西里西部城市。造访过叙拉古的图奥莫和蒙雷阿莱的大教堂的人，一定会表示首肯。



蒙雷阿莱大教堂的回廊

图奥莫是叙拉古的大教堂，恢复成基督教教堂之后完全看不到阿拉伯的色彩。这里在作为教堂之前是古代神殿。这段历史至今仍旧给人以压倒性的冲击感。叙拉古让人感到，不论是作为基督教的地盘，还是屈服于伊斯

兰，它都背负着古希腊一路走来。

而在巴勒莫近郊蒙雷阿莱的大教堂，不论从正面看去基督的镶嵌画有多么巨大，没有人感受不到教堂整体装饰所体现的浓厚阿拉伯色彩。著名的回廊完全是阿拉伯式的。这是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全面配合诺曼国王建设其所教堂的结果。

这两个教堂是我在全部意大利教堂建筑中最喜欢的五处中的两处。叙拉古的图奥莫就像古希腊的雕像，没有丝毫冗余，全体飘荡在静谧之中。只有最小限度的物件，却让人感受到其丰富无比。第一次造访这里的时候，我就强烈地希望想要一个具有这种感觉的书斋。

相反，蒙雷阿莱的大教堂则投入了所有的色彩，而这一切却能绝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罕见的美感世界的榜样。尽管因为过于愉悦，使得精神难以集中而不适合于做书斋，但它却最适合于做工作结束后休憩的起居室。

让你二者挑一，你一定会感到纠结。因为如果说前者是镶有粲然生辉的一颗大钻石的戒指，那么后者就是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珍珠等搭配绝妙、做工考究的项链。要是我，大概会深深地叹一口气回答：“两个我都要！”

有一个重要的中世纪建筑式样在研究家中被称为“西西里阿拉伯式样”，但按照这个式样建造的建筑物却不局限于西西里。诺曼王朝的统治曾经达及意大利南部，所以在拿波里以南至今尚有众多遗存。让19世纪北欧旅行者为之倾倒的“那遥远的南国”，不光是毫不吝啬地洒向南国的阳光、地中海湛蓝无垠的大海、芬芳的柠檬和橙子。意大利语中称为“sicuro arabo”（安全的阿拉伯）的“西西里阿拉伯式样”的房屋和别墅，在北欧人的眼中也都颇具异国情趣。甚至可以说，如果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没有了阿拉伯色彩，对21世纪的旅行者来说，这里也就不会再是他们所憧憬的地方了。

十字军仅重要的远征就有8次，其中仅有一次，有人未杀一个伊斯兰教徒就拿下了圣地耶路撒冷。这个人就是腓特烈二世，他是诺曼王朝的一位国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带有诺曼和德意志的血统，生长在西西里。文明史家布克哈特评价说，他是打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界限的人物。但如果没有前面叙述的西西里，就不会有腓特烈这位考虑并通过与伊斯兰领袖的和平谈判征服耶路撒冷的人。顺便提一下，中世纪后期在地中海世界发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火种也是在他统治时代的巴勒莫点燃的。

在中世纪前期的西西里实现的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共存状态，在西西里回到基督教世界后依然持续着。

“伊斯兰阿拉伯统治”：公元827年—1072年

“诺曼—霍亨斯陶芬统治”：公元1072年—1266年

如此，这种情形至少延续了400年。

德意志系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被得到罗马教皇支持的法兰西系安茹王族取代之后，这个时期打上了休止符。这位法兰西人的统治因西西里民众大起义而遭受挫折。这次起义因朱塞佩·威尔第创作的歌剧《西西里晚祷》而闻名于世。然而，取代被赶走的法兰西人进驻西西里的是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

法兰西人比意大利人受到基督教化的地方更多。西班牙人又比法兰西人更加基督教化。西班牙人统治后的西西里，最先消失的是清真寺。经历了400年已经完全西西里化的阿拉伯人，与其逃至如今仍操海盗业的北非，不如选择改信基督教。

于是，地中海的奇迹消失了。西西里作为地中海一大贸易中心的地位也宣告结束了。在西西里点燃火种的文艺复兴精神，在相距遥远的佛罗伦萨结出了果实。

---

1. 这首歌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昂布罗瓦·托马（1811—1896）于1866年根据歌德小说创作的三幕歌剧《迷娘》中的一首咏叹调。歌曲歌颂了意大利南部的优美风光，表达了思恋故乡的情怀。——译者注

第二章
两种“圣战”的时代

海盗行动在继续

西西里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勉强实现了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共存的局面，但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对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而言，伊斯兰势力征服西西里就是圣战的成果。征服西西里之后，圣战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指向了与西西里隔海仅3公里的意大利南部。

话虽如此，北非的伊斯兰教徒高举大旗进行的圣战与海盗行为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海盗行为具有走向全面称霸的前哨战的意义，还是一种使同胞活命的产业。也许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已经没有必要出去干海盗的营生，但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撒拉森人仍有此必要。

从9世纪末到10世纪，狂飙席卷般的撒拉森海盗暴行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南部。但要问其他地方是否就能安身，回答则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从北非港口出发向东北航行可以抵达的所有海岸及其腹地，都不能免于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是因为地中海中央盛行西南风和西风的缘故，尤其在夏季。

只要能借助这股西南风，人们就可以完成下列航行：从奥兰和阿尔及尔出发可以到达法兰西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从布杰（Bougie）和博纳（Bona）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区；从突尼斯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从的黎波里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半岛长筒靴状的脚尖的卡拉布里亚和脚踵处的布里亚。与现代的情况不一样，夏季刮起西南风和西风，人们就不能享受日光浴。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来说，虽然西南风有时会吹来撒哈拉沙漠的沙粒，但这风带来的不是夏季，而是海盗。

海盗们并不缺乏危急时的避难港。西西里尽管已经不再是海盗船的出港地，但伊斯兰教徒还是可以停靠。撒丁和科西嘉岛上无人的洞穴和沙滩使用起来都很方便。除这几个岛以外，第勒尼安海上还散落着诸多中小岛屿。拿破仑被流放的厄尔巴岛是中等大小的岛屿。像小岛中的基督山岛，只要划着小船绕岛一圈，便可以知道那里是海盗的理想巢窟。我在想，大仲马为了创作《基度山伯爵》可能到实地考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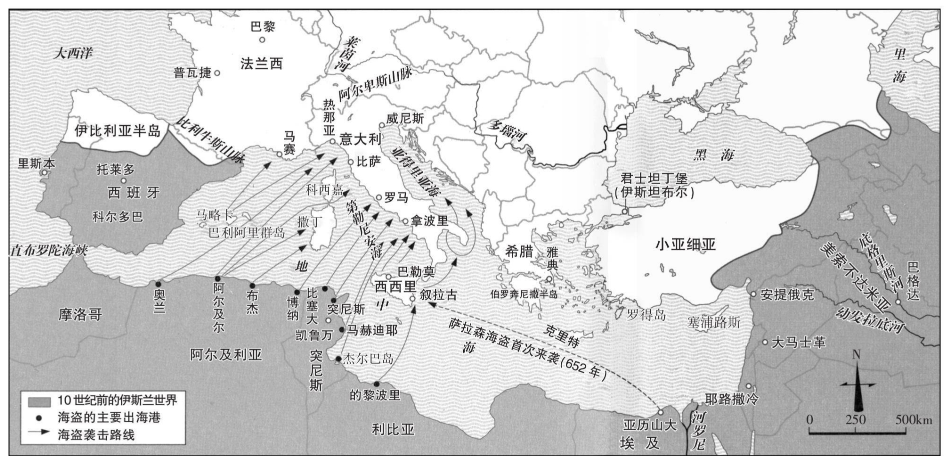
这就是地中海的中央海域第勒尼安海。如果想在这里安全航行，放心捕鱼，得以安眠而不被“撒拉森塔”的警报惊醒，就只有使用海军力量夺取制

海权。

然而，不用说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世界大跃进的8世纪，就连9世纪和10世纪，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事实上也一直在伊斯兰一方。

没有制海权，不仅敌人会在海上为所欲为，还会有敌人自由登陆，甚至入侵内陆腹地的危险。公元882年发生的惨案，不仅使第勒尼安海附近地方，就连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内陆深处的人们都毛骨悚然。

亚平宁山脉像脊梁骨一样自北向南贯穿意大利半岛。沃尔图诺河发源于亚平宁山脉，注入第勒尼安海。河的上游有圣温琴佐建立的名为“圣温琴佐·阿尔·沃尔图诺”的修道院，属于本笃派，是圣本笃建立的意大利南部著名的卡西诺山大修道院的小兄弟。这两座修道院都没有幽居在深山幽谷之中，而是紧傍着人间社会，忠实地践行着圣本笃的思想，在信仰和实际生活方面，积极指导居住在周边的人们。



撒拉森海盗的主要出航地及其袭击路线

卡西诺山在拉提纳大道这条干线公路的近旁，但圣温琴佐修道院则位于偏僻之地，它建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盆地中。沃尔图诺河上游湍急的河水在附近流过，自古因产良马而闻名。这里是萨摩奈族的发源地，这个民族挡在罗马征服亚平宁半岛的途中，寸步不让。萨摩奈族骑兵让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头痛了40年之久。

据说圣温琴佐修道院的修士们也会灵巧地策马飞奔，道袍下摆在风中飞舞。还有人说，修道院同属圣本笃派，年轻的修士会被派往冬季寒冷的圣

温琴佐修道院，老年时再转回气候温暖且富人际关系的卡西诺山修道院。

公元882年秋，撒拉森海盗袭击了这座“沃尔图诺的圣温琴佐修道院”。屡屡遭到海盗袭击的卡西诺山修道院经常交出黄金制品以换取海盗不再掠夺和破坏的承诺。但圣温琴佐修道院却对海盗的这个提议不屑一顾。他们已胜算在握。

第一，他们有年轻健壮的修士近千人。

第二，他们认为，季节已到秋季，一到10月，亚平宁山中就要开始飘雪。如果能坚持到冬天，北非的撒拉森海盗就会放弃进攻而撤退。各地的修道院主导生产，这是中世纪前期基督教世界的特点。因而圣温琴佐修道院也有长期坚守的储备。

然而事与愿违。海盗也身强力壮，人数众多。即使放弃进攻，他们冬天也无处可退。撒拉森人不惧基督教徒，却怕冬季的地中海。他们想避开风雪，一开始就发起了一刻不停的总攻。

年轻健壮的修士们死伤不断。他们擅长骑马却不习惯射箭。寒冷日甚一日，10月11日，圣温琴佐修道院陷落了。

修士半数战死，余下的全被带到了海盗面前。修士们都年轻力壮，带往北非当奴隶出售应该很好。不论在农庄劳动还是当划桨手，他们都应该有相当的价值。海盗一定会把他们卖掉赚钱。

然而，在伊斯兰教徒看来，为基督教奉献了一生的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徒开弓射箭的神职人员，已没有让他们成为奴隶的价值。修士们被捆上手脚，从桥上一个一个地被投进沃尔图诺河。下游的农民们藏在河边，努力救起冲下来的修士。可是，河水湍急，手脚被捆绑，修士无法躲避河里突出的岩石。据说没有一个修士被活着救起。沃尔图诺的地方志中记录着，500名修士被抛入河中淹死。撒拉森人在这里过冬，撤走时彻底破坏了修道院并将它付之一炬。不久，修道院开始重建。细水长流，重建工作一直持续到16世纪，但却再未能恢复其原先仅次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如今已是断壁残垣。

就在同一时代，撒拉森海盗甚至在教皇领地拉齐奥也构筑了城堡。城堡建于如今仍被称为“撒拉齐内斯科”的海拔900米的山岗上。古代的瓦莱里亚大道如今已成为国道5号线，撒拉齐内斯科可以俯瞰这条国道。从罗马沿蒂泊蒂娜大道到蒂沃利，在这里转上瓦莱里亚大道，越过亚平宁山脉，便可以到达亚得里亚海。通过瓦莱里亚大道人们把内陆地区的产品运到大都市罗马，进入中世纪以后，通行量经常居高不下。在如今仍被称为撒拉齐

内斯科的这座山村，小路纵横交错，让人想起北非的要塞。盘踞在此的海盗看到猎物，便会驱马沿着缓缓的山脊而下，抢掠货物，绑人上山。



意大利中部

从罗马到蒂沃利有20公里的距离，从蒂沃利到撒拉齐内斯科耸立的山岗也是同样的距离。瓦莱里亚大道运送着来自内陆地区的产品。如果交通断绝就会非常不便。伊斯兰势力渗透到如此靠近的地区，对身在罗马的教皇而言，必定是一个威胁。没有人再居住在撒拉齐内斯科周边。曾几何时，罗马皇帝可以不带卫兵来往于这条大道，700年后的这个时期，如果没有相当的需要，连农民也都要尽力避开这里。

进入10世纪以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公元915年，拜占庭帝国皇后佐伊代年幼的儿子摄政，她无法完全回绝仍在各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贵族的请求，向巴勒莫的“酋长”提出了订约请求。这份协约每年要支付2.2万拜占庭金币，以换取海盗不袭击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两地。

这是一个一旦进入衰退期，便收集不到准确情报的例子。拜占庭应该与北非撒拉森人缔约才对。实际上遵守这个协约的只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而时间仅有一年。巴勒莫的“酋长”已经洗手不做海盗了，承诺不干海盗易如

反掌。他把钱揣进了腰包。撒拉森人得知后怒不可遏。虽然同为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毋庸赘言，既不是协约的一方，也没有拿到钱的撒拉森人当然集中袭击了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两地。

当时的撒拉森人把基督教徒鄙视为“信仰错误的胆小鬼”。他们原本以为，拜占庭是唯一一个只要做出决定就能派出阵容不容小觑的海军的国家。而这个拜占庭帝国已是这副模样，撒拉森人觉得自己在地中海西部所向无敌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有一件撒拉森人不知道的事情，使对撒拉森海盗袭击感到绝望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更加绝望。佐伊皇后拿出的2.2万枚金币，既不是皇后自己的，也不是从拜占庭帝国国库中支出的，而是常驻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官僚征收当地人民的特别税。可是，交到巴勒莫“酋长”手上的这份年贡只是最初一年的，以后年份的都被官僚们私吞了。如果这些钱能持续交到撒拉森人手中，他们也许多少会手下留情一些。遭到撒拉森海盗泄愤的意大利南部居民有理由感到二重三重的绝望。

时代到了公元10世纪。基督教有一种观点认为，耶稣基督诞辰1000周年的这一年，是上帝审判的一年。善良的基督教徒想到上帝的审判，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会倾听谁的声音呢？是高叫“你忏悔吧”的主教和祭司的声音。200年前开始不断遭受伊斯兰海盗袭击，人们已跌落到贫困的渊底。这些人在被榨干的情况下，还是按照主教和祭司的意思，挤出了2.2万枚拜占庭金币。可即使这样，也并无效果。

公元925年，位于长筒靴脚踵部位布里亚的一个镇布林迪西附近的奥里亚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常驻当地的拜占庭官僚早已逃跑，但市民中有6 000人被杀、1万人被抓往北非，其状惨不忍睹。

这里没有可以抢掠的东西，又不临海。袭击这里的目的是绑架劳动力。被杀的6 000人都是年老的男人和孩子，他们不会立即成为劳动力。北非依旧需要劳力。

第一，送往西班牙，作为兵力投入到与基督教世界作战的最前线；

第二，在市场上出售，男人用作农庄奴隶，女人用作家务奴隶，一生劳作；

第三，用铁锁链铐住用作加莱船的划桨手。

没有黄金物品可以掠夺的城镇也已无法安身。

公元930年，撒拉森海盗在位于萨莱诺南面的帕埃斯图姆登陆。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公元前6世纪时被称为“Magna Graecia”，意为“大希腊”。帕埃斯图姆从那时起就已存在，因有献给海神波塞冬的神殿而闻名，古代这里也被称为“波赛多尼亚”（意为波塞冬的城市）。

不论是在希腊人殖民的时代，还是在被罗马吞并后的时代，沿海城市一直被认为是得“地利”的。可是在中世纪，这却成为“不利”之处。

由于远离基督教势力的中心，这里在罗马帝国末期排斥异教的狂风暴雨中未被击倒。但是，一旦国家丧失功能，也就不再关注各种基础设施的维护。结果，疟疾流行，人口减少。不过在中世纪前期，人们的房屋还比较集中在神殿聚集地区的周围。公元930年海盗来袭，扫荡了这片区域。



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

居民或被杀害，或被绑架，城市化作无人之境，房屋和所有的一切全被烧光。剩下的只有古希腊时代的神殿、罗马时代的街道以及椭圆形竞技场的遗迹。帕埃斯图姆就这样沉睡着，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迎来了近代的曙光。19世纪以前尚有海盗的威胁，人们不愿意居住于此。如今，作为在意大利可以感受到古希腊的历史遗址，这里名声大噪，游客很多。

中世纪前期，帕埃斯图姆不过是意大利为数众多的沿海小城之一。帕埃斯图姆的遭袭还不至于震撼整个意大利。但是，如果开始崛起的海洋商业国家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蹂躏，情况就会大不同。这事发生在帕埃斯图姆化为废墟的4年之后。

公元934年，热那亚遭到突然袭击。过去，从靠近意大利的法兰西南部，经热那亚到托斯卡纳北端的利古里亚，沿海各城市都曾遭受过撒拉森人的袭击和掠夺，但热那亚却不曾直接遭到过袭击。热那亚背山面海，金城汤池，在撒拉森海盗看来也很难对付。这一年，撒拉森人用30艘船组成船队，向这座城市袭来。

海盗突破了人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偷袭大获成功，还抢到了物品和船只。海盗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凯旋，回到突尼斯港。因无所作为而使海盗大获成功的热那亚不仅在临海一侧，也在陆地一侧构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墙。这一年在大兴土木中度过。

第二年夏天，撒拉森海盗再度来袭。夏季是海盗的活跃期，也是商人的活跃期。海盗看准了男人们全部出去的空隙，大摇大摆向港口奔袭而来。

如果打着黑底白色骷髅的旗子，人们马上就会认出是海盗。撒拉森海盗采用惯用伎俩，打着与热那亚关系良好的法兰西南部港口城市的旗子闯了进来。等看到船靠码头，撒拉森人下船，为时已晚。这次有很多女人被掳走。

根据热那亚共和国的历史，热那亚的商船队此时正向东方航行，从追上来的快船那里得知了事件的严重性，立即返航。他们袭击了停靠在科西嘉岛的海盗船队，夺回了被掳走的女人。

这个说法是否属实，现已无从知晓，但至少热那亚的男人已经意识到，光靠防守坚固已不能防范撒拉森人了。早些时候，比萨的船队也突袭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马略卡岛。当时，西班牙附近的巴利阿里群岛已归入伊斯兰世界，这里也是伊斯兰海盗的巢穴。

与已经开始行动的意大利北部相反，意大利中部没有这样积极主动的教皇，除了比萨以外，一直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中。而意大利南部的情况

更加糟糕，这里最近已经归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西里。

公元948年，撒拉森人袭击了与西西里只隔着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的雷焦（现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完全征服了这座古已有之的港口城市。城市遭到劫掠，但却少有居民被绑架送往北非。居民被课以与西西里一样的“吉齐亚”。这种人头税是居住在伊斯兰社会里的基督教徒所必须支付的，也只向这种人征收。西西里有伊斯兰教徒居住，而雷焦还没有。这意味着，在伊斯兰征服的地方，只要是非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任何人都有义务支付“吉齐亚”这种“异教徒税”，甘愿受二等公民待遇。这与伊斯兰教徒在居民中的比例无关。

在雷焦，有几座基督教堂很快改造为清真寺。由钟楼改造的宣礼塔（minaret）上传来宣礼师的声音，洪亮的阿拉伯语回荡不息。

“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唯一的先知！”

在意大利半岛上建造清真寺，这还是第一次。

10世纪，伊斯兰势力就这样推进了对意大利南部的渗透。也许是感觉到再也不能这样不闻不问了，正式统治者拜占庭帝国终于出面。公元963年，皇帝福卡斯派出的拜占庭军队与撒拉森军队交锋，拜占庭军队惨败，战斗的结果可以用“完败”一词形容。皇帝甚至向北非派出特使，签署了媾和条约。条约内容不详，但此后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尝试与撒拉森海盗进行决战。

西西里再大，即使放弃也只是个岛屿。意大利南部却与教皇所在的罗马土地相连。罗马教皇夜不能寐，再三恳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皇帝接受了教皇的请求，于公元982年夏天率领由德意志和撒克逊士兵组成的军队南下意大利半岛。

然而，这次南征的结果惨败。皇帝失去了4 000名士兵，扔下一切逃到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然后径直回北欧去了。

起来，意大利！

离公元1000年越来越近，地中海世界的伊斯兰势力已很强大，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不能与之抗衡。如果意大利半岛想防范伊斯兰的进攻，就只有意大利人自己站出来了。

公元1002年，阿马尔菲出动舰队，成功击退了进攻贝内文托和拿波里的撒拉森军队。

公元1004年，总督佩德罗·奥赛罗率领的威尼斯舰队，到达意大利亚得里亚海一侧的海港城市巴里救援，这里正在遭受撒拉森军队的袭击。巴里在千钧一发之际免于陷落。

公元1005年，比萨的舰队向蹂躏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撒拉森海盗船队发起挑战，取得了胜利。

意大利的海洋国家终于发起攻击了。他们认识到，商人为了进行贸易，不仅需要商船，还需要战船。

那么，同样蒙受危害的法兰西南部的海港城市为什么没有行动呢？

公元975年，他们成功地将伊斯兰海盗从圣特罗佩赶了出去，很久以前这里就是撒拉森海盗的根据地。一起事件使法兰西国王决心派出军队横扫海盗。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从法兰西到意大利去的途中，在圣特罗佩遭到海盗袭击，被洗劫一空。在这个时代的法兰西，与意大利卡西诺山齐名的克吕尼大修道院的院长是比国王还要受到尊敬的人。贵人受害便成了一件大事，为此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古今东西都是一样。虽然普罗旺斯的百姓每天都因撒拉森海盗而胆战心惊。

事实上，肃清了法兰西唯一的海盗巢窟，对伊斯兰海盗的警惕便从法兰西要人们的脑海里烟消云散了。而且说到海岸线的长度，法兰西南部无法与意大利相比。撒拉森海盗从来不乏登陆、掠夺、绑架的地方。

海洋城邦国家出头了，海盗方面便也开始考虑对策。似乎以公元1000年为界，海盗的专业化开始明显。专业化并非要降下圣战大旗。撒拉森人不是金盆洗手，也不是用积累起来的资产投资贸易，与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竞争。

他们推广了一种海盗集团的形式，把海盗集结到一个颇有才干的头目手下。

他们还是圣战的排头兵，仍然要向盘踞地的“酋长”上缴收入的五分之一，以换取认可。

可以认为，发生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变化，在做法上给撒拉森海盗提出了一个更具决定性的方向。

撒拉森海盗历来不喜海上作战，不似希腊人那种十足的海洋民族。他们喜欢打着假旗号，靠近并袭击缺乏防卫能力的商船，或是登上防御薄弱的海岸，绑架附近的人们。

专业集团化使撒拉森海盗的这种传统倾向成为主流。对海盗集团的头目而言，手下人是很好的生产手段，也是自己长期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让他们无所事事，对所有者和经纪人而言不是有效之策。

不过，这里有的也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纵容的。

正在成长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如同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所示，有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四国，这四国是贸易商人掌握国政的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个人利益极其自然地与共同体利益相一致。这一点有利于增强防卫力量。城邦国家虽小，但构成国家的人的性格倾向也不会不在国家政策中反映出来。这四个共和国各具性格，体现在海洋上，可作如下分类。

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个人主义倾向强烈，商船队几乎不配备护航船。这三个国家的海上军力多用于独立的海军行动，而较少用于护航。其做法是采取追踪击溃撒拉森海盗船队的办法来保证本国商路的安全。

相反，威尼斯共和国属于团队行动型，感觉就像是威尼斯股份公司。他们采用护航船队的方式，只要不遭到直接攻击，便不会向撒拉森海盗挑战。威尼斯的做法是通过提高商船船队所运送货物的档次来消化护航所增加的费用。重视与东方的贸易，也是因为以胡椒为主的香料价格较高的缘故。相反，运送体积大而单价低的木材和中端纺织品的商船则不派船护航，似乎在说：把命运交给老天爷吧。

在以西地中海为舞台的与撒拉森海盗的战斗大戏中，前三个国家的戏份最多，尤其是比萨和热那亚。但是，一旦必须作为国家整体与伊斯兰势力对决的时刻来临，威尼斯的存在便不可或缺。

另外还有一件事在公元100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海盗集团头目的名字开始在基督教世界广为人知。这是撒拉森海盗变为专业集团后当然的结果。不过，伊斯兰教徒的名字不论是阿拉伯语还是柏柏尔语，对意大利人来说大概都很难发音。很多著名海盗的名字都用绰号。穆塞托（Muscetto）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以后灿若繁星般地涌现出来的海盗英雄的领跑者。



法兰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

穆塞托的本名似乎是穆贾希德（Mugehid），出生于伊斯兰化后的西班牙。他本该更多地袭击法兰西南部，但他可能讨厌法兰西国王出头，便把目标锁定在了意大利。从西班牙到意大利路途遥远。他把海中间的撒丁岛建成了基地。撒丁岛西北端有个港口叫作托雷斯。岛前方的海上还有一座叫作阿西纳拉的小岛，20世纪是一座监狱。这里的地形最适合于做海盗的巢窟。穆塞托的意图是以托雷斯港为根据地，蹂躏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和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

穆塞托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利古里亚与托斯卡纳交界处的古都鲁尼。这是让鲁尼南北两面的比萨和热那亚感到震惊的大胆行动。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鲁尼，受到穆塞托及其手下的猛攻化作一片废墟，古迹遗留至今。这是穆塞托对比萨和热那亚的挑战。

但穆塞托无意与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海军在海上交锋。组织大船队易被发觉，他像攻击鲁尼一样，全部以小船队行动。他的战术是以小船队在海上

航行，到达目的地会合后，全体进攻。这个战术的有效性在进攻鲁尼时得到了证实。

比萨海军最终没有发现海盗，并且还应教皇的请求南下，参加夺回雷焦的战斗去了。雷焦清真寺宣礼塔上依然回响着阿拉伯语的宣礼词。

穆塞托躲在海岛背面，确认比萨海军向南走远后，直接袭击了比萨港。比萨海军接到追来的快船告急，调头返回为时已晚。

物资遭到抢掠，人被绑架，市区已被烧毁。看到这些人人愤慨。比萨人也是托斯卡纳人，他们素以好强的性格而闻名。

托斯卡纳人，不论是佛罗伦萨，还是西耶那、比萨或是卢卡，城市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协调。他们不善于采取共同步调，但却都争强好胜。眼看着祖国的惨状，比萨的汉子们发誓要掐死穆塞托及其手下。

这时，罗马教皇出面了，他一直在想把伊斯兰势力赶出意大利。他在把撒拉森势力逐出撒丁岛的大义之下，提议热那亚和比萨这两个憎恨撒拉森海盗的国家并肩作战。他建议比萨海军负责穆塞托盘踞的托雷斯港北部，热那亚海军负责散布着撒拉森海盗巢穴的南部。

两个国家都响应了教皇的提议，公元1012年，比萨向科西嘉和撒丁之间的海域派出了120艘船组成的舰队。每条船的桅杆上都高高飘扬着比萨的国旗，如此规模堪称舰队。

舰队越过博尼法乔海峡西行不久，便在海上与前来迎战的穆塞托舰队打了起来。船船对打，意大利的海上勇士更厉害。与战斗力相比，意大利人的控船能力更胜一筹。穆塞托舰队败下阵来，逃回了托雷斯港。

然而冬季来临。比萨人决定来春复仇，也回比萨去了。在撒丁南部，热那亚也顺利地一路横扫。比萨人带回了战利品。他们让在海战中被俘的基督教徒划桨手重获自由。战利品中还有穆塞托的妻子，她当时乘坐在一条船上。也许妻子的被捕使这位海盗头目决定进行外交交涉。

当年冬天，一位号称穆塞托使者的人造访了罗马教廷。这人在接待他的教皇面前把带来的一大袋东西撒了一地。袋子里装满了栗子。穆塞托的使者向教皇转达了主人的话：

“来春，将有如此众多的撒拉森人涌来‘鲁米’（住在意大利的基督教徒）所住之地。”

教皇本笃八世面不改色，向一个贴身侍从耳语了几句。侍从搬来一个大袋

子，撒在了使者面前。袋子里装的是无数的小麦粒。侍从说道：

“去告诉你的主人穆塞托，我们‘鲁米’会有如此大量的人等着穆塞托和他手下的海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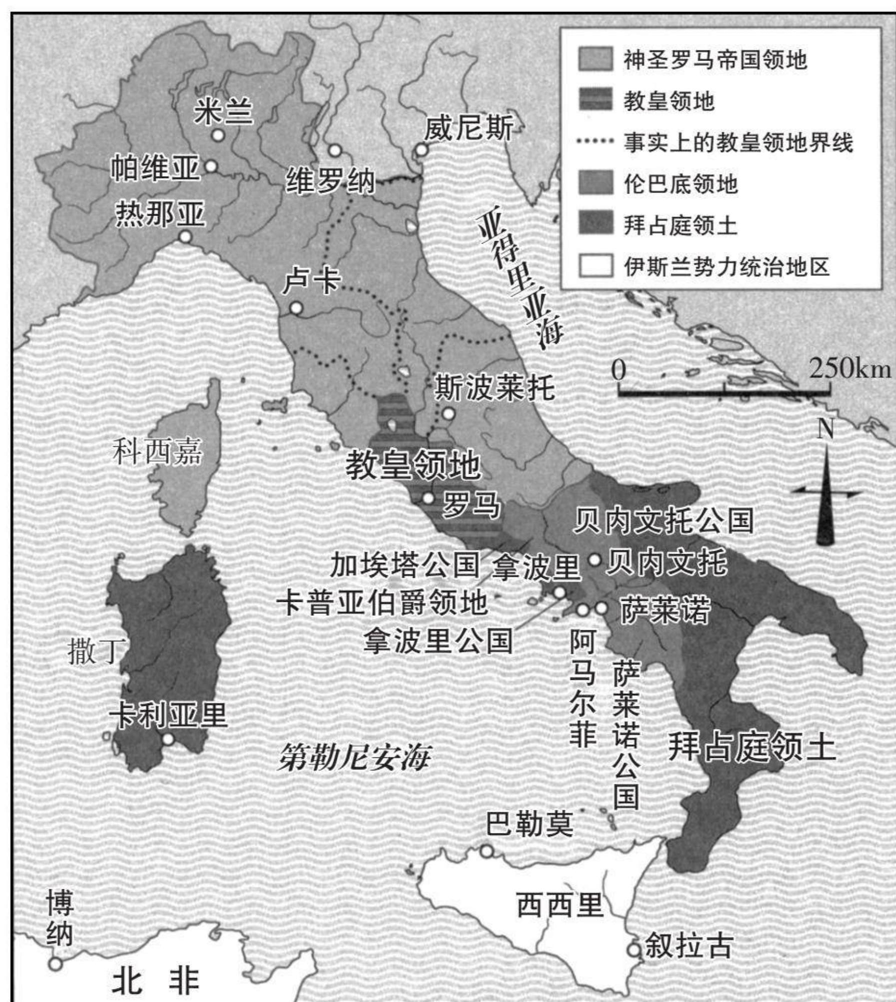
中世纪，没有度量是不能胜任教皇的。

同是“鲁米”的比萨人等不及了。第二年开春刚能航行，他们便再次出航，目标直指撒丁。这一年，他们完美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穆塞托属下几乎所有的海盗船或是沉没，或是被焚，很多海盗被杀。他们还成功解救出被俘的比萨人。被锁链铐在海盗船上的基督教徒奴隶也获得解放，跟着凯旋的舰队一起回到了比萨，然后分别回自己的故国去了。

只有穆塞托辗转在撒丁的许多洞穴之间，没有被抓到也未被杀死。后来他逃到北非，总算躲过了比萨人的追捕。不过，穆塞托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海盗业绩大受打击，召集部下和寻找船主大概也都相当困难。这期间，他隐藏在博纳港的街区中，顽强地谋划东山再起。实际上他以后真的东山再起，还试图夺回撒丁，真是令比萨人头痛的对手。

诺曼人到来

中世纪指的是夹在古代与近代之间的时代。这个时代很长，名称听起来也颇具讽刺意味，前期和后期加起来有千年之久。除了时间长，这还是一个纷乱至极的时代。



诺曼人征服之前的意大利（11世纪）

研究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真令人同情。群雄割据是英雄们的争雄斗勇，而中世纪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玉”少“石”多，石子相互碰撞的时代。我总认为，即使是天纵英才也不可能系统地写出中世纪的历史！

不过，也会发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会有的开心事。有些历史现象我们只能认为是很少的人在很多方面撞上了好运，从而颠覆了历史。诺曼人的到来即是一例。

公元1016年，比萨人为追杀逃亡海盗穆塞托，眼睛都红了。这一年，意大利南部有一行40人的诺曼骑士来到了布里亚的加尔加诺山。加尔加诺山一直延伸到海边，这样的景致在海岸线平坦延绵的亚得里亚海难得一见。这些诺曼人从巴勒斯坦朝圣回来，顺道看看山里的一座奉献给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堂。

在中世纪前期，不论是地中海东部还是西部，进攻的伊斯兰势力和防守的基督教势力之间冲突不断。尽管如此，朝圣却一直在这样的战乱中持续着。进入11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东部确立了优势。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虽然对立，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用墙或其他什么隔开，从而使交流完全断绝。基督教国家意大利的海港城市一直在与东方或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进行着贸易就说明了这一点。虽说有危险的感觉，但朝圣者还是会冒着战火去巴勒斯坦，朝圣后再回故乡。

即使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女人也都可以从罗马去耶路撒冷，朝圣后再返回。距离再远也是国内旅行。可是进入中世纪后，朝圣就必须通过统治者不同、信仰不同的国度。如果不是强壮而惯于使用武器的男子，便无法走完从欧洲到中东的遥远路途。为参拜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堂来到加尔加诺山里的，都是些身强力壮的骑士，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也不足为奇。

这一年，布里亚的实力人物也逃进了加尔加诺山，他们强烈希望把拜占庭势力和撒拉森海盗统统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先是想驱逐拜占庭势力，失败后便被拜占庭士兵追捕而逃进山里。

这些意大利人向诺曼骑士提出，请他们来意大利南方，赶走拜占庭和撒拉森这两股势力之后，统治意大利南部。50年以后，发生了诺曼人征服英吉利的著名的“诺曼征服”事件。尽管这件事发生在“诺曼征服”的半个世纪之前，但进取的个性大约已在诺曼人中间萌生。从圣地归来的诺曼骑士接受了这份请求。但是，40个人太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回到故乡诺曼底后再带伙伴回来。布里亚的实力人物未提异议。



诺曼人征服后的欧洲（11世纪）

第二年的公元1017年，诺曼骑士如约而至，人数似乎从40人增加到了250人，准确数目不得而知。布里亚的意大利人也加入到这些诺曼人中间，他们首先着手从意大利南部扫除拜占庭势力。

从这一年开始到公元1019年的两年之间，双方进行了四次战斗。但参战人数如此之少，战斗还脱不出小打小闹的范畴。四次战斗的结果是诺曼—布里亚联军三胜，拜占庭军一胜。据说，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兵力因这四场战斗仅剩十分之一。诺曼骑士们的牺牲也很惨烈，人数由250人减至10

人。

靠这点儿人要把拜占庭势力和撒拉森势力从意大利南部赶出去，简直就是做梦。但诺曼人甚至超越了梦想，他们还要征服西西里。这种勇气称为蛮勇可能更为合适。处在上升阶段的民族的勇气真是难以揣度。但因只有10个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帮助遭到撒拉森海盗袭击的萨莱诺防卫，为基督教战士取得了高分。

诺曼人征服意大利南部花去了近20年的时间。他们得到了既厌恶拜占庭统治又厌恶身处撒拉森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人们明里暗里的合作。诺曼骑士中人才辈出，一旦有能力的武将战死，马上就有人顶上来。当初以10个人开始的征服行动于公元1037年基本结束，人们再也听不到清真寺宣礼塔上阿拉伯语的宣礼词了。

但是，西西里就在意大利南部近旁。只要西西里还属于伊斯兰，在意大利南部打拼出来的诺曼人的统治就远远谈不上稳固。不论是来到意大利的诺曼人，还是30年后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都没有回诺曼底家乡的想法，他们打定主意要在新天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公元1038年，诺曼人渡过隔开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的墨西拿海峡。第二年攻陷墨西拿。转年便很快逼到了西西里东部最大城市叙拉古的城墙脚下。但是，他们在这里受到挫折，只得渡过墨西拿海峡，撤回意大利南部。原因是此前西西里和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一直关系不睦，在得知西西里将要被基督教徒夺回之后，他们团结应战了。另一个原因是，已经处于诺曼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沿海城镇正在再次逐渐成为撒拉森海盗的饵食。所谓统治权，只有捍卫了治下人们的安全时才能维持。征服西西里只能推后了。

公元1061年，罗杰率领的诺曼骑士再次渡过墨西拿海峡，也只有150骑。新兴民族诺曼人的人口一定有所增加，他们5年后进行了“诺曼征服”。他们生长在北方海边的诺曼底，与遥远的南国相比，对一海之隔的英格兰自然更有亲近感。恐怕也是因为这种情况，来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依然很少。

就在这一年，罗杰的哥哥罗伯特·吉斯卡尔多迅疾前来与先行出发的罗杰汇合。他们二人率领的诺曼骑兵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还是分为两路，声东击西，击破了未能采取统一行动的伊斯兰势力。然而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不论如何勇猛，仅靠这150人征服西西里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征服行动缓慢但扎实地推进着。

公元1072年，诺曼人渡过墨西拿海峡10年之后，阿拉伯人统治的西西里

首都巴勒莫，在经过5个月的保卫战之后陷落了。5年之后的1077年，与巴勒莫一样居住着众多阿拉伯人的特拉帕尼陷落。公元1086年，叙拉古再度回到基督教徒之手。这个时期与征服者威廉在遥远的英格兰进行“诺曼征服”的时期正好重合。

结果，地中海世界的“诺曼征服”耗时25年。在这25年中，大概会有少量援兵从诺曼底前来。征服始于150人，也只花了短短的25年。想想伊斯兰势力从数千人开始，增加到数万的兵力，花了50年才征服了西西里，数百人花25年时间，耗时绝对算少。西西里版“诺曼征服”成功的原因可以列出以下几条。

第一，伊斯兰世界存在着围绕教义和统治权的内部抗争，这可以说已成惯例。西西里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关系不好。非但如此，西西里的阿拉伯人之间也并不团结。不能击退150个诺曼人，也是因为伊斯兰教徒之间屡屡发生内讧。

第二，由于统治西西里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实施所谓“伊斯兰的宽容”，许多基督教徒留在了西西里。

但是，这一点起初对诺曼人产生了不利影响。西西里人对阿拉伯人的统治还没有不满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他们不能信任不太了解且人数很少的北方汉子。尽管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也没有轻易表态。诺曼人不断取得胜利，才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这并非因为其他原因。要让观望的人站到自己方面，只有用胜利显示力量才行。总之，很多基督教徒留了下来，一定是“诺曼征服”在西西里成功的最大原因。

第三，比萨、热那亚这些拥有海军力量的基督教国家，从海上帮助了诺曼人。诺曼骑士再勇猛，也是陆上战斗力，他们很难完全称霸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是海港城市的西西里。这些深知制海权重要性的海洋国家，在军事方面给了诺曼人积极的支援。比萨甚至从海上向巴勒莫发起了攻击。

不论是比萨商人还是热那亚商人，都是阿拉伯统治下在巴勒莫开花结果的“贸易中心”的常客。但是，阿拉伯统治下的西西里虽然不往外派海盗，却让从北非北上的海盗停靠其港口。撒拉森海盗已经成为比萨和热那亚商船安全航行的最大障碍。西西里回到基督教世界，将为这两个海洋城邦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

就这样，西西里在时隔200年后又回归了基督教世界。诺曼人罗杰这位西西里的新统治者确定了比过去200年阿拉伯人“伊斯兰的宽容”更进一步的路线，推行对西西里的统治，打造了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共生共存的社会。这堪称“地中海的奇迹”。

不过，第一代西西里君王罗杰并不是一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人物。这不过是一个根据需要而产生的现实性政策。不论如何，诺曼人作为统治阶级人数还太少。而必须统治的居民则有在当时被置于二等公民地位的基督教徒和为数不少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

首先，罗杰既没有杀害失败者阿拉伯人的实力人物，也没有使他们沦为奴隶，而是把哥哥罗伯特·吉斯卡尔多统治的意大利南部内陆的土地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作为农庄主优裕地生活下去。当然，把内陆的土地交给他们，就使得他们不能方便地与北非伊斯兰教徒取得联系。

其次，罗杰把没了头领的阿拉伯士兵编入了自己指挥的诺曼—西西里军队。这些战后处理做得十分漂亮，实在值得现代的某些国家一学。

最后，罗杰自己搬进了巴勒莫“酋长”居住的宫殿。此时这里被称为“诺曼人的宫殿”（Palazzo dei Normanni），但观其内部，彻头彻尾的阿拉伯风格一目了然。让巴勒莫名闻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心”原样保留了下来。学者、商人、工匠、农庄经营者留了下来，连士兵也留了下来。清真寺甚至还回荡着宣礼词的声音。伊斯兰教徒并没有沦为二等公民。在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以更加理想的形式实现了地中海的奇迹。信仰不同神祇的人们相互尊重对方的信仰，共生共存的社会成为现实。

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世界，不容许基督教徒以外的人生存。在伊斯兰世界，虽然允许伊斯兰教徒以外的人们共存，但那是因为由伊斯兰教徒提供了保护，基督教徒必须持续支付“吉齐亚”，作为“保护费”或“生存容忍费”。基督教徒被禁止在教堂鸣钟，房屋被强制做上标记，还必须遵守路遇伊斯兰教徒须靠边让道的规定。

在这些现象很普遍的时代，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是名副其实的世外天地。我在想，罗杰和他手下的诺曼人能这样做，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来自欧洲北部，不像长年遭受撒拉森海盗危害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那样心怀宿怨呢？

心中怀有宿怨，就会总想着过去，从而看不到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这种宿怨所碍，才会站在古代被称为“恺撒的宽容”的立场上，实施宽容的统治政策。

基督教徒的思想和伊斯兰教徒的技能浑然融合的巴勒莫近郊蒙雷阿莱大教堂是“地中海的奇迹”的完美成果。

西西里诺曼王朝的创始人罗杰一世似乎是一位在人性方面相当有趣的人物。他甚至准备了一条礼船，把在叙拉古攻防战高潮中战死的阿拉伯人总

督的遗体送到他在北非的家人那里。

他自我满足的不仅是自己的这个骑士风度的举动。接受遗体的人当中有凯鲁万的“酋长”，罗杰没有浪费这一机会。他与这位名叫塔米尔的“酋长”缔结了可称之为互不侵犯的协定，以北非诸港为根据地的撒拉森海盗不再袭击西西里。

海盗一般不会遵守什么约定，但这次尽管不很情愿却遵守了这个协定，真是不可思议。你细想来，如今的西西里已经确实成为他们难以掠夺的土地了。

虽说已被基督教徒国王统治，但伊斯兰教徒在西西里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受到了重用。他们不用因为自己是居住在基督教世界的伊斯兰教徒而缴纳特别税。就连在王宫工作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一到每天5次的礼拜时间，就把屁股对着国王开始祈祷。

这样一来，就连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也找不到认定他们是“具有错误信仰的人”而大打圣战的大义了。

由于这样的原因，起初是诺曼人的国王们，接着是通过与诺曼人公主联姻而开始的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延绵了200年。这期间，这里再也没有成为圣战的战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者还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和对岸的北非，以保卫基督教徒免遭伊斯兰攻击为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更要敌视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建立了共存共荣的关系，尽管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创这一切的正是罗杰一世。

诺曼人国王罗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居住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外地方的基督教徒陷入困境，尽管具有同样的信仰，他也不会立即拿起宝剑前去参战。连逃到罗马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的教皇求救，他也没有理睬。

这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因为刚愎自用，滥用教皇权力，并不受好评。所谓“卡诺莎之行”（l'umiliazione di Canossa）是教皇与皇帝抗争的象征性事件，震撼了中世纪的欧洲。其中一方的主人公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开除了反对自己的皇帝亨利四世的教籍。开除教籍是对待世俗君主的强有力武器，它的力量在于身为基督教徒的家臣没有义务再追随被开除教籍的君主。

陷入困境的亨利在大雪满地的卡诺莎城外站了三天三夜，终于请教皇取消了开除教籍的处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描写成一个最大

限度发挥了教皇权力的人，被列入了圣人之列。然而，他的人生却并不顺利。亨利刚被取消开除教籍的处分就立即转为攻势，把教皇逼得十分窘迫。为了不落入皇帝手下的德意志士兵之手，教皇逃到了圣天使城堡。尽管身在远离抗争的西西里，罗杰对这些情况也许知道得一清二楚。

信仰相同宗教的人们之间内讧不绝，这不仅是伊斯兰教徒的拿手好戏，也是基督教徒的拿手好戏。我想，在内讧普遍的时代，仅仅是实现了异教徒之间的共生共存，就值得特书一笔。

不过，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不光是没有理睬教皇的请求，连对帮助他进攻巴勒莫的比萨也没有给予回报，可见他遵守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彻底的。但是，由比萨人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他们的自由。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

比萨曾经血红着双眼寻找的海盗穆塞托终于以北非的博纳港为根据地东山再起，又开始出没于撒丁岛的近海。此时的比萨已明确了成为海洋城邦国家的生存方针。这样，穆塞托就不再是单纯的复仇对象了。

放任海盗穆塞托，就等于允许其他众多的海盗横行。对穆塞托采取断然措施，就等于对整个撒拉森海盗采取断然措施。

一支舰队从比萨港出发南下第勒尼安海，直驶北非的博纳港，袭击穆塞托的根据地，掐住他的咽喉。

突袭作战以穆塞托一个人为目标，获得了成功。好强的比萨汉子对胆大无敌的海盗、当时已经84岁的穆塞托毫不留情，砍下了他的头颅。比萨从长年的噩梦中解放了出来。

这件事并不是一场单纯复仇剧的落幕。它让撒拉森人注意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成长。海盗们不得不明白，对手已经不再是“胆小的狗”了。西西里不再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这对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而言怎么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以后地中海世界的力量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拉丁语里有一个词“consul”（领事、执政官之意）。这个词在欧美各国语言中发音不同，但在日本不知为何是按照拉丁语发音，翻译成“执政官”的。古罗马从王政过渡到共和政体时，以前由国王一人处理的国政成为由两个执政官担当的工作，日语这样翻译是正确的。不过，执政官由皇帝兼任，共和政体时代的意义便淡薄了。这种现象在从共和政体过渡到帝政后也一直存在。

进入近代以后，“consul”这个词仍在使用，但意义与古代不同，变为“领事”之意，不再指国家政治、军事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而指以保护居住、常驻在国外的本国公民为己任的国家公务员。有些词语虽然词形没有变化，但意义发生了变化，“consul”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那么，是何时、为何而发生变化的呢？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始于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作为国家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古代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不同之处在于，拉动共和政体的罗马的“少数人”是在土地上拥有经济基础的元老院议员，而中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少数人”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这些人也一定懂得“consul”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刚开始时会在“少数人”中选出了一位有实力的人物来做“consul”。在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阿马尔菲，“consul”做的工作类似于首相。

可是不久，人们开始把派出去负责保护从事海外贸易的本国公民的人称为“console”（意大利语发音与consul类似）。既然决定贸易立国，保护海外经济权益的重要性必然上升。

“Consul”最早演变为“领事”意义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最早把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称为“总督”（doge），把海外通商基地的负责人称为“领事”（consul）也许与此并无抵牾。对把贸易作为主要产业的国家而言，与海外的关系是生死问题。这样一来，古代的“执政官”到了中世纪便成了“领事”。同时，“领事”还被赋予了一项“执政官”所没有的任务。

这项任务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intelligence”，即情报收集工作。

但这却并非是由于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才把这项工作交给领事的。保护在海外工作的本国国民自不必说，如果想积极开拓新的进出口产品，大量而且正确的情报不可或缺，收集情报的工作便很自然地受到重视。后来，威尼斯共和国甚至被认为是情报立国，并因此颇受后来自诩以情报立国的英国人的尊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贸易立国到情报立国极自然且身不由己的转变而已。记账如果不准确，店铺早晚得关门大吉。

海洋城邦国家都在北非主要港口设置了常驻领事。这件事改变的不仅是在当地工作的意大利商人的环境。北非“浴场”的情况终于传遍了欧洲，而不仅是意大利。世人终于知道了基督教徒被绑架到北非，投进被称作“浴场”的强制收容所，每有工作便被带出做奴隶的悲惨状况。

此前，地中海的北面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些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们的不幸状态。首先，有贸易商人带回的情报。其次，还有海盗船划桨手因海盗船被

基督教徒捕获而成为自由人，他们回到家乡后透露的情报。各教区祭司记录撒拉森海盗带来损害的信件也送给主教甚至教皇。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不幸人们的遭遇并非广为人知，因为他（她）们都是无名百姓。我们这样说的证据是，撒拉森海盗在8世纪、9世纪和10世纪连续制造了数量庞大的牺牲者，其中有名的人物只有一人。这就是在从法兰西赴罗马的途中遭到海盗袭击，被抢个精光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当时法兰西国王不仅派军队救出了这位院长及其一行，还把从圣特罗佩附近的撒拉森基地法尔西内特到海盗的老巢统统扫荡了一遍。因为受害者是重要人物，国王才出面干预。而如果是不知名的寻常百姓被掳走，不要说国王，就连“割据”的“群雄”也都会无动于衷。

我认为，所有受害者几乎是无名百姓，加之情报时断时续，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实情没有充分传到欧洲的原因。连续也是一种力量。海洋城邦国家的领事通常好像两三年轮换一次。但是由于任务重要，替换的人必定赴任。这样，他们得以向各自的国家传送连续的情报。

领事们热心收集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目的也在于拯救那些在航行中被抓或被海盗登陆绑架的本国公民。这已是领事最大的任务——保护本国公民的分内之事了，热心于此当属自然。

在寻求本国公民消息的过程中，虽为其他国家公民但同为基督教徒的不幸实情也越来越清楚。

在这些海洋城邦国家领事们送来的情报中，那些有关伊斯兰世界中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也极为自然地集中到了罗马教廷。为了生意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与伊斯兰教徒来往，但在宗教上他们仍是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悲惨遭遇这样多地传到了罗马，教皇再不积极，也会感觉到自己寻找失踪“羔羊”的“牧羊人”身份。公元1087年，时任教皇维克多三世号召建立以拯救可怜的基督教徒为目的的十字军。

他似乎从开始就没有指望欧洲的皇帝和国王们，“卡诺莎之行”以来教廷与他们一直关系险恶。他号召的是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

西西里王罗杰好像以诺曼人刚刚夺回西西里，尚无余力为由表示不参加行动。真实原因在于他与凯鲁万“酋长”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仅仅坦率成就不了外交。威尼斯共和国不参加的理由不为人知。但如前述，尽可能回避和本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是这个“海洋之都”一贯的国策。

不过，不独威尼斯不参与和本国无关的事务。10年之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大张旗鼓的展开，目标是进军巴勒斯坦，夺回圣地。人类也许是这样一种动物，对于没有强烈触及自己内心的事物，即使同情也不会积极地付诸行动。

响应教皇号召的都是认为这事与己有关的国家，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以及自认为基督教世界精神导师的罗马教廷。人们可以从派来军队的国家惊讶地看到11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崛起之势。当时，只能从大海上来的阿马尔菲自不必说，就连比萨、热那亚这些人口不多的国家，也已成长为这样的强国，一次战斗就能投入众多的战船和战士。

迄今为止一直在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增添色彩的是举着绿底白色月牙旗的伊斯兰势力，而从公元1000年到1100年的11世纪，在历史上是“基督教世界开始反击伊斯兰攻势”的世纪。从地中海世界的范围来看，担任这次“反击”带头人的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他们因为贸易关系而更加了解伊斯兰。

阿马尔菲、比萨，还有热那亚

公元1087年，响应罗马教皇的号召组建了十字军，据称集结了300艘战船，士兵包括船员在内有3 000人。这次的战斗力几乎是以往基督教各国海军力量的10倍。这次行动打出的旗号是拯救基督教徒奴隶，从而聚集了如此众多的船只和人员，不仅罗马、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等国直接参战，意大利半岛沿第勒尼安海一侧从南到北还有很多个人志愿加入战斗。

教皇的军队由罗马势力强大的豪族科隆纳家族的掌门人亲自指挥，还决定由一位主教代表教皇参战。十字军的意义在于军队由教皇亲自统帅。

热那亚共和国的军队由共和国议会选出的两名实力人物担任指挥。

阿马尔菲则由地位可敌共和国首相的潘塔列奥涅亲自出马。

参战战船数量最多的比萨也把指挥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作战专家西斯蒙第和维斯康蒂。

目标选在何处？他们将这无比重要的目标确定为北非伊斯兰世界地位最高的城市凯鲁万的外港马赫迪耶（Mahdia）。在突尼斯、博纳和阿尔及尔要拯救的奴隶人数更多，但他们把马赫迪耶、凯鲁万作为目标，应该是罗马教廷的意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撒拉森海盗执拗地把罗马作为目标，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罗马是基督教的中心。教廷也认为凯鲁万是北非伊斯兰教的中心，从而把凯鲁万的外港马赫迪耶当成了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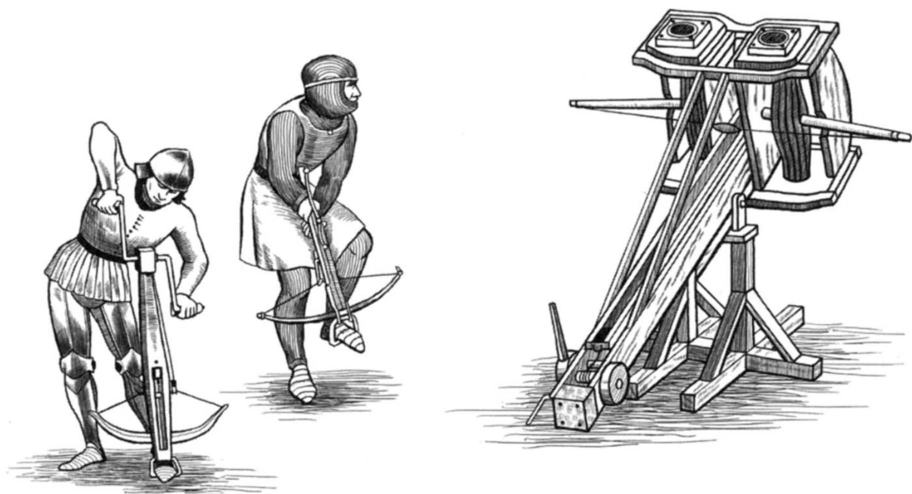
我们不知道这次战斗的集结地是哪里。我认为，军队大约是先从热那亚、比萨集结到位于教廷领土的主港奇维塔韦基亚，再从那里直指北非，在途中与阿马尔菲的海军会合。全军在位于西西里西南的马尔萨拉临时靠港之后，一鼓作气直奔潘泰莱里亚岛。

潘泰莱里亚是一座小岛，感觉就像是地中海的太阳和大海凝聚的一点。这个岛现在是意大利的著名观光地之一，当时属于伊斯兰世界。那里驻扎着守备队，但攻下此岛易如反掌。然而就在这时，潘泰莱里亚守备队长已把基督教舰队来袭的情况报告给了马赫迪耶的"酋长"。他用的是信鸽。在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联络方式中，使用信鸽传递情报相当普遍。得知基督教徒来袭的"酋长"用两道铁链封锁住马赫迪耶港的入口，严阵以待。基督教舰队通过先头的侦探得知此事后，便停止直接袭击港口，转而采取了在附近海滩登陆的战术。

凌晨，海上泛起鱼肚白，登陆作战正式开始。基督教舰队动员了所有军用帆船上的小艇以及一同前来的小型快艇（frigate），这些小型快艇相当于后世的护卫舰（fregate），在敌人发现赶来迎击之前，登陆就已结束。

基督教舰队只是模仿了撒拉森海盗拿手的登陆战法而已，不过人数更多。成功登陆的士兵分别在自己所属的教廷、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的旗帜下集合，高举大旗向马赫迪耶挺进。

他们一到城墙下就开始了进攻。他们好像并未携带攻城武器，用的只是弓箭、石块和绳梯，以及一种称为balestra的石弩。



石弩（balestra）和投石器（ballista）

伊斯兰士兵的传统是强于进攻而弱于防守。就这么一点儿兵器也使他们很快陷入了劣势。

防御的一方打开城门，放出豢养的狮群。但狮子并没有冲向拿着长矛杀过来的基督教军队，而是逃向了山野。就这样，经过几天称不上激烈的战斗，城门告破。

被伊斯兰教徒叫作“鲁米”的人洪水一般一举攻入城内。指挥官之间似乎事先已有分工，冲进城后分成了三路：一路冲向港口，放火焚烧停泊在那里的所有船只；一路直接去“浴场”解放基督教徒奴隶；而作为主力的一路则包围了“酋长”居住的宫殿。

马赫迪耶的“酋长”也叫塔米尔。他认为再抵抗下去已是徒劳，便提出媾和。请求被接受，作为教皇代言人参战的主教与伊斯兰“酋长”达成了媾和条件。

第一，塔米尔像以往一样继续拥有“酋长”的地位。

第二，拆除围绕马赫迪耶的城墙。

第三，不限马赫迪耶，释放塔米尔“酋长”统治的所有地方的奴隶，关闭“浴场”。

第四，以后严禁海盗行为。

第五，“酋长”向教廷支付10万第纳尔金币的赔款。

“酋长”答应了这些条件以后将基督教舰队送上归途。所有的船都满载着解开锁链的奴隶和占领期间抢来的金银财宝启航了。十字军出征以来速战速决，一个月结束战斗。他们好像忘记了要进攻凯鲁万，这与伊斯兰海盗的情况很相似，他们以罗马为目标却只满足于攻下外港奥斯提亚。

不过，解救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目的完全达到。归途中停靠了意大利南部的每一个港口，每次停靠都放下了原先的奴隶。迎接他们的亲人以为他们被绑架后早已死去，这时泪如雨下。十字军向罗马凯旋而去。沿途每个村镇的教堂都敲响欢迎的钟声，十字军带来了由衷的喜悦，他们受到欢迎理所当然。

还有令人愉快的事情。尽管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打着自己国家的旗帜正面进攻了北非，但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贸易商却依旧与北非的伊斯兰教

徒保持着通商关系。对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商人而言，与这些西欧人做生意所获取的利益不容忽视。

进口、出口的品目容后再叙，这里只提一句，意大利商人带到北非去的物产是伊斯兰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旦这些物品进不来，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将不再有船只、武器等质量较好的东西。也许只有贸易中的某一方认为自己有不可缺少的需求，相互间的通商才会超越诸多障碍进行下去。

的确，公元1087年拯救奴隶的战斗是成功结束了，但与“酋长”签订的媾和条约的所有条款，尤其是严禁海盗行为的第四款，以后能得到遵守吗？北非撒拉森人不能停止海盗行为的原因不仅在于抢夺他人财物不是恶行这一沙漠民族的传统想法，还在于他们只有这一条生路的社会现实。

威尼斯的海盗对策

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但其想法和一贯的做法却与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不同，让我们看一看威尼斯共和国的海盗对策。他们的做法不仅与其他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后来成为地中海世界主要国家的西班牙和法兰西。威尼斯人采取了当时特别怪异的海盗对策。

关于威尼斯共和国，我曾于27年前以“海洋之都的故事”为题写过两卷本的通史，从公认为其诞生年代的公元452年一直写到1797年被拿破仑灭亡。这部书的上卷第二章“走向大海”集中讲述了这个国家的海盗对策。我在这里只想做些摘录和简单的归纳。摘录是因为除了书中的写法以外至今还没有其他的写法。

“航海致富之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事贸易，另一条是以海盗为业。

“刚刚诞生的威尼斯共和国选择了第一条路。这样，他们最初的对手自然就是威胁威尼斯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盗。

“对已经决定走向大海的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就成为仅次于建国的国家规模的事业。

“在现代，亚得里亚海东岸被分割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如果我们驾船在这一带走一圈，就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入海口，数量很多，结构复杂。而亚得里亚海西岸意大利半岛长筒靴小腿肚部分，从威尼斯南下直到布林迪西，没有醒目的入海口，沿岸曲线柔缓，与东海岸形成对照，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地形一定适合于海盗。海盗躲在岛的背后，等哨兵报告的商船一靠近，就划着快船扑上去。遭到追赶时也不缺藏身之处。这样，海盗集中横行于亚得里亚海东岸而非西岸也就不难理解了。10世纪，斯拉夫民族的海盗乘拜占庭帝国衰落之际南下，出没于亚得里亚海。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威尼斯与东方贸易，除了穿过亚得里亚海别无他路。

“也许会有人问，既然海盗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蠢蠢欲动，为什么不避而沿西岸航行呢？撇开当时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形势不谈，只从气候方面看，走这条航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谈不上有利。

“与大洋长时间风向相同的信风不同，地中海以及属于地中海的亚得里亚海的特点是风向变化无常。在这样的海上，几乎不可能连续多日顺风扬帆航行，为等顺风不得不经常靠港。只因这一条理由就不得不沿海岸航行。西岸的海岸线平坦连绵，而东岸海岛重重，处处海湾，更可以避开逆风，等待顺风，具备绝对有利的航行条件。沿海岸的航行，对海盗合适的地形也对船员有利。

“因而，对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不单要击败海盗，保障本国船只航行安全，还涉及如何确保停靠港即基地的问题。公元1000年前后，一举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机到来了。一位年轻领袖准备周到，行动果断，点燃了导火索。”

威尼斯共和国展开了肃清海盗的战略。这个战略没有成为短期的“作战”，而是以“国家”的形式坚持下来，这里的原因在于威尼斯式的思维方式。

拥有众多小岛的海湾地形，其成因是山地延绵至海边，这样自然没有广阔的耕地。这在现代是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但中世纪还没有旅游业，这种地形意味着这里的居民缺乏维生的手段。威尼斯向这些不做海盗无以为生的人提供了活路。

船载着商品，带着中高级船员从威尼斯出发，然后立即转向亚得里亚海东岸，沿途不断靠港南下。在这些东岸港口停靠的目的不光是采购要在地中海食用的生鲜食粮，也是为了集中划桨手，他们是使用加莱船不可或缺的人力。即使是战舰做法也一样。速度对战舰很重要，即使不装货，战舰也比商船需要更多的划桨手。

可见，威尼斯船在驶出亚得里亚海之前并没有备足航海所需的人和物。威尼斯船只在到达亚得里亚海出口的科孚岛（克基拉岛）时，方才具备了航海的能力。各船以科孚岛为起点，向东方，向北非，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向

英吉利的南安普顿，各自向东西星散而去。

威尼斯一直采用这种做法，通过雇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划桨手，购买他们的农产品，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威尼斯称这些斯拉夫系的人为“斯基亚沃尼”（Schiavoni，斯拉夫人）。一直延绵到圣马可广场对面的码头也被取名为“斯拉夫人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他们不单是划桨手，在遇到海盗和敌船的时候，还是与威尼斯人船员一起奋起防卫的重要战士。这些“斯基亚沃尼”在拿破仑灭亡威尼斯共和国之前，一直与威尼斯共命运。

直到今天，在威尼斯的博物馆中还有厚厚布底上打满铁钉的划桨手专用的防箭防弹背心。考虑到划桨的方便，这些都是没有袖子的背心。

加莱船如果幸得风助，就可以靠帆航行，划桨手可以休息。划桨手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后世船上的发动机。在北非伊斯兰世界，这种“发动机”用的是基督教徒奴隶。但在基督教世界，使用抓来的伊斯兰教徒的例子并非全无，但屈指可数。理由很简单，因为绑架还不普遍，没有人来做这事。在西班牙，更多的是使用重刑犯做划桨手。

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使用本国人或雇用邻近国家的人做划桨手。但这些城邦国家缺少肥沃耕地，都是海洋国家，原来人口就比较少。如何确保划桨手一直困扰着他们。

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的兴衰顺序也是先兴先亡。威尼斯最后灭亡，我想其原因也是因为与其他任何海洋城邦国家相比，威尼斯成功地建立了组织体系，可以经常性地确保拥有忠实可靠的下级船员的缘故。这不是唯一原因，但至少是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世，威尼斯共和国的船，不论是商船还是战船都一直不用奴隶做划桨手。

不用奴隶做划桨手，在中世纪这个时代，就如同表明不做海盗。在热那亚人中，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的那样，也并非无人想挣快钱而从事海盗业。但这在威尼斯，却为国法所严禁。战船被允许装载一定数量的商品，在目的地做些生意。如果一个人想从零开始积累财富，不是有做战船战士的职业吗？我把这个职业看作威尼斯式的失败者复活系统。在威尼斯，不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别国人都不允许做海盗。

以上叙述了威尼斯共和国以海盗对策为主的思维方式。威尼斯不相信十字军的成果——“酋长”不做海盗的承诺，所以没有参加公元1087年的十字军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威尼斯没有参战，并非因为它与其他三个海洋城邦国家相比，是非常的利己主义者。威尼斯人以其现实主义已经参透，靠进攻伊斯兰世界，解救被俘的基督教徒奴隶，从“酋长”那里得到不做海盗的

承诺，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到20年，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变成了现实。

这20年间“休战”的原因不是因为北非撒拉森海盗尊重自己的“酋长”所做的承诺，而是因为地中海突然动乱。海盗不会袭击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只袭击比自己弱小的人。

“十字军”时代

十字军东征自11世纪末期开始持续了200年，我不拟在此详述。这是象征中世纪的重要现象，一旦详述，本书恐怕就不得不沿这条线索写下去。不过，我想从地中海的角度写一写这场运动。欧洲对中近东的远征仅大规模的就有7次。除了第一次、第二次是从陆上过去，其余都是乘船从地中海东去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碰巧遇到伊斯兰方面陷入窘境，只用了3年就成功“夺回圣地”。

之所以十字军东征迂回曲折却持续了两个世纪，是因为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海上补给发挥了作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地中海的东部。陆上战斗力主要由法兰西、德意志和英吉利提供，但意大利的海上支援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支援一词所能包括的范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096年8月出发，1099年7月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公元1099年，比萨以120艘规模的船队东进，抵达叙利亚、巴勒斯坦。

公元1100年，热那亚向叙利亚、巴勒斯坦派出150艘船。

公元1100年，威尼斯派遣了200艘的船队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第一次东征时虽然没有运送十字军士兵，但却运输了重型攻城武器、兵器武装和军粮等。当然运输不是白做的，报偿是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后，确保这几个国家在那里的通商基地。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主要港口都建起了通商基地。他们在建设基地时考虑了不使三个国家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但在这些竞争对手之间，争执还是屡屡发生。

公元1147年进行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要巩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夺回的圣地，那次东征并无明确的政略和战略。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不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这样的欧洲强国君主亲自参战，各率7万大军，在豪华铺张的朝圣后结束了东征。

同一时期，英吉利骑士采取了另外的行动。他们的路线是从英吉利出港后沿法兰西西岸南下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一气横渡地中海，直指巴勒斯坦。这些基督教战士身穿白底红十字的护胸衣，航行在地中海上，右舷依稀可见北非的港口城市。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多想被关押在那里“浴场”中的基督教徒所遭受的不幸。

公元1189年决定进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时阿拉伯民族与突厥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终于走向结束，伊斯兰势力团结一致，奋起夺回被基督教势力占领的地方。统一伊斯兰世界的不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萨拉丁这位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说起来并不属于伊斯兰世界，可见萨拉丁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

他能够再次统一伊斯兰世界，还因为他在公元1187年向基督教徒发起了“圣战”。萨拉丁出现后兴起了“圣地危急”的思潮，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即是受到这种思潮的裹挟。

绰号“红胡子”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率领德意志军队从陆路向东挺进。

在另一面，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率领法兰西军队来到热那亚，乘上热那亚船，通过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之间的墨西拿海峡，直奔巴勒斯坦。

英格兰国王查理也选择了从海路进军巴勒斯坦。抵达后他与萨拉丁打了一场漂亮仗，人们给他起了“狮心王”的绰号。他们先在马赛乘船，在热那亚、比萨、罗马、拿波里各港停靠后穿过墨西拿海峡进入地中海，又在克里特、塞浦路斯停靠后进入巴勒斯坦。十字军历史的英雄，一位是伊斯兰教的萨拉丁，一位是基督教的狮心王查理，这两人都不是顽冥的宗教狂热信徒，这一点非常有趣。浪漫的查理与冷血的腓力性格不合。英法两国国王之间关系不好，这在十字军内部也是出了名的。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大张旗鼓，国王亲自担任统帅，但却没有取得成果。倡导者罗马教皇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也属无奈。

这时，有一队德意志骑士从北海经过大西洋，沿法兰西西海岸南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他们横渡地中海后一路来到巴勒斯坦。地中海正逐渐成为北欧基督教徒去往东方的主要通道。

教皇英诺森三世不愿意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死去。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已得不到欧洲皇帝和国王的响应。发誓远征的是只有法兰德斯和法兰西的领主。这些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却不谙事理，甚至不懂得自己不遵守契约，对方也不会遵守的道理。所以，这次东征始终是中

世纪的经济动物威尼斯在为所欲为。关于这次十字军东征，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的第三章中有详细叙述，在此省略不表。如果详细叙述，作者就会像骑着难以驾驭的奔马一样，一旦过头就有远离正题的危险。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路线

公元1202年开始历时两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推翻了同为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帝国，以拉丁帝国取而代之。对基督教徒而言不应该这样。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件事把以往宗教热情背后隐藏的领土扩张的事实暴露无遗。这一事件在基督教世界评价糟糕，导演兼主演威尼斯共和国因此遭人忌恨。

公元1212年，出于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同的理由，被认为是“十字军之耻”的少年十字军试图进军圣地。受到狂热说教者煽动的少男少女成群结队地从欧洲各地聚集到马赛，他们受了恶劣船主的欺骗，不是被卖到北非当奴隶，就是在途中与沉没的船只共命运。

西西里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力二世在几度延期后，终于在1227年实现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腓力二世有诺曼和德意志的血统，生长于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共同组成的西西里，对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偏见。作为西西里的统治者，他要求北非伊斯兰“酋长”归还被绑架者，“归还没有改信伊斯兰教且愿意回到祖国的基督教徒”。他的观点是如果已经改信伊斯兰教且愿意继续住在伊斯兰地方，可以各随其愿。

他如此的做法使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率十字军东征也是无奈之举。不过，他从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出发以前，与埃及的哈里发多次互通书信，事先进行了磋商。

十字军在巴勒斯坦的阿卡登陆，然后挺进耶路撒冷，在那里与伊斯兰方面签订媾和协定，结束了东征。协定内容首先是将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这些基督教徒的圣地置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管辖之下。协定还写明，在全面保证基督教徒参拜、朝觐圣地的同时，也全面保证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同等权利。至此，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未流一滴血。

然而，虽然保证了基督教徒朝觐圣地的自由，但十字军对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却未开杀戒，这就是向敌人的妥协。以此为理由，这次东征在当时遭到了大合唱一般的谴责。巴勒斯坦的神职人员首先起来反对。罗马教皇已开除了腓力的教籍，并号召倒皇派进攻腓力的领地意大利南部。腓力不得不紧急赶回意大利，此后腓力一直被称为“基督的敌人”。未流一滴血实现的与伊斯兰方面的协定也只维持了10年。

在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世界，像腓力这样公开声言并做如下事情的人，会被当作异己分子遭到敌视。

这是皇帝逗留耶路撒冷期间的一个插曲。一天清晨，皇帝向耶路撒冷统治者伊斯兰的高官问道：为什么昨天没有听到宣礼的声音？伊斯兰高官回答道：基督教世界的俗界最高统治者来访，我们不想失礼。于是腓力说道：“如果这样，在你们访问基督教世界时，我们不是不能敲响教堂的钟声了吗？”

公元1248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率领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这时腓力二世尚未去世。路易九世与“基督的敌人”完全相反，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的浪漫主义者。他认为，要把受伊斯兰压迫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有效的办法是进攻埃及的哈里发。于是他率领军队从马赛出发进军埃及。这个见解本身并不错误。但十字军登陆埃及后只有初战告捷，以后连遭败绩，不但大量骑士战死沙场，国王自己最后也成为伊斯兰的俘虏。留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全体动员，募集赎金，这才赎回了国王的自由之身。国王随即从海路返回法兰西，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于公元1254年结束。

公元1270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再次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七次东征。不过这次的登陆地点选在了突尼斯。我准备在写到13世纪后半期时再对此详细叙述。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以路易去世而告终。这是最后一次打着夺回圣地旗号的十字军东征。

20年后的公元1291年，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的最后堡垒阿卡陷落，长达200

年的十字军时代落下了帷幕。照伊斯兰方面的说法，十字军东征是以伊斯兰方面“把最后一名十字军士兵赶下地中海”而告结束的。

但是，这200年间，参加十字军的基督教徒没有一个人说起要解救被抓到北非的基督教徒，这真不可思议。不，有一个人要除外，那就是一直被谴责为“基督的敌人”的腓力二世。

十字军以“上帝所愿”（Deus lo vult）的雄壮怒吼开始并结束。上帝“所愿”的大概是要夺回如今已归伊斯兰世界的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这些“圣地”。至少中世纪的多数基督教徒对此坚信不疑。北非与巴勒斯坦一样，同为伊斯兰世界，在此被迫为奴、痛苦不堪的人们却不值得“夺回”。教皇允准赦免前去夺回圣地的基督教徒过去的一切罪过，但却没有给予9年前毅然前往突尼斯的马赫迪耶拯救基督教徒并凯旋的人们如此的褒奖。拯救不幸的基督教徒，只有等到以拯救为目的的组织诞生的那一天。这与是否赦免罪过并无关系。

当然，遭到撒拉森海盗掠夺绑架的是居住在法兰西和意大利靠近地中海的人们。而十字军是由并不靠近地中海的北欧人所组建。在情报传递很少的时代，地中海海盗大概并不为北欧所知。但问题可能并不止于此。

人不论是好是坏，对远离现实的事物内心更感狂热，更会心动。中世纪的人信仰狂热，才会发起十字军。但信仰心之所向必须是圣地。正是因为要夺回圣地，才会发展成有那么多人参加的、延续那么久的群众运动。如果以拯救被绑架的不幸的人们为号召，那十字军即便可以得逞一时，也不能持久。我想，这不正是欧洲历史上地中海海盗持续千年的现象并未受到重视的原因吗？

“先下手为强”

十字军各国的船只在地中海穿梭如织，但这里的海盗却远未销声匿迹。

在大约20年左右的短时间内，他们老实了。这20年间，进军巴勒斯坦的船只，船上的全副武装的骑士，都对北非毫不关心。这20年撒拉森海盗就在得过且过之中度过了。我们不能忘记，不做海盗便无以为生是北非伊斯兰世界的特性。在港口城市，海盗要向那里的统治者“酋长”上缴海盗收益五分之一的做法还在延续。

但是撒拉森海盗捞钱的地方确实也在不断缩小。

首先，不能再去袭击靠得最近的西西里了。诺曼的国王们以及后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与凯鲁万的“酋长”之间有互不侵犯协定。即使在基督教与伊斯

兰在巴勒斯坦相互敌对的十字军时代，这些协定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关系不是强势的一方在压迫弱势的一方，而是双方都在不断寻求不伤体面的妥协。

公元111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成功夺回圣地，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基督教国家。载着前往巴勒斯坦的本笃派修士的船只，遭到了撒拉森海盗的袭击，修士做了俘虏。海盗船在把他们连人带船拖回北非的途中遭到了强风袭击，漂流到了西西里。

当时的西西里国王罗杰既不想与因十字军而狂热的基督教世界背道而驰，也不想破坏与北非“酋长”的良好关系。

于是他居间调停。被抓的修士恢复了自由，再度乘船，继续前往巴勒斯坦。撒拉森海盗也未被投进监狱，而是被送回了北非。

不过，这位西西里王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妥协。他派出军船和士兵占领了伊斯兰领土马耳他岛。北非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被称为“西西里海峡”。他向对岸的伊斯兰教徒显示了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名称。

西西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关系，进入腓力二世的时代以后，也适用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这两个地方。撒拉森海盗的活动范围越发狭窄。

然而，在同一个时代，比萨、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却以完全不同的办法对付海盗。

第一，这些国家拥有可以随时出港的百艘战舰规模的海军力量。

第二，这些国家长期在海上支援十字军，从而在东方各地拥有通商基地，使得东方贸易的收益远大于北非贸易。换言之，即使与北非伊斯兰教徒打起来也不怕。

第三，比萨人具有争强好胜的托斯卡纳气质，热那亚人也好似个人主义者的集合体。他们的性格不是挨打后再还手，而是先下手为强。他们不是防御来袭的敌人，而是在遭袭前主动发起攻击。

他们的自信不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船只的数量，而是来自操纵船只的能力。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全面发挥，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才会如此繁荣昌盛。不久以后，伊斯兰海盗头目中也开始出现少年时被海盗掳走，在伊斯兰地方成长起来的意大利人。在著名的海盗头目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令人瞩目。我甚至认为操纵船只的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这样，在海上遭遇时，逃跑的只会是撒拉森人。

居住在东方的阿拉伯人在航海方面技高一筹。这个时代，从红海到印度洋，阿拉伯水手自由自在地航行在大海之上。撒拉森人应该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我以为，在中世纪后期，对出没于地中海西部的海盗而言，“撒拉森人”，只不过是一个名头，实际上他们是柏柏尔人和摩尔人。

驾船能力确有差距。此外，撒丁、科西嘉事实上都已成为比萨或热那亚的领土。海盗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登岛藏身了。可停靠的港口越少，对于擅长于小船、小规模船队的撒拉森海盗就越不利。这一点不可忽视。

第四，与威尼斯不同，比萨和热那亚的办法与撒拉森海盗一样，但却没有丝毫犹豫。

在海上遭遇海盗与之交战，打赢了连船一起夺走，威尼斯也会这样做，但比萨和热那亚的船会进而攻击海盗根据地，打进这些港口城市后，对抵抗者格杀勿论，掠夺金银财宝，然后返航。

比萨大教堂以比萨斜塔而闻名。教堂展现了意大利哥特式建筑的精粹，美轮美奂。比萨共和国投入了贸易利润，建起需要如此高难度技术和大量金钱的教堂和高塔。从海盗那里抢来的收益也成为建设费的一部分。想到这一点，人们观赏比萨斜塔时也会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尽管比萨、热那亚都会把抓到的海盗吊在桅杆上，把能抢的东西都抢走，但他们不会绑架那里的老百姓。事实上，不论是比萨还是热那亚，不，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北非主要港口城市必有的“浴场”，没有绑架异教徒充作奴隶劳作的社会体系。虽然比萨、热那亚都模仿海盗与撒拉森人打仗，但他们毕竟是贸易立国，而不是海盗立国。

不过，对比萨和热那亚而言，地中海中央的第勒尼安海是本国商船去任何地方的必经海域。能否确保这片海域的航行安全，甚至决定这两个国家的命运。12世纪，以靠近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为根据地的海盗就像在自家院子里一般，横行于这片海域。他们也是伊斯兰海盗，但根据地不在北非。他们威胁商船的安全，增加了法兰西南部沿海、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和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沿海成为海盗盘中餐的可能性。为了切断危害的源头，法兰西南部领主与热那亚和比萨组建了联合舰队，要肃清以马略卡岛为中心的巴利阿里群岛所有岛屿上的海盗。

承担主要战斗的比萨在此一战中投入了300艘船和4万名战士。船只是比萨自己的，4万士兵是从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志愿前来的，人们对这场战役有着共同的目的。对苦于伊斯兰海盗的人来说，与其不远万里去巴勒斯坦与伊斯兰教徒作战，不如与眼前的海盗打仗更为重要。人们把他们称

作“西方十字军”。

“西方十字军”大获成功。海盗被歼灭，许多基督教徒奴隶从马略卡岛上的“浴场”里被释放出来，乘上比萨的船回到故乡。

但不论比萨还是热那亚都是城邦国家。与领土型国家不同，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国家人口很少。人口较多的威尼斯也才10万人，而热那亚和比萨都未超过5万人。他们开始把主力投入与东方的贸易之中，没有足够的人手使巴利阿里群岛完全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后来不久，巴利阿里群岛再次沦为海盗的巢穴。对比萨和热那亚的海军来说，到处追击海盗的辛劳永无尽头。

如果当时比萨和热那亚，再加上威尼斯联手合力对付撒拉森海盗，谁都会认为很快就会把海盗赶出西地中海。但是，这些海洋城邦国家之间是竞争关系。现代意大利海军军旗图案把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旗帜叠合在一起，这在学习意大利海军史的人们中间成为笑谈。我想在此做一介绍。

在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意识高涨的时代，意大利人是地中海的统治者。而四面旗帜结合在一起的今天，美国和俄罗斯统治着地中海。竞争意识有时会发挥正面作用，但也会产生很多的负面作用。关于意大利的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上卷第六章“竞争对手·热那亚”中有过集中叙述，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13世纪进入后半叶，地中海西部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公元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也是西西里王的腓力二世去世，他曾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统一起来。继承他的是嫡子和庶子两人，但他们未能打破因腓力之死而气势大涨的罗马教皇及其一派的攻势。持续了200年的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于公元1266年崩溃了。

新统治者是法兰西国王的弟弟、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安茹家族的查理。但这位法兰西人的统治遭到西西里人的深恶痛绝，不到20年就被“西西里晚祷”起义赶下台，歌剧《西西里晚祷》就是以这场起义为背景的。后来统治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是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在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发生了巨变。

安茹和阿拉贡是顽固的基督教徒，他们得到了深恐腓力二世反教会路线的罗马教廷的支持。大约在这个时期，巴勒莫和其他城市的清真寺消失了。在出入王宫的官员中看不到裹着头巾的身影，在直属于国王的军队中，也不再混有伊斯兰教徒了。

堪称西西里—阿拉伯式样结晶的蒙雷阿莱大教堂，以及其他众多的建筑没有受到破坏，这些建筑已经成为西西里自身的一部分。狂热的基督教徒虽然厌恶伊斯兰，却没有破坏这些建筑。

也没有发生强迫西西里人中的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情形。也许是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生共存的社会已存在了200年，伊斯兰教徒也发生了改变，没有多大抵触就改信了基督教。这就像人们已经忘却了柠檬和橙子原来都是阿拉伯人移植过来的一样。也许信仰深刻、抵触改教的伊斯兰教徒都已经回北非去了。总之，西西里内部变化平稳，没有引起其他地方的注意。

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却不安稳了。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邻居如今一变而成了敌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已经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又开始受到撒拉森海盗袭击的威胁。

就在同一时期，突尼斯“酋长”登上了公元670年建都60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北非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的凯鲁万“埃米尔”的宝座。突尼斯是撒拉森海盗的最大基地，这在当时无人不晓。这就如同海盗的最大头目当上了一个国家的正式统治者。

公元1270年进行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后的十字军

20年前在埃及大败，手下大量骑士被杀，后来又被长期囚禁在伊斯兰地方，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让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接受教训。他宣誓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七次东征。

路易似乎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好人，但他的亲弟弟查理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知道查理是怎样说服哥哥的，他让哥哥把第七次东征的目的地改为北非的突尼斯，不是基督教徒水深火热的巴勒斯坦，也不是可以一雪前耻的埃及。已是西西里王的查理自己也承诺率领属下军队与哥哥会合。

7月初，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从位于马赛的艾格莫尔特出发，阵容豪华，所率领的骑兵堪称中世纪骑士之精华。

法兰西国王和两个王子、英格兰王子、纳瓦拉国王，率领大军。他们全部由王妃相伴。阳光下，这些高贵之人的随从骑士甲胄枪剑闪闪发光，簇拥着王妃的宫女身着五颜六色的华丽服装，流光溢彩。这简直就是有闲阶级的观光旅行，连海上的暴风雨也都敬而远之。

十字军避开暴风雨，在撒丁岛南端靠港之后南下，直指突尼斯。7月17日，他们不知为何在古老港口迦太基附近登陆了。

迦太基是整个古代北非物产的集散地，繁荣兴旺，但在伊斯兰统治之下，由于集散中心转移到了突尼斯，迦太基成为废都，被沙漠所包围，看不到一丝古代荣华的残影。路易一行就在这片沙漠上登陆，就地宿营，等待查理的军队。他准备与弟弟会合之后，全军进攻突尼斯。

不知是讨厌浪费时间，还是久违地踏上伊斯兰之地而燃起对基督教的信仰，法兰西国王路易给突尼斯“酋长”写去了一封信。

“如果阁下打算改信基督教，敝方备有为你做洗礼之人。敝人将带领10万士兵前去寻找阁下。”

突尼斯“酋长”的回信很快到达。

“敝人决定请阁下在战场上做洗礼。如果阁下的军队前来进攻突尼斯，敝方将杀死身在敝处‘浴场’的全体基督教徒。”

路易九世没有料到对方会如此应对，难掩困惑。他向西西里派出快船催促弟弟查理尽快出兵，同时催促他送来水和粮食。

但查理刚刚当上西西里王。西西里人对新王并无好感，不但征兵困难，就连水和粮食的采购也不尽人意。

在盛夏的太阳暴晒之下，这支不知人数几何的军队缺水少食，宿不择地。路易军队的状况逐日恶化，瘟疫开始流行。

进入8月，没能践约的查理得知路易卧病的消息。

查理加快了士兵的招募和补给物资的采购。查理和他的军队从西西里西岸特拉帕尼的港口出发，到迦太基登陆时已经是8月25日。



十字军远征时去世的法兰西国王路易

没有人前来迎接查理。查理直奔路易的帐篷，但他看到的是哥哥刚刚断气的遗体。

在恶劣环境下病倒的不止国王一人。作为教皇代言人同行的主教和路易的一个儿子特里斯坦也丧了命。另一位王子菲利普则卧病不起。

生前被尊为广受尊敬的圣人死后，遗体要立即解剖，心脏要放在罐子里保存，留下骨头，身体的其他部分火化。这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习惯。这个习惯于公元1300年被罗马教皇废止。但路易死于1270年，就连亲弟弟查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的遗体被肢解。

有人报告，伊斯兰军队从突尼斯奔杀而来。查理急忙集合能打仗的士兵布阵迎敌。

伊斯兰军队与基督教军队激烈交锋，虽然各种不利情况接踵而来，战斗还是以基督教方的胜利告终。不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两军面对面的会战都不是北非伊斯兰教徒的强项。这时，突尼斯“酋长”看到眼前的失败惊慌失措，急忙求和，条件只有一个，不要进入突尼斯城。作为代价，他将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基督教方面的西西里王查理、父亲去世后刚刚当上法兰西国王的菲利普，以及纳瓦拉国王特奥巴尔多三人与突尼斯“酋长”签署了协定。英格兰王子爱德华拒绝签字，这并不是因为他忠于十字军精神，而是因为只有他在分配战利品时被排除在外。

媾和的内容如下：

1.突尼斯“酋长”向国王们支付21万盎司金条。

2.今后5年，每年向西西里王支付30万枚拜占庭金币。

3.坚决承诺不向基督教徒居住之地进行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一切攻击。

4.立即释放被收容在“浴场”里的全体基督教徒奴隶。

11月20日，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带着被解放的奴隶，离开旧迦太基。

时间已到11月下旬，地中海南部也完全进入了冬天。商船、渔船都已停止出海。然而，十字军的首脑中并无一人熟悉大海。

船队在接近西西里的特拉帕尼港时遭遇了冬季风暴，立即就有18艘船在前来迎接的人们眼前被海浪吞没。船上乘坐的4 000人与马匹武器一起葬身海底。

特拉帕尼居民动员了所有渔船、小艇前往救援即将沉没的船只，救起被船

上抛下来的人，据说救援一直持续到天黑。

西西里王查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纳瓦拉国王和英格兰王子，还有路易九世和菲利普的王妃、路易的女儿纳瓦拉王妃都被救起，得以生还。

这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人待身体恢复到能够长途旅行时都纷纷出发返回故乡。出发以前，国王们参拜了特拉帕尼教堂，庄严起誓，相约4年后的公元1274年7月22日，共同参加为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圣公墓教堂而组建的十字军。然而，到了那年那天，没有一位国王信守这个誓言。

回到西西里以后，在突尼斯染上瘟疫的人不断死亡。12月4日，纳瓦拉国王和王妃去世。纳瓦拉国王夫妇的遗体与从北非运回的路易九世的遗骨以及死于伊斯兰之地的王子特里斯坦的遗体一道，被葬于蒙雷阿莱大教堂。西西里王查理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参加了葬礼。所葬的遗骨和遗体都不完整。

法兰西国王菲利普护送父亲路易和弟弟特里斯坦的遗体回法兰西。他不想再尝海上风暴的滋味，归途选择了沿意大利半岛北上的陆路。途中，已有身孕的王妃从马上跌落而死。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不得不随着三具遗体回国。

抵达巴黎后，法兰西为路易九世举行了国葬。国王的心脏装在罐子里，一路风尘，此时终于被安葬在巴黎圣母院。

路易九世死后27年的公元1297年，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将他列为圣人。因此，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在历史上被称为“法兰西的圣路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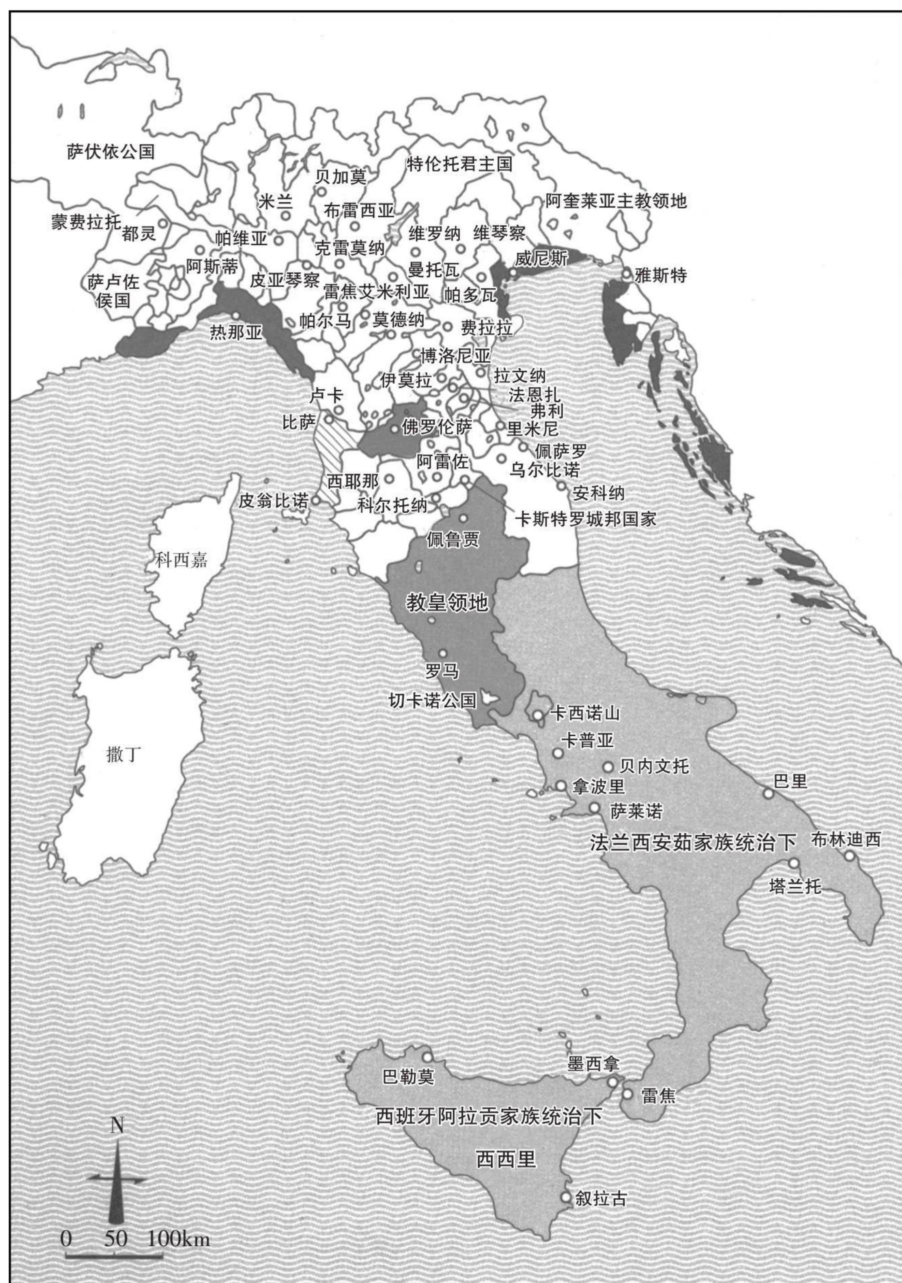
罗马市中心有众多的教堂，其中一座的游客一定多于其他教堂。游客是为欣赏米开朗琪罗的杰作而来。现代的游客又有几人知道这座教堂是献给路易九世的呢？教堂进门后的左侧立着一尊全身雕像，身穿十字军铠甲，浪漫得如同梦境。人们来到这里欣赏把人类的真实嵌入画景的米开朗琪罗的画作，无关乎这里是做礼拜的地方。游客中可有人注意到圣路易吗？

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进军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时代终结于公元1291年。可是打着“圣战”旗号的海盗行为，却完全没有结束。十字军进攻了北非的海盗基地，从“浴场”救出不幸的人们，并让“酋长”誓言禁止海盗行径，但誓言没有得到遵守。

进入14世纪以后，十字军的狂热成为过去。与此同时，意大利半岛也发生了巨变。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种被称为“城镇”（comune）的自治体

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城镇”的主人是在土地上没有经济基础，只能把自己的头脑和手脚当作武器的城市市民。这些都是小型城邦国家，但却在面向下一个世纪的重组过程中，萌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拉下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帷幕。萌生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巴勒莫的文艺复兴，将在逐渐成为金融圣地的佛罗伦萨开花结果。接力棒由皇帝交到了商人手中。

在意大利北部开始剧烈变动的同时，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仍然维持着封建制，拥有土地的人是社会的实力人物。不论对法兰西系的安茹王族而言，还是对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而言，考虑到自己占据的最高宝座的安泰，持续维持这个制度将会好处多多。意大利南部与城镇自治体和城邦国家没有关系。



14世纪的意大利（城镇割据的世纪）



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合并的世纪）

意大利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之首的阿马尔菲也成为这个变化时代的牺牲者，它衰退了。经济常常为商人所左右。土地所有者很少承担风险。如果听命于土地所有者，人们就无法发挥从事高风险事业时才会有的才能。无论在意大利南部还是在西西里，一直都有海港城市。然而在阿马尔菲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极走向海外这个意义上的海洋城市。

意大利的经济人

在这种形势之下，地中海北部与南部的对立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基督教世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入了协定时代。

但北方的船只与南方的船只在地中海上完全不是友好地相向而过。从北面而来的是商船，自南面而来的是海盗船。以往，海盗是在防御薄弱的地方登陆，绑架居民，现在情况也不同了。

由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带头，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缔结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

比萨共和国最早开始走这条路线。早在12世纪中叶，比萨就向突尼斯的“酋长”派出特使，缔结了协定。12世纪是十字军的鼎盛时期，他们的真实意图在于尽量减少比萨船向巴勒斯坦运输人与物的航海障碍。

不过，如果把真实意图表露无遗，就建立不了外交关系。于是，比萨以在靠近北非沿岸的岛屿采集珊瑚为由，让“酋长”同意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附近的港口贝贾亚开辟了两处比萨人居留区。在突尼斯，比萨还以保护居留区内比萨市民为由，取得了常驻领事的权力。领事隐蔽的任务，当然是收集包括海盗在内所有领域的情报。

13世纪以后，这种协定较前相比留下了更多的记载。

公元1230年，比萨与突尼斯“酋长”之间缔结了30年有效的协定，协定中载明了如下事项：

1.保证比萨市民及他们所运物资的安全以及在北非全境陆上和海上的贸易自由。

2.比萨市民有权在他们的商馆（fondaco）住宿并将商馆作为贸易基地。

3.确保常驻北非的比萨市民有一个教堂和一块墓地，以备不幸死亡时下葬之用。

4.只赋予比萨市民以进出口双重特权。

得知比萨缔结了这个协定，热那亚立即于当年向北非派出特使，与“酋长”缔结了几乎同样内容的协定。

第二年的公元1231年，一直与伊斯兰世界关系良好的西西里王腓力二世也重签了每15年须更新一次的协定。我们无从知晓这已是第几次更新。这个协定的内容也是让“酋长”承认西西里人的安全和贸易自由。当时西西里与北非之间已有互派使节的关系，西西里又不以贸易立国，所以协定中没有言及领事和专用商馆。至于教堂，也许腓力二世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逆反儿认为根本用不着。

公元1236年，热那亚再次与突尼斯“酋长”更新了协定。6年前签订的协定尚在有效期内，只是在细节上重新斟酌，使之更加有利于本国。1250年，对协议内容再作修改后，双方又重签了协定。

公元1251年，威尼斯共和国已加入了这个市场。起步虽晚，但这是一个做事彻底的国家。以总督代表的资格派来的特使从突尼斯“酋长”那里得到了以下各项保证：

1.保证威尼斯共和国公民及与威尼斯有合作关系地方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

2.保证领事的常驻及延续。

3.保证威尼斯公民专用商馆的设立及延续。

4.以上权利不限于突尼斯，还适用于北非全境的海港城市和内陆城市。

第二年的公元125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也加入了这个市场。以前佛罗伦萨商人一直通过比萨进行贸易，现在也出来独立开拓市场了。当时佛罗伦萨的经济已经进入兴盛期，走向海外是这种情况自然的反映。佛罗伦萨与北非协定的内容和比萨与北非所签的基本相同。在此期间，比萨已数次更新了协定。

公元1265年。在长期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开始向南进攻。西班牙的“阿拉贡、马略卡、巴伦西亚及巴塞罗那之王”出面与突尼斯“酋长”缔结了协定，内容如下：

1.承认西班牙商人在突尼斯港口的通商权。

2.节制突尼斯“酋长”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对西班牙基督教徒统治地区的海盗行动。

3.保证西班牙在突尼斯建立商馆和教堂的自由。

令人欣慰的是下面这些条款。

“如果被突尼斯追赶的其他基督教国家的船只逃进阿拉贡国王领地的港口，保证领地公民不向该船提供任何帮助。”

要而言之，只要不是西班牙船只，你们尽可对其采取海盗行动。

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还有腓力的西西里在与伊斯兰缔结的协定中所要求的都是本国公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其他国家的公民与我无关，不像西班牙国王那么露骨。不知什么原因，西班牙国王与“酋长”之间的协定，却有不少地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公元1323年更新的协定中，又增加了下面一项条款。

“海盗造成的损害，两国均须于3个月内申报。逾期不承担补偿义务。

“双方明确申明，即使领地公民被绑架或实施绑架之海盗被捕获，均不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这就是说，即使国民被绑架也与国家间的外交没有关系。

总之，不论是十字军时代，还是因基督教方面的败退使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在地中海世界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携手合作，一直保持着关系。各国与“酋长”之间的协定直到15世纪中叶，还在切实地持续更新着。

海盗为什么能够延续，前面各处对这个问题已有所叙述。基督教世界的商人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维持贸易关系，又是为了追求什么呢？

贸易商品

有出售的商品，还要有购买的商品，才能建立起贸易关系。并非只有威尼斯共和国才是中世纪的经济动物。比萨、热那亚、佛罗伦萨也是经济动物，虽然不像威尼斯那样彻头彻尾。

他们销往北非的商品虽因国家而异，但有下面一些相同名目。

木材，尤其是造船用的木材。中世纪的北非不但经常缺乏木材，也没有技术制作桅杆、桨和必须具有微妙曲线的造船建材，进口这些成品对北非更为合理。

布料，其中出口量较大的是帆布。帆，要求质地牢而轻。意大利的城镇和城邦国家制造的帆布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华丽的高级纺织品也用于出口。伊斯兰世界的上流人物也喜好华美的服饰，这与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的上流人物并无二致。

武器装备。以半月刀为代表的武器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北非自己即可制造。而盔甲这样的武器装备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使用者的身体，要求结实轻便。这就需要能够制作薄而坚韧的钢铁片材的技术，意大利城邦国家拥有这种技术。可以说从事金融和手工业的人是构成意大利城邦国家的两大平民阶层。

工艺品。伊斯兰世界的东方明显受到波斯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拥有生产高超完美工艺品的技术。但是，东方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而北非却地处边缘。居住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人们自然不是波斯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也不再是阿拉伯人。北非伊斯兰教徒大半是身处罗马文明圈外的沙漠之民柏柏尔人，以及虽属罗马帝国之民但却总在圈外的摩尔人。这些人意欲购买意大利人运来的、自己不会做的意大利工艺品。

我们在此不讨论有关意大利人本质上所具有的美感，具有美感且有益的东西没有一定的量也不能成为贸易商品。意大利的城镇和城邦国家的市民在企业化生产以及产品的量产化方面，不仅在地中海世界，在北欧也是出类拔萃的。

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自己却已遗忘，阿拉伯商人看到了它的作用，将它带到中近东。在沙漠上行走与在大海上航行的情形相似。

阿马尔菲商人通过阿拉伯人知道了指南针，他们最早把指南针改造为小型便携的罗盘出售。便携式罗盘转眼间便在意大利各地批量生产，不但意大利水手使用，还卖给阿拉伯人，这种做法令人佩服。

纸、玻璃和印刷术也都不是威尼斯人所发明，但却是在威尼斯投入了企业化生产。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后不到20年，威尼斯人便挺进出版业。又过了30年，威尼斯成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王国。

较之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在书写的时候不易写错，还有“零”的概念。比萨商人把阿拉伯数字带入欧洲。这种方便的数字很快风靡整个意大利，甚至有的威尼斯学校也用阿拉伯数字教育儿童。阿拉伯数字普及以后，在比萨去佛罗伦萨途中的城市普拉托，有一位商人发明了簿记，即刻受到威尼斯人的注意。他们不但引进了簿记，还完善成为复式簿记。采用复式簿记以后，商人们第一次得以全面掌握遍布各地的市场网络。簿记对经济发展

所做的贡献不言而喻。

如今谁都不会怀疑航海不能缺少海图。海图也不是意大利人的发明。但是，是比萨的水手首先画出了更准确、更细致、一张纸上包含更多信息的海图。比萨败给竞争对手热那亚，退出海洋城邦国家之后，威尼斯使这一技术企业化，绽放出更绚丽的花朵。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近世，船员们没有威尼斯制的海图便不会出海。地图和海图是准确把握整体以及局部情况的最佳手段。

一叶知秋，意大利出口到北非的物资相当丰富。其中有若干在现代完全属于禁止出口的商品，当时罗马教皇也因为其有利于伊斯兰教徒而发出禁令，不准出口。不过，从不断发出这种禁令的情况来看，中世纪的经济动物把禁令当作了耳旁风。

那么，他们又从北非伊斯兰教徒那里采购了什么呢？

小麦和橄榄油，野兽的毛皮和椰枣。这些是当时北非的主要产品，只有这些可以出售。

然而如果这样，不懂经济的人也会说，意大利方面肯定会贸易顺差。如果贸易如此不均衡，既没有必要设置领事，也没有必要建立商馆。又是派驻领事，又是运营商馆，甚至还要维持居住区，意大利商人一定另有企图。

不错，他们的确另有目的，还不止一个。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很早就有了海洋法。在这方面，阿马尔菲是先驱者。阿马尔菲在11世纪就制定了通称为“阿马尔菲公文”（Tabura Amalfa）的文件，今天还能在相当程度上了解这个文件的内容。

留有文字记录的第二名是诺曼王朝的西西里，一般认为文件制定于罗杰二世时代，也就是12世纪前半叶。

第三名是威尼斯共和国。文件制定于公元1223年，年代确凿。

热那亚共和国紧随其后，也制定了海洋法。比萨制定同样法律是在公元1233年。

但不论是威尼斯、热那亚，还是比萨，初次制定海洋法的时间都不是在13世纪前半叶。根据专业研究者的说法，上述年份是整理统合此前已有各种海洋法的年份。

这些海洋法规定细腻，包罗万象，为后世世界各国海洋法的范本。威尼斯

共和国的海洋法最为完美。从船只大小到装运货物的品目、重量、运费、靠港费自不待言，还列入了与船只和航海有关的所有事宜。不了解威尼斯历史的人看了这些可能会哑然失笑：这不就是政府制定的法规嘛！

海洋法明确了从船主、船长、高级船员到划桨手的权利与义务，还规定了即使对待遇等有所不满也严禁在航海过程中罢工，罢工被认为是一种怠工渎职行为。有关人员可以在航海结束后向海洋法庭起诉。海洋法庭是专门的司法机构，由航海经验丰富的第三者组成，审理诉讼。不过，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市民没有人毫无航海经验。即使是眼下为国家掌舵的元老院议员，年轻时也都是为商船掌舵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海洋法中载有保障从船长到划桨手所有船员身份的事项。定期支付确定的薪金自是当然，还保证了航海中因病不能出工时的薪金。对航海中死亡、受伤的人，船主负有支付规定额度补偿金的义务。在威尼斯，包括商船在内，所有加莱船均为国有，每次航行均须租赁，船主是共和国政府。国家也同样负有支付补偿金的义务。

这就是说，在海上“工作”时，如果遭到海盗袭击，船员被抓走带到北非，被“浴场”收容或被卖为奴隶，船主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负有支付赎金予以赎回的义务。海洋法中并没有如此写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扩大解释并付诸实行亦属合理。

有如此完善的海洋法，自然会出现完善的海上保险。要想保护船员，就必须保护负有保护船员义务的船主。

同时，航海中遭遇海盗船也是一个概率问题。派船出海更多的国家，遭遇海盗船的概率也更高。来自北非港口的海盗船看到对手强大便不会下手，因而配有护卫船队的帆船商船队较为安全。但是，若因货物廉价不派护卫船，这时的商船危险性会很高。

领事在港口、“浴场”和奴隶市场，通常都有情报收集网络。即使不是本国公民，如威尼斯，一旦得知发生与本国船员有关的事件，哪怕他只是居住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划桨手，领事也都会立即采取行动。

领事首先会向当地“酋长”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反两国间所缔结协定的暴行。意大利人在实际处理方面是现实主义者。

要求释放俘虏的有效手段之一是用自己抓到的俘虏进行交换。但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不是海盗立国的国家，没有足够的俘虏可供交换。所以，这种手段只有在马耳他骑士团后来采取了与海盗同样的做法以后才得以使用。

于是，只有支付赎金这一种办法才能换取俘虏。但是，撒拉森海盗只袭击弱小者，不袭击比自己强大的人。海洋城邦国家的船员很少有人成为奴隶，因此赎买本国船员所需的费用达不到足以纠正贸易不平衡的程度。

那么，用什么来纠正贸易不平衡呢？

撒哈拉的黄金

用纯金或非常接近纯金的黄金铸造的金币有很高的价值。这种金币不是市场上通常使用的通货，但可以起到对发行国家经济实力、信用程度的计量作用。

金一直以来受到重视，原因是与银和铜相比，金绝对易于保存。我有两枚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金币，如今依然金光灿灿，简直想象不出这是2300年前的古代之物。如同2000年前古罗马皇帝们的奥里斯金币一样，黄金如果太多也会失去品位，拉丁语中的“aurum”（金），具有贵重、重要、阳光的意思，可以作为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象征。“黄金时代”一词中“黄金”的用法较之于“淘金热”中的“金”在意义表述上更为合适。

罗马的奥里斯金币在帝政时代比在共和政体时代更为普及，原因是帝政之后的罗马已把北非完全纳入了帝国的范围之内。如果只要少量的金，到处都可采到。但如果需要大量的金，就只有在骆驼背上晃晃悠悠地穿越撒哈拉沙漠运来非洲黄金了。

到中世纪的时代，非洲产的黄金已不再能进入欧洲。北非归属伊斯兰以后，欧洲通货就只有银币了。查理曼领有辽阔的欧洲地域，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因而被称为“大帝”。就连他用自己名字铸造的货币也是银币。罗马教廷发行的通货也是银币。欧洲能够开采到银。这个时代信用度高的金币只有伊斯兰世界发行的第纳尔金币。币面上只雕刻有《古兰经》的阿拉伯文字，伊斯兰人憎恶偶像。

13世纪以后，金币又回到了欧洲。

公元1251年，热那亚共和国开始发行“热那维诺”金币。

佛罗伦萨共和国紧随其后，于第二年即公元1252年发行了名为“弗罗林”的金币。

到了公元1284年，威尼斯共和国也开始发行名为“达克特”的金币。至于威尼斯为何落后于其他国家，请读者阅读《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这三个国家的金币都重3.5克。

第纳尔金币重量相同，威尼斯向伊斯兰金币发起了挑战。“弗罗林”只有18K金，而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则为24K金，纯度为0.997。这个重量和纯度一直保持到1797年拿破仑灭亡威尼斯共和国为止。



热那维诺金币（直径20毫米，3.5克，1252—1339年铸造）



达克特金币（直径20毫米，3.49克，1280—1289年铸造）



第纳尔金币（直径23毫米，2.36克，1252—1277年铸造）

优质的“达克特”金币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国际通货。在欧洲，说起金币也必是“达克特”。我手头的金币是在开罗的跳蚤市场买的，金币边缘开了个小孔。金币为纯金所制，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便以金币来保存财产。他们在每枚金币上开个眼儿，用线穿起来保管。

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上铸有当时共和国总督的名字。我的达克特金币上铸有路德维科·马宁的名字，他是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督。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东方人依旧继续持有威尼斯的金币。

在基督教世界，13世纪以前也铸造金币。阿马尔菲就曾发行过叫作“塔里”的金币。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也曾发行过同名的金币。但这些金币的重量仅为1克强，也许是想使其价值相当于伊斯兰世界使用最多的“四分之一第纳尔金币”。

此外，腓力二世发行过名为“奥古斯塔尔”的著名金币。从名称上看，这种金币制造时明显受到罗马帝国的影响，金币重5克以上，与其说其制造是为经济目的，不如说是因政治意图。

信用度高、持久性好，因而与经济振兴密切相关的金币，还有待于以经济立国的各意大利城邦国家发行。发行金币在“撒哈拉黄金”的进口得到保障以后才有可能。

从发掘于墓地的人骨调查得知，意大利居民的体格在中世纪前期突然衰退，中世纪后期才恢复到古罗马时代的水平。人们不禁会想到，这与金币

重新流行的时间相吻合。

名著《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货币不是孤立存在的史料，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各种现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料。货币是了解和理解历史的最佳指标。”

撒哈拉黄金使意大利城邦国家与北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贸易达到平衡。正因为如此，意大利的城邦国家都在北非驻领事、设商馆，与“酋长”们不断更新协定。

不过，这个历史现象只与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人们相关。在同一时代，还有居住在意大利南部、与北非没有贸易关系的人群，这些人不受海洋法的保护，不能成为海上保险的对象，也与船员之间自古存在的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工会”（scuola）没有关系。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罗马带来的和平，说得现代点就是“罗马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但是，罗马人并不认为和平与安全单靠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他国军队蹂躏就能实现。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充分保护公民不受盗贼、山贼、海盗等人类社会敌人的侵害，也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和平与个人的安全。

为了明白地说明这种“罗马治下的和平”的内容，我想在这里引用《罗马人的故事》第六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卷末的一段插曲。

> 故事发生在波佐利，奥古斯都去世前不久周游拿波里湾时停靠在这里。一艘商船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刚刚到达，乘客和船员发现老皇帝正在附近停泊的船上休息。大家便从船上齐声向老皇帝欢呼，那情景宛如一场大合唱。
>
> “拜您所赐，我们生活安康！”
>
> “拜您所赐，我们旅行安全！”
>
> “拜您所赐，我们享受着自由和平！”
>
> 不期而遇的人们献上的赞美之辞让年迈的奥古斯都龙颜大悦。他下令赐予他们每人40枚金币。但有个条件，要用金币购进物产销往其他地方。奥古斯都虽然老迈但仍是一个现实的人。只有人和物都自由地流通起来，才能提高整个帝国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第三章
两个无国界团体

我在考察长年横行于中世纪地中海的海盗时注意到，被绑架的人中没有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地位高的人和有钱的人。

我想原因很简单，地位高和有钱的人身边经常有大批护卫。中世纪中期开始，地位不高也不富有的人，只要他属于海洋城邦国家，即使被绑架也会很快获释。

随着时代的进步，海盗的目标越来越少。但在北非伊斯兰世界，海盗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没有海盗业人们就不能生存，因而海盗不能歇业。问题是把目标定在哪里、对准谁。

海盗决定袭击哪里、绑架谁的理由也很简单。

目标是防御薄弱的地方以及绑架后不会把事闹大的人。

如果掳走重要人物，就会立即成为大事件，当地统治者不得不出面打击海盗。这样，对力求避开强手的海盗来说，活动区域会越发狭小。因而海盗把目标锁定在了普通百姓。

那么选择哪里下手呢？当然会首选地中海沿海地区，但也并非所有沿海地区都可以。尽可袭击能从海上到达的基督教徒居住地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海盗的视线渐渐集中于仍然残留着浓重封建制度的专制君主的领土。富于启蒙主义精神的专制君主会关心普通百姓的安全，而对其他领主而言，农民、渔民还不如他们所拥有的牛马。即使把他们绑架到北非当奴隶，非海运国家的统治者也不会为此勉强组成舰队，拼尽全力跑去解救回来。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会竭尽全力解救被绑架者，即使他们是老百姓，只要是本国人或是与本国合作的人都会如此。但他们的积极行动只限于与本国有关的人。与其他国家相关的情报到了领事手中，如果没有特别的请求，也不会采取解救行动。但各国似乎都把情报传给罗马教廷。基督教徒也是经济动物。

总之，没有地位、交不起赎金的普通百姓的悲惨状况从来没有改善过。

即使没有值得抢夺的金银财宝，海盗也会在你的眼皮底下抢走好不容易盼

来收获的农产品。东西被抢走还算好，有时人也会被掳走。不论男女，一到适合劳动的年龄便会被掳走，好似专等着田里的收获一样。这就是生活在基督教势力不断南下的西班牙东海岸、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法兰西南部，以及西班牙系阿拉贡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普通百姓的实际情况。科西嘉和撒丁情况也是一样。热那亚和比萨一直在争夺这两个岛的领有权，但这两个国家是海洋城邦国家，没有足够的兵力保卫这两个岛屿的全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两个团体，他们都以拯救被绑架到北非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为目标。

一个是修士的组织，与神职有关，成立于公元1197年。

另一个由骑士组成，可谓是世俗团体，成立于公元1218年。

这两个团体都是超越国界的组织，这是它们的共同点。这两个团体都由历代罗马教皇控制。教皇不是主宰者，而是支持者。

我在下面列举这两个团体的活动，有一点请读者注意，这就是这两个团体的成立时间。

公元1197年正好是十字军第三次东征时期，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交锋，出手漂亮而被誉为十字军之花。公元1218年也正处在威尼斯唱主角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与腓力二世兵不血刃赢得圣地朝觐权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之间。

这两个完全不依仗武力进行拯救活动的团体，与十字军是同时代的产物。

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是修士和骑士。前者挥舞的是印有十字的旗帜，后者挥舞的是宝剑。修士和骑士都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之下，以明确的形式参战。上帝之“所愿”对这些人来说就是“夺回圣地”。

在同一时代，还有一些人认为上帝之“所愿”不仅是夺回圣地，还包括拯救那些被掳到伊斯兰地盘上受苦的不幸的基督教徒，他们因为无权无钱而无望获释。这些人一直在坚持实施拯救他们的行动。

如果他们参加十字军，必定会在欧洲正史中留名，回国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颂，也会成为流行法兰西的众多歌唱十字军歌谣中的主人公。然而，他们抛弃了这一切，不断孤身冒险来往于敌境之中。当时，异教徒就是敌人。

下面我要叙述的，就是这些人和靠他们获得自由的人们的故事。

“拯救修会”

这个修会的正式名称是“Ordo Santissima de Redemptione Captivorum”(以救济奴隶为目的而设立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修会)。

创始者是三位修士：生于法兰西普罗旺斯的约翰·杜·玛塔、法兰西王族成员菲利克斯·瓦卢瓦，以及瓦卢瓦的弟子、生于英格兰的约翰。

这个时代的欧洲，不仅热衷于十字军，各地也在竞相建造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并不缺乏宗教热情。可是，正如我在夺回圣地的章节中所述的那样，建造宏伟大教堂可以不惜重金，但救济可怜的基督教徒却并非如此。这三位修士建立修会后并没有立即行动。

时任罗马教皇的英诺森三世出手，使得资金有了着落。教皇不仅承认这个修会是基督教会的正式组织，还为其筹备了持续的财源，以便修会的活动今后能够持续下去。

教皇在罗马七山之一西里欧山的一角为修会本部提供了地点，教皇还将从罗马城墙11座城门中的4座所收关税直接交给修会。在中世纪，任何城市都要向进入市内的物产征收关税。在罗马，关税缴纳给教皇，而其中的十一分之四成为“拯救修会”活动资金的基础。拜其所赐，这个团体成立两年后便很快地开始了活动。这实属特例。

历史教科书只把教皇英诺森三世写成了一位把罗马教皇的权威和权力发挥到极致的人。其实，他还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人。他生长在罗马，成年后在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修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动向极其敏感。

腓力二世3岁就成为孤儿，是这位教皇将他培养起来，尽管教皇没有料到这位腓力后来会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叛逆儿。

教皇很早就承认了圣方济各建立的方济各修会。刚建立的方济各会以贫与爱为座右铭，其会规在当时的基督教界是革命性的，如果教皇也参与反对大合唱，也许方济各和他的同志会被戴上异端的帽子，受到火刑。对全是年轻修士的方济各派而言，教皇的承认是比其他任何物质都更重要的帮助。

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曾同意惹起争议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仅如此，他还把阿尔维翁派定为异端，甚至强行建立基督教徒攻击基督教徒的十字军。这些事都已成为教科书的内容。但是，也是这位教皇从现实的角度支持了玛塔及其同志的“修会”。

“拯救修会”的创始者是法兰西人玛塔和英吉利人约翰，从他们去世的年份推算，创建修会时当在30岁上下。这两位也和圣方济各一样，代表了天主教会的一种新潮。

他们于公元1199年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行动。年迈的瓦卢瓦留在本部，玛塔和约翰二人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目的地定为摩洛哥。有情报说那里的“浴场”中收容了很多法兰西人。

教皇要即将出发的两个人带去几个摩尔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在做海盗时当了俘虏，被投进教廷监狱，可以用他们交换奴隶。“拯救修会”的记录里没有记载摩尔人的人数。修士是带着赎买奴隶的钱出发的，那些摩尔人的数量大概不足以交换奴隶。

教皇还托两位修士带信，嘱咐他们见到摩洛哥的苏丹曼苏尔时转交给他。这封信的内容是教皇劝苏丹改信基督教。

玛塔怀里还揣着另一封信，这是西班牙阿拉贡国王写给摩洛哥苏丹的，要求保证修士在摩洛哥境内的通行安全。这是一张安全通行证，也就是今天的护照。两位修士带上了所有能够想到的“保障”出发了。

玛塔和约翰二人乘上雇来的船，离开了教廷领土上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港。从船长到船员都是老手，船箭也似地掠过摩洛哥的地中海沿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摩洛哥的大西洋一侧。他们登陆后直抵马拉喀什。在马拉喀什会见了统治当地的苏丹之子，通报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并请求协助，并递交了教皇的亲笔信。

苏丹年轻的儿子读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来信立刻大笑起来。

在北非的伊斯兰世界，人们用希腊语直接称呼基督教神职人员，叫作“帕帕斯”。帕帕斯的头头罗马教皇就是“大帕帕斯”。英诺森三世的名声似乎也传到了摩洛哥，苏丹的儿子便没有把这位教皇劝诫改教的外交失礼行为当一回事，命令手下人为“大帕帕斯”要求的另一件事——赎买“拉基克”（raqiq）提供方便。

“拉基克”是北非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徒奴隶的称呼。

这是第一次行动，与对方交流不畅，对交涉的考虑和推进方式也都不同于基督教世界。此外，不仅要在马拉喀什，还要不辞辛劳地去内陆寻找奴隶。这次选择赎回奴隶的条件是须为法兰西人，且长期被迫为奴，体弱多病。

玛塔和约翰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赎买了186名奴隶。带去的资金只够赎

回这些奴隶。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这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186人弄上船，离开了摩洛哥，向马赛驶去。途中遇到大风，他们被风吹到了西班牙西岸，落到了正在与卡斯蒂利亚王交战的摩尔人手中。

难道要让刚刚解放的“拉基克”再次沦为“拉基克”吗？玛塔豁出去了。他拼命向摩尔军的队长解释，他们正带着经摩洛哥苏丹许可而获得自由的人回国。摩尔人对“帕帕斯”的解释不以为然，但他们对苏丹很敏感。苏丹曼苏尔是著名武将，在摩洛哥以外也广为人知。

两位修士和186人得以重新上船，这次颇得风助，几天后便抵达了马赛。这186人回到没有任何可以恐惧的地方了。

这件事显示了修士约翰·杜·玛塔是一位罕见的组织者。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可怜人的回归。

码头站满了群众，船在码头的正前方下锚。曾经的奴隶幽灵般地一个接一个下得船来。他们衰弱憔悴至极，头发胡须也从未修剪，手腕和脚踝上留着铁锁链勒出的红色印迹。这些人已被当作奴隶做牛做马十多年。



手里拿着打开的手铐的修士玛塔像

起初，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鸦雀无声。居住在以马赛为中心的法兰西南部的人没有亲人不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群众中有几个人走近奴隶的队列问：在“浴场”有没有见到过名叫某某的人？有没有听说过名叫某某的人的消息？这时，全马赛教堂的钟声响起，接着挤满码头的群众欢声沸腾。

在玛塔和约翰的带领下，186名被解救的奴隶向马赛的大教堂走去，去感谢上帝。

过去的奴隶一定想尽早回到故乡拥抱亲人，但重要的仪式在等着他们。他们被带到巴黎，接受法兰西国王致辞欢迎，然后回家。

巴黎的夹道欢迎带来了巨大效果。这186名奴隶被绑架时没有成为“事件”，他们的回归却成为“事件”，这自然使得对“拯救基督教徒修会”的捐赠和志愿者人数激增。

5年后的1204年进行了第二次拯救行动。这5年的时间不是花在筹集资金上，而是用在了为提高拯救效率而进行的情报收集和完善组织的工作方

面。

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逐渐成为合作者，以后长期在背后支持着这个组织。在“背后”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为了通商关系的顺利发展，已经与北非“酋长”缔结了协定，派驻了领事，运营着商馆，不便做损害这些关系的事情。

意大利人有着比当时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关于北非的情报。他们非公开地向进行拯救活动的修士提供这些情报。不论是在修士要去的“浴场”，还是在修士与奴隶管理者之间进行赎买交涉时，他们都不会在场。伊斯兰世界将这些事委托给第三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担任了基督教徒从伊斯兰教徒那里赎买基督教徒的中间人。

第二次拯救行动的目的地是突尼斯，目的是救出意大利人。

玛塔与苏格兰人威廉这两位修士春天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借着春天最后的北风南下，一路顺风。他们这次没有携带教皇的亲笔信。英诺森聪明机智，他肯定知道带信也不会有效果。从此以后，这些事就委托给了常驻北非主要港口的意大利领事和商人了。

这一时期的突尼斯处在摩洛哥苏丹的势力之下。修士认为，苏丹已同意解救奴隶，去突尼斯便可轻易成功。

的确，他们很容易地取得了突尼斯“酋长”的许可。然而，与摩洛哥苏丹的“同意”一起传来的还有修士为了赎买奴隶会不惜金钱的情报。

这样，带去了足够赎买200人的钱却只赎回了110人。以“酋长”为首，突尼斯“浴场”大幅提高了赎金。

两位修士不想空手而归，决定即便只能赎回110人也认了。但是，当他们二人为挑选这110人来到“浴场”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派惨景，恍若来到地狱。

蜷缩，不，被抛弃在坍塌墙壁下的全是已经年老不能再劳动的人，在劳役中因事故失去一只脚或一只手的划桨手，因长年的恶劣劳动条件和营养不良生病而不能劳动的人和长年在阳光强射下劳动丧失视力的盲人。年轻苏格兰人修士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几乎瘫软倒地。

只要不是相当狂热的基督教信徒谁都会发问：为什么在此之前不改信伊斯兰教呢？个中原因是伊斯兰教禁止让伊斯兰教徒当奴隶。改信了伊斯兰教，就不会做奴隶了。而且，伊斯兰教徒的使命在于扩大“伊斯兰之家”，如果基督教徒改教，不就等于扩大了他们自己的“家”吗？

因而，实情很简单，伊斯兰方面不但没有强迫他们改教，甚至连劝说都没有。

伊斯兰教强迫改教的，只是那些要送到伊比利亚半岛去当兵打仗的人，那里正在进行着与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势力的战役。站在扩大“伊斯兰之家”最前线的“伊斯兰士兵”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此外，在做划桨手期间崭露头角，被提拔为船长或水手长的人也被强迫改教。向伊斯兰教徒下命令的人也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其他的人不如让他们继续做基督教徒更好。即使向“浴场”管理者支付一点使用费，使用奴隶也比使用伊斯兰教徒绝对便宜。

在被绑架的基督教徒中，女人几乎全部被迫改教。海盗只绑架年轻女子。伊斯兰教禁止教徒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不管是不是正式结婚，想要把她们作为家奴使用，就必须让她们抛弃基督教而成为伊斯兰教徒。这是她们的命运。在“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强制收容所“浴场”中，几乎没有女性收容者，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说明。不论条件何等残酷，仍然有人坚持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会对中世纪老百姓的影响力，应该说是精神上的约束力非常之强，强大到我们这些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以后的人们所无法想象。

而且，在一神教中，改教本身即不简单。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在伊斯兰世界会被视为叛徒。而改教在基督教世界则并非如此就可了事。

公元1232年，罗马教廷设立了宗教裁判所，裁判信徒的信仰是否正确。这里不以异教徒为审判对象，审判对象是基督教徒，包括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教徒。宗教裁判所后来成为西班牙和北欧愈演愈烈的异端裁判和女巫裁判的地方。这是它的宿命。

在这个时代，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再改回基督教的大门事实上是关闭的。即使改回来也会被怀疑是否真心。这种怀疑与被视为异端是一样的。

多神教的古代与一神教的中世纪之间的不同，在改教难度上也可见一斑。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能活下来，靠的是梦想终有一天会被救出的一线希望。我们不能责备这些人连改教这点智慧都没有。

面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哀求无论如何把自己带回家乡去死的可怜人，两位身着僧衣的修士要从中挑出110人，这比上帝的考验还要残酷。出生于普罗旺斯和苏格兰的这二位修士，硬是闭着眼睛做完了这项工作。他们要赶在“酋长”没有变卦之前让这些人上船，把他们带走。

从突尼斯到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归途奇迹般地顺利。两位修士和110个奴隶在奥斯提亚上岸后受到了与在马赛同样的欢迎。然后他们立即分船，溯台伯河而上，到了罗马。

在罗马，道路两旁以及沿途房屋的窗户里都挤满了摇铃的人。这一行人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到教廷。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打破庄严肃穆的惯例，十分热情地欢迎他们。

后来，二位修士被招进另外的房间，接受了教皇的询问。英诺森三世想知道所有的一切。玛塔说的下面这件事使教皇最为关心。

两位修士懂拉丁语，自然会说与拉丁语最接近的意大利语。他们说，听懂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所说的意大利语要花很大的力气。这些人都是意大利人，但不会说标准意大利语。他们所说的意大利语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证明几乎所有在“浴场”终其一生的不幸的基督教徒都是无权无钱的下层百姓。

教皇英诺森三世承诺，以后将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拯救修会”是超越国界的组织。罗马教廷也是超越国界的组织，其最高人物承诺继续支持，就保证有了强有力的支援者。

修士玛塔策划实施的先做出样子，再筹措资金的战略获得了完美成功。

亲眼看到同教教徒不幸身影的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必须拯救这些人。捐款和志愿者申请纷至沓来。

玛塔认为钱多多益善。

伊斯兰方面已涨了价格。玛塔还想在各个“浴场”建立医院，其实是简单的治疗所。

“修会”决定在除罗马本部之外，在欧洲各地开设分部。按现代国别，开设分部的地方有如下国家和地区：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在意大利只有总部设在罗马，而中部和南部以外的地方由海洋城邦国家暗中运作。

在欧洲历史上以十字军为代表的这个时代，“修会”以拯救基督教徒为目的，其活动这时走上了正轨。玛塔战术巧妙，他不仅依靠国王和君主的援助，也没有轻视所谓“草根”的支持。他在每座教堂里都放置了一个指针已坏无法使用的罗盘，哪怕只是直径只有10厘米的便携罗盘。弥撒结束后，

信徒们总会向里面投入一些银币和铜币。这也是他让人们保持易逝的同情心的一种策略。

公元1209年发起了第三次拯救行动，目的地是突尼斯。约翰和托马斯两位修士前往，两人都出身于英格兰。

他们春天从奥斯提亚港出发，顺利抵达突尼斯，成功赎买了394名不幸者。尽管伊斯兰方面涨了价，他们还是赎买了这么多人，可见筹集了很多捐款。赎回的人几乎都是意大利南部各地的被绑架者。

然而，就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没有料到的障碍。

修士托马斯让全体人员上船后心里松懈下来，似乎忘记了“修会”对“酋长”的承诺，居然在突尼斯中央广场上布道，赞美基督教的教义。

“酋长”虽然许可修士花钱赎买基督教徒，但却没有认可他们向伊斯兰教徒布道，传教受到禁止。这在伊斯兰世界百姓皆知。于是“酋长”震怒，派兵前来。士兵尚未到达，广场上的人们就先动了手。托马斯饱尝了他们的老拳。

幸运的是他们未被投入监狱。两位修士赶紧走人，与394人一起离开了突尼斯港。归途一帆风顺。他们在奥斯提亚港上岸后去了罗马，照例在市民的夹道欢呼声中，列队来到位于西里欧山的修会本部，然后各自回自己的故乡。

这次的宣传效果也很大，“修会”随即筹集到了足够立即再赴北非的捐款。

当年实行了第四次拯救行动。这次仍从奥斯提亚出发去突尼斯。前往的修士也依然是上一次的约翰和托马斯。

他们航行顺利，但在突尼斯登陆后遇到了麻烦。两位修士甚至未被允许进入突尼斯城。在发誓严格遵守“酋长”提出的“不准向伊斯兰教徒说一句有关基督教的话”之后，他们才好不容易进入城内。

这次，他们用带来的钱赎回了240人。在带这些人去港口的路上，有个人告诉修士，突尼斯有一个可怜的意大利少年与父母一同被海盗绑架，不久父母去世，少年被拉到奴隶市场上出卖。一个撒拉森有钱人买了他，逼他改信伊斯兰教，做他的娈童。这事在“浴场”里尽人皆知。

修士约翰下决心救出这位少年。约翰身上英格兰人坚持原则的性格似乎久已形成。他把240人登船的事情交给同事托马斯，自己亲赴突尼斯“酋长”处，当面要求释放这位少年。

“酋长”没有拒绝，告诉他说，主人似乎很在意这位少年，赎回恐怕要花大价钱。有附加值的商品价格就高，这是市场的逻辑。出售奴隶收入的五分之一要进“酋长”的腰包。赎买奴隶价格的五分之一也要进“酋长”腰包。要求支付附加价值，自己的腰包也会相应增收。

然而，即使根据市场逻辑，修士也已一文不名。于是约翰说，先确定赎回少年的价格，把少年带回去。在罗马送来这笔钱之前，自己留在主人这里当人质。

“酋长”嘴上说“你疯啦”，但还是让人叫来少年的主人，对这个伊斯兰教徒问道：“你接受站在这里的这位‘帕帕斯’的建议吗？”他还说，如果听说“帕帕斯”在这里当人质，罗马的“大帕帕斯”不会弃之不顾，少年的赎金一定会付到。

修士约翰年纪轻轻，金发碧眼，是个英格兰帅哥。

但少年的主人看到约翰毫不动心，回答说不打算卖掉少年。

“酋长”听了他的话大发雷霆。他愤怒的是一个挣钱的机会将被毁掉。他命令少年的主人把少年带来。少年被带来后，他又严厉地命令交出少年，让“帕帕斯”带走。

修士约翰打算把一切托付给同僚托马斯，于是请求“酋长”给他做这些事的时间。他带着少年向港口走去。

然而，主人并没有断念。他企图夺回少年，埋伏在去港口的路上，向赶来的修士挥起了宝剑。如果没有人前来助阵，英格兰人会被杀死。在伊斯兰世界，杀死异教徒不算犯罪。

这时，碰巧有个伊斯兰教徒路过，单看外表就知道他是个富人。这人命令随从按住了冲动的主人。

修士很感激，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个人听后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相当于“酋长”确定钱数的银币交给主人，并告诉修士，可以在下次来突尼斯时连本带利归还他这笔钱。

大概这位人物与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商人有生意关系。尽快且足额地付款是意大利商人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时的铁则。利息制度也已很完善。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债年利5%，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

船只载着连同少年在内的241人和两位修士启航。船在出港后遇到强风，漂向马耳他岛。不过，此后的航行顺利，他们在奥斯提亚平安上岸。他们

照例列队接受欢迎，领到了足够的食物和衣物，伤病也得到了治疗，然后各自回故乡去。少年的故事似乎引起了同情，教皇英诺森三世把这位孤儿带进了教皇的宫殿，为他安排今后无忧的人生。

公元1210年5月，玛塔和苏格兰人修士威廉离开罗马来到奇维塔韦基亚，从那里乘船前往突尼斯。和以前一样，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带回不幸者。这次约翰·杜·玛塔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建设他念念不忘的“浴场”医院。为此，他只能去求突尼斯“酋长”。他们还带了两名医师同行。

哪里会有医师呢？说来令人感到意外。当时医术先进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而撒拉森海盗在这里为害甚于其他任何地方。在意大利南部无论何事都会两极分化，在极尽奢华的大教堂旁边，麇集着穷人歪歪倒倒的房屋，这情景并不罕见。

意大利南部靠近拿波里的萨莱诺有欧洲最早创立的最古老的医学校。

该校创立的时期不详。研究者中有的说它创始于7世纪，也有的主张创始于9世纪。但该校10世纪时就确已存在，到11世纪已向整个欧洲的宫廷和修道院输送毕业生了。

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在萨莱诺创立医学校。不过，11世纪以后，萨莱诺医学校得到了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历代国王的有力支持。萨莱诺是意大利南部的主要城市之一，位于王朝领土的北部。

萨莱诺也是一个濒临大海的海港城市。港口流通的不仅是物产，也有人员。一种新的文明，无论内部有多么强大的后援，如果没有外部的即异物的刺激是不会产生的。

另外，医学是一门科学。如果宗教的影响过于强大，就有可能阻碍它按其自身规律成长。萨莱诺医学校非常幸运，诺曼—霍亨斯陶芬的国王们采取了使其与罗马教皇保持距离的政策。与意大利南部的另一个培养医师的地方卡西诺山修道院相比，萨莱诺医学校宗教色彩不浓，很适合做俗世的医师培养机构。

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萨莱诺医学校当初是由意大利、希腊、阿拉伯和犹太的四位医学家联合创建的，因而教科书有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书籍。教师、学生当然不会同时懂得四门语言，但大概有不少人懂得两种语言，学校规模不大，互相翻译一下也足以应付。医学是实践科学，基本靠观察。教科书即使用阿拉伯语写成，也一定不会有太大障碍，因为这种阿拉伯语有着古希腊、古罗马、犹太以及吸收了这些精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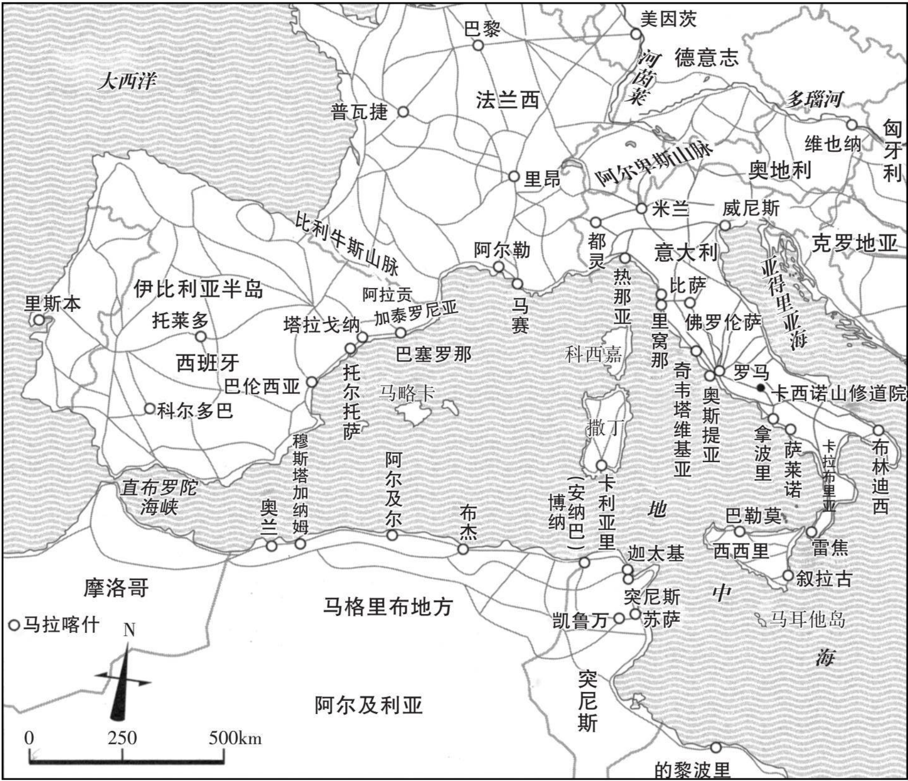
波斯而来的传承。萨莱诺医学校特别重视临床医学。

学生都是些什么人呢？

根据研究者的说法，毕业证书上有所有国家的人名。仅我所调查的范围，意大利人自不待言，有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匈牙利人，从名字上看，明显还有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还流传着学校有女学生的说法。

卡西诺山的医师学校附属于修道院，仅限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人。而同时代的萨莱诺医学校，则不分人种和宗教，至少在其鼎盛时期完全没有这种差别。

萨莱诺医学校难道不也像西西里—阿拉伯模式开花结果的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一样，是地中海世界的奇迹吗？不正是这点点滴滴在各地萌芽的奇迹汇集起来，形成滚滚洪流，掀起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拉下了中世纪的帷幕吗？



修士玛塔为建医院可能招募了萨莱诺医学校的毕业生，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不过，要设立医院就需要医师。玛塔的“修会”所设立的“浴场”医院也并非只有突尼斯一家。

公元1210年春，玛塔肩负着开设这种医院的任务来到突尼斯。他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是向那位好心的突尼斯人连本带利归还去年修士约翰所借的钱，然后立即前往“酋长”居住的城市，请求同意开设医院。

“酋长”同意开设医院，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认为，基督教徒奴隶恢复了健康，就可以让他们劳动。于是，他们开始在“浴场”一角修建医院，被收容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帮忙。

玛塔从罗马带来了药品和器械，还带来了许多填充着麦秸的垫褥。他们从被收容者中选出合适的人，让这些人做助手和护士的工作。治疗和教育两项工作同时进行。

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人们表情逐渐开朗，恢复了元气。“酋长”可能了解了这些情况，还同意了玛塔在“浴场”内建教堂的请求。也许“酋长”认为，如果奴隶们精神安定，就可以更好地劳动。如果建了教堂就要派主教常驻。于是玛塔询问“酋长”是否可以派驻主教。“酋长”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在北非伊斯兰世界中，不仅有与宗教无关的医师常驻，甚至有基督教的主教常驻。在意大利城邦国家居留区的教堂，经常会有乘商船而来的神父举行弥撒。这便是后来在伊斯兰世界也经常有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渊源。

伊斯兰世界对此事的反应耐人寻味。扩大“伊斯兰之家”在信奉伊斯兰教义的人眼里是最重要的事业。“圣战”是实现的手段，同时被视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然而对他们来说，经济也不能忽视，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实行贸易立国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成功地与伊斯兰世界维持着关系，大概只是因为经济这一点吧。在经济面前，教皇颁布的禁令不起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情并非一切顺利。在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并未停止南下，成为守势的伊斯兰势力对基督教的憎恶似乎也蔓延到了北非。这时，伊斯兰教徒就会把经济置于脑后，爆发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抗和敌意。

每当此时，“浴场”里“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待遇就会恶化，对基督教徒居住地的海盗行为也会激化。气氛险恶，但修会的拯救行动仍在继

续。

这种针对基督教徒的狂热敌意经常爆发，玛塔自己也体验过多次。有一年发生过这样的事。

玛塔和另一位修士像往常一样带着赎回的人去港口，遭到一伙手执半月刀的暴徒的袭击。已经赎回的奴隶又被扔进“浴场”。

玛塔手上负伤，脸上流着血。他就这样找到“酋长”控诉。“酋长”冷冷地答道，想带走他们就得支付双倍的钱。

玛塔已身无分文。半夜以后，有人轻轻敲响了玛塔住的房门。玛塔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身披黑色披风的男人，问道：“您是玛塔修士吗？”然后默不作声地递给玛塔一只皮囊，转身离去。皮囊里装着玛塔急需数量的银币！

玛塔用这些钱把不幸的人们再次带出“浴场”。暴徒们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改变了战术。

他们袭击了停靠在港口的船只，扯掉了所有的帆，折断了好几根桨。

奴隶们对茫然的玛塔说道：宁沉海底不回“浴场”，不论发生什么事，绝不回“浴场”。

玛塔和另一位修士脱下身上的披风，挂上桅杆。奴隶们用手紧紧拉住披风下端，做成了一张帆。甲板的木板也被拆下用作船桨。

满身疮痍的船出港了，把暴徒甩在码头，这些人在那里手舞半月刀，嘴里叫骂着“没有信仰的狗”。上帝吹来了顺风，披风做帆的船只顺利抵达了奥斯提亚。

教廷正式宣告，圣母马利亚深夜造访，留下了装有银币的皮囊。

不过，玛塔知道真相。那是意大利海洋国家的贸易商人知道玛塔的困境后，秘密筹集了银币。虽然只是寥寥数语，身穿黑色披风的人说的是意大利语。他拿来的不是金币，而是银币。金币流通有限，容易暴露出处，而银币流通广泛，暴露的危险较低。

约翰·杜·玛塔于公元1213年去世。他所创立的“拯救修会”从1199年第一次拯救行动到他去世前一年的1212年这13年间，成功救出的人数总计达到7000人。有研究者认为，这个修会在存续的500年中，救出的人数达到50万人。创立者玛塔去世50年之后，1262年被罗马教皇列为圣人。想想法

兰西国王路易，他的第六次、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两度失败，教皇给玛塔这个待遇就是极其当然的事了。

玛塔去世后,“拯救修会”也一直坚持活动。这意味着，北非海盗没有停止绑架基督教徒的行径。看一看仍在进行拯救行动的1480年，心情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不是文艺复兴这朵文明之花在佛罗伦萨绽放的时代吗？一方面是波提切利描绘的《春》给人以生的欢乐，另一方面却有人在异教徒的国度当奴隶受苦受难。这也是一个例证，证明历史并不是平衡发展的。

既然现实如此，修会分支发展到遍布地中海沿岸港口，也是理所当然。在这些分支中，举其要者就有以下这些：

西班牙西部的巴塞罗那、托尔托萨；法兰西南部的马赛；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中部的里窝那，它取代了衰退的比萨；还有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和西西里的巴勒莫。

在整个地中海拥有分支方便于出港前往北非。不仅突尼斯有“浴场”，阿尔及尔以及北非地中海沿海主要港口也都有。这些分支的任务不仅在于筹集捐款，还包括收集情报。关于北非“浴场”的情报，可以通过意大利城邦国家的领事和商人了解，但地中海此岸失踪者的情报只能靠各地的分支收集。

建在罗马西里欧山上的修会附属医院墙上，有一幅相传为玛塔让人制作的镶嵌画留存至今。画中的基督端坐中央，被铁锁链铐着双脚的白人和黑人分立两旁，感谢基督使他们恢复自由。

如果有人看了这幅画认为玛塔的“修会”致力于解放奴隶而不问肤色，因而是600多年后基于尊重人权理念的奴隶解放运动的先驱，那就错了。

中世纪与现代不同，非洲黑人是不能接受基督教洗礼的。被绑架的基督教女人与摩尔男人生下的混血儿肌肤黝黑，这些孩子几乎都被卖为奴隶。
在“浴场”的收容者中混杂着看似欧洲人的黑皮肤男人。



描绘基督与两个奴隶的镶嵌画（1213年前后）

是否生为基督教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救被收容在“浴场”中，特别是那些能够判明身份，其家庭和亲属也无力支付赎金的人。这是玛塔及其“修会”拯救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方针，即使在玛塔死后也长期坚持未变。

“拯救修会”长年坚持，成功救出了为数众多的不幸者。这只是非国家规模的一个组织的活动，令人惊叹。然而，有得必有失。这样的活动使北非海盗认为绑架有利可图，不能用作奴隶的人也能转化为钱。

结果，海盗的袭击一如既往。西欧的海军力量比伊斯兰更占优势，但海盗仍未绝迹，其原因就在于此。不怕无物可抢，抢到人便可赚钱。

但是，在任何出于善意的活动中都会发生类似的矛盾。问题只是有矛盾还要不要坚持。玛塔“拯救修会”选择了坚持。另一个设立于20年之后的拯救

团体，也面临同样的矛盾，他们也选择了坚持。这个组织不像玛塔和他的同志那样由神职人员组成，而是由骑士这一世俗身份的人组成。

“拯救骑士团”

“骑士团”是中世纪独特的组织之一，与十字军一同诞生。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保卫领土和朝觐的基督教徒不受伊斯兰教徒的袭击，“骑士团”应运而生，其设立集中于十字军时代的初期。从欧洲去中东路途遥远，朝觐者到达后极度疲惫。也有骑士团以帮助朝觐者获得休息和治疗为目的，与保卫工作并举。

在这些“骑士团”中，当时颇具实力且在历史上也很重要的骑士团名称和建立年份如下：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1024年

“圣葛斯默·达弥盎骑士团” 1118年

“圣殿（圣墓）骑士团” 1174年

“条顿（德意志贵族）骑士团” 1191年

不过，这个时期诞生的“骑士团”并非仅以中东为活动舞台。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前期很早便被伊斯兰化了。随着中世纪的演进，基督教开始了夺回运动。以西班牙人为主，组成了许多骑士团，担任了这一运动的先锋。伊斯兰教徒被他们视为敌人，这也与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样。即使与伊斯兰作战的地点不在东方而在欧洲，对参加骑士团的人而言，这无疑也是十字军作战。

“圣本笃·戴维斯骑士团” 1162年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 1158年

“圣雅可布之剑骑士团” 1175年

“阿尔坎塔拉骑士团” 1178年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 1218年

这些中世纪的骑士团正如其名称明确表示的那样，都是以剑，即以武力对付伊斯兰的组织。只有“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武力之外也从事医疗业务。但医疗毕竟是它的副业，实际情况请读者参阅我以前出版的《罗得岛攻防

记》一书。伊斯兰势力采取攻势把这个骑士团逼到了罗得岛，人称“罗得骑士团”。它后来又被赶出罗得岛，把根据地移到了马耳他岛，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本书下卷会叙述马耳他岛时代骑士团的情况，这个骑士团是盔甲重于白衣。

以伊比利亚半岛为舞台的西班牙系骑士团，其军事性质并未变化。伊斯兰教徒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但同时代的基督教徒也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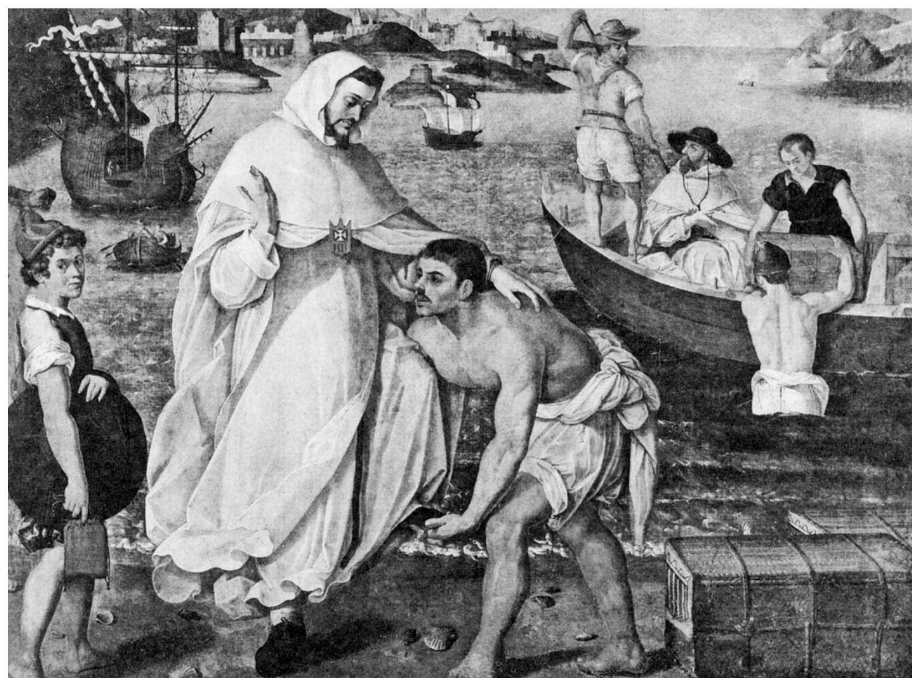
在这些骑士团中，只有“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情况特别。他们也是骑士，也同样对付伊斯兰教徒，但却一直采用非军事手段。

他们是骑士团，也遵循与同时代的其他骑士团相同的规矩。

即使是骑士团，他们也和修道院一样，要承担作为圣巴西略、圣本笃，稍后是圣方济各修士的义务。他们遵循的规则是终生独身，没有私人财产，生活朴素，以服从为美德，把一切献给上帝和基督。

修士仅被称为“修道士”（monaco），而他们则被称为“修道骑士”（monaco cavaliere）。与修道院一样，骑士团也须经罗马教皇认可才具有正当性。因而骑士团直属罗马教皇，不归世俗君主及其领地的主教管辖。

生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人骑士圣彼得·诺拉斯科于公元1218年建立了“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他恐怕，不，几乎肯定是受到了玛塔“拯救修会”的影响。由于创立者是西班牙人，骑士团正式名称也是西班牙语，叫作“Real y Militar Orden de la Mercede para la Redencīon de Cautivos”。阿拉贡王朝支持着骑士团，所以名称前面冠以“Real”。这个名称的直译大约是“以赎买奴隶为目的而建立的皇家骑士团”，但我们还将沿用意译的“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的名称。尽管都是骑士，但他们使用的手段最终却是钱，而不是武器。



骑士诺拉斯科拯救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

他们与玛塔的“修会”在性质上稍有不同。骑士诺拉斯科和他的同志认为，当然可以把自己作为人质，以解决预料之外的事件。

“骑士团”起初的活动资金是团员变卖资产的收益和阿拉贡国王赐予的资金。诺拉斯科和他的同志，都属于具有实力而富有的封建领主阶级。不过，他们在与伊斯兰教徒的战斗中，选择了与本阶级其他人不同的道路。

公元1222年，骑士团建立4年之后得到了教皇的认可，他们立即开始行动。目的地是阿尔及尔，这里是北非海盗巢窟的集中之地，与突尼斯不相上下。

骑士团带去了阿拉贡国王给阿尔及尔“酋长”的亲笔信。可能是这封信的作用，第一次拯救行动成功赎回了160人，他们回到了巴塞罗那港。阿尔及尔的卡塔洛尼亚商人收集的情报也帮了诺拉斯科的忙。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也继承了先辈“拯救修会”的做法，先向公众展示赎回的不幸者，然后募集捐款。统治阶级子弟发起的“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也募集到了来自其他富有阶层和普通百姓的捐款和志愿者。

第二次拯救行动也顺利达到目的。问题出在1225年的第三次行动。那年，根据常驻阿尔及尔的加泰罗尼亚商人的情报，骑士团决定出海。加泰罗尼亚商人认为被绑架而来、在奴隶市场卖身为奴的年轻女基督教徒是一个问题。

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然后在奴隶市场上出售，消失在买主的深宅大院。把无偿的爱献给女人也是中世纪骑士的义务之一。年轻的诺拉斯科和另一位骑士古埃尔默不能听之任之。

他们离开巴塞罗那向阿尔及尔进发，一到达就立即开始了赎买交涉。对方说，在家庭劳动的奴隶不是收容在“浴场”的人，交涉前要支付定金。于是，两位骑士只能先付定金再开始交涉。这次救赎的对象不仅是女人，还有因她们不情愿的非婚关系而出生，不知生父的孩子。诺拉斯科乐观地认为可以赎回249人。

交涉好不容易就要完成的时候，对方突然涨价，还声称没有收到定金，逼迫他们要么按照要求付钱，要么走人。

绝望的诺拉斯科无法抑制愤怒，他给阿拉贡国王写信，在信中说：“跟这帮人有理讲不通。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都做不到，遑论谈论道理。”

然而，不幸的女人和孩子们就在眼前。他们向常驻阿尔及尔的加泰罗尼亚商人借用不足的钱款。可商人的答复模棱两可，不知是不能还是不愿借。这些商人在异教之地做生意，他们不想与当地人为敌也情有可原。

骑士没有退缩。在与古埃尔默商量之后，诺拉斯科提出了另外的解决方案。先从这里带回249人，不足的钱款待抵达巴塞罗那港后交给加泰罗尼亚商人，收到钱款之前把骑士古埃尔默留在这里做人质。对方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阿尔及尔，人们也知道基督教徒遵守承诺。

就这样，船只载着249个女人和孩子离开阿尔及尔，回到了巴塞罗那。只有诺拉斯科一人没有参加阿拉贡国王也出席的欢迎仪式。他变卖了家产，正在四处筹钱。他将筹来的钱款交给了加泰罗尼亚商人，古埃尔默恢复了自由。

过了3年，1228年拯救行动目的地也是阿尔及尔。途中在海上遭遇了以马略卡岛为根据地的海盗船的袭击。带去的钱款遭到洗劫，船长和船员的个人物品也被抢劫一空。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人被掳走。这样，即使去了阿尔及尔也达不到目的，他们只好返回了巴塞罗那。

伊斯兰教徒海盗认为在公海上掠夺是他们当然的权利。在其意识中，公

海、领海没有区别，只要不被驱赶就一切自由。“拯救骑士团”虽有资金租船，却无钱雇船护航。他们毕竟是骑士。“拯救修会”出海时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拯救骑士团”的骑士们又能依靠谁呢？靠每个人的勇气吗？他们是骑士，手里却从来没有武器，也没有盔甲，不带随从。

1228年，他们遭遇海盗，被抢动劫之后只能返回。在巴塞罗那，他们计划年内再次前往北非。两位本会产生恐惧的骑士再次志愿参加了即将启程的拯救行动。

这次没有遇到海盗，赎回了290名奴隶。他们到阿尔及尔的“浴场”，倾尽所带资金，从被收容的人中间赎回了290人。

骑士应该坚强，但“浴场”里的惨状还是让两位骑士震惊不已。监督基督教徒的摩尔人没有任何理由，不，他们有“没有信仰的狗”这个漂亮的理由，动辄毒打基督教徒奴隶，用粗棍棒把他们打翻在地。奴隶躲不开，因为他们的脚踝，有的人还有手腕都被沉重的铁锁链铐住。

奴隶们被从“浴场”押到劳役场地，带着铁锁链的响声走过街道，这已经成为早晚时分阿尔及尔司空见惯的风景。遇到奴隶队列的小孩都会向被牵着前行的奴隶投掷石块，嘴上骂着“鲁米”、“狗”这些辱骂基督教徒的词语。

“拯救骑士团”的两位骑士甚至丧失了出港返回的勇气，他们不忍留下那些未被挑中而绝望的人们。他们决定，无论如何至少带回10个病魔缠身、受到虐待的基督教徒。可是，钱已分文不剩。两位骑士中的一位提出留下做人质直到10个人的钱款送到为止。对方也相信了钱款数日后便会送到的话。另一位骑士带着挑好的290人和另外的10人出发了。

然而，不曾想筹集这10个人的费用竟花去了许多时日。约定的日子已到，却不见钱款送来。伊斯兰方面暴怒。留下当人质的骑士被拉出来游街，被骂成是“拿撒勒[注]狗”。游街后骑士被剃光胡须。在伊斯兰世界，男人没有胡须就不被视为男子汉。因为“浴场”管理人的阻止，骑士才未被情绪激昂的群众杀死。管理人对前来拯救奴隶的修士已经十分熟悉，知道一旦杀掉修士，钱款就拿不到了。

幸运的是，虽有延误，钱款还是到了。伯尔纳多·德·科尔多巴骑士终于回到了巴塞罗那。

根据“拯救骑士团”的记载，这是第九次拯救行动。果若如此，从1222年开始到1228年的6年间，拯救行动共有9次。骑士们个个都是良家子弟，精力充沛，体格强健，年轻有为。

但是，数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使诺拉斯科遭到伊斯兰教徒的愤恨。

一位叫作特蕾莎的西班牙贵族的女儿与阿拉贡国王订了婚。为了结婚，她从所居住的罗马一路迤逦，来到巴塞罗那。然而，国王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已经选择与匈牙利国王的女儿结婚。

特蕾莎当然生气，声称不想在巴塞罗那多待一天，一定要回罗马。她不听路途危险的忠告，决意从巴塞罗那出发从海路回罗马。

想想当时地中海西部的状况就能预料，她遭到了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连同行的弟弟一起被带到了阿尔及尔。

因为是年轻男女，他们没有被直接送往“浴场”，而是在奴隶市场出售之前暂时被留置在一个人家。他们在那里邂逅了诺拉斯科。这个时候的诺拉斯科正在践行“拯救骑士团”的老办法——为了尽量多地赎回不幸者，自己留下做人质，被留置在“浴场”监视人的家中，等钱款送到。他不是奴隶，可以在阿尔及尔市内自由行动。

诺拉斯科一眼就看出了特蕾莎的身份。他们毕竟都属于阿拉贡王国的望族人家。诺拉斯科向特蕾莎耳语道，不能暴露身份。一旦得知她是贵族的女儿、国王的妃子，伊斯兰教徒索要的赎金必定会高得惊人。被留置的诺拉斯科并不知道特蕾莎已成不了王妃，她现在的主人海盗船船长也不知道这一点。

诺拉斯科封住了特蕾莎的口之后，先到加泰罗尼亚商人那里去借钱，然后拿着借来的钱去见船长。海盗船的船长在地中海世界被称为“raīs”。诺拉斯科向这位船长请求用这些钱赎买那位年轻女子和她的弟弟。船长也许是想尽快得到钱，接受了请求。

然而，在船长手下当甲板长的人是抛弃了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在海上抓住特蕾莎的弟弟时就觉得眼熟。他向船长告发了特蕾莎姐弟的真实身份，说他们二人不是西班牙百姓，而是有钱的贵族。

船长大为光火，痛打了拿着钱再次前来的诺拉斯科。如果不是同行而来的奴隶贩子拉架，他差点就被杀掉。在伊斯兰世界，奴隶贩子也知道送钱而来的诺拉斯科的价值。伊斯兰商人的经济感觉救了诺拉斯科。特蕾莎见状决定孤注一掷，碰碰运气。

既然贵族女儿的身份已经暴露，她也就不再否认。她甚至谎称自己将要成为阿拉贡王妃，并向船长提出了一个他从没想过的建议，该建议涉及常乘坐这条船的犹太商人。

她的方案是，如果用犹太商人的船把自己和弟弟送回西班牙，她将在那里支付巨款。船长和犹太商人都接受了这个方案，大概相信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发财机会。可是，犹太商人被独吞巨款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当天深夜悄悄让特蕾莎姐弟二人上了船，径直起航走了。

第二天早晨，船长不见了二人，便向阿尔及尔“酋长”申诉，说这一切都是诺拉斯科的阴谋。其实诺拉斯科并不知道犹太商人的谋划。但“酋长”深信基督教徒欺骗了伊斯兰教徒，大发雷霆，把诺拉斯科投入牢狱，对他说，不把与那两人身份相符的赎金送来，就休想出去！

这时，连诺拉斯科也绝望了。他只能横躺在满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牢里，忍受着身上的伤痛，心想顺利逃走的姐弟二人根本不会专门来送巨款。

然而，还不到一个星期。一天，地牢的门被打开，进来的是“拯救骑士团”伙伴之一的彼得·阿美利奥，他带来了特蕾莎交来的巨款和一封信，信上写了从逃脱到抵达巴塞罗那的全过程。从狱卒把信抢走交给“酋长”的情况来看，这一切都是犹太商人搞的名堂。

“酋长”下令释放诺拉斯科，允许他回国。“酋长”也深知诺拉斯科带来的经济效益。生意就是生意，有钱能使鬼推磨。

诺拉斯科回到巴塞罗那，没有休息，很快投入到下一次拯救行动的准备之中。他与一位同志再度出发前往阿尔及尔。但他们在途中遭遇海盗，带去的钱全被抢光，两位骑士也被押到了阿尔及尔。他们携带的由阿拉贡国王签发的安全通行申请书被海盗扔进大海，两位骑士被当成普通人，沦为奴隶。

到了阿尔及尔，诺拉斯科立即去求海盗船长，对他说：放我回西班牙，我会带来两人的赎金，另外一人可以留下当人质。

船长问道，为什么你自己不留下来呢？诺拉斯科回答，我能更快地筹到钱。然而，这位船长似乎不是“酋长”那样能听得懂话，即有经济头脑的伊斯兰教徒。他用充满讽刺的口吻对诺拉斯科说，给你一艘无帆无桨的小船，你还要回去吗？诺拉斯科接受了这个挑战。

阿尔及尔港和突尼斯都是马格里布（北非西半部）的重要港口，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大船进进出出，码头上也有许多伊斯兰船员和商人，非常热闹，还有很多被铁锁链铐着的基督教奴隶在装卸货物。

诺拉斯科一个人上了没有桅杆没有桨的小船。码头上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不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认为这是疯狂的行为。

诺拉斯科坐在小船中间，开始用两手划水。用手划水，小船只能缓缓前行。但他没有停歇，一点点靠近了码头的出入口。

刚出码头，诺拉斯科便忽地站起，叉开双腿，伸展双手，手指紧紧抓住穿在身上的披风衣襟，披风成了风帆。当时不论是修士还是骑士，男人都会穿披风。

基督教徒们不由地停下手头的活计看着诺拉斯科。在他们眼里，诺拉斯科的身影无疑就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伊斯兰教徒可能也会想起基督教徒奴隶用木板做的十字架，钉在上面的耶稣基督垂着头颅。不管遭遇多么残酷，基督徒却决不放弃十字架。

根据“骑士团”的记载，诺拉斯科数日后到达巴伦西亚的海滨。这是奇迹，一个神助的奇迹。

“拯救骑士团”此后也一直在诺拉斯科的率领下坚持活动。从建立时起到发生这件事的6年间，他们成功地实施了30次拯救行动。骑士们再年轻，也只能平均每年实施5次拯救行动。救出的人数，每次平均200人，6年间总数也达到了6 000人。这些可怜的人恢复了自由，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彼得·诺拉斯科于公元1256年去世。他在坚持拯救行动38年以后，离开了人世。

死后410年，他也被罗马教皇列为圣人。修士玛塔在死后50年时被列为圣人。我想，个中原因不仅在于玛塔和他的同志都是修士。玛塔的“拯救修会”在创立者死后，仍然顽强执着地坚持着拯救行动，尽管救出的人数不多。而诺拉斯科“拯救骑士团”的活动却有起伏。

原因之一，我认为是“骑士团”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实际关照，财源得到保障。另外，他们在全欧洲的所有教堂中都放置了旧罗盘，下了许多功夫，使大众广泛投入到拯救基督教徒奴隶的运动之中。

还有，“骑士团”是具有强烈个性的诺拉斯科为统帅的西班牙骑士所建立，并延续到他去世的组织。“骑士团”在诺拉斯科死后失去了领袖，活动中断长达37年。公元1293年重新活动之后，骑士的性质没变，但集合了西班牙以外欧洲各地前来的志愿者，强化了“无国界骑士团”的性质。这恐怕才是为不用武力拯救人质运动奉献一生的圣彼得·诺拉斯科梦寐以求的事。

我想在这里讲讲“拯救骑士团”从西班牙扩展到欧洲以后的几个故事。在异教地盘上进行活动的艰难程度与以前别无二致。而且非常不幸，随着时代的演进，无国界行动又受到国家间对抗的波及，而只想劫人越货的海盗行

径却没有停止。

公元1293年，“拯救骑士团”重新开始行动。但此时时机不好。1270年法兰西王路易率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目的地不是中东，而是北非的突尼斯。时间过了20年，北非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的恶感一直没有好转。

那年，热那亚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从巴塞罗那出发。他们刚到外海，就遭遇了海盗。了解海盗情况的船长选择了逃跑，返回巴塞罗那港。两位骑士只好另外雇船。

他们顺利抵达目的地突尼斯，获得“酋长”同意交涉的许可。但这位“酋长”并非生来就是伊斯兰教徒。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摩尔人，原本是奴隶的儿子，后来改信伊斯兰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人被纯粹的伊斯兰教徒称为弃教者、叛教者，一直有自卑感。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认为，只有比伊斯兰教徒更加残酷地对待基督教徒，才能挽回改教者的名声。这位“酋长”就是其中之一人，虽然同意交涉，却又找理由取消。

热那亚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在希腊商人家借了一个房间开始交涉。希腊商人眼红二人带来的钱财，向“酋长”告发这两人是间谍。“酋长”派兵搜查，在两位骑士的随身行李中发现了突尼斯市区地图。

骑士解释那是为外出寻找奴隶时用的，但解释不起任何作用。常驻突尼斯的意大利各国领事和商人为骑士辩护，“酋长”也置若罔闻。两位骑士被宣判为西班牙阿拉贡国王或拿波里安茹国王的间谍，处以死刑。

热那亚骑士被绑在广场的柱子上，被群众用乱石砸死。法兰西骑士被从突尼斯城墙上倒栽葱推下摔死。二人带来的赎金被希腊商人和“酋长”平分。“拯救骑士团”第64次拯救行动未能成功。

7年后的公元1300年，意大利和法兰西的两位骑士成功进行了第67次拯救行动，从突尼斯带回了228人。

公元1302年，第69次拯救行动又获成功，带回218人，目的地也是突尼斯。

1306年，生于佛罗伦萨的名为诺维洛的骑士和另一位骑士一同前往阿尔及尔。“酋长”先同意了，但看到诺维洛已年迈，又改变了主意。“酋长”不但以定金的名义收取了赎金，还把诺维洛投入监狱。佛罗伦萨人没有挺过牢里悲惨的日子。他是死于牢狱还是被杀，情况不详。我们所能知道的确切情况是诺维洛死了，同行的另一位骑士好不容易才回国。这就是第73次拯救行动的结果。

在同一年，法兰西人骑士和另一位骑士也实施了拯救行动，地点是博纳，即现在阿尔及利亚东端的安纳巴（Annaba），当时以海盗出海港闻名。他们得到了当地“酋长”的同意，付完了将要带回的108人的赎金。就在这时，他们见到了借房附近住着的一位年轻西班牙女人。她被绑架来后在奴隶市场卖身为奴，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做了买主的小妾。法兰西骑士向女人说教，说要把她赎回去，她应该在故乡开始新生活。已经对人生绝望的女人动了心。这事被主人发觉。

在伊斯兰地盘上不论对谁说基督教教义都被坚决禁止。“酋长”接到主人申诉，将法兰西骑士投入地牢。白天与其他基督教徒奴隶一样，在采石场干重活。

消息传到“拯救骑士团”总部所在地巴塞罗那，一年后惊动了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国王派出特使，与博纳的“酋长”交涉放人。交涉成功，但条件不详。第二年，已经付了赎金的108人和法兰西骑士回到了巴塞罗那港。这就是第74次拯救行动的结果。这位法兰西骑士名叫迭戈，一年多来，在残酷的环境下身心俱损，回来后不久便去世了。

偶尔也会发生夹着笑话的插曲。公元1317年春，十字军运动偃旗息鼓，意大利骑士亚历山德罗一行二人从巴伦西亚港出发前往突尼斯。他们也雇了犹太人，“骑士团”以前拯救基督教徒行动一直雇用他们。亚历山德罗告诉中间人伊斯梅尔说，要优先挑选“浴场”收容者中有病的人。于是按照这个条件进行了挑选，赎买的交涉也已结束。

这时，这位犹太人说，我家也有一个生病的奴隶，请把他也买走吧。意大利骑士决定先到伊斯梅尔家去看看这个奴隶。

只看了一眼，亚历山德罗便哑然无语。这个奴隶不仅病重，而且已经处于濒死状态。他断断续续地向自己国家的骑士诉说，死也要死在意大利，不能死在异教的土地上。

既然是“拯救骑士团”的一员，就不能把这话当作耳旁风。但骑士已身无一文。于是亚历山德罗说，这个奴隶的赎金送到以前，自己留下来当人质。

生病的奴隶在一旁听到这话样子大变。踏上故乡土地的愿望给了他力量。趴在地上的他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

犹太人伊斯梅尔见状大惊。他问亚历山德罗：难道你能创造奇迹吗？意大利骑士回答说：如果说这就是奇迹的话，那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创造的。犹太人还是说：“基督？胡说！很久以前他在耶路撒冷被处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奇迹啊？”

亚历山德罗骑士便把基督教义耐心地说给这位犹太教徒听。伊斯梅尔完全感动了，竟说也要改信基督教，改教后去巴伦西亚，做一个基督教徒生活下去。

但是，“酋长”只给被赎买的奴隶和两位骑士发了出港许可。于是，亚历山德罗对伊斯梅尔说，以索要自家已恢复健康的奴隶的赎金为由和他们一起走。伊斯梅尔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说不但自己和家属要上自己的船一块儿走，为了骗过码头的官员，让骑士也上自己的船。两人说定了这事。

未曾料到，在伊斯梅尔家干活儿的摩尔人佣人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酋长”。

“酋长”派出的贝都因人警备队到达码头时，两艘船都已起航了。载着奴隶的船已到港外，犹太人的船载着骑士尚在港内。骑士亚历山德罗只能看着船只远去，自己却被抓住，押到了“酋长”面前。

在伊斯兰的地盘上，哪怕是向犹太教徒说教基督教义也被禁止。“酋长”以违反此条之罪判处骑士火刑。

意大利骑士被绑在广场中央的柱子上，周围挤满了群众。堆积如山的木柴被点燃。群众不断向人体火柱投掷石块。傍晚开始下雨，那火终于被雨浇灭。

夜半过后，几个从“浴场”偷跑出来的奴隶走近焦黑的柴炭堆捡拾尸骨，回到“浴场”分给大家，每人一片，用绳子拴好，当作圣物挂在颈上。这是第84次拯救行动的结局。

公元1350年，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二位骑士把阿尔及尔确定为拯救行动的目的地。进展一切顺利。船只满载着近200名赎回的奴隶准备出港，这时人们发现，一个拿波里女子不见了踪迹。这人年纪轻轻就被绑架到这里，改信了伊斯兰教，后来和许多女人一样做了买主的妻子。即将出发时，她对回故乡在基督教世界生活生出了恐惧。二位骑士只得撇下这女人出发了。这是第112次拯救行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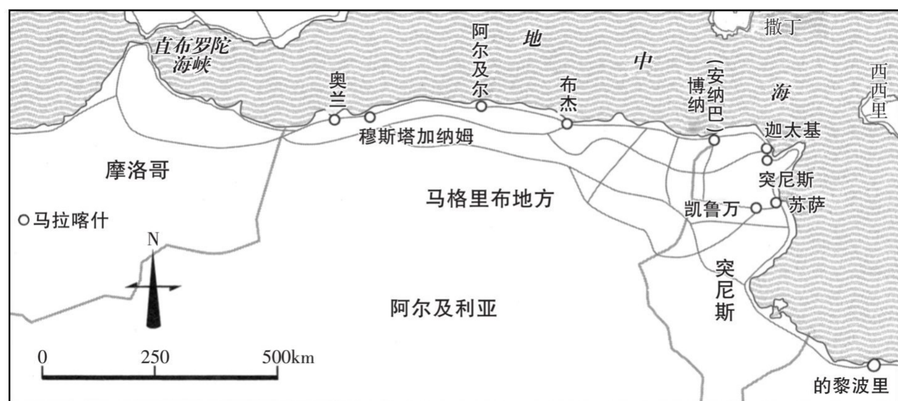
类似这种情况很常见，在整个拯救北非基督教徒的活动中，罕有成功救回女人的例子。

这期间，不论是玛塔的“修会”还是诺拉斯科创立的“骑士团”都在坚持活动，从未停止。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舞台都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城市，有下面一些原因。

第一，北非从西向东的瓦赫兰、穆斯塔加纳姆、阿尔及尔、贝贾亚、博纳（现在的安纳巴）、突尼斯、的黎波里等都是海港城市，也是撒拉森海盗

的根据地。收容绑架来的基督教徒的“浴场”规模大，收容奴隶的数量也多。拯救行动也只能集中在这些海盗集中的地方。

第二，这些城市的“酋长”都已经适应了这两个组织的拯救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懂得经济方面的理由。拯救行动没有当地“酋长”（相当于总督）的许可就不能成功。常驻当地的欧洲领事和商人提供的情报也是进行拯救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



北非

第三，是治安方面的原因。在北非伊斯兰世界，“酋长”的影响力也只限于沿海地方，一旦进入内陆，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以贝都因人为首的盗贼团伙横行霸道。内陆地区也有基督教徒奴隶，尽管人数比沿海地方少。不过，进入内陆地区寻找奴隶，即使是伊斯兰教徒也有危险，更何况基督教徒。第166次“骑士团”的拯救行动就表明了这一点。

公元1430年，两位生于托斯卡纳的骑士深入内陆寻找奴隶。他们把赎金装在皮囊里放上驴背，顶着灼热的太阳，徒步离开了突尼斯。

可是，旅程不到一个星期便结束了。跟踪而来的贝都因盗贼夜里袭击了骑士，抢走了他们所带的一切，把两人绑在岩石上，用乱箭射杀他们。突尼斯“酋长”把他们被秃鹰啄食得狼藉不堪的遗体交给了佛罗伦萨的领事。

另外还有人虽未遇害却被盗贼作为奴隶，10年后才好不容易回国。也许是因为“拯救骑士团”的成员都是骑士，与修士的“拯救修士会”相比，同样的拯救行动却更富波澜。下面介绍的插曲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有一年，深入突尼斯内陆的法兰西骑士在行进途中遇到一个人，没有戴脚

镣但戴着铁制项圈，一眼便知是一个“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这人上了年纪，衣衫褴褛，可能是饥饿的原因，他脚步蹒跚。骑士问道：“你是谁？”

老人用意大利语回答：“我生在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在一个沿海小村当教士。有一次，海盗来袭，我被绑架卖身给这附近的村民当奴隶，也不知已经过了多少年。”老人继续说：“有没有什么吃的？一大早就干搬石头的活儿，但什么都还没有吃。”

年迈的意大利人一边嚼着递过来的面包一边说：“现在是撒拉森人的斋月。进入斋月，他们不吃东西，也不给我们吃东西。可是，太阳落山后他们吃饱喝足，却只给我面包和水。”

骑士心生怜悯，但要向前赶路，便说一起进村给他买食物。老人却回答说：“那怎么行！耽误了活计我会被主人毒打。”骑士说下次来一定把你赎回去。说完心情黯然地与老人分别。然而，赎买老人的机会不会再来，这位法兰西骑士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在内陆地区，欧洲人还是很惹眼的。村里有人看见他给老奴隶面包，和老奴隶说话。其中一个人向突尼斯“酋长”告发。

虽然“酋长”同意了法兰西骑士的拯救行动，也只好把他关进监狱。“酋长”并未打算判他死刑。有传言说有几个年轻人不知在哪里得到许可，去牢里给骑士送食物，骑士与年轻人说了话，“酋长”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这五位年轻人是在西班牙塔拉戈纳学习的学生，在附近海边游玩时遭到海盗袭击，被带到了突尼斯。这类事情在海盗横行的当时并不稀罕。

他们被带到船上就开始遭到拳打脚踢。这五个人都意识到，等待自己的命运只有被在奴隶市场上卖掉或去“浴场”。毕竟是学生，他们很快寻找打开局面的途径。在命运尚未向不幸的方向转舵之前，他们改信了伊斯兰教。抵达突尼斯港口时，海盗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五人被安排在伊斯兰教导师那里从头学习《古兰经》，然后被迫与柏柏尔族女人结婚生子，每周五去清真寺，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活了下来。他们都还年轻，得知法兰西骑士被投入监狱之后便以送面包为由接近他。

其中有一个西班牙青年在坦言了他们的情况之后问道：“您认为我们该怎么办？”法兰西骑士回答道：“如果无论如何都想回到祖国，就必须忏悔自己抛弃基督教义之罪，必须在伊斯兰教徒的面前声明回到基督身边，哪怕这样做对你们意味着死亡……”

听到狱卒的报告，“酋长”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五个年轻人被禁止出入监狱。伊斯兰社会严禁基督教的布教行为。“酋长”没有对骑士处以在广场中央执行火刑，而是减少牢里的食物，让他渐渐衰弱而死。就这样，法兰西骑士被杀害了，好像是自然死亡。

“酋长”选择这样的屠杀方式，是因为这个时期正与拿波里有些交涉，而拿波里处在法兰西安茹王朝统治之下，他不想把法兰西骑士之死搞得沸沸扬扬。无国界是“拯救骑士团”活动的理念，有时也并非与国家间的事务毫无关系。

这是15世纪中叶的故事。在佛罗伦萨，高唱人的尊严的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时期，“骑士团”成功地进行了第185次到第195次共计11次拯救行动，帮助3 000多不幸的人们恢复了“人的尊严”。

与此同一时期，有一位骑士被置留北非10年以上，后来终于回国。他留下了对下面问题的回答。这位骑士也是在前往北非进行拯救行动时，遭到海盗袭击被俘，所带的安全通行证无效而被卖为奴隶，被强迫干重体力活。后来他终于回到祖国。

“请你谈谈被囚禁在巴尔贝利亚（北非西部）的人们的真实状态。”

“用语言无法表达，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长期以来，我也是一直按照买我的主人的命令从事重体力劳动，从荒地上搬走石头，开荒种地，在采石场凿石运走。我的体格和体力都不适合这种重体力劳动。干活稍慢一些，主人就会发怒，每次都会辱骂我，对我拳打脚踢，还经常用鞭子抽我。

“能暂时在‘酋长’奥特曼身边干活就是我的幸运了。每当想到没有我这样运气的人靠什么信念活下来，我就会黯然伤心。”

奥特曼“酋长”让这位骑士在宫殿里干活儿，是因为中世纪后期，欧洲进入了各国重组的时代，伊斯兰世界也开始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需要懂得其语言的优秀官僚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活动。工作几年之后就可以让骑士如愿回国，可见奥特曼“酋长”也是一位富有外交感觉的人。“拯救骑士团”在欧洲已是家喻户晓，其中的一位骑士回国，一定会给西欧各国留下良好印象。

即使这位骑士已经讨厌再看到伊斯兰世界，也不会有人去责怪他。但是，在上述谈话后的第二年，这位骑士却又去了阿尔及尔。他要充分利用“酋长”表示的好意。这第185次拯救行动带回来的是300多名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老百姓。

第195次拯救行动进行于公元1480年。以往对于“修会”和“骑士团”活动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年爆发出来。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两个拯救团体的活动使北非海盗意识到赚取赎金的效用。他们竭力寻找、袭击防守薄弱的地方。只要绑来人就行，即使付不出赎金，也会有“修会”和“骑士团”替他们支付。

第二，支付赎金赎买的做法导致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伊斯兰世界更加富裕。

于是，时任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公布废除令，废除了历代教皇一直承认的减轻向这两个团体捐款者罪责的特赦令。

当年9月，“骑士团”的两位西班牙骑士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人数锐减至56人。失去了教皇的特赦，募集捐款不再顺利。

翌年开春，冰雪消融，“拯救骑士团”的代表路易斯·德·罗斯里奥斯赶赴罗马。他带着前一年9月救出的56人直接与教皇谈判。

“这些人生活在无法想象人类能够生存的悲惨境地之中，仅靠要回故乡的希望才活了下来。在北非，光是有名的‘浴场’里就有瓦赫兰、穆斯塔加纳姆、阿尔及尔、贝贾亚、博纳、突尼斯等多处，里面都塞满了基督教徒。他们被残酷地对待，做着重体力劳动。有谁一旦不能劳动了，他只能等死。”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只能收回成命。他甚至还向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统治者们和领有拿波里、西西里的阿拉贡国王写去亲笔信，请求他们向这两个团体进行资金援助。罗马教廷自然也不例外。两个团体得以再度募集到捐款，重新开始拯救行动。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在好坏两重意义上，都是文艺复兴时代教皇的典型代表。梵蒂冈美术馆吸引游客最多的“西斯廷教堂”(Capella Sistina)就是他建造的，教堂名称意为“西斯图的教堂”。这位教皇邀请波提切利、基尔兰达约、佩鲁吉诺以及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画家在教堂里左右各画了一幅壁画。天穹和正面是后来米开朗琪罗所画。这位教皇迈出了用古代和文艺复兴的杰作创造梵蒂冈美术馆的第一步。然而，颁布废止捐款特赦令又收回成命的也是这位教皇。

15世纪后半叶之后，高唱“人的尊严”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席卷佛罗伦萨，也波及到了罗马，而拯救被绑架的不幸基督教徒的行动也仍在继续。就在达·芬奇挥舞画笔、米开朗琪罗挑战大理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在

地中海不远的对岸还有“浴场”，还有很多不幸的人被锁链锁着，被强制劳动。就在米开朗琪罗完成西斯廷教堂天穹壁画同一年的公元1513年，“拯救骑士团”从突尼斯成功救回200人。

公元1779年，这个骑士团进行了最后一次拯救行动。10年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历史进入启蒙主义时代，但还有需要拯救的基督教徒奴隶。

“拯救骑士团”成立于1218年，从1222年进行第一次拯救行动开始，其活动整整持续了557年之久。这期间，他们实施了344次拯救行动，平均一年半多一点儿一次。

较之“修士会”，“骑士团”留下了相当多的史料，较易追溯其活动。但我们仍不可能准确掌握救出的总人数。每次救出的人数不到100人时，很多就不做记录了。“修会”也同样如此。因此，我认为还不能轻易否定有些研究者主张的“修士会”和“骑士团”合计救出的总人数达到百万人的说法。不管怎样，这两个团体的活动都持续了500至600年之久。另外，在此期间，在拯救行动过程中殒命的修士和骑士也不计其数。

这两个团体都彻底贯彻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只拯救那些因无地位而国家不出援手，因无钱财而付不起赎金的人。他们救出的人中没有一位是名人便证实了这一点。坚守铁一般的原则长达500年以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彻底。

唯一的名人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他于公元1571年参加了黎凡特海战，一只手被打成残废，在回故乡西班牙的途中被海盗掳走。他在阿尔及尔的“浴场”过了两年的奴隶生活。28岁的塞万提斯曾经一度尝试逃跑，但未成功，双手双脚被套上镣铐，成为重点监视对象。他被“拯救修士会”赎回，恢复了自由。《堂·吉诃德》是他被赎回以后创作的，这位为世界文学增光添彩的塞万提斯，当时不过是个无名的可怜人，是一个被“修士会”和“骑士团”作为拯救对象的普通百姓。

“浴场”是收容伊斯兰教徒称为“拉基克”（基督教徒奴隶）的地方。这是一种什么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我所知，没有一本书可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根据想象描述。这是一个在市内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地方，我想，这是不是古罗马时代公众浴场的废墟呢？罗马人建造的大型建筑中还有斗兽场和圆形竞技场，但一般都在市外。市内的大型建筑只有以广场为中心的古罗马广场和公众浴场。

伊斯兰教徒比同时代的基督教徒有更强的卫生观念，并不把洗澡视为罪恶。但是，要使用罗马式大浴场，却不是只要有建筑物就能办到的。首先，为给大浴场供水，水道必须能用。供水之外，燃料和人员的组织也不

可或缺。在所有方面不形成组织，罗马式大浴场便不能发挥作用。

伊斯兰教徒在罗马帝国东部也修复并使用罗马时代的浴场，但不是全部。而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北非，就连部分恢复使用也未做到。这些罗马时代的大浴场虽成废墟还剩屋顶，伊斯兰教徒是不是把这里作为收容奴隶的强制收容所了呢？

有这种“浴场”的海港城市几乎都是罗马时代就有的城市。只要是城市，古罗马人都会在那里建设公众浴场。

现代辞书只解释说强制收容所称为浴场，但那称呼不是自古就有，而是沿用中世纪伊斯兰社会对强制收容所的称呼。古代罗马人那么喜欢洗澡，用艺术作品装饰大众浴场，使之成为“百姓的宫殿”。无论如何不能想象，这样的古罗马人会把收容俘虏和奴隶的地方称作“浴场”。不过，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

在现代，地中海已经没有海盗出没了。海盗何时从地中海销声匿迹的呢？

那是公元1830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兰西殖民地以后的事。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法兰西人征服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为了标榜全面消除反对《人权宣言》的海盗业，而是为了将其作为本国的殖民地。不过从结果上看，事实是以法兰西为首的西欧各国殖民北非之后，地中海终于摆脱了海盗的威胁，从我们叙述至此的时代之后一直到19世纪前半叶，海盗始终出没于地中海。

海盗既然是社会现象之一，也就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简而言之，绿底白色的月牙转变成了红底白色的月牙。

---

1. 拿撒勒（Nazareth），又译纳匝勒，基督教圣城之一，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北部。传说耶稣在该城附近的萨福利亚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译者注。

年表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476	蛮族出身的将军奥多亚克举起反旗，战胜皇帝的军队，逼迫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退位，西罗马帝国灭亡。		（中国）萧道成灭宋建齐（479）。
565		查士丁尼皇帝统治37年后去世。	（中国）陈霸先灭梁建陈（557）。
568	伦巴底人南下入侵意大利。		
570		穆罕默德诞生于麦加。	（中国）陈国灭亡，隋朝建国，中国全境统一（589）。
613		穆罕默德开始布教。	
632		穆罕默德去世。	（日本）开始派遣遣唐使（630）。
634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哈里发完全称霸阿拉伯半岛。	
635		伊斯兰势力征服大马士革，迁都于此。	
636		叙利亚被伊斯兰化。	
642		伊斯兰势力征服亚历山大，埃及伊斯兰化。	
644	伊斯兰势力征服的黎波里；昔兰尼加（今利比亚）伊斯兰化。		
651		波斯萨珊王朝灭亡；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化。	（中国）伊斯兰教传入（651）。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652		从亚历山大出发的海盗船袭击西西里首府。从此，海盗入侵基督教世界。	
670	北非第一个由阿拉伯人建设的城市凯鲁万在突尼斯以南 150 公里的地方建成。		
698	伊斯兰势力征服迦太基，北非全境处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		（中国）武则天即帝位建周（690）。（日本）迁都藤原京（694）。
700	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两岛遭撒拉森海盗袭击。		
704		凯鲁万的地方长官宣布开始“圣战”，袭击西西里南岸。	
705	撒拉森海盗从凯鲁万出发袭击叙拉古。		
710	伊斯兰势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伊比利亚半岛。		（日本）迁都平成京（710）。
727	撒拉森海盗船从北非出发，袭击西西里南岸，绑架居民。		
728		叙拉古的拜占庭军队迎战撒拉森海盗，惨遭败绩。	
732	撒拉森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入侵法兰克，在普瓦捷平原被击退。		
734	突尼斯建成伊斯兰造船厂。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744	以帕维亚为根据地的伦巴底人国王利乌特普兰德去世。此后伦巴底人再度回到以前的分散状态。		（中国）唐朝将军高仙芝在怛罗斯河畔与伊斯兰军队作战败北（751）。
762		伊斯兰势力建成新都巴格达，由大马士革迁都。	
800	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授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		（日本）迁都平安京（794）。
814	查理曼去世。		（日本）最澄从唐朝回国，开创天台宗（805）。 （日本）空海从唐朝回国，开创真言宗（806）。
816	教皇利奥三世去世。		
827	伊斯兰军队在西西里登陆，在马扎拉—德尔瓦洛附近的平原与拜占庭军队作战获胜。北非伊斯兰教徒开始征服西西里的历程。		
828	受教皇之命博尼法乔伯爵进军凯鲁万获胜，解救了被绑架的基督教徒。		
829	伊斯兰大军从突尼斯出发，在罗马以北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港登陆并占领该港。此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也成为海盗的目标。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830	在托斯卡纳过冬的伊斯兰势力进军罗马，失败。组建完成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最大规模的伊斯兰军队。以阿拉伯人为主的第一队袭击巴勒莫。拜占庭军队未来救援。		
831	巴勒莫陷落。此后伊斯兰势力完全征服西西里西部，并向东部扩大势力，西西里成为海盗袭击意大利南部的基地。		
835	坎帕尼亚的拿波里与巴勒莫的伊斯兰地方长官缔结友好同盟条约。此后撒拉森海盗将目标转向普里亚。		
840	威尼斯海军在塔兰托港外大败于撒拉森海盗。		
843	受伊斯兰势力攻击，墨西拿陷落。西西里北部归于伊斯兰统治。		
846	北非各地的伊斯兰势力在西西里集结，经意大利南部进军罗马。再度为罗马城墙所阻。掠夺城外的教堂。罗马和意大利中部、南部各城奋起反击，夹攻伊斯兰势力。		
847	撒拉森援军从西西里和北非赶到，与法兰克王兼意大利王鲁多维科率领的防卫军在陆上作战。决战前加埃塔港外暴风雨突起，直击撒拉森军队，征服罗马以失败告终。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849	春，撒拉森海盗在托斯卡纳北端的鲁尼登陆，大肆掳掠。然后继续北上，横扫从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海岸到法兰西南部地区。教皇利奥四世号召意大利各城市组成防卫军，在奥斯提亚港外迎战伊斯兰船队。猛烈的西南风袭击伊斯兰船队，捕获众多俘虏。（《奥斯提亚海战》）		
860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多维科二世接受罗马教皇的请求，在意大利南部与撒拉森军队作战，遭到惨败。		
877	教皇约翰八世会见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各城市代表，欲说服其不要与伊斯兰结为同盟，未果。 约翰八世以一年之内不再掠夺意大利半岛西部为条件，向撒拉森海盗支付2.5万枚银币。 西西里“酋长”从巴勒莫出发，进军叙拉古。		
878	春，伊斯兰势力再度开始进攻叙拉古。9个月攻防之后叙拉古陷落，伊斯兰统治西西里全岛。		
879	撒拉森海盗再度开始掠夺意大利半岛。约翰八世向意大利王、法兰克王、德意志王请求救援未得理睬；向已经与伊斯兰势力逐渐建立通商关系的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苏莲托请求共同作战又遭拒绝。		
882	约翰八世去世。 撒拉森海盗袭击、破坏圣温琴佐修道院。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915	拜占庭帝国摄政皇后佐伊与巴勒莫“酋长”签订协约，以不攻击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为条件支付2.2万枚拜占庭金币，但仍然遭到协定范围以外的北非海盗的袭击。		（中国）唐灭，后梁立，进入五代十国时代（907）。
916	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奇维塔韦基亚。加利格里阿诺失陷。教皇约翰十世号召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组建军队，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加利格里阿诺。经过了3个月战斗，肃清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第勒尼安海沿岸的伊斯兰势力。		
925	撒拉森海盗袭击布里亚的奥里亚，杀害6 000人，绑架1万人去北非。		
934	撒拉森海盗袭击热那亚。		
948	撒拉森海盗征服意大利南部雷焦。		
963		拜占庭帝国皇帝福卡斯败给撒拉森军队。此后拜占庭帝国再未尝试与撒拉森海盗对决。	（中国）宋立（960）。
975	法兰克王肃清盘踞在法兰克南部圣特罗佩老巢的撒拉森海盗。		
982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率领德意志和撒克逊士兵组成的军队南下意大利，与撒拉森军队决战，遭到惨败。		
1002	阿马尔菲舰队击退袭击贝内文托和拿波里的撒拉森军队。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004	威尼斯舰队击退袭击亚得里亚海海港城市巴里的撒拉森军队。		
1005	比萨舰队击退扫荡卡拉布里亚的海盗船队。		
1012	比萨和热那亚的海军并肩作战，击退海盗穆塞托。		
1016	逃进布里亚加尔加诺山里的布里亚豪绅请求朝圣归途中的诺曼骑士从意大利南部驱逐拜占庭和伊斯兰势力。		
1017	诺曼骑士与布里亚的意大利人着手从意大利南部肃清拜占庭势力。		
1024	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成立。		
1037	诺曼人肃清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和伊斯兰势力。		
1038	诺曼势力征服意大利南部以后开始进攻西西里。		
1061	罗杰率领的诺曼人再度进攻西西里。		
1066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		
1072	诺曼人占领巴勒莫。		
1086	诺曼人占领叙拉古，统治西西里全境。		
1087	教皇维克多三世号召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组建抵抗伊斯兰的军队，进攻凯鲁万港外港马赫迪耶，成功救出基督教徒。		
1096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出发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099		第一次十字军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1147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王路易七世参战。		（日本）保元之乱（1156）。（日本）平清盛任太政大臣（1167）。
1174	圣殿骑士团成立。库尔德人萨拉丁再度统一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民族与突厥民族之间的争斗终结。		
1189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法兰西王腓力·奥古斯都、英格兰王理查参战。		（日本）坛浦之战中平氏一门灭亡（1185）。 （日本）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1192）。
1197	修士约翰·杜·玛塔等人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支援下创建拯救基督教徒修士会。		
1199	拯救基督教徒修会从奇维塔韦基亚出发前往摩洛哥，成功救出 186 名基督教徒，经马赛回国。		
1202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欧洲各国君王不理睬英诺森三世的号召，只有佛兰德斯和法兰西的领主参加东征。		
1210	拯救基督教徒修会在突尼斯的奴隶收容所内建立医院。		
1213	修士约翰·杜·玛塔去世。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218	西班牙骑士圣彼得·诺拉斯科建立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		(日本)北条氏开始执政(1219)。(日本)承久之乱(1221)。
1222	教廷承认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骑士团出发前往阿尔及尔拯救基督教徒。		
1223	威尼斯制订海洋法。		
1227	西西里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特烈二世召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来到耶路撒冷,与伊斯兰势力媾和。		(日本)道元自宋回朝,开创曹洞宗(1227)。
1230	比萨与突尼斯“酋长”签订在突尼斯保护贸易安全、设立商馆和教堂的协约。热那亚迅速仿效,缔结内容基本相同的协约。		
1231	腓特烈二世与伊斯兰势力更新承认西西里人安全和贸易自由的协约。		
1232	罗马教廷设立宗教裁判所。		
1248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召集第六次十字军进攻埃及,遭到惨败,路易九世被俘。		
1251	威尼斯与突尼斯“酋长”缔结在突尼斯保护本国国民安全和行动自由、设立领事馆和商馆的协约。 热那亚开始发行热那维诺金币。		
1252	佛罗伦萨与突尼斯“酋长”签订贸易安全和设立商馆、教堂的协约。佛罗伦萨开始发行弗罗林金币。		(日本)开创日莲、法华宗(1253)。
1256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的诺拉斯科去世。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262	罗马教廷将约翰·杜·玛塔封为圣人。		
1266	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灭亡。路易九世的弟弟查理成为新统治者。		
1270	路易九世组建第七次十字军前往突尼斯，路易九世病故。		(中国)蒙古人创建元朝(1271)。(日本)元军率高丽军队远征日本失败(1274)。(日本)元军再次入侵失败(1281)。
1284	威尼斯开始发行达克特金币。		
1291		巴勒斯坦基督教势力最后堡垒阿卡陷落。十字军时代结束。	
1297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将路易九世列为圣人。		(日本)足利义政建成银阁(1483)。
1480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废除减轻向拯救基督教徒修会和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提供捐赠者罪责的特赦。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第195次拯救行动前往阿尔及尔，因捐赠锐减，只带回基督教徒56人。		
1453		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拜占庭帝国灭亡。	(美洲)出生于热那亚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2)。

公元	地中海西部	地中海东部	世界其他地区
1481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的代表路易斯·德·罗斯里奥斯向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请求撤回特赦捐赠者的废除令。		
1513	米开朗琪罗完成西斯廷教堂天穹壁画。		（美洲）葡萄牙的费迪南德·麦哲伦通过麦哲伦海峡（1520）。
1571	塞万提斯从军参加黎凡特海战后回西班牙时被海盗绑架。		（美洲）13 个殖民地宣布从英国独立（1776）。
1779	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最后一次拯救行动。		
1789	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7	威尼斯共和国灭亡。		
1830	法兰西入侵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殖民地。		